

真正的力量，发自内心

心 胜

心胜则则衰

《苦难辉煌》作者 再创新理念

金一南★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



微信扫一扫

ISBN 978-7-5354-6777-5



9 787535 467775 >

定价：36.00 元

金一南★著

心胜则兴 心败则衰

心胜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胜 / 金一南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54-6777-5

I . ①心… II . ①金…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3263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王黛君

装帧设计 | 视界创意

版式设计 | 宋欣谣

媒体运营 | 张 坚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9.25

版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90 千字

定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战胜对手有两次
第一次在内心中

战胜对手有两次

第一次在内心中

选 目

序言 /009

一、强军之梦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是我们的重任。

军人生来为战胜	/014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016
记住甲午，知耻后勇	/018
和平年代无英雄？	/027
力量可以从天而降，思想不会	/041

二、将帅之风

除了战争，别无所虑；除了胜利，别无所求。对这样的老兵来说，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战术家，都不是桂冠。“枕戈待旦”才是真正的桂冠。

本色最无敌	/056
含而不露的静水	/059
艰难困苦，元帅功成	/070
三个不能忘记的名字	/077
战将帕夫洛夫：一颗被遗忘的流星	/088
战将朱可夫：胜利的象征	/093
战将基尔波诺斯：死不瞑目	/096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104
阿里尔·沙龙：完美谢幕	/109

三、战略之思

领导者的判断出错，胜利的希望即会渺茫，此时部属的鲜血或许能够力挽狂澜，或许不能。尽管世上无人不犯错，但一定要避免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战略思维出错。

什么在决定成败？	/114
重心、枢纽和关节	/116
民族的致命伤	/120
强烈的问题意识	/123
风险在安宁中积累	/127
稳定的利益，漂移的目标	/138
认识与把握国家核心利益	/142

四、战争之道

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仗。当左右战争胜败的地缘政治因素大大超过军事技术因素的时候，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不能仅仅是几件高技术兵器了。

美国人念念不忘的三场战争	/148
研究失败——美军的警醒	/158
兵贵神速的奇迹与尴尬	/159
伊拉克战争：咬牙唱下这出戏	/161
潘多拉盒子与拉登之死	/163

五、前事之鉴

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中，我相信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大清王朝的四次说“不”	/178
一支开炮前就已失败的军队	/186
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196
一封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通信	/198
大挫折造就大变革	/205

六、和平之履

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

“中国威胁论”——谎言也在编历史	/210
反战的心态与迎战的实力	/216
运河回归：没有帝国日不落	/219
柏林墙的尴尬	/224
历史是什么？	/229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担当	/232

七、他山之石

这支缺乏传统，甚至开列不出像样军事思想的军队，也是一支作战理论、战斗方式、军队条令更新最快的军队。其包袱之轻、新理论对旧理论否定之大胆，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那个最不该谈论战争的国家	/236
国家之父也是军队之父	/242
研究雷锋和孙武的美国军人	/273
那些美国女兵	/275
美国国防大学见闻	/283
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印象	/289

八、民族之魂

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之时的精神历练与灵魂展示。

我们中国人	/296
无名烈士墓·界碑·国徽	/297
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300
海纳百川·壁立千仞	/302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振兴	/305

序 言



穷，不仅指物质，也指精神。

弱，不仅指体格，也指内心。

1919年，清华大学教授马约翰赴美进修，看见中国同学大部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心里难过。他后来一直对学生说四个“要”：“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儿什么，你们也要能玩儿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马约翰对学生说的四个“要”，不仅指体格，更包括内心。

1947年，人民解放军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关键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一连问了四个“敢不敢”：“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毛泽东问周围人的四个“敢不敢”，强调的也不仅是态势，更包括内心。

这就是心胜——首先在心中战胜对手。

心胜，并非胜利的全部，却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造成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我们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太缺乏胜利激情对心灵的滋养和陶冶。不但出现了贾桂

那样让他坐他都不敢坐，还要说一声“站惯了”的标准奴才，而且产生出那些签了不平等条约，却以让外国使节走杂役走的偏门获得心理平衡的昏庸官吏。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何等的猥琐与可悲。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描绘这类精神萎顿之人，被欺压侮辱后千方百计用自我设计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这不是内心强盛的表现，恰恰是内心极度虚弱的表现。它导致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衰亡。

人活着，必须要有精神。

精神是什么？

是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光明。

内心有力量，精神才有定力。

内心有光明，力量才有指引。

我们今天这个高速发展、充满梦想、充满动荡、充满变化、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社会里，几乎人人都充满着力量期待。政要们的力量期待，多属于物质期待；设想GDP发展到某日，国家拥有了何等财富，一切头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军人们的力量期待，则多属于装备期待；设想先进武器发展到某日，三军拥有了一流装备，前面所有障碍便都所向披靡。这些期待并非没有道理，却怕永远难以实现。一个人，一支队伍，如果内心缺乏力量而期待外在力量弥补，那么不管外部力量多么壮观，恐怕都难以支撑。

真正的力量，首先发自内心。

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才几个人、几杆枪，就发出史诗般的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靠什么？靠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靠强烈的历史进取心。正是出自内心的必胜信念和坚定意志，其话语才空前铿锵有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再看看那个瘦骨嶙峋的圣雄甘地，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办事处，也没有权力，随身带一只山羊，以羊奶为食，周游贫困乡村和污秽城市，以自己蒙受苦难的方式唤起别人觉醒。就是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穿着单薄、终生主张非暴力的人，摧毁了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体系。为核武器发明提供理论支撑的爱因斯坦也由衷赞叹：“我们的下一代子孙恐怕很难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过这样一个人。”

再看看穷困潦倒于英国的马克思，因为交不起房租，多次被房东撵得搬家，

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馆的《莱茵报》前编辑能有什么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却掀翻了多少王座、颠覆了多少独裁者、解放了多少民众、改变了多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其巨著《资本论》，东西方不知有多少经济学者今天又开始重读，寻找走出由于资本的贪婪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途径。

毛泽东、甘地、马克思，完全不具备今天我们认为取胜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当他们怀着内心百折不回的执着走向世界的时候，表面看一无所有。但今天全世界都承认，他们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给全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制胜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格——一句话，来自他们的内心。

真正的胜利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实现了心胜。

人类从大地上拾起第一根木棒，在大山中点燃第一堆篝火，在大石上磨出第一把利器，就开始了寻找制胜力量的漫漫旅程。

黄金时代过去了。

白银时代过去了。

青铜时代过去了。

黑铁时代过去了。

巫术试过了。

图腾拜过了。

八卦算过了。

风水看过了。

内燃机也发明了。

原子弹也爆炸了。

空间站也穿梭了。

互联网也普及了。

寻找制胜力量过程中越来越焦灼、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茫然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

圣经说：内心的光明若失去了，黑暗何等之大。

反过来看，内心有一盏明灯，世间哪里有暗夜。

新中国六十多年风雨跌宕。我们经历过贫穷，也享受着富裕；应对过危机，又面临着挑战。所有这一切，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庞大的精神财富，构建我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内心定力。

何须拿别处的阳光照耀自己。

人人内心都埋藏着星火。

点燃它——

让它燃成火炬。

北京红山口—上海浦东

一、强军之梦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是我们的重任。

军人生来为战胜

面前有一张表格：1936 年底世界各大国陆军力量比较。

它令我万分吃惊。当时中国陆军 220 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 25 万人，世界第八。此时距七七事变仅差半年多一点。

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

再往前翻。1860 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 18 000 人，法军 7200 人。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其皇帝天不亮就仓皇出逃“北狩热河”，这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纪录。

1900 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人，义和团拳民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以二万人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项纪录。

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从来不讲道理的，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讲究实力。义和团虽数十万之众，但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和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仍是以卵击石。如果谁人多兵多谁就得胜，恐怕中国早已无敌于天下。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 7335 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抗

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 6127 支、轻机枪 254 挺、重机枪 75 挺、迫击炮 24 门、步兵炮 24 门、野炮 36 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败得如此之惨。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如钢铁一般冰冷。战场的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而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人民解放军中有一位在战争年代打出传奇色彩的名将粟裕。人们皆知其辉煌战绩，却鲜知他为胜利付出的心血。他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地形、看地图。胜利了，进城了，在繁华的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和平生活持续几十年，每晚就寝前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

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位一生未经历战争，却一生为未来战争准备不已的苏宁。古人形容常备不懈是“枕戈待旦”，苏宁从军 23 载，23 载他都枕着叠放军装的梆硬的包袱皮。别人整晚整晚聊天看电视，进餐厅歌舞厅，他整晚整晚缩在简陋的小屋里，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

人要有点精神，军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从大将粟裕到少校苏宁，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人民军队过去制胜的精髓，和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也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胜利的给予总是那么吝啬，为什么从古至今，胜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访美期间，我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军人对中国军人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出于礼貌或者客套，而且的确出自他们的内心。美国人自视甚高，能放在眼里的人不多，为什么对中国军人情有独钟？

后来，我发现他们一个特点：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了亏的对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三场战争，前两场都与遏制中国有关。三场战争中，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

对这三场战争，美国军人自有比较。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了。他们或许能记住一两篇描写志愿军的文学作品，对以下这些比任何文学描写都更加震人心魄的数字却不知情。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三十八军只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则只有45辆。

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三十八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志愿军当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 1100 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36 门 75 毫米高炮，还要留 12 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最初带入朝鲜的，竟然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 24 门。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当时美国飞机从朝鲜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司令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几乎遇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斗，迫使不可一世的远东美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的。

当时志愿军作战艰难困苦的情况，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对曾与之对阵的中国军人怀有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地表现在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当年到过朝鲜的美国军官，在回忆录里皆印象深刻地描述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甚至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两军的相识。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在零下 40℃ 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以他们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我们应该骄傲。我们也应该惭愧。我们千万不能吃尽这一老本。我们也应该为明天的中国军人留下点什么。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挑战。当今世界军事新发展给中国军人带来的挑战，其严峻程度与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前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所面对的局面。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迫切于高科技知识积累，迫切于复杂技术装备掌握的今日中国军人，更迫切于当年战场对手也不得不衷心叹服的精神底蕴。那种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精神风貌，是新中国

军人展示在世界面前光耀千秋的无价之宝。我们以这样的精神风貌迎接挑战，便是为明日中国军人地位最好的奠基。

挑起今天重担的中国军人！

记住甲午，知耻后勇

东方人和西方人都热衷于百年纪念。缘由和方式虽然各异，但通过此或回忆光荣，或领略启示，或召唤未来却是共同的。

有时搜寻出的百年纪念是令人难堪的，有些人宁可忘却。一百多年前，爆发了一场使中国遭到空前屈辱和失败的甲午战争。

肯定有人问：这有什么好回顾的？又不是什么光荣。

我们已经习惯于回顾胜利和光荣。我们多么不习惯没有掌声和笑声的纪念。若让总是喜气洋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的节目主持人来主持，该有多么难堪。满台的流光溢彩，似乎瞬间变成了百年前孤零零洋面上无人顾及的破甲残片。

还有若干细节问题。1894年7月25日，发生丰岛海战。9月17日，大东沟海战。11月7日，大连失陷。次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全军覆灭。到底该以哪一天，做这个沉重的纪念日呢？

哪一天都是流血的创口。不在哪一天，在你有没有想到它。其实不论你想到也好，未想到也好，丰岛、大东沟、镇远、定远，这些在现代人视野中早已消失的盲点，都会在那一刻重新浮现，苍白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忘却和未忘却的人们。

我们并非那么健忘。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年代，每个人上台都能倒出一两本血泪账。那多是个人之苦。若一说苦就是吃糠咽菜，我们记忆的圈子就太狭小了。不吃糠咽菜就不苦了么？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只惦念个人之苦的，容易被个人之福满足。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和毛泽东。那一代遍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记住的创痛是民族的创痛，首先惦念的富强是国家的富强。

为了记住国耻，要记住甲午。知耻而后勇，首先要知。不对“耻”进行艰难、

沉重的思索，就不能期望勇会来得多么猛烈、多么持久。记住它，你从历史中采摘的就不只是几枝耀眼的花朵，还有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军界有句名言：胜利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同样我们还可以说：失败是不需掩盖的。并非邓世昌一句“撞沉吉野”，我们就可将光荣的花环斜挎在悲怆的胸前。作为军人，更应记住那锈铁一样斑驳的事实：吉野未被撞沉，致远号却被一枚鱼雷击沉。

不知道有多少教训、创痛和遗憾随同那支舰队沉入海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反复打捞搜寻，一百多年过去了。以一个多世纪的光阴来思索，时间不能算短。上个世纪末风云变幻，这个世纪末依然风云变幻。今天追忆甲午，我们并非仅为朝烟波浩渺的黄海投下几枚孤寂的花圈，而是要通过那个空前惨痛的教训，再次体味中国军人承担的民族责任和历史责任。

记住那些日子，就是记住我们神圣的使命：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兴奋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红军突围西征，他腾出手来精心布置的“湘江追堵”。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摩拳擦掌，捏着一封封电报，对照钉在四壁的地图，核实各路大军到达位置，一分分削减红军实力。最后认为红军牺牲很大，但地方实力派追堵不完全尽力，意犹未尽。

第二次是在红军鲁班场战斗失利，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他判断红军此时举棋不定，是因大政方针未定，已无处立足；于是调集川、滇、黔、湘军及中央军，在川南黔北一带大修碉堡，以为用江西的老办法，在川黔边一举围歼红军。

第三次便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

当时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昆明，而滇军主力全部调入川黔，昆明城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龙云十分恐慌。蒋通过空军侦察发现红军在昆明附近又掉头北上，与幕僚研究后，判定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增援昆明的薛岳掉头向北，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部署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

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六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

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月9日，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以整整六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其间会理会议也开了两三天。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已经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部署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5月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说的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刘伯承就是凭手中掌握的六条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呢？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六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四十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于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八根二号铁丝绳，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有一次，毛泽东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时，毛泽东等人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进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而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在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便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做出了迅速改变。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5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入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十三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攀援那十三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的原因。

“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十三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途中还打掉了瓦坝驻防刘文辉的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日凌晨两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

林彪的左纵队已经在九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

林彪的速度更快。

《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了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28日清晨，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达的命令：

王（开湘）、杨（成武）：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彪）、聂（荣臻）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是在泸定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十里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

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每每在关键时刻，林彪不但是一个像样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像样的政治鼓动者。限期夺占泸定桥的电报，平型关战斗前连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上的演说词，都是在交代艰巨任务的同时，给部队以坚强有力的鼓舞。

一军团二师四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之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二十八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林彪就是在这个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叶挺独立团的见习排长，到南昌暴动中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到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二连连长、一营长、团长，靠这支部队打出了威名。1933年在江西永丰滕田整编中，该部编为一军团二师四团。第一任团长萧桃明，第五次反围剿时在大雄关战斗中牺牲。第二任团长耿飏。遵义会议后王开湘继任第三任团长。

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

是在滚进。”

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

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战争中的巧合，也是二连。

安顺场担任首船突击的，是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泸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肖克。这是红军中一支著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泸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二十二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一幅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十七勇士。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二十二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十七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

明、丁流民、陈万清。

泸定桥二十二勇士只留下三个人的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十八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十八勇士，指冲过泸定桥后活下来的那十八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十八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十七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十八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虽然没有免死牌，但这也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午夜赶到泸定桥。这场他未见的夺桥战斗令他激动万分，虽然已经凌晨两点，也不愿休息，非要去看桥。

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提了盏马灯，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踏上桥面。

刘伯承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向桥东。自1912年进重庆将校学堂起，他从军已经23年。其间经无数胜败，见无数兴衰，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1916年参加护国军讨袁，丰都一战，他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穿出。德国医生实施手术，七十余刀，三个多小时时间，他端坐不动，被医生叹为“军神”。右眼已经是假眼了，视力不好，他还是对泸定桥上的每根铁索、每个铁环看了又看。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中国革命由此将徒增多少牺牲，徒增多少艰难！

现在两路终于会合了！

刘伯承最后在桥中央停下了脚步，扶着冰凉的铁索护栏，看着脚下奔腾汹涌的河水，他使劲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此时此刻，军神的左眼一定渗出了泪水。

和平年代无英雄？

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

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可以说那是战争年代。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没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有些微合理的部分：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

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的森林之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奋勇扑救，缚住了肆虐的火龙。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在湍急的决口中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溃堤，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队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会聚北京小汤山，像勇士集团冲锋那样，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在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后，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这位被命名为“新时期硬骨头战士”的勇士后来返回部队与战友共度八一节，当他坐在轮椅上被鲜花簇拥着出现在礼堂的时候，2000多名官兵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欢迎勇士凯旋。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广州日报》于2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大幅照片，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当时广州最低气温只有4℃，只有极度的疲惫，才能在这样的温度中以站立的姿式睡着。摄影记者拍下这感人的瞬间，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央军委向部队下达“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的命令，成都军区领导也发出“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的号召。但空中路线被复杂气象阻断，陆航团直升机多次试降无法成功；地面道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多支部队的摩托化开进被堵塞。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苍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也就是说，军队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在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1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其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须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

战略服务。1999 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 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还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不同的职责使命，不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 1500 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 5.6 万士兵和 7600 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 11 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 16 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 2005 年 8 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的原因。这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

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是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时光变迁，军队的职责使命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

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我军的职责使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变化。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时候，在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时候，在勇敢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时候，在倒塌的废墟内倾听微弱的呼唤、然后舍生忘死投入救援的时候，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又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仅2008年以来，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执行藏区维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快速反应和“一跃而起”的能量

抢险救灾，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出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2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的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地震发生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5月13日，又有1万余名官兵及救灾装备空运至成都地区，中国航空史和我军历史上单日空运兵力最高纪录被改写。5月15日，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行动在川西北展开。

速度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质量，速度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掌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和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主要担负下列任务：（1）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2）保护重要目标安全；（3）抢救、运送重要物资；（4）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5）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军队可以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从以上任务之中就能明白，“一跃而起”的反应速度在其中的分量。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从客观因素看，首先因为灾难救援中挽救生命的时间实在有限。经过汶川大地震，“黄金72小时”几乎无人不知，“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早已深入人心，生命救助成效已经成为判定行动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成为激发军人忘我拼搏的最高境界。其次因为灾难中局面容易失控。如果前期不能控局，后期处理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是为什么中外专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最初几个小时的动作，决定整个灾难处理的成本的原因。没有速度就没有主动，没有速度就会失去对

局面的掌握。

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军队具有力量集中、分布广泛、机动方式多样、指挥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些都是快速反应的基本要素。别人反应慢了，可以找各种理由求得原谅；军队反应慢了，一千条理由也难获得一次原谅。正因如此，军事力量历来是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首要手段、关键手段和最后手段，其作用无法被其他力量所取代。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订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人，其中解放军31万人，武警官兵5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等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建国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了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

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的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达成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凌晨，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300人到达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

2008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救灾官兵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寻找短板——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和强化？

毫无疑问，人民军队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流的反应能力。

同样毫无疑问，我军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方面。

第一是空中机动，特别是通过直升机机动超越复杂地形障碍的能力。

当很多部队冒着山体滑坡危险、徒步强行军翻山越岭进入重灾区后，《解放军报》记者报道说：“我军‘铁脚板’的硬功夫，让一些老将军由衷感慨：成建制、远距离、负重、持续的强行军表明，我们战士的身体素质以及战术素质，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信息化建设中，我军的传统优势并没有丧失。”

发扬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在信息化建设中，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军应该，也必须具备一些全新的能力。

汶川大地震造成公路、铁路阻断，地面交通网线严重受损，出现了直升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我军装备直升机数量少，地方单位拥有的直升机数量也不多，成为救灾突击力量中的明显短板。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陆军平均每万名官兵装备直升机在 100 架左右，全世界平均每万名陆军官兵装备直升机也达到 14 架，我军陆军每万名官兵平均装备的直升机数量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被明显感觉出来了。

军队的一位兵器专家分析说，直升机“数量不足必然导致训练以及使用经验上的不足，配套设备不完善。尽管参与救灾的机务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合格的技术水平，但地理环境的限制、气象条件的限制、训练水平及专业配套设备的限制，制约了直升机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这一评价中肯且透彻。

2005 年，美国政府和武装力量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救援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因为拥有大量直升机，一旦到位，24 小时内就进行了超过 1000 架次的直升机起降。这一方面说明其军方和民间拥有足够的直升飞机用于救援，另一方面可看出其航空管制能力很强，可以指挥如此大密度和高强度的空中行动。这同样是我军在今后救援行动中需要大力加强的领域和方面。

第二是远程投送能力。

远程投送能力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准，是保持军事行动主动权的基础支撑。国内救灾的兵力调动，我们可以依托国内公路网、铁路网，还可以动用各大航空公司的空运力量，那么超出国境线的国际救援行动呢？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有大量国际义务，完成国际救援任务在所难免，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决不会仅限于国内区域。

以 2005 年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为例，当时各国出动的力量如下：

英国：3 艘舰船、6 架大型运输机、2 架直升飞机，380 人。

美国：2 艘航空母舰，3 支救援舰队、19 艘各类型舰船，90 架直升飞机，13 000 多人，是越战结束后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法国：1 艘航空母舰、6 架直升飞机，1000 多名官兵。

德国：1 艘供应舰，2 架直升飞机，一所野战医院，36 名专家和 100 名队员。

日本：3 艘舰船，陆上自卫队 100 人，空中自卫队 230 人，海上自卫队

640人，还有一支58人医疗队。

俄罗斯：2架IL-76运输机，1架直升飞机，若干救援队员。

新加坡：2艘舰艇，数架“大力神”军用运输飞机和直升机，军队医疗组，3000名士兵。

中国：中国国际救援队（由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某集团军工程部队、武警总医院有关人员组成），共计230人。

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230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国际航班抵达印尼，最后是转乘新加坡提供的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才抵达班达亚齐救灾第一线的。事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提供的救援资金不如美国和日本多，后勤支援能力也不如美国，只能眼看美国军舰迅速驶向灾区，眼看美国军用直升机向灾民运送最急需的物资。

《纽约时报》说了一些实情，又瞒了一些实情。美军的航母编队开进、飞机起降、油料损耗、人员补助等费用，全部算入救灾款之中，其提供的那笔钱最后几乎被自己花完，所谓“救灾款”，实际上不过是一次练兵费用。中国的救灾款项却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衣服、被装、食品、药品等，但由于我们缺乏将这些物品送到灾民手中的投送工具，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军的运输和投送。于是一段时间内，印度洋海啸救援出现了“美国大兵分发中国物资”的奇景。参加救援行动的中国同志回国后万分感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必须具有像样的远程投送能力，才能让其他人尤其是灾区难民知道，中国是真正负了责任的。

所以大飞机项目在中国终于上马。2007年底，温家宝总理说：“让大飞机飞上蓝天是国家意志，不仅必须做，而且一定要成功。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第三是复杂条件下的信息保障能力。

就覆盖范围来看，可分为“小”信息能力和“大”信息能力。

“小”信息能力即地区内的通信能力。汶川地震使该地区通信台、站、网受到毁灭性破坏，正常通信联络受到极大阻碍。人们看到我军首先进入灾区核心区域的指挥员，基本是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其他通信工具基本无效，随后灾区内多军种、多部队之间的通信也不断产生问题，只要没有民用手机信号，通信联络就出现障碍。可见就“小”信息能力而言，我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大”信息能力指从更大范围把握特定区域宏观情况的能力。

英国路透社报道，汶川地震第二天，即5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5月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卫星（ALOS）观测的四川地震地区资料图。同一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

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家共有9种型号的15颗卫星为救灾提供支援，但其中的遥感遥测卫星不多，特别是由于最初几天灾区上空阴云密布，只有雷达探测卫星的波束才能穿透云层拍回地面图像，使我们在救灾的初期阶段通过太空了解掌握灾情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开展了嫦娥探月工程，但国家在轨卫星数量少、军用卫星数量更少的现实和探测感知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的现状，在救灾过程中显露出来。

5月12日15时30分，汶川地震发生一小时后，中国国家航天局启动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成员提出卫星数据申请。5月13日14时，日本航天局向我提供了ALOS遥感卫星拍摄的受灾地区雷达卫星遥感图片。5月17日，美国Digital Globe公司中国代理向我提供了“快鸟”卫星拍摄的5月14日、15日、16日三天的高分辨卫星影像数据。5月19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中国提供了首批非保密卫星图像。截至5月19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七个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遥感影像技术支持。

每个中国人都十分感激汶川大地震中各国救援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管这种支持和帮助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资金的还是技术的。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主导国际援助，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的需求很大，空白很多，必须保持清醒。“一跃而起”的快速反应能力是瞬间的能量爆发，它依赖于长期的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

2008年结束之时，已经成为我们新一轮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的开始。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核心军事能力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武装力量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许多大国都把军队执行与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军事变革的重要方面，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成为军队建设的新兴领域。

但仍然需要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并非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就新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核心军事能力依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我们依然需要牢记我军存在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克服“两个不适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离开了这一核心能力，其他能力只能成为摆设。只有强化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获得坚实可靠的能力基础。

第二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检验、培育和辅助生成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新形势下增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平时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我军经常性、现实性的重要任务，遂行这一任务的过程，就是对我军现有理论、机制、装备、训练的检验过程。例如，2008年抗击雨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救援这两场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检验了部队的政治素质、战备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全面锻炼了各级指挥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处置能力，是平时时期军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一次珍贵实践，更是对我军应对突发事件的难得考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深刻地分析说：抗震救灾不是打仗，近似打仗，是一场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对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使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军队的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决定了我军承担军事任务的多样化：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

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苍海横流之中，我军的传统在继承，我军的使命在延伸，我军的职能在扩展。

苍海横流之中，努力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与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军徽的光芒

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曾经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是否还能

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回答这个疑问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半个世纪的和平，人民解放军以两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群众有难、急需帮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雷锋；当国家有难、强敌虎视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的苏宁。

雷锋和苏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代表，八一军徽在他们头上闪出了夺目的光辉。他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欢乐里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危难中人们却离不开他们的精神。人民解放军的血脉，通过这样优秀的军人在不息地流传。他们与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和朝鲜战场上的勇士一样，永远与军队同在，与军徽同在。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时空，嵌入了军徽的辉煌之中。我军的职能，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里。

世界上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离不开军人的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在于千千万万个雷锋和千千万万个苏宁。那些在茫茫瀚海中驻扎南沙高脚屋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滚滚洪水前死守荆江大堤的空降兵官兵，那些长年累月巡逻于边疆大漠的边陲卫士，日日夜夜攻关于试验室、为我军新型装备呕心沥血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八一军徽不竭的力量源泉。如同一支歌中唱的那样：“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才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看到了超级霸权如何凭借武力，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先例，也看到了一支军队失去军威，一个国家便失去国威的教训。世界风云变幻，周边风云变幻，形势在提醒我们：要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必须以我们的奋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行列。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阅兵方阵雷霆万钧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做证，“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仍在唤动我们胸中的热血。那一片片灿烂军徽中发出的口号山呼海啸，即是全军将士致祖国的钢铁誓言。

真正的中国军人，军徽的光芒便是他的生命。这光芒不仅在帽檐上，更在心中。

力量可以从天而降，思想不会

没有飞行器，就没有空降兵。

飞行器与陆上力量的结合，使一个全新的兵种从天而降——不论伞降还是机降。

这就决定了这个新兵种并非通过传统陆军猛烈的火力、厚重的装甲、沉重的辎重显示其威力。它的优势集中体现在跨越、速度、突然性和瞬间爆发力这些关键要素之上。

这也决定了这个新兵种是一个处于陆军和空军结合部的兵种。它以空军的运载工具、空军的行动空间和空军的飞行速度，遂行陆军地面军事行动任务。这个年轻的、全新的兵种应该归属陆军还是空军？抑或做一个独立的兵种独立遂行作战任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安全需求，不同的军事理念，产生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至今在世界各国也没有统一。

一句话：兵种从天而降了，理论却无法从天而降。

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来在决定着人类的战争方式。

人们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就以什么样的状态作战。

空中力量诞生之前，所有国家的军事行动都是平面的。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到诸葛亮的“八阵图”，从腓特烈的斜形战斗队形到拿破仑的散兵，战斗方式的变化仅是发生在平面空间的变化上。即便战斗由陆地发展到海洋，由陆军衍生出海军，作战界面也不过是由地平面延伸到海平面而已。

空中战场和电磁战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空战场的开辟不过百年，电磁空间的军事开发利用时间更短。时间虽短，但影响巨大。军事行动不但由二维空间延伸到三维、四维空间，而且把数千年传统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样式搅得面目全非，使传统军事思想、传统军事规范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

人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态。

军人跟不上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也是军事领域中的常态。

这就是为什么用传统军事手段应对新型军事挑战的失败事例比比皆是，以超前思维构建新型作战力量从而成功应对未来挑战的事例却十分鲜见的原因。传统思想的统治与影响如此久远，以致现今大多数兵家典籍所描述、记录与总结的，仍然是基于单一平面的军事实践。理论落后于实践，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比其他领域更为明显，这也印证了恩格斯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

树常青。”

就新中国来说，长期以来推动我军空降兵发展的动力，来自国家安全形势的需求。

新中国的首支空降部队成立于1950年，当时称为空军陆战部队，直接目的是准备用于解放台湾。20世纪60年代初组建空降军，则是因为台海、中印两个战略方向形势紧张，必须组建和增强具备战略机动能力的部队。

形势所迫，一直是我军空降兵发展的最大动力。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推动下，世界进入一个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冲突也日益丰富多彩的时期，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紧密交织。虽然由于相互毁灭的存在，大国尤其是有核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陆上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但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使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现。部分中小国家借助与大国的军事联盟，在地缘空间争夺方面表现得日益咄咄逼人、愈加好勇斗狠，也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2013年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主席说：“现阶段我国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但因外部因素引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低估。”这是对当今我国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也是对军事斗争准备形势任务的高度概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之中，空降兵具有全域机动、隐蔽快速、远程直达、非线式作战、精确打击等特点，十分有利于国家在和平年代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中，实现静态威慑与动态出击的有机结合，从而把握斗争的主动权，营造有利于己方的安全态势。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差异巨大、内外矛盾丛生，以及领土、边界、海洋权益纠纷不断的陆海复合型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大国的安全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空中突击力量不但可以作为国家战略重拳，而且是塑造形势、慑止战争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传统战争中逐步升级、大规模毁伤、无休止缠斗、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作战方式，日益转化为在有限时间和有限空间，采取有限手段、实现有限目标的全新军事斗争方式。过去的“大吃小”——以兵力、火力、装备的全面优势战胜对手——正在变成今天及今后的“快吃慢”——在有限时空条件下以快速反应、快速输送、快速行动，用快速果敢的战役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的——成为新世纪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军事能力。正因如此，地面力量的空中突击化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普遍和主要趋势。

近些年来，我空降兵部队以快速机动部署、联合军事演习等对敌威慑行动，以及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积极配合国家政治、外交斗争，彰显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对于打击各种分裂和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任何制胜法则的产生都是需要有条件的。空降兵有效突击的基本条件，一是空中投送的条件，二是掌握制空权的条件。前者要求具有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空中投送作战部队的能力，后者则要求能够在特定区域基本掌控制空权的能力。这两个能力不具备，大力发展空降兵就成为空谈。而这两个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军的短板。我军空降兵建设长期发展缓慢，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基于此。

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思维。我军长期以积极防御、持久作战为指导思想，以“集中优势兵力”为军事原则，以“不打第一枪”为行动准则，以“后发制人”为历史经验，无形中从主观思维上限制了空降兵这支从来强调孤军深入、以少胜多，从来要求先发制人、先声夺人，从来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新军种的军事运用和发展。在投送能力和制空能力较为落后的时候，这一矛盾基本被装备落后的现实所遮蔽和掩盖了。但当装备改善已是明显事实，这个矛盾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强调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却也必须十分注意，装备层面的跃进，并不能同步产生思维层面的跃进。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防投入的显著增加，军事装备研制生产能力获得明显提高，引进机型也不断到来。这就使得长期制约空降兵发展的投送能力（大型运输机）和制空能力（先进战斗机）出现了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最显著的跃进。过去由于国家航空工业不能提供数量和质量都能满足投送需求的战略运输机，我空降兵不仅在兵力投送能力方面受到很大制约、火力投送方面受到很大制约，同时在空降兵运用思想方面同也受到很大制约。现在的情况正在出现重大转变。一批批新型战斗机飞上祖国的蓝天，引进的大型运输机也开始陆续到位。更重要的是2013年初，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完成首飞。随着该型国产大型运输机今后进入空军序列，我空降兵一次投送更多建制兵力和建制火力的能力将大幅度提高。这一天正在日益逼近。我们为它的到来做好准备了吗？当装备改善已是明显事实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思想滞后也成为明显事实吗？人的思维、人的素质会不会成为空降兵发展的下一个瓶颈？

长期以来军队一直强调一个口号：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才。其含义就是思想、思维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面，作战运用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

面，高素质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定要走在装备的前面。

要真正做到又是何其艰难。

大量现实是，新装备出现了，投入部队使用了，适应新装备的人才和相应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几乎出现在和平时期各个大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发展之中。

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超越传统经验的艰难。

完成这种超越，最大推力只能来源于战争实践。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任何训练、任何演习都无法代替这一最根本的实践。战争从来都是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今天的问题是，在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我们能否在冲突与战争到来之前，产生出一流的空降兵运用思想？抑或非要等到处于战争的严酷考验之中，才能在沉重损失的痛定思痛里面被迫做出改变？

责任、主动和担当，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今天日复一日的和平消磨之中。

世人皆知，空降兵不是一支完美无缺的力量。它有弱点，有不足，但它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世界上没有一支完美无缺的作战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扬长避短。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运用这支力量的人的意志和思想。

思想解放对今天的空降兵来说，绝对不是一句泛泛的空话。

空降兵建设发展基于的国情，可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实现统一的、领土主权尚不完整的社会主义大国。

发展中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发展。

尚未统一，要求我们必须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

领土主权尚不完整，要求我们必须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

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

大国，要求我们必须有能力履行大国的责任、完成大国的义务。

中国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安全态势、独特的战略处境，要求我军空降兵必须成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能打仗，打胜仗”、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尖刀和先锋。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再把“以空间换取时间”作为战略思维的基础，而是要能够迅速穿越己方空间、紧紧压迫对手的时间，数小时内能够成建制地投入任何一个战略方向作战，成为国家应

对各种危机的快速反应之拳。具备这样一支力量，才可能有力地支撑十八大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声明：中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中国家门口生事，也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把亚洲搞乱。

无论哪个国家或哪种势力，若想把我们搞乱，首先必须通过这道坚强、坚硬的门槛。

这才是这支新兵种的最大价值所在。这才是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相适应、能够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重任的 21 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

技术理解力——现代建军的瓶颈

什么是技术理解力？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懂得、明白和感悟技术中所显现和蕴含的全部意义。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和感悟所产生的不同效用，不但导致完全不同的应用和发展方向，其结局也大相径庭。

比如火药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我们发明火药并不是为了拿它去打仗。在中国，火药只是炼丹长生的产物和驱鬼敬神的信物。我们没有想到火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被装入枪筒推动弹丸射杀对方，热兵器由此诞生并开始大规模取代冷兵器，世界第一轮军事革命也由此发生。

再比如罗盘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我们发明罗盘是为了看风水，为了判明何处好建屋、何处好修墓。我们同样没有想到，欧洲人把我们发明的罗盘装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航，先探索世界，然后征服世界。

说中国因科技落后导致国力落后最终被迫挨打，也许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前来征服我们的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其威力巨大的火炮本身依赖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其远涉重洋的战争指向本身也依赖于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当然其中还包含有其他很多因素，但对同一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出现后，颇富戏剧性的场面就随之而来了：我们的发明物像澳大利亚土著人打猎使用的“飞去来器”一样，不同的是它被甩出去后，呈弧线状飞回来击中的猎物却是我们自身，这可以算是从极致之处领受技术理解力的不同所产生的效用吧，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波及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

西方的技术理解力就无可挑剔了吗？也不尽然。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进行首次有动力飞行，今天看来是伟大的创举，当时却也被不少围观者笑掉大牙：费那么大劲糊的飞行器像个空中书架，晃悠几十米就掉下来摔烂，还不可笑吗？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一技术的巨大含义，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种军事利器即将出现，延续几千年的平面作战从此将走向立体。

技术理解力并非一蹴而就的功夫，只有随着技术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后来飞行器迅速发展起来了，最前卫的理解也不过是认为它可以用来侦察对方阵地。所以最初双方的那些简陋的双翼、三翼“空中书架”摇摇晃晃地飞去侦察对方阵地的时候，飞行员们在空中相遇时还热情地微笑和相互招手。但“蜜月”很短暂，很快有人向对方拔出了手枪。手枪射程太短，于是有人开始在飞机上安装机枪。新的技术感悟导致空中温情脉脉的时代结束，空中搏杀很快就变得像地面搏杀一样凶猛激烈。这种几乎是突然出现的作战方式把早已固定的军事秩序冲击得支离破碎，前景扑朔迷离，哪一方也未对来自空中的噩梦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

可以说这是一种常态：新的技术和新的兵器出现了，但新的思想没有出现。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这句话揭示了一条军事规律：新技术、新兵器迫使人们产生和创造出新思想。但诸多矛盾制约因素中，技术理解力的不同，仍然对同一技术产生巨大的思想认识分歧。

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米切尔最先说出他对航空技术的感悟：“在战线上空飞一趟使我对军队的布局情况得到了比在地面上跑多少圈都更加清晰的印象。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我们的飞机里花几分钟就越过这些交战军队的阵线，而这些军队却在战斗中僵持、无力前进难以动弹已经三年了。”“花几分钟”就可越过僵持几年的战线并非对米切尔一个人“非常有意义”，而是对全部作战方式将产生重大意义。

比米切尔更加彻底的是刚刚步出监狱的意大利人杜黑。这位前航空局长预言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空中战争。他说空中战争将引起战争的革命。他说战争将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他说战争也不再会为地形地貌所阻隔。他还说未来战争很可能从空中开始。

杜黑一句话一个结论，其中反传统的观点比比皆是，被人揪住辫子的极端

意见也比比皆是。此人像一个现代巫师，用人们陌生的话语，说出了他对新技术的全部理解。当时不少权威人士纷纷站出来，依据浩瀚的兵学财富对其进行反驳和诘难。颇富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对杜黑理论的争论，立体作战观念终于带着其全新的理论视野降临战争舞台。虽然批评声今天仍不绝于耳，但在事实面前，全世界都承认了杜黑对航空技术的透彻理解力。

航空技术开拓了三维空间。今天引领性的技术，是正在开拓四维空间的信息技术。如果思想仍然停留在二维空间，怎么去谈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怎么去运用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完成军事创新。任何人都不可能懂得所有技术，但必须能够理解技术的含义，明白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感悟它所开拓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军事学轻视技术、脱离技术的倾向明显。

古代先哲们“形而下者为器”、“形而上者为学”的观点对我们影响甚深，不少人认为要建立一个什么“学”，必须先脱离“器”，否则就不高深，就不抽象，就钻不进象牙塔。这种观念难道不是我们军事创新思维的重大障碍。从历史长河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形态一直决定着战争与军事的基本形态、决定着军事组织方式和作战指挥方式、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事技术而不是军事思想，推动旧的军事力量体系逐步瓦解和新的军事力量体系逐步形成。轻视军事技术，就是轻视军事实践；脱离军事技术，也就脱离了军事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制约我们军事思维创新的不是理论理解能力，而是技术理解能力。

必须克服这个瓶颈。

二、将帅之风

除了战争，别无所虑；除了胜利，别无所求。对这样的老兵来说，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战术家，都不是桂冠。“枕戈待旦”才是真正的桂冠。

信仰·火种·必胜信念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

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

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

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 1927 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 22 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 年 10 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本色最无敌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的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从红军时期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到建国之初朝鲜战场上的五次战役，从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百团大战，到解放战争最艰苦阶段的西北三战三捷，彭大将军从来都是横刀立马，战绩辉煌。

如果一部共和国史仅以战绩来论定彭总，还不能把握其全部。古往今来战史卷册浩如烟海，从来不乏功勋卓著之将帅。任何一支军队在其漫漫历史长河中，不知要将多少枚勋章、多少颗将星授予那些杰出的军人。有多少位名将，当麾下兵阵如云之时可以一展风采，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韬略；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一旦失去兵权和前呼后拥的部属，为人称道的秉性便如冰雪一般消融，他们自身也像流星那样迅速陨落和暗淡。

如果彭总仅与战争有关、仅与胜败有关，同那些大江东去的名将一样身着戎装方显威风，坐为上宾才有气派，何至于我们今天如此唏嘘感慨。彭总非凡之处，恰在于他一身布衣，也是大将；他落为囚徒，也是伟人。不论统兵百万还是孤军奋战，不论从士兵到元帅还是从元帅到平民，他对自己的追求都终生不改。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

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颇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三十一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八千人，何键率兵三万人。三万人败于八千人，被彭德怀俘去四千多人，枪三千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八挺，迫击炮二十多门，山炮两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大革命中对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对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对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

当时各省之中，唯何键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他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魄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三十多

年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一个人已经成了囚徒，却仍然令战场对手心惊胆寒，这该具有何等的人格力量和信念力量！勋章可以褪色，将星可以消磨，非凡的人格力量与信念力量却使彭德怀同志超越自身局限，在最深重的苦难与委屈之中，迸射出最耀眼的辉煌，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真人。“文革”灾难中他被批斗审讯二百余次、打得遍体鳞伤，却留下这样的心迹：“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在战争年代，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的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九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1974年彭德怀同志去世时，是那般的萧条零落，甚至连简陋的骨灰盒上也不能留下姓名。他死后却成为一座巍峨的青山，历史记载下他的英名，承认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颗巨星。

含而不露的静水

林彪与彭德怀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

而不露的静水。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塌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塌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

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

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了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自己对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

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比方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要多用脑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贪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况中找到新办法的创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敌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指挥员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最高自觉性和正确理解上级意图的基础上面。

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作是重复，实际上这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积累掌握的情况越多，越系统，在战时，特别是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就越沉着，越有办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础。因此，调查研究工作要贯串在各项工作中，要贯串在每一次战役、战斗的整个过程，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对急性病，反对不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懒汉作风。特别是敌情，必须切实摸透。因为敌情是活的，敌人必然会极力隐蔽、伪装他们的真实企图和行动。要尽一切可能不间断地侦察，查清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看他扮演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主力还是非主力？是骄兵还是败兵？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和阻挡我们的进攻。查明敌主官的特性，看他惯用和擅长用什么战法，根据他当前的企图判断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只要摸清了敌

情、我情、地形的底，决心就快，就硬，就坚定。就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住。如果情况不清，就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良机，或者勉强下了决心，一遇风吹草动，听到畏难叫苦和不正确的建议，就容易动摇，可能一念之差，前功尽弃。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到地图差不多快划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至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来找答案。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们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地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

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都要勤快，都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招。在追击时，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际锻炼，要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就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就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面这九条。

“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化冒险性为创造性”；“要勇于穷追”、“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语言简练、生动，有力度、有气势、有特色。

与其说是语言的力度与特色，不如说是思想的力度与特色。只有扎实的实践与深刻的思索，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晶。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剥夺剥夺者”“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皆是以极其精练和巧妙的语言，道出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表达清楚的概念。

林彪也有颇多颇富个性颇带个人思索特点的语言，是否也能算一个语言大师？

1995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中常委”讨论高中三民主义考试问题时：郝柏村说，考试和教学方法要好好检讨；连战说，今后要以“活学活用”为目的。

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风靡内地，台湾人称为“反攻大陆”；90年代国民党副主席也高谈起“活学活用”，大陆人却忘了说林彪反攻了台湾。

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

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他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

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蹙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来自战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生与死、胜与败的选择。

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带领大家实际操演。江西、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

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运动。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

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首屈一指。

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按考生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步兵科第一团是军官团，第二团是预备军官团。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二团里。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士第、赵自选、宣侠父、余洒度；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

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一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儿，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郑洞国、陈

明仁……这些黄埔一期学生，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手的对手。

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队长”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军事钻研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一面，也不成其为林彪。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八十三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一三”了。

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

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再于是，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

艰难困苦，元帅功成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共八位元帅，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就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

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

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

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

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八月一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就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

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

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革命分子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继任的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则被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夫人，出卖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出国护照；罗亦农被抓捕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也如此昂贵。

贺龙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汪精卫叛变刚刚两天，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告诉贺龙，

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贺龙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的基本计划询问贺龙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他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

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所以当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说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他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起义成功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8月2日拂晓，他们才从马回岭追赶上来。

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这支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聂荣臻后担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几天之后，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

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做出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当时如果张发奎真的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徐向前于1927年3月入党。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

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下决心离开旧军队，搞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

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1926年9月，陈赓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

粟裕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其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是张云逸。

张云逸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他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领导并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

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他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但没有哪一次如南昌起义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与它紧紧相联。

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又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

朱德的这一作用，《信仰·火种·必胜信念》一文中详述的，就不再重复。只须再强调一下：朱德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接过这支部队指挥权的；是在大家都认为毫无希望的境况下，成为这支部队领袖的。

南昌起义中，朱德没有基本部队，很长时间也没有作战指挥权。

朱德真正获得指挥权，是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作战，他被分配留在三河坝担任阻击之时。这是南昌起义以来朱德首次获得战斗指挥权，授权时间却并不长，阻击三天后就完成任务，便收拢部队南下与主力汇合，归还建制。

但就是这三天的临时指挥，使朱德终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根本性转折，发生在起义军主力南下作战全军覆没、全部南昌部队家底只剩留在三河坝担任阻击这小部分力量的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设想：如果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没有在三河坝分兵，中国历史又会如何？如果起义部队全体南下、在潮汕陷入全军覆没，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失去自己建军的基石，又到哪里去寻找另一块基石呢？如果这样，以武

装斗争为核心的中国革命真是前景难料。

有了三河坝分兵，就肯定可以获得这样的基石吗？

情况也并非如此。当时留在三河坝的这支 2000 余人的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断，四面又都是敌人，组织涣散、军心动摇，不论从今天的哪个角度看，都几乎注定必然溃散。

朱德稳住了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剩下 800 人。

从中外战争史看，完全可以说是一伙儿残兵败将。

所以出现“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的崩溃局面。

是朱德坚决遏制住了这一崩溃局势，一句“要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挽狂澜于即倒。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如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他成为这支部队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把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变成中国大地的燎原火种。

靠什么？靠坚定的意志和内心必胜的信念！

危机毁灭权威。

危机诞生权威。

南昌起义最危机关头站出来了朱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幸。我们从来不否认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但也从来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意志是中流砥柱。

八一南昌起义队伍经历了凤凰涅槃，朱德在其中也经历了凤凰涅槃。这位旧军队的旧军人，凭借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大的历史自觉，一举成为新中国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三个不能忘记的名字

这三个名字，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甚至包括军人。

这三个名字，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们——尤其是新世纪的军人。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随着主力部队的离去，中央苏区附近存在的最大一支红军部队，只有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由两部分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

军团，另一部分是方志敏的红十军。主力红军长征一个月后，中革军委发来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全军团共一万余人，下辖三个师：

十九师，原红七军团部队，师长寻淮洲；

二十师，原红十军部队，师长刘畴西（兼）；

二十一师，原红十军部队，师长胡天桃。

2月中旬编成到1935年1月底覆灭，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后来心痛地概括成八个字：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感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的选择也不错，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补充第一旅于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的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但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1924年，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1922年，刘畴西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时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照样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想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

率部坚守苏区战略要地宜黄二十四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他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谭家桥伏击战是红十军团的第一仗，关系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之胜败存亡。刘畴西以二十师、二十一师在伏击地域右侧担任正面攻击，置十九师于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截敌归路。

十九师未放在主攻位置上。原红七军团军团长、现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和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均执异议，认为十九师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而二十师、二十一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担任主攻存在问题。

刘畴西却很自信。二十师、二十一师都是他的老部队，他认为战斗力强于十九师。他坚持原来的部署。

12月14日，补充旅出发，以第二团为前卫，其余按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谭家桥时，路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种地，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前卫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机会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敌人团指挥部还未进入伏击地域，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过分紧张，提前开火。敌人立即警觉，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如果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后，首先打掉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汗的，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

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展开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都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四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补充旅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此番红军三个师伏击它，最初它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红十军团反被它打得措手不及。

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以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时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人们都以为 25 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 1933 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 22 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 19 岁当师长，20 岁当军长，1933 年 2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粟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尚年长寻淮洲

5岁。

寻淮洲曾经五次负伤，谭家桥成为最后一次，因伤势过重，在转移途中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枝，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一位优秀将领，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险遭歼灭的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反败为胜，所获甚丰。他派出一个步兵连寻找寻淮洲的遗体，捉到一个参加埋葬的人，便由此人带路到茂林，把寻淮洲的遗体挖出来照相，以作为寻淮洲确实被打死的证据。他们发现遗体尚完好，但上身无衣，由此认识到红军处境已极度困难。王耀武判断说：“共军官兵所穿的衣服破烂不堪，难以护体，因被服奇缺，在掩埋其阵亡的官兵时，顺手将死者的衣服脱下，以供活人穿用。”

王耀武领到了5000块大洋的犒赏。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敌不当、指挥不当所致。后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的失败，基因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谭家桥战斗失利，皖南便无法立足。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南下返回闽浙赣边。谭家桥战斗前那样自信的刘畴西，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敌情已十分紧急。粟裕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以突破敌人封锁线，但刘畴西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十分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迟疑，叫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

一留便成永诀。

粟裕率少数先头部队行动坚决，当晚就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行动拖沓犹豫，前面一打枪便改换前进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在怀玉山被赶上来的国民党军十四个团包围。方志敏本可跟着粟裕突围，就为了等刘畴西，最后二人双双被俘，并肩走向了刑场。

浙赣边界的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后的战场。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红军战士拿枪向敌人射击，但冻僵的手扣不动扳机；挣扎着向围上来的敌人投弹，又投不了多远。王耀武发现他所俘虏的红军人员，都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人很多；很多人数日不得饮食，冻饿交加，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1935年1月底，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程家湾被俘。

国民党随即将他们解往南昌，沿途召开“庆祝大会”。到达南昌后，又在市内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美联社一名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枪……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大队兵马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的官兵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也表示无限敬佩及同情……”

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那是奠定国民党党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蒋介石一直记得当时奋不顾身、因伤被锯掉左臂的刘畴西。无当年棉湖的胜利，便无后来的蒋介石。他命顾祝同对刘畴西要特别关照，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

顾祝同是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在黄埔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又借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时，刘畴西担任过总务科长的由头，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让他们帮助做工作。于是从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就亲自来了一次。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钦佩刘畴西的意志之坚韧与不拔。

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劝说和纷纷前来的黄埔同学，他丝毫不为之所动。

刘畴西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一样刚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用“田寿”这个名字，记述了刘畴西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蒋介石把消灭红十军团归功于俞济时、王耀武。尤其是在第一线大打出手的王耀武。王耀武参加追击红十军团的作战时，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曾对他说过一席话：共军装备虽差，但作战很机动、很顽强。闽北的部队及俞济时的保安团等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俞济时本人还因此受了处分。你一定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受挫败。

赵观涛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多次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王耀武牢牢记住了赵观涛的叮嘱，同时生出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定要面对面见识一下这些装备又差、供应几乎没有的红军将领，凭什么本事令一个又一个国民党骄将如此头痛。

他在谭家桥战斗中打死了红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失去了与这个暗中叹服的红军将领见面的机会，但在怀玉山却又捕获了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王耀武立刻仔细利用了这个机会，但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呆住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的被俘战士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

放出来，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二十五年前与胡天桃那次谈话。

王耀武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

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红十军团三个师，军团长、师长全部壮烈牺牲；一万余部队，最后冲出包围圈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关枪连、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和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余人。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是一支残兵；对前仆后继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

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

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劫夫在一首歌中写道：“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以济南战役为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

指挥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大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当年从怀玉山冲出去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

率十四个旅共十万守军防守济南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十四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以及慷慨饮弹的胡天桃。

他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县被民兵查获。

“捷报飞来做纸钱”。

那些在天英灵，定能有知。

那顶耀眼的军人桂冠

这是一组令人荡气回肠的电报——今人看起来颇有“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兴奋，后人看起来则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同阅读天书一般的感觉：

“粟令：一纵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二十五师，复浮山可放”；

“粟令：八纵解决芦山，九纵孟良崮已占，四纵解决六〇〇高地，合力打芦山”；

“粟令：王建安指挥二纵及八纵向南出击八十三师，改成包围”；

“粟令：停止攻击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续肃七十四师，明午前完成”；

“粟令……”、“粟令……”、“粟令……”，一道道震撼山岳的命令。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围歼敌军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当天，指挥这场战役的华野战将粟裕发出了这一组电报。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军令如山、斩钉截铁的歼敌意志，无不洋溢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夺胜气概。

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史无前例的大决战中，粟裕的战争指挥艺术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从1946年7月到1947年9月短短十四个月里，他率领华中和华东野战军大的战役进行了六次，中小战斗不可计数，使华东战区成为吸引敌军最多、消灭敌军最多的战区。其后是更大规模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占领南京、解放上海、挥师闽浙。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不论是敌人的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也不论是我军的战略防御、战略反攻还是战略决战，伴随粟裕的始终是胜利。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伯承评价说：“粟裕同志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刘帅的评价，是一个军人追求的最高荣誉。革命战争年代，粟裕之所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器重，根本原因是他“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不战则已，战则全歼；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在长期以劣势兵力与敌重兵集团周旋过程中，其求战愿望之强烈，取胜决心之坚强，古今罕见。

军人与战争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如果军人的辉煌仅仅与战争有关、与胜败有关，那么战争结束了，战场寂静了，军人生涯只有变得寂寞和暗淡。

粟裕曾经有过寂寞，但他从不因此转投别的场所。他终生不善牌局，不善棋弈，不善跳舞，不善祝酒。胜利了，进城了，别人在繁华的大街上逛商店看商品，他还在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别人开始对军衔、轿车、住房、排场产生更大兴趣，他最心爱的还是手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别人因江河巨流和名山大川的锦绣风光引发无限感慨，他眼中的这些皆是过去发生过战斗、未来仍可能发生战斗的场所。别人大部分精力被官场风波、政治起伏耗尽，他大部分精力仍然花费在地图前，用放大镜端详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站在那里默默地想，一看就是半天。他一辈子没有学会用其他眼光，只会以军人的眼光审视、分析、判断眼前这个世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想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但他的观点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冲突甚至相对立，为他执笔的同志犹豫再三，最终不敢落笔。虽然即便有问题也不会由执笔者负责，虽然该同志绝大部分也是出于保护他的好意，但当年这个率领数十万健儿纵横驰骋、以一道道“粟令”“粟令”令多少国民党沙场宿将也谈虎色变的华野统帅，到了连身边一个普通干部都指挥不了、连一个敢用纸和笔记录下他意见的人都找不出来的时候，那种困顿与窘迫也不言而喻。这还是当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在城南庄连毛泽东主席也跨出门槛亲自迎接的战场名将么？

多少人因此向现实局面悄然低头，多少叱咤风云的战将因此悄然萎顿，任周身光彩落满利害的尘埃，任奔腾思绪蒙上荣辱的蛛网。

粟裕没有萎顿，他把纸和笔朝自己夫人面前一推，说：“我口述，你写！”

夫人劝他：“你这是何苦，为直言吃的苦头还不够么！”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能保个人平安已属万幸，夫人实在不解他为何还要去触及那些重大且敏感的问题。

他回答的第一句是：“战争是要死人的。”

然后是第二句：“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罪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严肃而且激动。

历史上绝大多数将帅，只有拥兵者众才能一展风采。失去了兵权和可驱策的部属，那些为人称道的勇气与能力便像冰雪一般消融，他们本人也像流星陨落一样迅速暗淡。

粟裕不是这样。他的勇气从来不取决于身后跟随了多少人马。纵然面临孤军奋战的窘迫局面，纵然能够指挥的只剩下数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他仍然是一个敢于挑战、敢于应战的军人。

有两个概念长期纠缠于人们的脑海：一曰十全十美，二曰有始有终。现在人人皆知十全十美是凡人难以企及的概念了，仍很少有人体会有始有终也何其艰难。人的一生实在短暂，现代社会的万事万物又何其纷繁。每个人一辈子做过的事情也许多而又多，其中有始有终者，总是鲜而又鲜。

粟裕并非十全十美，但他确实有始有终。我们钦佩他，不仅因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杰出战绩，更因为他在和平时对军人使命鞠躬尽瘁的忠诚。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个老实人，始终认定军事之学、制胜之道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由不得半点分心与走神。他一辈子老老实实、踏踏实实、聚精会神地这样做了，最终，将自己锻造为一名非凡的中国军人。

1947年，延安总部发言人评价苏中七战七捷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那是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对一个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战将的评价。今天我们感叹他百战百胜，讴歌他百战百胜，是否能够真正明白他为何能百战百胜？当他随手拿起身边的茶杯、烟缸、棋子对周围人如数家珍般摆排出古今中外重大战役的时候，当和平时数十年如一日、每晚就寝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的时候，当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扎进裤腰的时候，他的生命仍然是一支燃烧的火炬。

美军名将麦克阿瑟退出现役时说过一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消隐。粟裕是一个永不退役的老兵。他一辈子在等待、在准备硝烟来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军事生涯和军事生命的消隐。除了战争，他别无所虑；除了胜利，他别无所求。对这样的老兵来说，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战术家，都不是桂冠。只有“枕戈待旦”才是真正的桂冠。勋章可以退色，将星也会消磨，一个真正军人在和平年代颇具悲壮且特别珍贵的爱军尚武精神，金子一般万世长存。

在这样的军人面前，不管你懂不懂军事、是不是军人，都会明白：国家安全应该托付给这样的人。

战将帕夫洛夫：一颗被遗忘的流星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不知有多少已经举办和将要举办的盛大规模庆典。鲜花、礼炮、欢呼、游行……除了满目彩旗和雪片般贺词带来的光荣和尊严，也同样不应当忘记那些虽然与节日气氛不符，但却值得永远记取的沉重教训。

今天就在这里提出一个人：二战初期苏军的帕夫洛夫大将。

如果问朱可夫是谁，即使苏联已经解体，这个名字在俄罗斯、在欧洲以至在世界也广为人知。

如果再问帕夫洛夫是谁，即使苏联不解体，这个苏军将领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也无几人知晓了。

一颗被遗忘的流星

他本来与朱可夫齐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还超过朱可夫。

帕夫洛夫和朱可夫，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军队里崛起的两颗新星。20 年代末期，苏军在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主持下，组建了两个最早的坦克试验团。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从全军选出了两个优秀团长，一个是朱可夫，另一个就是帕夫洛夫。从此之后，他们二人凭借担任苏军最早的坦克部队领导者的身份扶摇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均担任大军区司令的领导职务，先后被授予苏军大将的军衔。

如果说这两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帕夫洛夫作为当时苏军内部首屈一指的坦克战专家，斯大林对他寄予的希望曾经超过朱可夫。帕夫洛夫一直被放在最重要的军担任军长，在最重要的军区担任司令。在苏联国内举行大型对抗演习时，朱可夫一般扮演“蓝方”司令——西方势力的代表，帕夫洛夫则扮演“红方”司令——骄傲的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的象征。援助西班牙政府反对佛朗哥的军事斗争期间，朱可夫的身份是军事观察员，帕夫洛夫则是负责坦克作战的首长。朱可夫长期被斯大林当作救火队员使用，不断从一个地点奔往另一个地点，从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到中蒙边境的哈勒欣河，从南方的基辅军区到首都莫斯科。当朱可夫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的时候，帕夫洛夫却始终被斯大林放在灯芯位置，先是负责组织和试验苏军自己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探讨苏联陆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后被放在最重要的西部特别军区，担任军区司令。

西部特别军区是护卫苏联心脏的屏障，所以配置了苏军最精锐的力量。除2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外，1940年6月组建的9个机械化军，有6个集中在帕夫洛夫领导下的西部特别军区；它们是机械化第六、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和第二十军。帕夫洛夫指挥的西部特别军区拥有的摩托化师数量达到6个，坦克师数量达到12个，其他任何军区都没有如此强大的装甲机械化力量。

如果说斯大林让朱可夫奔波于东西南北，是为了让他处理那些随时出现的棘手问题，那么他把帕夫洛夫一直放在苏联西部，则是为了让他长期专注斯大林断定的这个对社会主义苏联最危险的方向。别的方向可以允许挫折，允许失利，允许事到临头更换指挥人员，允许像朱可夫这样的解决问题能手去挽救局面，但西方方向不能允许。因为这扇大门一旦被撞开，它的后面就是莫斯科。

在这方面，帕夫洛夫和朱可夫这两位苏军最早的装甲机械化部队领导者，肩负着斯大林莫大的希望。

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帕夫洛夫从西班牙回来后，这位苏军头号坦克战专家，长期研究、试验、发展这一新兵种的领导人，竟然搞出了一份要求取消坦克军的报告。没有人怀疑帕夫洛夫的专业能力。正因如此，人们就更难揣测：帕夫洛夫之所以如此，有多少是产生于西班牙内战中的军事错觉，有多少是产生于苏军大清洗中的政治敏感。

悲剧从哪里开始？

1937年2月至3月苏共中央全会后，开创红军机械化部队建设的苏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同时被指控的还有部分思想敏锐、对西方军事理论比较关注或干脆是具有部分德国血统的高级将领。他们是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前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埃德曼，前远东濒海部队集群司令普特纳，红军中央机关部长费尔德曼等人。同年6月17日，他们一起被执行枪决。红军元帅、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在被捕时自杀。

清洗“德国代理人”的行动继续扩大。在枪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1937年6月，逮捕活动扩大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部机关、红军总政治部、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各军事院校，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

尔、军区司令别洛夫等一大批高级将领都遭到镇压。红军6名元帅中的4名被处决，只留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全军195名师长中110名被枪毙，220名旅长中枪毙了186名，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名，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卫国战争中威名远播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来回忆：“1939年，当我奉命不得不将霍津指挥的列宁格勒军区移交给梅列茨科夫时，许多师的指挥官都是大尉，因为比大尉高的军官全部被逮捕了。”

当时苏军内部发生的大清洗，其规模和范围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对于抓“德国间谍”、清洗“德国代理人”来说，除了红军高级指挥机关外，必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几个军区。任何曾在这一地区工作并能够幸存下来的人，回顾那些不断消失的上级、下属及身边战友，都不能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帕夫洛夫不但长期在这一地区工作，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关系。他是在“德国间谍”图哈切夫斯基的机械化建军政策下选拔和成长起来的干部，他的军事实践似乎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军事理论的证明。30年代中期，苏军在图哈切夫斯基主持下提出大纵深攻防战役理论，坦克的战斗运用在这一理论中占有突出位置。大纵深理论主要就是依靠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冲击速度、突破能力和机动能力来支撑的，正是依据这一理论，苏军甚至走在了德国军队前面，率先成立了坦克军。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一理论的确吸收、借鉴了西方某些军事科学成果，包括德国的一些实践与探索，但它同样依靠着优龙芝等红军优秀指挥员和思想者提出的军事思想。大纵深理论不是抄袭外军的理论，它先于德军的闪击作战理论四至五年时间，是当时苏联军事思想的一大成就。

但随着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他主持制定的理论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谁也不敢再向这一理论靠近。坦克军这种毫无先例的大型机械化兵团编组形式，不论军事上是否可行，作为支撑图哈切夫斯基军事理论的支柱，首先在政治上就遭到了怀疑。帕夫洛夫是个十分机警，而且十分聪明的人。在斯大林信任图哈切夫斯基的时候，一切还都好说；但图哈切夫斯基突然间成了斯大林的敌人，既是斯大林学生又是图哈切夫斯基弟子的帕夫洛夫，其处境之微妙也可想而知。

悲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西班牙内战似乎产生了一些于大规模运用坦克不利的战例，但国内明显地出现了反对图哈切夫斯基军事理论的需要。斯大林急于让红军与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划清界限，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老一代骑兵将领也乐于相信并且力图让斯大林也相信，红军传统

战法并未过时。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比帕夫洛夫这样既得到斯大林信任又是图哈切夫斯基理论的实行者，跳出来“反戈一击”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帕夫洛夫真的跳了出来。1939年11月，苏联总军事委员会不顾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刚从远东对日作战胜利归来的朱可夫的坚决反对，决定向意帕夫洛夫大将提议：鉴于利用坦克军奔袭敌人后方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坦克军长也没有能力指挥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集团，所以从苏军的编制序列中取消坦克军的编制。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暮年回顾这一切时，曾说红军中大批年轻的、有才干的、思想活跃的指挥人员被清洗，才使希特勒敢于在1941年发动大规模入侵。他只说出了一半。苏联红军在大清洗中的损失不仅仅是失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损失了先进的军事思想。虽然把守苏联大门的帕夫洛夫大将麾下拥有30个坦克团，坦克达到2500辆以上，就数量来说决不亚于后来进攻西部军区正面的德军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装甲集群，但他既抛弃了起初准备集中使用这一作战兵器夺取胜利的先进思想，也丧失了原先就对敌方大规模集中使用这种兵器抱有的高度警惕。

当然帕夫洛夫也可能是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从西班牙战场上费尽心血得出的结论全部是出于职业考虑，哪怕是再不正确的职业考虑，而没有掺杂丝毫政治动机。但是这已经无法冲淡那场悲剧。作为一个斯大林寄予厚望、长期参与并主持苏军装甲兵建设的坦克专家，他对苏军装甲兵最大的“贡献”，竟然是战争爆发之前在解散大型装甲机械化部队中起了关键作用，认为战场面貌仍然照旧。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十分奇特的：帕夫洛夫以一个反对使用坦克做大纵深机动作战的坦克专家的身份被记入军事史册。他断言利用坦克集群奔袭敌人后方不可能取得胜利，他的方面军却最终在敌方装甲集群的大纵深奔袭中陷于全军覆灭。他那份报告宣判了苏军坦克军的死刑，最终也宣判了他自己的死刑。

对最后这幕悲剧，斯大林准备不足，帕夫洛夫更是毫无所备。

大难临头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15分，德军在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2000公里正面，以118个步兵师、19个装甲师、15个摩托化师共305万兵力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德军进攻的主要突击力量是3350辆坦克，分布在四个装甲

集群内。进攻帕夫洛夫西部特别军区的是两个装甲集群——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组成北突击集团、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组成南突击集团，向苏军防线的深远后方做向心突击，在纵深 400 公里处的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收拢钳口，完成对帕夫洛夫西部特别军区改编的西方方面军的合围。

虽然西方方面军实力雄厚，但帕夫洛夫轻看了德军向大纵深穿插的装甲铁钳。他首先下令对德军侧翼进行反突击。计划很好，因主力机械化部队未能按时赶到，赶到的部队战前训练不足，战斗中又指挥失当，其攻势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德军粉碎了。反突击失败之后，帕夫洛夫做了一个使西方方面军遭受灭顶之灾的决定。他看到前方部队受到威胁，有可能被德军步兵师包围，便下令所有集团军和方面军的预备队向前调动。这样，在他身后极其重要的明斯克地区就留下了一块真空地带。他不知道德军的两只装甲铁臂正在经过他的侧翼，向致命的大后方伸展。这位苏军的头号坦克战专家，把自己的部队全部送进了后来被称为“诺沃格鲁多克口袋”的德军装甲合围圈之内。在苏军中享有很高声誉的坦克战专家帕夫洛夫，竟然未明白由机械化部队配以航空兵的高速突击，已经使传统的战场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并非如帕夫洛夫所言的“利用坦克军奔袭敌人后方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军装甲部队进展速度快得惊人。战争爆发第四天，德军第二装甲集群和第三装甲集群已经出现在明斯克南部和北部。此时虽然苏军已新调增援部队上来防守明斯克，保障帕夫洛夫西方方面军的后方，但为时已晚。6月27日，战争爆发的第五天，德军第二和第三装甲集群在明斯克会师，帕夫洛夫大将的两个集团军全部、一个集团军大部共计 22 个步兵师和相当于 7 个坦克师、6 个机械化旅的兵力，在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陷入德军合围。

更糟糕的是帕夫洛夫本人一直不知道他的部队已经大难临头。而斯大林 6 月 30 日才从德国的广播台中收听到西方方面军被围的消息。斯大林立即要朱可夫通过无线电与帕夫洛夫通话，询问德国人宣布的消息是否属实。最后时刻通过身边发生的一切才明白局势严重性的帕夫洛夫大将，沉痛地承认了这一处境。西方方面军领导成员立即全体乘飞机被召到莫斯科。7月1日，除政治委员福明纳赫以外，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大将、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中将等高级将领被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7月8日，包围圈内的苏军部队消耗殆尽。德军先后俘虏了 29 万苏联军人，其中包括数名军长和师长；俘获和击毁苏军坦克 2500 辆，火炮 1500 门。麾下部队在前方毁灭的同时，帕夫洛

夫大将及其主要指挥人员在后方被执行枪决。

德军用先被帕夫洛夫遵从后又被他否定的作战理论，陷这位苏军坦克战权威于灭顶之灾。通向苏联心脏的大门被撞开了。朱可夫的英名也就此开始。他在莫斯科会战中领导重组的西方方面军，粉碎了德军的梦想，再次坚决地关闭了这扇大门。

四年之后，朱可夫指挥了攻克柏林的战斗。

帕夫洛夫和朱可夫，是苏军现代化建设中的两颗新星。但在随后到来的战争实践中，一颗变得分外耀眼，另一颗却黯然陨落。他们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至今从战争史中翻到这一页，仍然令人万分感慨。

翻出这一页是不容易的，胜利记录者没有人愿意在这上面多用笔墨。甚至帕夫洛夫的战友、部属都愿意他彻底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说其中有很多教训今天也并没有很好总结的原因。

我猜想朱可夫的内心不会这样。每当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刻，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苏联元帅，一定能够穿过无数欢呼声浪，穿过战火硝烟和战场残骸，痛惜地看到他当年的同伴消失的身影。

战将朱可夫：胜利的象征

战争与和平是千古话题。失败与胜利是千古话题。

两个千古话题之间，站着披甲执锐的军人。和平时期枕戈待旦，战争时期横刀立马。

但更多见的是和平时期未能枕戈待旦，于是战争时期也就无法横刀立马。

因此，即使是在同样经历的军人之间，失败与胜利的悲剧喜剧也是连绵不断。有些人因胜利其名字登上历史的英雄榜，有些人则因失败其名字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上一篇我们讲到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那个悲剧性人物：西部特别军区及后来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大将。这一篇我们讲他的同伴、战友，莫斯科保卫战期间的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大将。

朱可夫还用讲吗？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负盛名的苏军将领，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也与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一样，是胜利的象征。

但其胜利的轨迹依然值得思索，尤其是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军队里崛起的两颗新星，当帕夫洛夫悲惨陨落的同时，朱可夫却如此耀眼地冉冉升起，两人命运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最初看上去，他们两人相同之处甚多：同时出任最早的坦克试验团团长，同时担任大军区司令，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样深受斯大林信任，同样在苏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甚至在希特勒入侵苏联最初的困难岁月，他们的遭遇表面看也有些相同。1941 年 7 月初，帕夫洛夫因其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全军覆灭而被执行枪决。同月底，朱可夫因提出放弃基辅，被解除苏军总参谋长职务。

同一个月，斯大林培养的这两颗新星似乎都已陨落，失去了他的信任。但朱可夫与帕夫洛夫不同的命运，恰恰从这些表面看来似乎相同的地方开始。

帕夫洛夫被枪决，源自他出于种种原因，错误地估计判断了眼前这场战争。朱可夫被解职，则源自他对战争的严酷性和局面的严重性不但做出正确判断，而且敢于坚持自己这一判断。当时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认为在西方方面军覆灭、德军已经形成中央突破的形势下，坚守乌克兰的西南方面军虽然作战卓有成效，但在整个战线上形成一块巨大的突出部，容易陷入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切入合围，所以必须尽快后撤，放弃基辅。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粮仓。基辅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战争爆发以来，西南方面军作战一直是整个苏军中最好的，顶住了德军向乌克兰的强力进攻。这种情况下朱可夫竟然提出放弃基辅的建议，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在说什么？把基辅交给敌人？！第二个反应是：简直是胡说八道！

此时朱可夫本来可以像他的继任者沙波什尼科夫那样，只要统帅做了决定就不再吭气，反正天塌下来也不用自己扛——虽然建议不被采纳，但已经尽到职责。

朱可夫之所以不是理论精深但行动犹豫的沙波什尼科夫，其真正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此宁可放弃总参谋长职务。

他真的失去了这个职务，被派去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后来的形势发展如他所言。9 月上半月，德军发起基辅战役。斯大林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基辅，使苏军部队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庞大的西南方面军后方被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南北对进所切断。德国人使用的方式与两个月前围歼帕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这次苏军损失更为惨重：明斯克对帕夫洛夫西方方面军的合围，使苏军损失了将近 30 万人；德军基辅一役对

西南方面军的合围，苏军损失兵力达60余万之多。即使二战结束后，该役也仍然被德国陆军战史称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战役”。

正是通过这一役的惨重损失，让斯大林真正看出了朱可夫的价值。

当时的局面确实异常严峻。在德军的装甲突击下，很多苏军将领没有完成他们对斯大林做出的许诺。他们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未能及时阻止德军挺进，未能掩护好友邻侧翼，未能实现先前一再保证坚决实现的反冲击……德军一次又一次出乎苏联领导层预料地向前挺进，首都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被从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地紧急召回接掌西方方面军，肩负起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任务。斯大林签发的命令中说：“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负责。”

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特别是当第五、第四十三和第四十九集团军放弃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德军在苏军防线中部地区实现纵深突破后，莫斯科的紧张气氛达到高峰：到处是文件焚烧后留下的焦黑纸灰，外交使团按苏联政府安排离开莫斯科退往古比雪夫，惊慌失措的人群谣传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抢劫的场面也出现了：有人冲进商店抢劫，还有人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更有人偷偷烧毁党证，摘掉家中的斯大林像。

斯大林决心坚守莫斯科。但莫斯科能否真正守住，他并没有把握，特别是过去坚守基辅的决心不但未能实现，而且还遭受到空前损失，这对这位苏联最高统帅的决策信心不能不产生重大冲击。此时的斯大林已经相信，在朱可夫那里能够听到真话。

形势也发展到了最需要真话的时刻。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突破，决定莫斯科存亡的时刻到来。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朱可夫，不加任何掩饰，提出他平时最不愿意说出、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守住莫斯科？他对朱可夫说：“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不是以一名苏军高级将领、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而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其分量之沉重，即使那场战役已经结束了64年，今天依然能够像铅块一样沉甸甸地感觉出来。

仅仅三个月前，朱可夫坚持要求放弃基辅，并因此失去总参谋长职务。此时面对斯大林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坦诚，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句

地回答最高统帅：“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

真是危难时刻。真是字字千钧。

朱可夫军事生涯中先后指挥了无数个战役，包括辉煌的攻克柏林大会战，但没有哪一次战役像莫斯科保卫战这样关键，没有哪一句话如“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这样字字千钧。

一句古谚语说：“性格即命运。”帕夫洛夫与朱可夫的差异当然不只是性格，但两人的命运在战争中被岔开，永远不再会合。

我常想：如果当时不发生战争，又会如何？

如果不发生战争，两人当然都能够在苏军中平步青云，帕夫洛夫还很可能走到朱可夫前面。

但战争发生了，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战争撕去一切假面，对军人做出最严厉无情的淘汰和筛选。

我又想：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又将如何？

如何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帕夫洛夫肯定会对他的观点和做法做出大幅调整，向他的同事和战友朱可夫靠拢；那么希特勒的军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长驱直入，悔过的帕夫洛夫同样可以享受到英雄的辉煌。

但历史无法重新开始。

这正是历史的庄严和悲壮。

朱可夫也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后来人们把他的种种缺点罗列出来，如骄傲、专横、跋扈、“波拿巴式人物”等等。主观上说，那是因为他的毛病也不少；客观上看，那是因为战争已经过去，和平已经到来。

在灾难危重、艰难困苦战争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够有这样的军人挺身而出，那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军队有幸。

战将基尔波诺斯：死不瞑目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三位苏军将领已经写了两位：因战败被枪毙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因战功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朱可夫。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战胜过也战败过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

战争开始时，帕夫洛夫和朱可夫的军衔都是大将，基尔波诺斯的军衔是上将。但就是这位上将，在卫国战争初期连续获得连朱可夫都想不到的胜利，成为苏军在最艰难阶段作战最有成效的将领，甚至连德军将领也对他大为赞叹。但西南方面军最终也和帕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一样被德军围歼，战死疆场的基尔波诺斯也和军法判处枪毙的帕夫洛夫一样，永远被胜利的庆典遗忘。

下面就是这位应该被人们记住的人。

一位精明强干、善于夺占先机的方面军指挥员

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发出预言：“踢开破旧的门板，整个房屋就会轰然倒塌。”的确，由于对现代战争缺乏深刻认识和思想准备带来的指导失误，也由于大量富有才干的指挥员被从军队清除，战争初期，苏军部队整师、整军、整个集团军甚至整个方面军陷入德军高速突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合围。相当一部分苏军高级将领对德军的“闪击作战”极不适应，首先进入战争的西部边境各军区各部队普遍损失严重。这些部队的指挥员有的被俘虏，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但苏联并不是希特勒想象的“破旧的门板”，可以被随意一脚踢倒。即使在战争初期的西部各军区中，也并非没有有力的指挥员指挥有力的部队，完成对德军的坚强防御。基尔波诺斯上将领导的由基辅特别军区改编的西南方面军在战争初期的出色作战，就是一例。

为了保卫乌克兰的粮食、顿涅斯克的煤矿和高加索的石油，苏军统帅部在西南方向配置了最为众多的部队，战争打响后又不断进行补充。西南方面军的兵力共计有32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大部分装甲机械化力量集中在第五和第六集团军内，这两个主力集团军的指挥员都是优秀人物，特别是第五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少将。

作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不仅比别的方面军司令员拥有更多的部队和装备，而且战前准备也较充分，特别是他的战争警惕性极为敏锐。在得到德军开始撤去设在边界上的工程障碍物，并将炮弹和航空炸弹直接堆在地上的报告之后，他立即命令筑垒地域部队占领前沿接近地。基尔波诺斯判断：敌人将炮弹直接放在地面上，说明不打算长期保存，这意味着袭击随时可能发生。但他的主动却是擅自的行动，立即遭到总参谋部干预。朱可夫来电质问：

“为什么发出这种可能刺激德国人挑起武装冲突的命令？！”要求他立即撤销

这一命令。

万分扫兴的基尔波诺斯只好按照他的老上级、总参谋长朱可夫的命令执行，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准备：拟好了给各军的命令，勘察了行进路线和集中地域，只剩下最后发出作战命令。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在战争爆发前一个半月完成，然后他深入各部队详细检查，对那些短时间拼凑起来、应付突然事变能力较差的部队，严令加紧训练，因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这是一位不但精明强干，而且颇有主见、善于夺占先机的方面军指挥员。战争爆发前夕，当别的军区和方面军的大多数指挥员都在大城市的司令部内坐等莫斯科指示，基尔波诺斯已经进入在帖尔诺波尔的指挥所了。6月21日午夜，他在指挥所内向莫斯科的朱可夫报告：一个德军逃兵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6月22日0时30分，战争爆发前两个小时，苏军总参谋部发布“武装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此时德国的特工人员已经开始破坏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通信设备，基辅特别军区直到战争开始后也没有收到这一命令。但6月22日凌晨2时30分，在战争爆发前35分钟，基尔波诺斯已经向其属下的所有司令部和机构下达了命令：“以一切手段抗击德军进攻！”

卫国战争初期，在第一拨迎接战争的所有方面军司令员当中，基尔波诺斯做了最为艰苦细致最终也最有成效的努力。整整30年后，西方研究苏军的专家、英国人艾伯特·西顿说：“基尔波诺斯是唯一能从德国入侵的震惊中立即恢复镇静的方面军司令员，并极其巧妙地指挥了所属部队的防御作战。”此评价不虚。基尔波诺斯首先使进攻利沃夫的德军第十七集团军遭受挫折。这个方向的德军说“遇到了俄国防御者出乎意外的顽强抵抗”；一部分德军师在最初几个小时就失去了互相间的联系，以致出现了宽达10公里的缺口；奇袭扑热梅西尔的重要桥梁的计划也未成功，结果整个德军第七集团军的初期战果甚微。

克莱斯特率领的第一装甲集群是不可一世的德军王牌部队，也在基尔波诺斯面前大受挫折。战争爆发第二天，即6月23日，基尔波诺斯就巧妙地组织第九、第十九、第二十二机械化军对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先头部队的侧翼实施反突击。这几个机械化军组建时间很短，训练时间更短，很多装备甚至尚未配齐到位。同样状况在别的方面军成为机械化军首战失利最通常的理由，但在基尔波诺斯领导下，这些问题成堆的部队也进行了顽强战斗。苏军的反突击如此猛烈，使在法兰西国土上疯狂推进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北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小脚女人。战争爆发一周，德军的这支王牌主力只能缓慢推进，无法完成其指

挥部要求的向纵深战略目标长驱直入的任务。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懊恼地记下，德军在乌克兰战场“遇到了事先有充分准备的，组织得很好的抵抗”。

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德军南方集群的噩梦

西南方面军虽然卓有成效，但随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给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战区带来极大被动。

一是基尔波诺斯的右翼——帕夫洛夫大将指挥的西方方面军作战失利，整个方面军在明斯克方向遭德军围歼。二是基尔波诺斯的左翼——秋列涅夫大将指挥的南方方面军作战失利，在乌曼地区遭德军重创。

两翼失利，夹在中间的基尔波诺斯被突出出来，西南方面军才按照总参谋部的命令全线后撤。撤退行动也组织得非常好，德军无法占到便宜，很多部队没有丢下一个死伤人员。

撤退行动中，波塔波夫少将指挥的第五集团军表现尤为出色：他颇为大胆地把机械化部队撤向东北方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攻击前进的德军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在十分不利于坦克作战的沼泽地区，竟然连续遭到苏军坦克的袭击。7月初，波塔波夫的部队突然从沼泽地冲出来袭击猝不及防的德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7月10日，波塔波夫的部队再次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缘出现，对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群侧后发起快速猛烈的进攻。

这等于是狠狠地向老虎屁股踢了一脚。德军第一装甲集群的主供应线被切断了，德国陆军元帅赖歇瑙率领的第六集团军不得不掉转身来，对付在德军侧后突然出现的威胁。灵活的波塔波夫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他利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作为隐蔽所，把部队收拢在一起，包括当时已为数不多的坦克，对赖歇瑙的第六集团军进行了坚决的、密切协同的防御，并卓有成效地使用了密集炮火。双方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战斗极为激烈。在自行火炮支援下发动进攻的德军伤亡惨重，到处是呼唤担架的喊叫声。波塔波夫组织的炮火猛烈而准确，很多德军士兵连同战斗车辆被逼得离开陆地陷入沼泽地。麦田、灌木丛、树林，到处都成了隐蔽射击和开炮的场所。当增援的德军第九十八步兵师匆匆赶到时，也被遍地弹痕累累的装备残骸和废墟惊得目瞪口呆。这些德军官兵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场面。

第六集团军是德军主力，在西欧作战时曾经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已经习惯

于崩溃的对手在稍加抵抗甚至不做抵抗就成千上万地投降。现在这支希特勒的王牌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次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一年半以后，继赖歇瑙任司令官的保卢斯率领这个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陷入苏军重重包围，25万人马全军覆灭。当那些蜷缩在雪墙之下，因重伤和寒冷变得神志麻木的德军官兵纷纷开始举枪自杀之时，也许他们还能够记起，这支王牌部队的悲剧开始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缘。

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编著的战史中，这样评价波塔波夫的第五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沼泽地的防御表明，苏军不愧为无与伦比的防御大师。”

为解脱陷入苦战的第六集团军，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向斯摩凌斯克—莫斯科挺进的中央集团军群抽出部队，从北面向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苏军第五集团军实施突击。波塔波夫这个给德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对手，通过卓有成效的作战行动，成功地牵制了两个方向的德军兵力。

最珍贵的经验，包含在最惨痛的教训中

万分可惜的是，基尔波诺斯率领的这支在战争初期表现杰出的西南方面军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陷入德军高速推进的装甲集群合围而全军覆没。西南方面军的悲剧中有极其深刻的教训值得记取。他们曾经给德军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在一些对现代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人指导下，这支优秀部队最终覆灭，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当时对全力向西进攻的德军来说，苏军西南方面军已经向东深深楔入德军中央集群的南翼。随着德军在西南方面军左右两翼迅速向前进展，基尔波诺斯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是由单方面作战成功带来的危险。对这种因局部得手带来的危险，当时的若干领导者并未领悟。7月10日，斯大林任命国内战争中的老英雄布琼尼元帅为西南战区总司令，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布琼尼颁布的第一号命令是：“不许后退一步。要坚守和反击。”这位国内战争的老英雄不知道希特勒颁布的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方案”中指令：“装甲部队应果敢作战，入对方深远纵深，歼灭部署在俄国西部地区的俄国陆军主力，必须防止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退入俄国纵深辽阔地区。”

希特勒想尽可能将苏军主力围歼于相对狭窄的西部，所以命令“必须防止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退入俄国纵深辽阔地区”；但布琼尼也在要求“不许后退一

步”。新成立的苏军西南战区指挥部把部队装进敌人的圈套之前，思想首先装进了敌人的圈套。

布琼尼上任一周办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基尔波诺斯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调出，划归秋列涅夫大将的南方方面军指挥。布琼尼本想通过此举减少西南方面军防御正面，让基尔波诺斯集中力量防守基辅，结果马上造成指挥上的混乱。8月初，这两个集团军在乌曼地区陷入德军合围。同时被围的还有南方方面军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分。8月8日，德军乌曼合围战结束。苏军第六、第十二集团军大部及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共计10万余人被德军歼灭，第六集团军司令穆兹琴科中将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波涅杰林少将皆被德军俘虏。

此后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处境便每况愈下。

8月中旬，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包含极大危险的态势。德军中央集群在俄罗斯中部的高速推进，已经使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西南方面军处于德军中央集群的深远后方，而专心在这一地区组织对德军正面防御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尚未认识到在其深远侧后已经开始出现的巨大危险。8月20日，德军中央集群和南方集群向东突击的两支先头部队形成齐头并进之势：两个德军集群的锋芒之间相距550公里，几乎形成一条直线的中心距后方也大约550公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几乎等边的三角形地区，苏军一个完整的方面军——英勇善战的西南方面军位于这个三角形地区之内。

希特勒立即抓住这一机会，8月21日他签署指令，要求德军南方和中央两个集群“必须毫不迟延地利用这一极为罕见的态势，以其内翼兵力实施一次协同作战”。德军中央集群的突击主力——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开始掉头向南，向苏军西南方面军的纵深后方罗姆内和普里卢基突进；南方集群的突击主力——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群则从克列缅楚克迎头向北，德军南北两只装甲巨钳的会合地点在洛赫维察。这两只装甲铁臂的相隔距离、伸展长度以及他们企图合围的部队数量，都是空前的。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装甲合围战全面展开。

苏军总参谋部已经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朱可夫为此不惜被斯大林解职，坚持要求放弃基辅。8月19日，就在希特勒发出那道毁灭西南方面军命令的前两天，朱可夫以预备队方面司令员的身份再次致电斯大林，指出如果德军中央集群的装甲部队迅速南下，西南方面军后方将面临极大危险。斯大林迅速接受了朱可夫的意见，一个新的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成立了，任务就是阻止

德军中央集群分兵南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既坚决又果断：“我打算粉碎并且无疑将粉碎古德里安。”

如果说西南方面军成功作战反使自己陷入包围的话，那么叶廖缅科仅仅是语言的豪壮，又使刚刚开始认识西南方面军危险处境的斯大林松懈了这一认识。布良斯克方面军为掩护西南方面军做了一些事情，但它始终未能阻止德军坦克集群南下完成对基尔波诺斯的合围，更别说什么“粉碎古德里安”了。

此时基尔波诺斯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部队所面临的危险，9月10日他致电总参谋部，要求实施总退却，以免陷入德军合围。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回电：“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认为，必须按我军条令规定继续在西南方面军各部队占领的阵地上奋战。”德军合围之势如此明显，连内战时期的老英雄布琼尼也坐不住了。9月11日他以西南战区总司令身份致电莫斯科大本营，要求实施总退却：“延误西南方面军的退却，可能使军队和大量兵器遭到损失。”

当天晚上，莫斯科的答复到了。斯大林亲自站在电报机前，不给布琼尼而给基尔波诺斯发报。电报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电报中间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要基尔波诺斯立即变更兵力部署、抽出有力部队对敌军发动猛烈冲击，配合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粉碎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

叶廖缅科做出的保证使斯大林印象深刻。在西南方面军被合围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在等待叶廖缅科“粉碎古德里安”的捷报。正是基于此，他才发出了这封葬送西南方面军的电报。

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后来回忆：斯大林的电报使指挥室陷入一片沉寂。尤其是电报的最后一句话把所有人都惊呆了：“最后，应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应寻找抵抗的途径。”脸色苍白的基尔波诺斯两次大声念了这句话，然后转身问军事委员会各位委员：“你们要说什么，同志们？”

他给斯大林回电：“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将会立即得到贯彻。”

第二天，斯大林解除了布琼尼西南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命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他。

9月15日，铁木辛哥接过指挥权第三天，德军古德里安装甲集群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洛赫维察会师。炮塔上涂有很大“G”字（古德里安的第一字母）的坦克，与炮塔上涂着“K”字（克莱斯特的第一字母）的坦克在乌克兰平原南北靠拢，苏军西南方面军5个集团军陷入德军的铁壁合围。

洛赫维察西南那片树林

德军完成战役合围两天之后，莫斯科才发电报给基尔波诺斯，同意开始撤退。

一切为时已晚。从来没有在如此困难情况下执行任务的基尔波诺斯，用尽一切办法想解救德军合围圈内的部队。遗憾的是在此局面下，所有努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9月19日，基辅陷落。

9月21日，曾使德军主力第一装甲集群和第六集团军陷入困境的苏军第五集团军覆灭。集团军司令、被德军称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军事家之一”的波塔波夫少将负伤被俘。

9月20日，在洛赫维察西南的德留科夫希纳镇附近，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和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在冲出重围时战死。

9月24日，德军基辅合围战结束，60余万苏军被围歼。这次作战，被德国陆军称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围战”。

作为一名方面军指挥员，基尔波诺斯无疑是相当杰出的。他在自己负责的方向上组织了十分出色的防卫作战，还带出了一批如第五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那样能征善战的将领。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因为友邻部队作战失利和大步后退，基尔波诺斯的出色防御反使他陷入被包围的危境。而统帅部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决策，终使其被包围的危险变成了现实。

中国有句老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历史从来都以成败论英雄。不知有多少像基尔波诺斯这样的优秀军人，虽然英勇战斗，却无缘成为英雄。一轮又一轮对二战胜利、卫国战争胜利的歌颂、纪念、授勋和回忆中，几乎没有人把目光投向乌克兰西部辽阔的洛赫维察原野，去发现一个叫作舒梅伊科沃的树林内，有一座手握冲锋枪的苏军士兵雕像，雕像旁的清泉边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书写：“1941年9月20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M.P. 基尔波诺斯上将在此牺牲。”

数十年过去，风吹雨淋太阳晒，这里一直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还有那位负伤昏迷被俘的第五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少将，在德军战俘营度过卫国战争的大部分时光。德国战败，他被解救出来，鉴于他在战俘营中同样表现英勇顽强，重新获得信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担任敖德萨军区第一副司

令员。

但战争已经过去、敌人已经战败。这位优秀的指挥员，失去了本该让其军事造诣大放异彩的时间和空间。像波塔波夫这样的指挥员，如果不被德军关进战俘营而在前线指挥作战，苏联国家和人民会少付出许多代价。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英勇善战的西南方面军和基尔波诺斯本人的覆灭，其悲剧都需要到一个更加宏大的层面去寻找，因而其中的教训也更加深刻和更有意义。

最后还要反过来看。在围歼西南方面军的基辅会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德军名将古德里安，战后反思这一幕时是颇为不满的。他抱怨希特勒指挥错误，让他的部队从中央集群掉头南下围歼西南方面军。他认为此举耽误了向苏联首都挺进的宝贵时间，以至最后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已经冰天雪地，德军的敌人除了不屈不挠的苏联红军之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对手：难以应付的俄罗斯严冬。

“只差几周时间”，闪击名将古德里安晚年也像一个唠叨的老人，反复啰嗦这句话，好像真的多上几个礼拜，他就可以把德军旗帜插上克里姆林宫了。

这可以被列为一种极端另类的说法。

但不妨把古德里安这些话，告诉长眠地下的基尔波诺斯。如果他得知自己领导的西南方面军最终甚至用自己的毁灭，为保卫苏联心脏赢得了时间，会闭上一只一直难以闭上的双眼。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这个人不是军人。

却比任何美国军人都执着地鼓动、进行、坚持战争。

这个人拥有众多“第一”的头衔：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1975年，43岁）；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国防部长（2006年，74岁）；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两度担任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第13任、第21任）……还有什么呢？喜欢或不喜欢的都对他留有深刻印象，仅仅就为这些充满机缘条件的“最”？

其实真正给此人留名的“最”，是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指挥调动美军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侵入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推翻两个政权——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实现美国长期耿耿于怀的两个夙愿——进入中亚、掌控海湾。

先看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地处中亚，苏联解体后，中亚被美国战略学界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力求进入而不可得。这个夙愿“9·11”后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进入并占领阿富汗、驻军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大门从此无法对美国关闭，“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从此不再真空。

再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地处的海湾地区，是全世界最富石油储藏的地区：伊拉克的储量为世界第二，旁边就是世界储量第一的沙特阿拉伯、储量第三的伊朗、储量第五的科威特。在该地区完成坚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半个世纪的梦想，这个梦想又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占领伊拉克全境，牵制沙特、威慑伊朗。科威特则更加顺从，长期令美国头痛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也变得噤若寒蝉，收一箭数雕之效。

如此“战绩”，的确是自1947年美国依据“国家安全法”设立国防部长一职以来，任过该职的所有人皆自叹弗如的一个关键之“最”了：最富美式攻击精神、最富实际攻击成效——2001年10月7日向塔利班宣战，11月12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6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2003年3月20日向萨达姆开战，4月9日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回时间更短——20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还多以策动政变的方式，颠覆那些它不喜欢的政权的话，那么新世纪则是以赤裸裸的和不折不扣的武力了。在这些“全武打”中，拉姆斯菲尔德首当其冲。

伊拉克战争得手后，这位据说“身体奇好、精神状态奇佳”的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提出“10—30—30”的作战构想，即一旦美国决定在全球某个地区动武，美军必须能够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30天内摧毁敌军、第二个30天再完成重组，做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次任务的能力。此设想一出，全球哗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设想是打“两个半战争”：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亚、非、拉地区应付一场小规模战争。到了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重大损耗，再打“两个半战争”已力不从心，指标不得不大大下降，变为打“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仗。冷战结束后，恢复过来的美国战争指标再次上升，克林顿政府提出要打“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即在东北亚和中东地区各打一场大仗；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觉得克林顿的胃口还不够大，要调整“两场战争”的指标，但谁也没有想到调整出个拉姆斯菲尔德的“10—30—30”计划出来。依照此计划，美军必须在70天内打完一场仗并且完成投入下一场战争的全部准备，这真是

前所未有的野心和胃口，无怪乎欧洲舆论惊呼：美国在准备一年进行五场战争！

就在这些猜疑、感叹、惊呼、愤怒之中，拉姆斯菲尔德上升到其威势顶峰，然后是权势顶峰。

就美国国内政治来看，国防部长历来不是显眼角色，在内阁中居于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要角之后。但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后，不但在五角大楼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而且靠其咄咄逼人的个性以及与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的特殊关系，很快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从国务卿鲍威尔那里抢了过来，弄得那位前四星上将一而再、再而三做出“以大局为重”的妥协；然后又通过战场实绩一次又一次向国会要求追加拨款，把个财政部长也贬成了美国大兵的账房先生；最终超过所有内阁成员，使自己成为布什政府中实际上的第一阁员。在国内如此霸道，在国外他也不是谦谦君子。伊拉克战争前，英国爆发史无前例的百万人反战大游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莱尔首相面色凝重，眉头紧蹙，拉姆斯菲尔德只撇撇嘴说：即使我们的英国盟友不参与，美国一家也要把仗打到底。就是这句话，使布莱尔有一阵颇下不来台。这种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习性和谁说也不行、谁劝也不听、一意孤行的意志，使美国《时代》周刊用“五角大楼军阀”（Pentagon's Warlord）一词来描述他，也使其头顶诸多个“最”之上又添加了一个“最”：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国防部长。

在一般人早已退休的年龄，他却进入了其事业的顶峰。

他以为从此都是顶峰，有永远的顶峰。

幸运的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他的顶峰恰好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力量的顶峰重合，或者更客观地说，他恰恰借助了美国力量的顶峰。当他说“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时候，以为凭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严重危机的隐患就由他自己悄悄埋下了。

他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忘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截至2006年底，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花费3500亿美元军费、付出了24000名美军死伤的代价，不但未能消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样板”，反使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陷入了生灵涂炭、乱象环生的内战，爆炸、刺杀、枪战、炮战成了家常便饭。三年零八个月之前，美军第三机步师冲进巴格达，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拉倒萨达姆塑像的时候，谁能想象到伊拉克今天的乱局？2006年11月26日，美军在伊拉克作战的时间，已经超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348天的作战时间，战争费用在2005年就超过了朝鲜战争的开支，2007年超过越

南战争 5310 亿美元的纪录。这不但成为美国进行的最昂贵战争之一，而且结束之日遥遥无期，已经成为一场难以脱身的战争。新加坡报纸发表了一篇颇有特色的评论：《越战伤了驴，伊战倒了象》。认为以驴为象征物的民主党在 2006 年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胜，是因为以象为象征物的共和党陷入了伊拉克战争泥潭。由国会授权成立、民主和共和两党外交政策专家参与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提出的报告说：“伊拉克局势非常严峻，而且还在恶化。暴力的规模和杀伤力越来越大，针对美国军队的袭击以及美军的伤亡情况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伊拉克人民正在苦难中煎熬。”

这一切，拉姆斯菲尔德难逃干系。他的地位与美国力量一起上升，也必然要随这一力量的衰落而跌落。尤其是在导致美国力量的过度损耗中，他难辞其咎。2006 年 11 月 8 日，他从权力顶峰跌落了：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发表辞职感言时，他说了一句连自己也十分陌生的话：“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几乎没有人理解的战争，是一场人们备感陌生的战争。”几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天前，自己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瞬间似乎连自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四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一篇名为《拉姆斯菲尔德自己造成的创伤》的评论，给了他一个美式的“盖棺论定”：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有机会成为美国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在危急关头执掌国防部，具备很多令人钦佩的才能，这些都是成功的必备条件。然而，与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一样，他的缺点是傲慢和固执，这不仅导致了他的下台，还使他毕生的努力毁于一旦”；“拉姆斯菲尔德为这一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会以改革美军的国防部长而名留青史，充其量也就留下个差点输掉伊拉克战争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他的顽固不化毁掉了地面部队。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设备损坏殆尽，士兵们也已精疲力竭。部队为了保证训练只得轮流使用坦克和悍马军车。美军遭遇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与拉姆斯菲尔德在 2001 年上台时所掌管的那支军队相比，他所留下来的这支军队的实力和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2006 年 12 月 15 日，美国国防部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在发言中依然对拉姆斯菲尔德充满溢美之词，称赞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国防部长，但新任国防部长盖兹回答参院咨询“美国是否正在打赢这场战争”时，张口就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字眼：“不！”

拉姆斯菲尔德走了。虽然黯然神伤，但头上依然顶着左一个右一个“最”：最年轻的、最年长的、最有权势的、最富攻击精神的、任职次数最多的……美联社记者伯恩斯说，仅仅只差了10天时间，拉姆斯菲尔德就能创造另一个“最”：打破越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创造的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

也许拉姆斯菲尔德最不想打破的就是这个纪录。越南战争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的噩梦。麦克纳马拉活一天就要检讨一天。他决不想重蹈覆辙。正式辞职之前，拉姆斯菲尔德完成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建议布什对伊拉克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甚至规划了“上策”为何、“下策”为何等等，细致且周全。但这份备忘录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建言献策了，而是暗中埋下的那句伏笔：不管做出任何决定，都要表明这些决定是“实验性”的，“这样我们就能随时在必要的时候对策略进行调整，而不必承担失败的责任”。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拉姆斯菲尔德才想起来不能做麦克纳马拉。他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灾祸和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艰难。他想抽身便走，身后尽量少留痕迹。

但为时已晚。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露多大脸，现多大眼”。现在不要说全世界了，即使在美国，如果要为伊拉克战争选出一位标志性人物，美国媒体也承认：大多数人会选执着的和顽固的拉姆斯菲尔德。

“暴风雪结束了”，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离去之前，给五角大楼同仁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平素喜欢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句名言：“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失败也不是最后的宿命，重要的是勇气。”

他对丘吉尔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凭借他的个人勇气和美国国力，就能够达到一切、克服一切。当他终于明白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之时，他的勇气也竟然像冰雪那样开始悄悄融化了。

应该责怪丘吉尔吗？既然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失败必然是最后的宿命。

现在坐在家里的拉姆斯菲尔德，未来只有在回忆录中解脱这一切、辩白这一切了。他拥有如此众多的“最”，回忆录肯定畅销。有人以成功影响一个国家，也有人以失败影响一个国家。拉姆斯菲尔德无疑属于后者。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时间和历史会做出这样的记忆。

多少年以后、多少代以后的美国人会不会说：21世纪初，我们有个最狂妄的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他的最后一个“最”。

阿里尔·沙龙：完美谢幕

先脑栓塞、后脑溢血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躺在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里，任C T扫描一遍一遍掠过，昏迷不醒。这个中东强人用人们始料未及的方式，突然完成了他的政治谢幕。

执政者启幕艰难，谢幕更难。封建君王们总是“驾崩”在至高无上的皇座上，像路易十六那样被推上断头台，或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自己跑到煤山去上吊的，毕竟是少数。看看埃及一座高过一座的金字塔、中国一坑连着一坑的兵马俑，君王们生前极致的尊贵和死后极致的哀荣也就不难想象了。

法西斯“元首”和“首相”们的谢幕方式则要惨得多。战争还未结束，墨索里尼就像连着胴体的火腿那样被倒挂在高高的架子上；希特勒则先是自我饮弹（一说服毒），然后被部下倒上几十加仑汽油烧得不干不净再砸碎骨头抛弃；东条英机虽然熬到了战争结束，还不无痛苦地往自己肚子上狠狠戳了一刀，但最终无法逃过东京国际战犯法庭的绞刑判决——哪怕临刑前他像踩着鸡脖子那样突然尖叫了一声“天皇万岁”。

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使执政者告别政坛的方式体面多了：任满、辞职、落选，最不济也就算弹劾。但制度越是完善，也越是“见制不见人”，政治家个人也被压迫得越干瘪——有时干瘪到无情的地步。丘吉尔从张伯伦手中接害怕战争害怕希特勒的英国，发誓要用“blood, toil, sweat and tears”（热血、艰辛、汗水、眼泪）拯救大不列颠，结果当“blood, toil, sweat”真的重振了英伦三岛、其政治峰颠在胜利曙光中遥遥相望的时候，他便被选民们毫不吝惜地抛弃、独自一人到角落里挥洒“tears”去了，让人领略到民主政治也有让人寒心的另一面。至于美国人最喜欢最崇拜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总统里根，这个制度也要通过在他下台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像剥洋葱一样一步一步剥夺他的思维、他的记忆、他的风采、他有美男子称谓的尊容，最终把他变成目光呆滞、表情木讷、形状干枯的一具植物人，把他留给世人的所有美好形象像砸碎一面镜子一样完全粉碎。最后让那些崇拜者围着这具木乃伊和他们的偶像道别，对死者和生者不也是很残忍的吗？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例证：克林顿。他的幽默风趣、他的风流倜傥、他语调中那种非常迷人的抑扬顿挫节奏，他留给人们的这些最精彩的部分，无一例外都正在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冰雪那样逐渐消融。如果他像里根那样长寿，也不过给美国的政治蜡像馆内增添一具同

样呆若木鸡的蜡模，而永远不可能像他的偶像肯尼迪那样 46 岁被刺杀，在阿灵顿公墓日日夜夜享用跃动不熄的长明火，证明自己的永远年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沙龙，这个以色列最桀骜不驯的老鹰的谢幕。此人终生为犹太民族拼死奋战，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身负重伤，一只眼睛从此处于半失明状态；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他带领特种部队攻占米特拉山口，为以军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最终占领西奈半岛立下汗马功劳。其最辉煌点是 1974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以色列面临战局危境，他以预备役军官的身份进入现役，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军区司令戈南要撤他的职、随后赶来的副总参谋长巴列夫要撤他的职，独立带领装甲师横跨大苦湖直插苏伊士运河西岸，合围埃及第三军团，使整个战局反败为胜。头部负伤包着纱布指挥作战的沙龙神勇至此，以色列士兵当时就在汽车上刷上了“阿里克，犹太王”的字样，将沙龙的军威捧到极致。

这个被犹太民族尊为“救星”和“战神”的沙龙，在阿拉伯人眼中却从来都是一名冷血屠夫。由于牵涉进 1982 年“加利利和平行动”中屠杀巴勒斯坦难民，甚至西方社会也对他保持一定距离。当他 2001 年出乎意料地当选为以色列总理时，世人普遍感觉中东和平迎来了一个终结者。果然，持续四年的巴以仇杀开始了。但另一面也在越来越清晰地显现：这尊战神真正开始从冲突中寻求和平。这个“定居点之父”开始率先拔除定居点，这个桀骜不驯的老鹰开始探索像鸽子那样共存。进程开始了。其中沙龙的决心与勇气可能依然像他面对一场战争一样，非我等所能想象。也许正是此生淋漓的鲜血让他真正认识到万世和平的难能可贵，认识到这种和平不仅是阿拉伯的战略选择，也应该是以色列的战略选择。而这一切，现在已经不能找沙龙求证了。他在以色列人围绕祈祷的那所医院中数次开颅，未及表露的思想已经随脑干被清理的污血而去了。

军营的熄灯号已经吹响，集战神与屠夫为一身的犹太王阿里克正式谢幕。多么精彩的谢幕——你看他身后开启的那扇无法关闭的和平之门！

此前也有过精彩的谢幕，比如叶利钦。这个执政时期不断犯错不断骂人不断被人骂的嗜酒者，在最后一刻变得异常清醒。他事先不告诉任何人，1999 年 12 月 31 日突然宣布辞职。他毫无预告地出现在元旦前夕莫斯科街头的大屏幕电视上，满含深情地说：“今天，在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最后一天，我辞去职务”，“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俄罗斯在新的世纪，必须有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去领导充满才智、精力充沛的人民。我已掌权多年，应该离去了”，“我

不应该阻碍历史进程的发展。当这个国家拥有一个更坚强的人能够胜任总统时，我没有理由等待，这不是我的性格”最后他缓慢地说出了他的告别语：

“我为未能实现你们的梦想而乞求宽恕，我没有能够使国家跨越到明亮、富有、文明的未来。”讲到最后一句，他的声音哽咽了。当时不知有多少俄罗斯妇女和男人，站在街头为叶利钦的最后一句话泪流满面。这就是执政很糟糕谢幕很精彩的叶利钦：通过断然对手中权力的提前让渡，通过不是发自别人笔端而是发自内心的歉意表达，一瞬之间使所有错误和过失都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沙龙的谢幕更精彩——尽管这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意识的——他甚至不需要一句话语，不管是对犹太人还是对阿拉伯人，不管对他的家人还是对他的仇人。他用大面积脑溢血这种无可挽回的重症，向犹太人、阿拉伯人最后向全世界显示了他的巨大价值和真正存在——可能还有一条：他确定的政治方向可能会被拖延，但已难以更改。似乎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调动，让这个终生跋涉的信徒最终由斗士变成使者，向他的民族和周围爱他恨他敬他怕他的人们传递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之后，悄悄离去。

这就是我的全部观点。当人群云集为沙龙祈祷、祝其平安、希望奇迹发生使他还能够重返政坛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天意。此时此刻哪里还需要什么别的奇迹，中风就是奇迹。它使毛病成堆得罪人无数的沙龙变得空前完善。不辞而别，反让他留下的事业难以更改——这真是履行使命的沙龙的最后凯旋——超过以往任何沙场辉煌的凯旋——这个终生信奉武力的人，竟然留下如此丰厚的和平遗产。

不管我们把人权、生命强调得多么高贵，对多数政治进程来说，政治家的生命往往会在不经意中由财富变成累赘。即将 78 岁的沙龙在自己变成累赘之前，通过中风完成了对传统惯性和制度惯性的解脱——在另一个世界，他可以向他的老长官拉宾、巴列夫、达扬这些著名的前辈将领报告，他沙龙身后留下的路径，开始通向和平。

难道这不是有生之年他所能获得的最为空前的凯旋？

阿里克，犹太王！

三、战略之思

领导者的判断出错，胜利的希望即会渺茫，此时部属的鲜血或许能够力挽狂澜，或许不能。尽管世上无人不犯错，但一定要避免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战略思维出错。

什么在决定成败？

有人说机遇决定成败。有人说实力决定成败。有人说战略决定成败。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大千世界五光十色，人们无不在根据各自的成长经验，阐述各自领悟的道理。

还是应该听听那些真正的胜利者的说法。

1947年，底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陈毅同志讲过两段话。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陈毅同志概括出了一个以前我们未曾认识深透的道理。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面临敌军的压力最为巨大，取得的胜利却又最为重大。为什么能够如此？就是陈毅同志这段话。虽然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我们“愈往上比则愈强”，这是我们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胜的重要缘由。陈毅同志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

这就不仅仅是华东野战军了，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一个法宝。当然有主义的正确，当然有作战的勇敢，当然有群众的拥护，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愈往上比则愈强”这一领导层特有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优势。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述：“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

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就是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当年在越南战场，每一场具体战斗似乎都没有输，但战役战术胜利堆成的却是战略失败，最后不得不万分狼狈地撤出。正因为搞不明白，所以至今还在不断犯错：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就在那里顽强地向每一个卷入方证明，战术成功远远不等于战略成功。

战略思维——尤其是领导层战略思维——的重要性，在这里被空前地凸现出来了。若想得胜，就一定要避免对“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一样，要想不犯错很难。重要的是少出错，尤其要避免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战略思维出错。俄罗斯描写车臣战争的报告文学《连队消逝在天际》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这是带血的语言。指挥员的思维判断出现问题，浴血奋战的士兵也许能力挽狂澜，也许不能。不管能与不能，付出的代价都将极其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斯大林的战略思维就出现了问题。他以为凭借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有三至四年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未料想一年多时间希特勒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所有征候已经极其明显，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应部署，还要求一线部队按兵不动，“不给对方提供挑起战争的口实”，致使战争初期苏军损失极其重大。战争爆发第五天，苏军西方方面军就被德军合围，两个集团军全部、一个集团军大部共22个步兵师，加上配属的若干个坦克师和机械化旅共计30万部队在明斯克方向陷入绝境。斯大林从德国广播台中听到这个消息，只来得及派飞机将方面军主要领导接到莫斯科，然后军法审判，除政治委员福明纳赫以外，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中将等人全部被执行枪决。但灾难并未就此中止。过了一个月——1941年8月，德军完成斯摩棱斯克合围，苏军损失39万。又过了一个月——1941年9月，德军完成基辅合围，苏军损失60余万。基辅合围被西方史学界称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作战”。又过了一个月——1941年10月，德军再完成维亚兹马合围，苏军损失50余万。这就是卫国战争之初，因苏军严重损失使苏联面临的严重态势。虽然后面有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依然在红场阅兵表现出的钢铁般意志、有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实现的伟大转折、有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横扫半个欧洲铺开的辉煌胜利，都无法掩盖战前和战争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层因战略

思维出现问题，给国家、民族和军队带来的巨大灾难。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安·阿·科科申在其《战略领导论》一书中说：“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及其初期，国防指挥体系最薄弱环节是最高军事政治核心（最高战略核心）。”战略思维出现问题，最高战略核心竟然成为国家体系中“最薄弱环节”，其中教训不可谓不重大。苏联陆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战争结束后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表现出对战略筹划的准备不足。经历一系列严重失败和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他完成了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的成长过程。”

因此，当我们在窗明几净的学术报告厅概括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全面性、穿透性、预见性、深刻性、彻底性、关联性、辩证性，如此等等之时，一定不要忘记战略思维的艰巨性和关键性。因其关键，所以艰巨；因其艰巨，所以关键。

成功与失败，由此发源。

重心、枢纽和关节

战略思维是从宏观总体和长远建设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宏观、总体、长远、全局，都是它的关键词。那么是不是说，战略思维必须是不折不扣地顾及方方面面、必须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是十个指头按跳蚤的思维呢？还是说所有事都一人管、所有条子都一人批、所有仓库钥匙都挂在一人身上，这个人就抓住总体和全局了？

意大利经济学及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学者并不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他从大量经济统计中发现一组颇有意思的现象：80% 的产出，来自 20% 的投入；80% 的存款，来自 20% 的客户；80% 的堵塞，发生在 20% 的路口；80% 的工作，由 20% 的人员承担；80% 的医疗资源，消耗于 20% 的疾病；80% 的销售额，来自 20% 的顾客……帕累托由此得出结论：80% 的结果，归于 20% 的起因。这一结论被人概括为“重要的少数与不重要的多数定律”，又称为“80% 对 20% 定律”，或干脆简称“帕累托定律”。

该定律的意义，不在于每一组统计的百分比是否都精确到了无懈可击和完美到了天衣无缝，而在于当大多数人一直习惯强调多数的意义、多数的重要和多数的决定性之时，帕累托却揭示出多数往往只能造成少许影响，少数则往往

造成主要、重大的影响这一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现象。这位终身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通过该定律告诉我们：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分清主次，从众多琐碎事情中摆脱出来，用最大精力去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整体往往是被局部颠覆的，反过来，整体也往往被局部拯救。抓住了关键的局部，就抓住了整体；失去了关键的局部，也就失去了整体。帕累托定律揭示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为后人进行高质量的战略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是不知道帕累托为何人的，但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他特别强调“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这就更加精到地概括出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位大战略家在这里指出，抓整体、抓全局非但不是眉毛胡子一起抓，而是抓重心，抓枢纽。掌控了重心和枢纽，就掌控了全局和整体。真正高明的领导者，最大的本事并非今天人们分外推崇的“沟通”和“协调”，而是从纷繁复杂的万物万象中，发现重心是哪里，枢纽在何处。

顺便再分析一下人们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第二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前一句意即大家谁也不是神仙，难免不时犯错。后一句是说谁也不可能像弓一样整天绷那么紧，有放松才有紧张，没有放松也就没有紧张。这两句话都无可非议，但把帕累托“80%对20%定律”拿过来对照，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首先可以说，你在那“80%”的范围中松弛一下未尝不可，犯点错误可能也无碍大局，但是要特别注意，一旦进入关键性的“20%”范围，你的任何松弛都可能因过于懈怠而错失良机，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因小失大撼动全局。在“重心”和“枢纽”处的松弛和犯错，其意义与非“重心”和非“枢纽”处的松弛和犯错，从性质到意义都会完全不同。

不是不允许犯错，不允许松弛，而是说平时你可以松弛一下，这个阶段你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绷。平时你可以出一两个错误，这个阶段你必须全力以赴避免出错。因为此刻它不但可能使你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也可能让你陷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困境。

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致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

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战略思维的整体性与全局性，在这里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们说从空间上讲，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思维，表现出思维的整体性和全面性。那么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知道重心在哪里，枢纽在何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输、可以败，什么时候不能输、不能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适当放松，打个小盹，什么时候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其核心正如毛泽东所说：“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思维在这里就变成了一把庖丁解牛的利刃，通过重心、枢纽和关节，游刃有余地把握了全局和整体。

泰山与麋鹿

作为从宏观总体和长远建设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战略思维的前瞻性，是战略指导能动性的源泉。战略思维的一切成果，无不体现着预见和预置。缺乏前瞻性，思维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对毛泽东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来回忆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所谓高瞻远瞩，就是预见。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还说：“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我们今天谈“领导就是服务”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领导的服务就是搞好生活保障、弄好福利待遇，就是排列好职务晋升次序、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千万不要忘记，前瞻与预见，是领导者提供的最大服务。这种前瞻与预见从来不全神贯注于前方的庆功、颁奖、表彰、剪彩，而是全神贯注于前方可能出现的风暴、冰山、悬崖、沟坎，以及风暴与冰山、悬崖与沟坎之后还有的绚丽与灿烂。唯此，领导者才能在心理准备、组织准备和力量准备之上，产生大眼光，生成大境界。宋代名家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不是不知道“泰山崩于前”，不是不知道“麋鹿兴于左”，而是能够以大眼光和大境界超越眼前的纷繁万象，通过更大的气象和更大的格局，最终实现更大的利益追求。

以抗美援朝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为例，两次作战都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做出用兵决定，十分艰难。朝鲜战争发生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整编复员、边疆剿匪等任务也相当繁重。面对美韩联军向鸭绿江挺进，出兵即出境，即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迎头相撞，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海空力量的弱点将暴露得十分明显。如此困难情况下决定用兵，毛泽东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一思维表现出的眼光和胆略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战场胜败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标准，“入局”或“不入局”才是出兵与否的标准。这就将“跨过鸭绿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境界。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视线穿越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看到了比战场得失更加重要的东西。所以哪怕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哪怕美国海空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轰炸中国城市和工业基地，哪怕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被破坏、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群众对其产生不满，都阻挡不了毛泽东为了新中国更加长久的安全，一定要“入局”的坚定决心。

这就是“跨过鸭绿江”这一新中国战略决心的根本来源。

无独有偶，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作战前，再次出现类似处境。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国力虚弱。军事斗争主要方向又在东南沿海，重点防范蒋军窜犯大陆。与苏联老大哥刚刚吵翻，对方撤专家、停援助，“中苏同盟”已成废纸。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则气焰嚣张，一进再进。不得不做出自卫还击的决定做出后，因我军从未与印军作战，并不摸底，毛泽东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毛泽东问：“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中毛泽东的战略决心，同样超越了战场胜负。

抗美援朝，在全世界面前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成为新中国历次军事斗争中赢得最为漂亮的胜仗。这些经典事实说明，要想准确或大致准确完成战略前瞻与预见，思维主体必须以全部智慧和魄力完成对种种决定性因素的切实把握。在这其中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还不够，还要能够用更加长远利益的追求超越眼前困境，最终为价值久远的战略决策开辟通路。

不被“泰山崩于前”慑神障目，不被“麋鹿兴于左”乱意分心，领导者才能获得一种持久定力，以更高更远的战略眼光，作为关键时刻进行战略决策的心理底数。只有这样的心理底数，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决心。

大眼光、大境界、大决心之综合，便是大格局。

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

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

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入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

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 255 人、伤 777 人、损失舰船 6 艘、飞机 34 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 1000 余人、被俘 11 000 余人、损失舰船 11 艘、飞机 105 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 年 10 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江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 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强烈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不但说问题意识，而且要说强烈的问题意识？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战略问题的存在，才有战略思维的存在。

还因为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穿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丫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时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非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由此开始。

只记住那棵静态的苹果树而忘掉动态的苹果这一现象，决不仅仅发生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美国新军事战略，与会者中包括参与制定这一战略的两位美国学者。我方有学者发言，深入展开分析。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点，娓娓道来，全面铺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浅出，把两个美国人听得目瞪口呆，赞叹道：你们的理论概括真厉害，总结出这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可惜好景维持不长，午餐前这两个美国人开始心存疑惑，午餐后他们已经在小心反问了：研究问题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研究问题的好方法吗？

虽然现场无人回答，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症结所在。全神贯注于挖掘意义，最后丢掉的必然是研究问题。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有很多分析都认为这场战争喻示着信息化作战正式登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转折点、对世界军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此等等。美军的概括却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遇到了“理想的敌人”，获得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地形”，因而在“理想的战场”上打了一场“理想的战争”。之所以提出这么多个“理想”，无非是想说明如此理想的条件今后很难再现，因而这场战争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五角大楼的三卷本《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对战场成功和军事优势的描述基本上是轻描淡写，随便带过。依照我们一些人的思维习惯肯定认为成绩挖掘不深、优点概括不精、意义升华不高。但说到问题与毛病，他们却挖掘得很深、概括得很精、升华得很高：“事实证明，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在扫雷经验、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令人遗憾；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使那些距离稍微拉开、彼此喊话刚刚听不见的部队之间无法进行通话联系；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看到这些评价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这还是那支被描述为全新高技术装备、全新高技术作战理念，无所不能的军队吗？

该报告对问题的追究就是这样不依不饶：“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情报支援的不足也会越来越严重地妨碍武器效能的发挥”；“目前使用的压制敌方防空武器的飞机均已陈旧，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有些型号的飞机甚至正在退出现役”。

这样的总结，与我们的众多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在战绩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寻找缺憾如此敏锐，对查找问题如此锲而不舍，恰恰表明他们在力图保持清醒，在力求未来胜利。而今天人们说战略问题泛化、战略思维问题泛化，最大特征就是在花样翻新的词汇概念掩盖下，问题意识的极度欠缺。而战略思维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现问题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怎样产生？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思维才会摒弃漫无边际和烦琐枝蔓，变得清晰简捷、单刀直入。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

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

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概括总结意识、提炼拔高意识、归纳升华意识不论怎样使文章和口号妙笔生花，也无法与尖锐冷峻的问题意识比肩。因为没有后者，就不可能具有对未来的真正主导。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引用胡锦涛同志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入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

风险在安宁中积累

知识可以积累，财富可以积累，经验可以积累。这些人们都知道。容易被忽略的是：风险也可以积累。虽然“福之将至”的思维方式人们普遍欢迎，“祸之将至”的思维方式受到普遍抵制，但现实并不因人们愿意，便将福气一个个推到你眼前，也不会因为人们不愿意，就将祸水一波波远远引走。风险永远在安宁、安逸、安详、安乐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积累。这一现象，似乎还不像老子描述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样简单。

以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为例。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该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期达到盛世，史称“康雍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坏事来得却十分突然。紧随“康雍乾盛世”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及由此开启的无穷无尽割地赔款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衰世”。从持续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到持续七十余年的“道咸同光衰世”，中间竟然只间隔了一个嘉庆，嘉庆皇帝还搞了整饬内政、整肃纲纪的“咸与维新”。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速度几乎连让人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只有让后人扼腕感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了。

这是一个社会从安宁、安逸急剧过渡到动荡、动乱的典型。在这个王朝中，经济曾经持续发展，社会曾经呈现繁荣，不但将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经营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以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和大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也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这些成就营造的繁荣与安宁，其副产品是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是不思变革，满足于现状。纵然当时内部不稳定因素已经日益凸现，也认为不难控制，无碍大局；纵然外部的挑战也已经日益明显，也认为天朝大国以刚柔并济两手对付那些“蕞尔之邦”，不难羁縻。如此氛围中，即使统治阶层中志向远大、目光锐利者，其思维视野也不得不受到极大局限。

被称为中国近代以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南方实施禁烟时，最初同样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认为战胜对手不难。1840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样描述英国侵略者：“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

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持这种认识的不只林则徐一人。另一位民族英雄、两江总督裕谦，在林则徐的奏折之后十三天，也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同样认为对手犯了兵家大忌，必败无疑：“海道数万余里，刍粮一匮，后继为难，此一忌也。远涉重洋，动经逾岁，前师一败，后师莫援，此二忌也。该夷国富民贫，一旦驱斗于数万里之外，何有敌忾之心，此三忌也。夷炮虽烈，然不利仰攻，且船与浪低昂，施放亦难得准，此四忌也。夷船笨重，吃水极深，一遇水浅沙胶，转动万难，此五忌也。夷船虽固，然不利于火，我若用火攻，彼船顷刻焚毁，此六忌也。夷兵腰硬腿直，结束紧密，一仆即不能起，不利陆战，此七忌也。夷人不服中国水土，或出天花，或染时疫，死亡相继，此八忌也。”裕谦的结论是：“该夷犯此八忌，其败可立而待。”

但是战事的结局，是裕谦兵败投水自尽。

这是一段让所有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历史。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长期沉缅于安逸与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成为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衍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不镇静。”

灭顶之灾就这样在力图保持的安宁中被积累了起来。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演说中，更将大清王朝引为前车之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

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能够把人们从安宁中拉出来审视风险的，是忧患。忧患的前提是前瞻。没有前瞻，不远眺天边变幻的风云，不思考前方可能的沟坎，只看见脚下花团锦簇，哪里来的忧患。

七十多年前，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发问过：“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今天新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我们能不能继续这样针对过去、针对未来、针对自身发问下去？能不能在一个个设问和解答之中使我们的目光更为远大、心胸更为宽阔？

这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真正基础。

耀眼的罂粟与冷峻的准则

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辩论所以激烈，是因为即使以“自由贸易权利”为遮羞布的人们都知道鸦片贸易的不道德。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沙夫茨伯里伯爵说：“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鸦片主要生产者、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咎经理赛蒙也承认：“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写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也坦承，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如此背景下，要让议员们贸然同意为不道德的鸦片交易进行一场战争，显然并非易事。反对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的演说慷慨激昂：“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斗，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斗。站在对面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

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格莱斯顿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其语言使其他议员深受震动。

辩论进行了三天，但最后取胜的并非最初占优的反对派。被称为“白色金子”的鸦片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与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

非法的鸦片贸易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产向印度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出场了。这个人一年多前还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现在却宣称这一贸易涉及维多利亚女皇的尊严，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帕默斯顿的话非常直白。纵然鸦片贸易不光彩、不道德，也是支撑大英帝国利益的支柱，一定不让它倒塌。正是在这一概念驱动下，对鸦片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率先要求英国政府为保护这一贸易对华用兵。

最后表决结果，271票对262票。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要求中国赔偿的决议。有人说，9票之差改变了中国历史以至东方历史走向。这种表面看似偶然的情景，其中又贯穿着某种必然。以议会辩论中强烈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克莱斯顿为例，当他以财政大臣身份进入内阁之后，立刻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拥护者，随后又以英国首相身份在中东发动英埃战争、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在爱尔兰镇压当地人民独立斗争。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国内公正的立法和经济来培植帝国实力，并由此产生国力的两大要素：财富，那是物质要素；融洽及知足，那是精神要素——并且保存帝国的实力，以便用于国外重要而值得的场合。”克莱斯顿追寻大英帝国利益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帕默斯顿。

这个产生过科学泰斗牛顿和法拉第、文学泰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诗人拜伦和雪莱的文明国度，又产生出国际政治通行的帕默斯顿准则：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被西方战略家和政治人物奉为圭臬，成为他们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到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奠基者摩根索，从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因有效奉行此准则被冠以“大师”称号。

我们不崇拜这样的准则和大师，但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我们置身

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只有也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现实。纵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异常迅猛，国际交流、交往空前频繁，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梦想）依然是一个美好的理想，“One bed, different dream”（同床异梦）却是眼前严酷的现实。看看东西方各种力量对中国国力增长的种种质疑，看看国际气候大会对排放额度的瓜分和争吵，看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荒谬的颁奖，看看美国如何或暗度陈仓或巧取豪夺地转嫁其金融危机损失，人们就会明白，不论把“人权”捧到多高、把“普世价值”说成多妙，国家利益依然是主权国家不变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依然是各个国家战略思维不变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决定着各个国家战略思维的走向。

有没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全世界只有戈尔巴乔夫说：有。他提出了不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以追求“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思维”。这一思维的最终结果如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由于大幅度单方面的让步，致使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被人为破坏。其结果是，苏联在几年之内就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200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十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采访，神色黯然地说：“我们本想利用苏共政权贯彻实施改革的方针，使党本身实现民主化。但是打错了主意，党没有能控制住改革进程。联盟国家的改革也有失误。世界上除了少数人，谁也没想到，苏联在自我毁灭。”也许最没有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新思维”超凡脱俗，却以苏联崩溃为结局，被历史加以了最无情的嘲弄。

相比之下，最直白实在的还是美式战略思维。这个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的国家连欧洲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不要，小布什总统单刀直入地提出三条“美国永久性的国家利益”：第一，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第二，确保获得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第三，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美国海军作出重要补充，宣布要控制的十六条海上战略通道。其中大西洋七条：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两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印度洋两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太平洋五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阿拉斯加湾北航线。

这种美国利益高高在上而且纯粹是霸权主义的战略思维，国际间竟然没有

任何政治家、评论家、媒体主持人站出来质疑和指责，反而不断有人以国际道义名义宣称：美国力量对维护全球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甚至比美国还积极地邀请美国在东亚发挥作用，否则“放弃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角色”。一句话把基于新加坡利益的新加坡战略思维表露无遗。

这就是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面对的今日世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和平发展和小平同志说的“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

中国和平发展至少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犯；三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如何有效维护基本权益，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面临的特殊课题。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民族的复兴都不是天赐之物，都需要一种战略主动性，需要完成既包括形象也包括态势的战略塑造，这同样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针对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进程中肯定有坎坷，有挑战，有误解，有敌视，但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担当。

罂粟制成鸦片，提供的是麻醉。当年以维护鸦片贸易提出帕默斯顿准则的那位英国外交大臣永远想不到，中国人借此获得的是清醒和力量。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与保住蛋糕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实现的主要任务。既体现了发展，又展现了是相对公平、人人获益的发展。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国家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蛋糕确实越做越大了，各级政府也在尽心尽力把蛋糕分好。

在“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同时，还需要一点补充，那就是“保住蛋糕”。

为什么还要提“保住蛋糕”呢？

因为“保住”与“做大”和“分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如果你的蛋糕被人乘你不备切下一块端走了，那么不论你如何“做大”、如何“分好”，成效都要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今天的蛋糕做得已经不小。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氛围未曾改变、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有继续做大蛋糕的良好条件。看发展，让人欢欣鼓舞；看安全，感觉却不那么一样了。

虽然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很多安全问题最终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但两者的重心毕竟并不一样。发展强调的是增长，安全强调的则是均衡。当我们把发展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时，新的问题就出来了：人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普遍认识，对“崛起必遭遏制”却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普遍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却思想准备不足。

如已经出现的国家经济发展重心与威胁方向重叠问题。三十年改革开放，伴随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国家经济重心逐渐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沿海十省市在全国人口、大中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外来直接投资、出口产品生产等方面，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所依托的核心地带。国家经济布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安全需求出现重大变化。朝鲜半岛问题、东海海洋权益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都非常明显、非常现实地对国家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区域带来严重威胁。当国家经济发展重心与威胁方向重叠时，“做大蛋糕”和“保住蛋糕”这两个命题也同时交叉在一起了。这种重叠和交叉使新的缺憾随之显现：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指标、利润增长指标，均无法代替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国家安全指标。正因为发展指标无法替代安全指标，确立新的国家发展安全标准，就成为新世纪保障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事项。

在这方面俄罗斯就颇有一套。俄罗斯经济总量比我们差很多，但其制定有十分清晰的国家发展安全标准。如工业生产中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科研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生产产品中新型产品所占比例、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消费品进口份额的上限、粮食进口的上限、外币在国内货币体

系中所占比例的上限等等。严格地说，这些标准俄罗斯自己也未能完全做到，但它起码树立了一个告警的标准，有明确的告警线。一旦过线，就产生向安全标准回归的内在要求。

从这方面看，也许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缺乏这种具有约束性的安全指标，使我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投入了美国国债。美联社曾报道：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中国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共持有总数达 1.16 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比第二名日本多三成以上（日本 8823 亿）。

金融危机前，都说购买美国国债最安全；金融危机后，又说只有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些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有它的道理。

美国那么多盟友、那么多朋友，都不去持有这么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样也有它的道理。不能说我们就是战略考虑，他们就不是战略考虑。特别是应该看到，我购买美国国债规模数量之大，在国与国借贷历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要摆脱却十分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入的金额也就越大。

应该说，这就是缺乏强制性安全标准所带来的缺憾。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的发展规划往往十分清楚，安全规划却往往不那么清楚。我们解决发展问题往往比较主动、办法也多，解决安全问题往往就比较被动，办法也不那么多。其后果就是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当我们开始着手石油战略储备时，国际油价已处于高点；当我们开始进行核燃料储备时，国际核燃料价格已处于高点；当我们开始谋划增加黄金储备时，国际黄金价格已处于高点。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到 2007 年，国家开始重视稀土资源保护时，无序的开采已使这一珍贵资源流失严重。我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36%，产量却占世界产量的 97%。明显的比对是：美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13%，产量为零。俄罗斯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19%，产量也为零。印度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3%，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2%。这些现象说明，一些地区和部门“重发展，轻安全”“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已经给国家带来了相当的损害。那种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管子孙后代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外资进入的安全审查问题。招商引资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性内容，很多地方将此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却欠缺建立基本安全防范措施。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不惜展开恶性竞争，安全审查几乎是一片空白。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

外某水务公司进入中国，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高溢价收购实现快速扩张，很快在十余个城市投资运营多个项目，基本控制了以上城市的水价——这些城市的水价也纷纷大幅度上涨。一直到2008年，这种通过“高溢价收购，高成本转嫁”的跑马扩张行为才得到制止。

在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商业银行改革中，外资进入的安全审查问题，同样十分突出。

就这个问题，我们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建立他们的安全防范的。

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中止或禁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1992年通过《伯德修正案》，阻止“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府”的收购行为。还有《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8年《关于外国法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建议稿》等法律文件，阻止外国公司对所谓“敏感企业”和“敏感技术”的收购。“外国投资委员会”所起作用更为重要。这个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囊括所有政府高官：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贸易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总统经济政策顾问。任何外资并购，只要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就会使这些并购无法通过。看看这些实例：

1989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曼可公司失败。

1996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租用美国西海岸长滩码头失败。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

2008年，华为公司与美国贝恩公司联合收购美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失败。

2010年，华为公司收购美国旧金山3Leaf Systems技术开发公司失败。

这是美国的安全防范。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制度成为保障其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屏障。其实没有人动他们的蛋糕。纵然如此，他们也颇有几分神经质地启动程序、紧紧藏着护着、生怕别人动一下他们那块蛋糕。

这些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索。

在每年一度的“两会”上，如何把蛋糕做大，如何把蛋糕分好，一直是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也一直是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议论、建言献策的重点。

如何把蛋糕保住，也应该进入我们的议事日程。

恰当性即有效性

战略思维的焦点是对目标的判定。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战略。

战略的现实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目标的现实性与有效性之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目标选择既决定战略本身的性质——攻还是防及攻防程度，这也决定战略实施的成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目标最初选定为军事设施、工矿企业、大中城市、交通及能源设施。投弹量分配如下：

军事设施：30.5%；

工矿企业：13.5%；

大中城市：24%；

交通及能源设施：32%。

从1939年10月至1945年5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共向德国61个城市投下50万吨以上的高爆炸弹、燃烧弹和杀伤炸弹，炸死30万人，炸伤80万人，摧毁住宅360万套，相当于德国全部住宅的10%，使75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德国首都柏林被全部摧毁的地区达到70%。（瑞吉纳德·布雷特诺《决定性战争》，第1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但这种将德国后方几乎所有目标都包括进去的攻击方法，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轰炸虽然使德国损失巨大，但对其军工生产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对房屋的破坏与对机床的破坏不成比例，所以德国恢复生产的速度比预料的快得多。

为维持花费巨大的战略轰炸，英美两国都倾注了血本。当时英国军火工业的50%投入空军生产，美国的投入比例是35%。投入如此巨大，就是希望通过战略轰炸尽快摧毁对方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但由于没有抓住什么是影响德国战争潜力的关键目标，大量弹药被倾泻到非关键目标之上，炸了半天，也未使对手的战争潜力受到真正的重创。

直到1944年，英美空军才领悟毛病出在目标选择上。诺曼底登陆前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对目标重新做出选择：以德国的交通及能源设施为主要攻击目标。

这一改变立即使战略轰炸变得真正有效。交通运输线的破坏对德国的煤炭分配造成灾难性影响，鲁尔区的煤和焦炭堆积如山，运输几乎完全停顿，很多

工厂设备完好却也只能停产。对石油加工厂的轰炸更使德国石油产品从每月近32万吨急剧下降到每月17000吨，生产能力损失达95%；橡胶产量也从每月12000吨下降到不足2000吨，仅为原来产量的16%。德国的战争潜力因此迅速下降。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英美的战略轰炸才变成了真正的战略轰炸。

美国军事理论家瑞吉纳德·布雷特诺评论说：“如果盟国能够更早懂得目标恰当性的重要，而以最恰当的目标置于较不恰当和完全不恰当的目标之前，将有多么大的不同。”他特别强调说：“目标的恰当性，无论多么强调也不算过分。除非对这个原则能彻底领悟，否则人员的伤亡、资源的损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本该短期结束的战争状态也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布雷特诺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恰当性”问题，除了一般性地指出选择目标对保证战略实施成功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外，还触及现代战略观念的一个重要演变。

一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类的战争活动基本局限在狭小的战场空间之内，战略视野受到极大限制。同时由于物质运用能力的有限，在被称为“前线”空间范围内，构成“目标”的事物也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目标选择的空间远不像今天这样广大，其在战略运用中所占比重远不像今天这样突出，更没有严重到由于目标选择不当导致整个战略失效的地步。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当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拥有的手段非常简单、对客观外界的了解也十分表浅的时候，针对可供选择的有限目标却感觉到选择的余地非常大，目标的变换也随心所欲，没有那么多限制。但当物质生产水平越来越高、拥有的手段越来越多、对客观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可供选择的目标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选择的限制却变得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从无所不能变成有所不能。产生战略对抗关系的各方，每一方都感觉自己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这就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运用能力空前提高所结出的果实。其中有苦果，也有甜果。苦果是相互毁灭能力的出现，甜果是追求更高目标的要求。在这两个果实的双重压力之下，现代战略从神游寰宇、逍遥八荒、无所不用其极的思维驰骋，变成了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运用有限实力、针对有限目标的精密规划，“限制”(Limit)一词日益成为现代战略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基本特征集中聚焦在目标的选择与确定上。目标选择的恰当与否，对战略全局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核心与关键。

目标选择的恰当，指所选目标与战略意图的恰当、与自身实力的恰当、与运用环境的恰当。目标选择与确定的过程，就是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相契合的过程；而目标选择的恰当，恰恰表明人们的主观世界正确地反映了面对的客观世界。

即使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也并非一经确定就万事大吉。如果不能控制由目标牵动造成的利益强度转化，或对这种转化毫无准备，所确立的目标也可能反过来对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歌德说：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

歌德是大文豪、大诗人，但其这句话绝非仅仅适用于文学创作。当人类从无所不能的狭小空间进入有所不能的广阔世界之后，歌德的这句话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回味。

在目标的恰当性越来越关联到战略成败的时候，大战略家对目标的掂量与选择，就成为了巨匠在限制中的表现。

稳定的利益，漂移的目标

确定战略目标，是制定战略的基础。

为避免目标模糊不清，或来回变动过大使任何战略实施难以奏效，在进行国家安全战略设计时，必须依托以下三个因素：

- A. 对国家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判定；
- B. 对国家实力——包括可运用的所有资源和手段——的掌握；
- C. 对安全环境——包括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主要对手——的估计。

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表明自身的追求与愿望，后两个因素表明对实现这一追求和愿望所受到的限制：前者属于对“能够干什么”的估计，后者属于对“允许干什么”的衡量。

一个国家不论有多么高的追求与愿望，也不论其主观能力能够干什么，还是客观实际允许它干什么，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首先必须对国家利益做出清醒准确的判断。

当代国际政治学一般把国家利益的强度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国家生存利益。生是国家生存利益生存的条件，便无其他利益可言。对国家生存利益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外部力量的入侵或毁灭性攻击。准确地说，即当国家的实际存在由于受到入侵或毁灭性攻击，或面临遭受攻击的威胁而处于危险状态时，就会涉及国家的生存利益。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将遭受对方大规模核攻击视为对自己国家生存的最大威胁。

第二层是国家的重大利益。特指如果不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强硬措施来加以保护，自己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利益。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将苏联对北约诸国的威胁视为对自己国家重大利益的威胁，而苏联则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华沙条约各国的威胁视为对自己国家重大利益的威胁。

第三层是国家的主要利益。威胁到这一利益，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受到不利影响，但还未达到需要动用武力消除与克服这些影响的地步。威胁这一利益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国家利益范围的边缘地区。

第四层是国家的次要利益。一般指事态发展涉及某种国家利益，但其产生的任何后果都不会对国家造成全局性的不利影响。

观察与思考这四个强度的国家利益时必须注意，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互无干系的，而是既互相牵制，又相互转化的。假设冷战时期北约与华约发生冲突，美国和苏联都因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惜坚决使用武力，最后很可能因为双方都宣称为捍卫重大利益不惜使用核武器，造成由相互攻击驻欧部队的核战争发展到相互攻击本土的核战争，最终使美苏在欧洲进行的以捍卫国家重大利益为缘由的战争，扩展为一场危及国家生存利益的核大战。

这种假设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当国家在维护下一层次利益时，一旦失去控制，就很可能对自己的上一层次利益造成直接威胁。这种失控既可能由当事国双方的主观意志促成，也可能是客观外界诸因素造成的转化。它告诉我们虽然目标是对利益的选定与追求，但即使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也并非一经确定就万事大吉。如果不能控制由目标牵动造成的利益强度转化，或对这种转化毫无准备，所确立的目标也可能反过来对利益造成损害。

依据国家利益确定安全目标时，首先要注意控制国家利益强度之间的牵制和转化，尤其是所采取的行动造成下一利益层次向上一利益层次转化。如果把实现本国重大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重大利益甚至是生存利益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利益层次的转化就很难避免。

例如以色列自 1948 年建国以来，一直把对水资源的有效控制列为国家重大利益。那些为以色列奋斗的先驱早在 1919 年就指出，犹太人建国的“基本要求”就是控制发源于戈兰高地的约旦河。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通过占领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控制了约旦河水资源的大部分。1978 年和 1982 年又连续发动针对黎巴嫩的战争，企图掌握利塔尼河的控制权。

现在以色列有一半的供水来自 1967 年战争中的被占领土，其中约旦河西岸地下水层 80% 的水被以色列抽取。从表面上看，它已经实现了控制水资源这一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目标，但由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周围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占领和水资源的掠夺之上，损害了这些国家的重大利益甚至是生存利益，本身就使这些国家觉得以色列的存在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由此该地区长期处于一遇火星就能引燃干柴的危机之中，暴力事件不断，流血冲突不止，使以色列的国家生存至今无法得到可靠保证，一直处于飘摇和动荡之中。

这种由于不惜一切追求既定利益目标、反使自己的更大利益遭受威胁的现象，在国家行为中屡见不鲜。如果说国家战略是国家行动的思想，那么利益目标就是对行程的界定。在追求目标过程中一旦引发利益强度的转化，必然导致目标行程对原先界定的超越。一旦发生超越，面临的风险必然出现变化，对实力的要求也必然发生变化，造成最初确定目标时依据的基础全部坍塌。所以依据国家利益确定安全目标时，必须控制国家利益强度之间的转化，尤其是所采取的行动造成下一利益层次向上一利益层次的转化。

依据国家利益确定安全目标时，还要特别注意利益强度层次之间的弹性，尤其是在使用武力捍卫的国家重大利益与不使用武力达成的国家主要利益之间的弹性。在这一方面，从主观因素到客观因素都存在难以把握的可能。

从主观因素看，当国家实力较强时，容易将利益目标定得过高，把原本属于国家主要利益层次的事物上升为属于重大国家利益层次，出现滥用武力的倾向；当国家实力较弱时，又容易将利益目标定得过低，把原本属于重大国家利益层次的事物下降为属于主要国家利益层次，从而放弃使用武力，躲避挑战。

从客观因素看，因为重大利益与主要利益的区分涉及动武界限，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都是国家利益强度层次中争议最大、最难区分的部分。不同的国家对这两个层次的利益都有不同的标准、实施不同的划定。既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执政集团针对不同的实施对象，也会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界定方法。

利益是要通过目标体现的，这是利益对目标的推动作用。目标无疑是对利益的追求。阶段性目标是对阶段性利益的追求，长远目标是对长远利益的追求。但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如果由于利益强度出现漂移导致目标漂移，最终要反过来对利益造成损害。

这种损害关系按照中国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不论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还是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直用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延伸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诸岛的一条弧线来描绘美国的安全圈，从来没有将南朝鲜、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列入关系美国重大利益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抛弃了旧利益范围，出兵南朝鲜，派遣第七舰队隔断台湾海峡，增加对重占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援助，将重大安全利益的范围朝前大步伸展。

此举直接带来的是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作战目标的来回漂移与前后混乱。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丹尼斯·德鲁在描述这种混乱时说：“战争的前几个月，美军的目标只是把北方入侵者赶出南朝鲜。由于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失利，美军的目标便随之扩大为解放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于是，美军和联合国军向北推进，一直打到中国边境，从而导致中国参战。中国军队又把美军和联合国军推回南方。战场情况的变化，使得美国又回过头来追求最初保卫南方的目标，只是对手成了中国军队。最后，战争在两个朝鲜的原边界线附近形成僵局，美国公众随即也普遍地清醒过来。”

从以上事实可见：最根本的清醒，是对目标的清醒，是对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能够干什么的清醒。朝鲜战争对美国政府来说，是非常典型的由于利益强度漂移而导致的目标漂移，最后自己不得不艰难地吞下这颗人为的苦果。

利益要通过目标而实现。目标也可能因为利益而脱节。

拿破仑讲过一句话：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

拿破仑要用“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死死把住不放的东西，就是利益与目标之间的牢靠联系，这是战略成功实施的保证。

反之，就难免失败。

认识与把握国家核心利益

1862年8月22日，美国南北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给其友人H. 格里利写了一封信：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所有奴隶的方式拯救联邦，我定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部分奴隶而置其他于不顾的方式拯救联邦，我也定会这样去做。我对奴隶制和有色人种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相信那样做有助于拯救联邦。”

林肯今天享誉全世界。人们以为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为解放黑奴、争取平等而战，林肯是实践这一崇高理想的伟大领袖。很少有人知道他进行这场战争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了阻止国家分裂：“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

一句话：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驱动民权总统林肯不惜发动南北战争的根本。这场战争成为美国人真正认识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心不惜一切捍卫这一利益的起点。现在不论参众两院议员在国会中辩论，还是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发言，在美国使用最多的词汇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1860年，美国曾经走到分裂的边缘。该年12月，南卡罗莱纳州经过表决，首先宣布退出联邦；1861年1月，佐治亚、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5个州也跟着退出。6个州于1861年2月在阿拉巴马州开会，通过民主程序确立自己的宪法，建立自己的议会，选举自己的总统，宣布为独立的“美利坚邦联”，简称“CSA”（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1861年5月，得克萨斯、阿肯色、田纳西、北卡罗莱纳、佛吉尼亚等5个州又退出联邦，加入CSA。一时之间黑云压城，来势凶猛，CSA与USA分庭抗礼，大有改写美国历史的架势。

那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林肯总统刚刚当选，就面临南部11个州、四分之一的领土、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分裂出去的局面，而且国家培养的军事人才还大部分集中在南部分裂地区。

从未打过仗的林肯毅然选择了战争。

南北战争持续四年。为重新恢复国家统一，美国付出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

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美国死亡总人数为 57.8 万，仍未达到南北战争时期 62 万人死亡的总数。

但美国历史没有被改写，CSA 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 USA。林肯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成为今日世界头号超级强国的力量基础。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是最辉煌的建筑之一。其端坐的大理石像背后铭刻着这样一句话：

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

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这座殿堂是美国的心脏，为纪念挽救了国家的亚伯拉罕·林肯，人民永远怀念他”。

林肯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使他获得了美国人前所未有的巨大崇敬。如果林肯当年在关键时刻不敢于挺身一战而任分裂局面延续，不会有今日的美国。

首先，国家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国家，就有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保障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的全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

以不同的标准为尺度，国家利益可分成不同类型。按利益属性划分，国家利益可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按内容划分，可分为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按领域划分，可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文化利益；按时间段划分，可分为近期利益（现实利益）、中期利益、长远利益；按利益主体划分，可分为普遍利益（所有主权国家都追求的利益）、非普遍利益（强国利益）、霸权利益；按利益强度划分，可分为核心利益（美、俄称“生死攸关利益”）、重要利益（重大利益）与边际利益（普通利益）。不同的划分，体现着对特定时期国家利益中所含矛盾的不同认识与处理侧重。所有划分都出于同一个目的：从多方面对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进行缜密认识与审视。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依据和准则。19 世纪初，英国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要不要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说了一句话：“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英国利益是永恒的权衡标准。”这句话后来被人们传为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意识对客

观存在的理解、判断与认定。

不同国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认定。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有不同的认定。即使是同一国家在同一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依然不尽相同。任何利益都要通过目标去体现。国家利益的主观选择与认定性，在确定国家利益目标过程中表现得分外明显。当国家实力较强时，容易将利益目标定得过高，把原本属于下一层次的利益目标向上提升，将边际利益提升为重要利益，将重要利益提升为核心利益，出现滥用武力的倾向；当国家实力较弱时，又容易将利益目标定得过低，甚至把原本属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下降到次要利益层次，放弃对决，躲避挑战。

1895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光绪皇帝专门“降朱谕公告全国臣民”解释为什么签约：

“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怠，勿嫠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光绪的话语，言辞肯切。但当大清王朝的执政当局把国家核心利益降为次要利益、为保自身平安不惜割地赔款的时候，被推翻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了。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任何政权，如果无法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其灭亡就实属必然。

一部中国近代史挫折连着挫折，灾难接着灾难，从历史灾难中走出来了新中国政权。这个政权在广大海内外中国人心目中的合理性、合法性，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的形式显示出来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韩联军向鸭绿江挺进，新中国为什么要出兵？因为国家利益面临直接且巨大的挑战：一是新的威胁方向突然在新中国的战略后方出现，国力军力由此受到极大牵制；二是东北重工业区由后方变成前沿，对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三是如果朝鲜半岛被美韩联军占领，不但使我东北三省失去战略屏障、东北重工业区失去相当一部分电力供应，而且朝鲜半岛可能再次变成入侵中国的跳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坚决用国家力量捍卫新中国的国家利益。

朝鲜战争是近现代以来，在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之时，中国第一次不再退让，第一次主动出击。如同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

上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利益的选择，也是对自己安全的选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

今天这一论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江泽民同志说：“处理国与国关系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符合我们根本利益的我们就干，不符合的我们就不干。”胡锦涛同志说：“如果不能从政治上观察和思考问题，脑子里缺少国家利益全局这根弦，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已经清晰地阐明了六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开始逐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国家利益观念。

四、战争之道

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仗。当左右战争胜败的地缘政治因素大大超过军事技术因素的时候，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不能仅仅是几件高技术兵器了。

美国人念念不忘的三场战争

一场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战争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刚入军校的年轻士兵和身经百战的白发将军皆未目睹的战争。拥有 5000 辆主战坦克、5000 辆步兵战斗车、3000 门 100 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760 架作战飞机的伊拉克百万大军，经过 5 个月全面封锁、38 天空中突袭、100 小时地面战斗，土崩瓦解。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又如此迅速地崩溃，战争的双方都没有想到。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称要让海湾地区变成越南，让美国人在这里血流成河。

美国总统布什则为自己军队的伤亡做了充分准备。美国的战地医院在海湾战区准备了 18 530 张床位，在欧洲准备了 5500 张床位，另外在美国本土也预留了 22 000 张床位；共计 46 000 张床位。地面进攻发起后，美军又预备了 220 架医疗直升机，1000 余辆地面救护车，C - 130 运输机准备每天出动 30 架次以上执行医疗后送任务；每天另还有 74 架次的同型号运输机留作备用。在美国颇受尊敬的思想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预测美军的伤亡将达 1.5 万人。美国防部后勤局的计算机也得出了同样数字。1.5 万个装尸袋悄悄准备好了以后，战场指挥官、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提出一个较乐观的估计：大约 5000 人。美军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上将提出的数字最低，却也在 3000 人左右。

预想的伤亡没有出现。美军以 146 人阵亡、467 人受伤的代价，轻易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阵亡的 146 人当中还有 35 人死于友军火力误伤，28 人丧命于大后方宰赫兰基地一枚来袭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真正面对伊拉克火

力战死疆场的，仅 83 人。

以这样的代价，击毁和缴获伊拉克坦克 3847 辆，装甲输送车 1450 辆，火炮 2917 门，俘获伊军 8 万余人，使号称世界第四的伊拉克军事力量迅速崩溃。

如此结局令全世界目瞪口呆，历史未曾记载过这样的战争。

争论与评价风起云涌。普遍的结论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正在改变传统的作战方法。高技术军事领域的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作战样式和战争结局。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今后的战争，都将以海湾战争的模式进行。

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军事冲突中越来越包含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人文、宗教问题背景，它已经被技术简化至此了么？

最先在这些眼花缭乱结论面前清醒过来的，似乎还是美国人自己。

胜败与高技术兵器

1991 年 7 月，美国防部提交国会关于海湾战争的初步报告《海湾战争》。

1992 年 4 月，关于海湾战争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公开发表。

9 个月时间内报告做了不少改动。改动最大的，就是关于高技术武器的作用。初步报告中那些过分夸大的不实之词，在最后报告中被逐一纠正。

首先，它特别指出：精确制导武器不是突然出现的尤物。巡航导弹 70 年代中期就开始研制。F - 117 隐形战斗机 80 年代初就已制成。

其次，海湾战争也不是头一次运用这种武器的战争。精确制导武器初露端倪是在 50 年代初的朝鲜战场。当时美国空军为了轰炸桥梁和水坝，曾用 B-29 “空中堡垒” 重型轰炸机投放过无线电制导、12 000 磅的雷松式和塔松式航空炸弹。

60 年代的越南战争，精确制导武器使用更加广泛。

首先是空对地反辐射导弹。1965 年，百舌鸟式反雷达导弹投入使用。这种能够朝目标雷达自动寻的导弹，使越南北方的防空雷达和炮瞄雷达遭到严重破坏。

其次，为了对付桥梁、隧道等坚固目标，美空军用强击机和 SH - 34 直升机对地面发射小斗犬式导弹。与此同时，电视制导的小牛式空对地导弹和霍博式自动寻的炸弹也投入战场。

另一种可从四十多英里外实施电视制导的秃鹰式空对地导弹，在越南战争末期研制出来。1972 年 5 月，美军使用这种大威力电视制导炸弹，炸毁了河

内和海防附近交通运输枢纽——清化马河畔的函龙桥和红河三角州的龙编桥。

各类传感器也在越南战争中投入战场。

为发现在大片森林遮蔽下行动的部队，美军使用了一种命名为“人员嗅探器”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由直升飞机携带，用来测量大气中的氨。如果刚好投放在部队的下风头，氨的浓度只要增加1%~2%，传感器便立即嗅探出来报警。

为扼断越军交通线，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4月，美国空军每天出动300~400架次，集中轰炸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一种叫作“白房子”的远距离传感系统投入使用。整个胡志明小道区域内都撒下了这种被形容为“陆上声纳浮标”的东西。这种小罐能探测到周围车辆行驶所引起的振动，然后用无线电发出信号。在空中飞行的AC-130E电子侦察机接收到信号后，立即计算出车辆的准确位置，然后引导武器系统进行攻击。这些传感器曾使越南人民军遭受巨大损失。每往前方运送1吨物资，就含有损失5吨物资的代价。

遥控飞行器也于1970年前后，在越南战场投入实用，被用来发射小牛式、霍博式、百舌鸟式导弹，攻击雷达站、高炮阵地、地空导弹阵地等对飞行器威胁大的目标。

美军在越南战场拥有的技术优势如此之大，以致“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的喧嚣反复出现于政府和军方的宣传之中。

美国人却打败了那场战争。

海湾战争中被新闻媒体抬到前所未有高度的高技术兵器，为什么在越南战争中却收效甚微？陆战队大学当代军事学教授迈克尔·怀利上校曾两次在越南战场服役，他说：“我们当年是带着满脑子技术上的狂妄出兵越南的。当时，我们拥有超音速飞机和灵巧炸弹，有弹药充足、可以不间断射击的大炮，有精密的电子装备，有获得哈佛大学管理学位的军官，还有从理论上说似乎已使步行成为过时的军事调动方式的直升机服务。但敌方想出了把军人与民众混杂起来、夜间行动、依靠徒步的机动性以及利用我们对高科技作战方法的依赖等弱点，来打击我们。”

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用直升机运输的美军打不赢赤脚走路的越南人民军的时候，另一场武器系统差别更大的战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

1950年在朝鲜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美陆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

和加农炮，当时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而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才使入朝部队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三十八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

空中力量则更无法相比。美国空军在朝鲜拥有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别说作战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司令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几乎遇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迫使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的。

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特评论说：“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

有人说伊拉克海湾战争中败在武器水平整整相差了一代，是第三代武器系统与第四代武器系统的较量。那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武器系统的差距又该有几代呢？

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综合力量的较量看成是单纯兵器的较量之时，战争本身就被简单化了。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这三场战争中，恰恰是美军与对手的武器水平差距最小的第三场战争，被宣扬为高技术武器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国人该怎么从这个谜团中走出来呢？

所以有了前面说到的那个“最后报告”。国防部长切尼在报告中列举了美军制胜的数个“得益于”：得益于对方的孤立、得益于盟国的支援、得益于独特的沙漠环境、得益于战争发生时间、得益于长时间的战前准备。这里没有一条提到得益于高技术兵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更进一步提出，从海湾战争中得出的最错误的结论，就是这场战争完全是依靠技术优势打赢的。

高技术兵器赢得海湾战争的论点，在美国也不攻自破。

地形地貌——战争兵器的衰减器或倍增器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美国人在海湾取得空前胜利的呢？

切尼的几个“得益于”贴近了皮毛，特别是其中第三条：得益于独特的沙漠环境。

用兵之道就主观条件来说，是军制与统帅；就客观条件来说，则是兵器与地形。让我们来看一看海湾战场、越南战场和朝鲜战场的不同地形条件。

海湾战场第一是地形平坦。科威特领土是被众多河床、干谷分割的滨海荒漠平原，伊拉克领土沙漠占国土面积约40%，大部分也是平原。第二是基本无植被遮蔽。伊拉克领土的森林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3%，而科威特则仅占全部土地的0.1%。第三是气候干旱，气象条件简单。科威特年降水量约125毫米，伊拉克北部年降水量有500毫米，但作为主要作战区域的南部，则只有100毫米或更少。

克劳塞维茨说：“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海湾战场既缺乏妨碍通行的高山峡谷，又缺乏妨碍观察和利于隐蔽的茂密植被，更没有这两者综合的山岳丛林，它的地形条件使美军能够不间断地监视每一平方米的土地。在无特征的沙漠地形上，连挖壕深埋的伊拉克坦克都成为精确制导武器攻击的大好目标。这种独特的地形条件，成为了美军高技术兵器的倍增器。

让我们看看朝鲜战场的地形条件。

朝鲜全境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和深谷。北部是咸境山脉、狼林山脉和盖马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0多座。东部是从北向东延伸的平行山脉。南部是白山脉和芦岭山脉，西南部为南朝鲜山脉。全境不但多山，而且植被茂盛，森林和灌木林占四分之三。地貌起伏的山地形成大量天然障碍和死角隐蔽区，茂密的植被又利于军队隐蔽行动和达成作战的突然性。

“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最初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踏上朝鲜土地后，印象深刻地评价道：“这一带的地形看上去，对机械化部队的士兵是不适合的。石峰高处离地6000英尺，山崖像刀峰一般，坡度极陡峭，狭窄的山谷如蛇般蜿蜒曲折。公路不过是些崎岖小径，较矮些的丘陵则为灌木松林所覆盖。对于一个善于隐蔽自己的士兵来说，那就是极好的掩体。这是一个适合打游击战的地方，是靠双脚行军的中国步兵理想的战场，而对我们靠轮子走路、受道路限制的军队来说简直糟糕透顶。”

李奇微退役后，在回忆录中列出理解朝鲜战争的五个因素，排列第一的就是地理。

比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更加麻烦的是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越南不但像朝鲜那样多山多树，而且茂密的热带丛林和多发的热带疾病更成为美国军人的梦魇。

越南北部是由深谷切割而成的平行山系，海拔 1500~3000 米。南部是高原和台地，海拔 500~1500 米。山间溪流很多，河床落差较大，水流湍急，雨季江河泛滥，许多地区变成一片汪洋。热带丛林覆盖了全部领土面积的 40%。年平均湿度为 81.3%。年平均降水南部地区为 1600 毫米，北部地区达 2830 毫米。阴雨多，云层厚，空中力量的使用受到不少限制。道路网少，到处都是难以通行的热带密林和沼泽地，又给地面部队的重型装备输送带来很大困难。炎热潮湿的气候使武器装备容易锈蚀，在欧洲可用十年的装备，在越南用不了一年。蚊虫肆虐使人昼夜难安，多发的热带疾病又很容易瓦解部队的战斗力。

几乎所有回忆越南战争的美国军人，都忘不了描绘一番越南的地形，都忘不了诉说一番这种地形对他们的作战行动形成了如何大的限制。

战争本身就是兵器在不同地形上的运用。地形既会成为兵器的倍增器，也会成为兵器的衰减器，但地形并不能决定胜负本身。它容易成为战争行动中胜不沾光、败必委过的因素。胜者不愿多谈它所带来的便利，败者却津津乐道它所产生的灾难。它在胜败中的地位可能被抬到很高，也可能被贬到很低。对它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忘掉另一个远远超过地形的战争兵器的倍增器或衰减器：国际政治。

战争与庇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局势已似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能否纵横捭阖游刃其中，对现代领导人的能力与见识都是重大考验。

萨达姆说要让海湾战场变成第二个越南，他却不了解越南之所以成为越南的那些外部条件。

越南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越南战争期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越南提供了大量支援。

越南背后是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惜重大民族牺牲，先后向越南派出共 30 多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并从武器、

弹药到粮食、被服等提供了巨额无偿援助。在战争的严重时刻，中国政府庄严声明：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广阔后方，7 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盾。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进行战争的美国，不得不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1964 年 8 月到 1973 年 1 月，历时 8 年对北越的空袭，轰炸目标先是军事基地，续而是桥梁、铁路和主要公路等运输补给线，再继是油库和储油系统、发电厂、钢铁厂、飞机场，最后则集中轰炸“胡志明小道”。千炸万炸，却不进入距中越边界 40 公里内的“轰炸禁区”。之所以“狂轰”而不“滥炸”，主要是不给中国提供大规模介入的借口。这种所有轰炸目标都由白宫而不是前方指挥官决定的做法，被约翰逊总统自嘲为“没有我的命令，他们连一所厕所也不敢轰炸”。

整个越南战争期间除几次例外，美国人都细心遵守这个约束。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人从心底里不希望再与中国人进行地面较量。

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上将和约翰逊总统的一段对话，更显示出美国人的心态。

1967 年 4 月，威斯特摩兰对约翰逊说：如果把兵力增加到 68 万人，能够在两年以内结束越战；如果只增加到 56 万人，结束战争则需三年。约翰逊满脸不高兴地问：“我们增兵，对方就不能增兵？这样下去的尽头在哪里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武元甲的增兵能力接近尽头，美国人消灭他们的速度已经越过他们的补充速度。”约翰逊又问：“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样？”威斯特摩兰无言以对，半天才说了一句：“噢，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就是在这样尴尬的条件下，以判断中国的意图为指导进行越南战争的。越过 38 度线挺进北朝鲜招致中国出兵的惨痛教训，使得美国军队再也不敢越过 17 度线直接攻击北越。

当我们从全局通视这场战争的时候，谁还能够说越南战争的胜利仅仅是越南的胜利？

朝鲜战争同样如此。

当我们希望越南人民记住中国人民提供的巨大支援和付出的巨大牺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牢记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支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 64 个陆军师、22 个空军师的装备，并提供了

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必要训练。入朝之初，我志愿军4个军、3个炮兵师不过600台汽车，加上新编的两个汽车团共计1300台，结果入朝第一个月就损失600台，在前3个战役中损失达1200台之多。三十八军100台运输车，入朝20余天只剩下6台车可用；二十七军45台汽车，7天后即损失39台。武器弹药送不上去，被装送不上去，最后连前方部队的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问题。关键时刻斯大林决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紧急提供汽车3000辆。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前方心急火燎的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到1950年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发起时，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又增至2000辆。没有这样的支援，很难想象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能够长驱直入推进到37度线，占领汉城。

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更加重要。朝鲜战争爆发前，我空军只有一个配备老式飞机的混成旅。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空军发展到3个旅。至1950年底，已经形成8个航空兵师的规模。苏联不仅提供了这8个航空兵师的全部装备，而且斯大林还拿出了刚刚装备苏联空军的米格-15战斗机装备志愿军空军。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给中国补充两批共120架米格-15飞机表示感谢。1950年底至1951年4月，空军又组建了9个航空兵师。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空军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美国报纸评论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但没有苏联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强有力支援，不会有这种可能。

在向中、朝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的有力支援之同时，苏联空军的首批参战部队于1950年底进驻中国东北安东机场。选调来的都是尖子飞行员。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1951年1月10日起，苏联更以两个空军师的兵力，掩护清川江以北我志愿军的运输线，建立了著名的所谓的“米格走廊”，使清川江以北100余公里的运输线有了空中保障。据战后苏联方面统计，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共击落美国飞机1300架，200多名苏联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

除了军事支援外，苏联的政治支援提供了更加重要和坚强的后盾。

朝鲜战争期间，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强烈主张以海军封锁中国沿海，袭击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他的观点在军界十分普遍。

一时间，扩大朝鲜战争的舆论在美国甚嚣尘上。

杜鲁门总统怒气冲冲地否定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他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崴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

美国决策层的考虑是：如果轰炸中国东北的工业和军事基地，需要美国空军付出极大的投入和代价，由此不但无法应付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挑战，而且还会给苏联报复性袭击美国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提供借口。即使东北的基地受损，中国仍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接受苏联的军事补给和援助；要炸毁西伯利亚铁路以消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争能力，无疑就是直接与苏联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如果全球战争爆发，我们也许有输的危险。”

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同样会引发一场双方互掷核武器的竞赛，在朝鲜的美国军队有遭受苏联核武器袭击的危险。

美国决策层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1951年5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对国会说出的那段名言：“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这位五星上将一口气用了四个“错误”反驳麦克阿瑟。他未便公开说出麦克阿瑟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认错了主要对手。他只看到朝鲜背后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背后的苏联。而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是中国。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朝鲜战争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在欧洲对付苏联的力量。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激烈反对扩大朝鲜战争、激烈反对在朝鲜动用核武器，主要原因也是为此。

朝鲜战争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所谓“有限”，并不是指单一方面力量的有限，而是在综合因素制约下，各方所能采取措施和使用手段受到的限制。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时，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领空作战。美国人从空中信号中截听到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仍然无可奈何，也只有保守秘密，不敢对国内舆论公布。这是美国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在世界战争史上与一个强国对抗，不获得大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个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中国站在朝鲜背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所有现代战争手段的

苏联又站在中国背后，成为朝鲜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因素。

越南战争时也是同样。尽管当时中苏之间已经分裂，但在援越抗美上还是统一的。越南背后同样是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邻国老挝与柬埔寨更给向前方源源不断运送物资的“胡志明小道”提供了方便之门。美国每每轰炸与切断这条小道的努力，都会被国际舆论指责为侵犯几个国家主权的行为。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人空前感受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滋味。两次世界大战中用尽一切手段争取完全胜利的思维方式和作战方式如雪崩一样坍塌，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中一种全新的战略平衡观念。

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又是怎样营造自己的战略地理环境的？

萨达姆第一个就抛开了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前苏联。他的行为使达成反对他的国际共识变得轻而易举。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价说，“如果莫斯科支持伊拉克，美国的选择自由将受到严重制约”，“前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其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国防部长切尼说：“伊拉克在政治上十分孤立，联军的空袭作战不会引起邻近大国的干预，而美国在其他地区作战往往要考虑这一问题。”

伊拉克与大国关系如此，与邻国的关系更糟。

北面的土耳其切断了伊拉克的输油管，允许联军利用土耳其的机场和基地攻击伊拉克。东面的伊朗与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交恶更深。战争期间所有伊拉克飞往伊朗避难的飞机和飞行员都被悉数扣留，战后也不归还。西面的叙利亚长期以来也是对手，它派出一个装甲师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攻伊拉克。南面的两个邻国，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则邀请美军大规模进驻，成为联军攻打伊拉克最大的前进基地。

伊拉克的所有邻国中，只有经济脆弱的约旦和它保持联系。约旦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换取低价的伊拉克石油和更多的贸易机会，给自己的经济输血。

这就是伊拉克的地缘政治环境。既无大国支持，又与邻为壑，只剩下“四面楚歌”四个字。如此环境中谈把海湾变成第二个越南，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在海湾战场大打出手的美国，再也不存在朝鲜战场上的38度线和越南战场上的17度线了。

与当年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用了四个“错误”描绘朝鲜战争不同的是，海湾战争期间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用了五个“理想”。他说：“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

施和理想的战场。”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规模最大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持续3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 246人；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 209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通过对这三场战争所用兵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比较，再参看它们的持续时间和伤亡人数，可较为清晰地透视仅通过一场战争难以透视的那些深层帷幕。当左右一场战争胜败的地缘政治因素大大超过军事技术因素的时候，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就不能仅仅是几件高技术兵器了。

研究失败——美军的警醒

美军战史教学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较注重研究失败。至今他们还在反复研究越南战争，对海湾战争的研究却着力不多。越战是美军战史中最惨痛的一笔，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却至今念念不忘，一堆高级军官还扎在那里，反复探讨美军当初怎么一步步深陷泥潭。世人以为其最耀眼的海湾战争，却放在一边至今未列入教案。即便讲课中偶然提到，也必有用心良苦的安排。例如国家军事学院的“突袭、蒙骗、预警和战争”一课列举五个战例，其中出现了海湾战争，与之并列的却是1968年越军的新春攻势。听课学员在领略“沙漠风暴”头一天美军有能力把精确制导炸弹扔到萨达姆头顶上的同时，也领略到越南人民军能够在新春佳节的凌晨，突然把攻势推进到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驻越美军司令部门前。

人们常说失败是警钟。美军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研究越战，无非想从失败中获取胜道。现在很多美国军官直言不讳，认为海湾的胜利来自越南。当年从金兰湾狼狈撤出的第二十三步兵师的两位青年军官克林·鲍威尔少校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中校，海湾战争时皆以四星上将军衔担任美军指挥作战的首脑。前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者是海湾战地美军中央总部司令。连胜军的统帅也从败军中一身泥水摔打出来。

失败是警钟，胜利又何尝不是警钟。海湾战争之后，他们的军事评论家纷纷指出美军发展中的那条马鞍形路线：前次胜利往往导致下次失败。两次世

界大战的胜利吹昏了美国人的头脑，导致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连续失败。如果被海湾的胜利吹昏头脑，必然在下一场战争中失败。军队内部也不断有人告诫海湾战争局限性很大，对未来作战的指导十分有限。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人再把海湾战争的胜利看作是单纯高技术兵器的胜利或军事胜利，而越来越强调取胜过程中地缘政治的因素。曾任美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战场。我们在总结战争经验时应该格外当心。”

对失败揪住不放、对胜利格外当心的心态推动下列现象出现：冷战时期美军组织的对抗演习多数是扮演“蓝军”的美军获胜；海湾战争后则一反常态，大多数对抗演习的结果是“红军”胜，“蓝军”败。1994年罗得岛州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举行的大规模海上对抗演习最为典型。在这场有8名海军将军、40名海军上校和一批政策分析家参加，设想下个世纪初于西太平洋沿岸与某大国发生对抗的演习中，美国海军遭到沉重打击，实施有效防御之前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巡航导弹击沉，海上编队只有铩羽而归。

这种一次又一次置自己于败军位置的做法，给我们什么启示？如果认为这是自认失败、自甘失败、自取失败，就大错特错了。哪一个军人不梦求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直面失败、设想失败、研究失败，恰是一种更加急切与旺盛的求胜心态。

原因很简单：作为军人，必须警钟常鸣。

兵贵神速的奇迹与尴尬

任何一部兵书也不忘写下这四个字：“兵贵神速”。

任何一个挖掘历史经验的人也不忘记写下这四个字：“机不可失”。

1999年6月12日凌晨，这些书本上的精彩理论变成了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就在踌躇满志的北约准备按部就班完成对科索沃的分区占领之时，俄军一支200人的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进入科索沃，抢占了普里什蒂那的机场。

东方西方皆目瞪口呆。这支部队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谁批

准了这次行动？世界舆论大哗。在俄外交部长费力地解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故作轻松、资深评论家们来不及用完早餐便纷纷加入对事态的分析之时，这支部队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像一颗钉子一样钉死在了那里。

科索沃战争中一枪未放的俄罗斯，其在巴尔干被动的战略地位顿时改观。

为什么一支 200 人的部队能够产生这样重大的后果？

第一，在于占有了先机。先机就是主动，就是主导。兵贵神速，其“神速”就体现在抢占先机这一点上。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一步险棋：如果再不进入科索沃，也许就永远失去了进入的可能。北约空袭了 78 天却让俄罗斯人首先进入，从西方角度看，无论如何也有被人家摘去了大桃子的感觉。

第二，在于占据了要点。从现代空中机动与空中作战看，一万平方公里的科索沃，最重要的就是普里什蒂那机场这一点。所以北约的“维和指挥部”也选在这里。200 名俄罗斯士兵的突然抢占，既点到了科索沃的穴位，也点到了北约的穴位。

第三，它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俄罗斯仍然有军人在枕戈待旦。科索沃战争使俄军声誉降至最低点。这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泥足巨人。但在全世界面前表现的抢占机场行动，从其不事声张、有条不紊、一气呵成看，如果没有军人对战机的精心把握、对行动的周密策划、对达成既定目标的大胆果敢，纵有政治家的决定和批准，也难保不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俄罗斯军人的素质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以上三点，使俄军抢占普里什蒂那机场的行动，成为以果敢的战术行动产生重大战略影响的典型。现实政治确实严酷：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就因如此，俄罗斯在科索沃维和谈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当然也还要从另一面看。一个 1800 万平方公里、两亿人口的世界大国，靠 200 人的大胆军事行动改善战略地位，既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悲剧。俄罗斯军人每每在行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军事造诣，但又每每因国家后劲不足，难以为续，成果东流。抢占机场行动仍然如此。在北约开始以每小时 200 人以上的速度进入科索沃之后，俄罗斯这支 200 人的部队却得不到有力补充，几天之后不但开始向周围的英军士兵讨水喝，而且“科索沃解放军”竟然宣称要对俄军动手，只是被英军隔离在了封锁线之外才作罢，大有“虎落平原”的景象出现。俄罗斯灵活机动的作战分队和缓慢锈蚀的国家机器，在小小的普里什蒂那机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这里既看到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也看到了一个

需要大修大补的国家。

所以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还不是通过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的的全部。

还是孙子那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伊拉克战争：咬牙唱下这出戏

2004年6月28日，对伊拉克来说，是一个灰色的、低调的、暗淡的日子。这一天，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五六个人围着一张被宣读的纸片，完成了交权。这种冷清的局面与一年前攻陷巴格达、半年前抓住萨达姆时美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相比，真是反差巨大。若与2003年5月1日小布什乘坐舰载机在“林肯”号航母上降落，然后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的戏剧性场面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伊拉克战争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2003年在战场上似乎一路所向披靡的美国，时隔一年这些优势到哪里去了？

谋求胜利者，必要追求优势。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将其军事优势几乎发展到极致。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军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对方的目标是如何被激光瞄准具套住，然后在精确制导炸弹的打击下轰然爆炸的。在上演这些真实镜头的时候，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国内实施国民动员、实施灯火管制、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等紧急措施了，你甚至可以一边看好莱坞大片或NBA比赛，一边喝着可口可乐，同时观看别人怎样在高技术兵器打击下陷入硝烟火海。战争对单方面来说变成一场游戏，军事对单方面来说也在变成一把日益锋利的快刀。正是在这种状态作用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看到：美国动武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低，美国进行战争行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

1993年，克林顿任内的美国统治阶层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当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克林·鲍威尔正在起劲地介绍美国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军事行动能做到如何有效，他的话突然被一位老太太打断了。这位老太太就是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她非常不耐烦地说：“将军，你总是在讲美国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但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力量，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句话噎

得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四星上将鲍威尔半天说不出话来。奥尔布莱特当时看似不经意说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军事政策的一种明显趋向：不仅追求力量的建设，更加追求力量的使用。

今天给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冲击、出现俄罗斯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生活武力化”现象的，主要根源于后者。按照美国政界一句通用的话说，就是“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武力，对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就是在这种不但要建立军事优势、更要运用军事优势的心态和政策双重作用下，人们看到了美国用兵的随意程度：谁说也不听，谁劝也不行，说打就一定要打。至于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并不重要，至于什么联合国决议案、国际战争法则等等，更可以不在话下。用武力在世界拓展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成为其中长期的主要谋划，用武力在中东建立美式“民主样板”则成为其近期的主要追求。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美国人认为他们运用独一无二的军事优势的机遇来了，但是他们面临独一无二的麻烦时刻也来了。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在伊拉克，每结束一场战斗都要统计两个数据：消灭了多少敌人，制造了多少敌人。”2004年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出现的严重恶化，就是美军在伊拉克滥用武力的结果。而其中从阿布格莱布监狱开始被揭露的虐囚事件，实际上不过是在从一个特定侧面，揭示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优势心理和霸权心理，正在导致多么荒谬与齷齪的结果。当美国对《全面核禁试条约》、《京都协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些国际约章表现出极大蔑视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他们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当他们随意指这个“流氓国家”、那个“强盗国家”，甚至提出所谓“邪恶轴心”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他们把自己作为“高山上的灯塔”，把别人看作劣等民族甚至“人类渣滓”的时候，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所说的“人权”是普世意义上的人权？一个国家，当它开始蔑视其他国家主权的时候，必然开始蔑视其他种族的人权。曾两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就说过：“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即不受约定俗成的国际法规限制，不受国家主权的限制。这些霸权、霸道的理念汇集到普通军官和士兵脑中发酵为对战俘残酷施虐，也许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一个国家随意践踏别国主权，必然随意践踏别国人权。

美国今天在伊拉克的处境说明，当一个国家的优势心理和霸权意识膨胀到超越其实际能力的时候，真正的麻烦便不期而至、接踵而至了。如果世界上所

有问题都能靠信息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来实现，美国何至于陷入今天的窘境。如果与军事优势相连接的必然就是政治优势，美国何至于在国际社会陷入如此孤独的境地。如果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拥有可以随意镣铐捕人、随意开枪杀人的权力，又如何去期待这个国家能够为那个国家建立自由和民主。无怪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深深叹息，感叹自以为世界第一的美国，茫然不知自己的“软实力”已经下滑到了多么糟糕的地步。

新世纪以来，美国表现最为鲜明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单边主义，事事都由美国说了算；另一个是先发制人，不管有没有确凿证据和理由，美国都可以首先开火发动战争。正是这两个在全球军事优势支持下的美国特色，陷美国自身于泥潭。其麻烦与灾难并非源于别人的威胁或破坏，恰恰来源于其自以为是的优势。

草草交权之后，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如释重负般地坐飞机走了，美国驻伊大使内格罗蓬特又如负重般地来了。虽然美国一定要咬紧牙关，把伊拉克这出戏继续唱下去，但是谁也不知道变调的音符在哪里。

潘多拉盒子与拉登之死

2011 年最为轰动的消息笃定是这一条了：拉登死了。

5 月 1 日，巴基斯坦北部山区阿伯塔巴德那场对抗微弱的枪战，以坠毁一架直升飞机为代价带走一具尸体，不但成为本年度最大新闻，而且被说成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拐点。

这场刺杀行动的意义果真如此巨大吗？

在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的时候，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已是奇观；更何况还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向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叫板，就像是唐·吉珂德面对风车，就像是蚂蚁面对大象，达成了戏剧化的全部条件。这个超级大国也认真地把他当作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他活着的时候，以 500 万美元（1998 年）、2500 万美元（2001 年）、5000 万美元（2007 年）作为连续递增的捉拿悬赏；打死了他，还要动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对其进行海葬。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这样做是要“确保其安息之地不会成为一处圣地以及追随者朝拜的场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令人惊叹的奇观。这些离奇的做法除了使这个人真

正阴魂不散之外，不知还会招引多少计算机游戏和动漫影视制作者，以他作为童话和神话的临摹蓝本。

或许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这个人真的具有当今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描述的那种巨大能量？

在阿伯塔巴德山区一住就是五六年，不通电话，不用网络，不与周围来往，仅依赖一两个“绝对可靠”的“信使”徒步、骑毛驴、坐汽车、乘飞机与外界传递消息。家中既没有一件可资顽强抵抗的像样武器，也没有一条基本说得过去的逃逸通道，更没有四周全部预埋高爆炸药、随时准备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最后安排，与好莱坞大片中人们熟知的那些惊险、刺激、充满悬念的镜头和场景大相径庭。所以当依托太空卫星、高空无人机、地面全套信息化装备的特种部队万分紧张地冲进院内之时，当美国各路大员齐集白宫指挥室把心提到嗓子眼、屏息观看刺杀行动实时视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原始、那么的粗糙、那么的简单。哪里有什么“极为专业的安全措施”，哪里有什么“堡垒一样坚固的豪宅”，夸张的语言，变形的描述，在现场实景面前变得像谎言一样苍白。就是这么一个人，据说指挥着全球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当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不知让多少人寝食难安。究竟是这个躲在阿伯塔巴德深宅里整天吃药、定期做肾透析的人太强大了，还是力量从太空延伸到海底、貌似强大的今日世界太虚弱了？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开篇就给我们创作了这样一个充满噱头的离奇故事。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以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著名的这位教授话说得很有意思。没有人怀疑美国人编写故事的能力。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历史上范围最广、最令人心身疲惫的搜捕行动”已经营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氛围：在必须铲除的这个人身上，集中了世间一切罪恶的根。当然可以说这个人打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潘多拉盒子，“9·11”事件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进程。他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报》说：“拉登以其惊世恐怖之举改写了美国前进的路径，险些使美国这艘大船倾覆。”且不去说这类评论是准确还是过分，一个更深入一些的问题是：这个人又是从哪一个潘多拉盒子中飞出来的，是谁把他放出来的？

此人原本不名一文。20 世纪 80 年代，因为加入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反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令其名声大噪。这是拉登在国际政治中淘到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就离不开美国的得力支援，无形中他也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角力争斗中美国的一杆快枪。

装拉登的潘多拉盒子就这样在阿富汗被打开了。

后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了，随后又垮台了，美国人以为这杆枪将会变成一支无人问津的老枪，撂在那里任其锈蚀。未料到这杆枪掉转枪口，把准星指向美国，而且抠动了扳机，这是原来挨过枪子的塌台超级大国和原来抠动扳机的现存超级大国都始料未及的。后来被人们冠以“国际恐怖大亨”的这个人生于冷战。在冷战中他只是个让人摆布的配角和小伙计，是一枚随棋手安排而落下的棋子。冷战过后，配角竟然想扮演主角、小伙计竟然想当老板、一枚棋子竟然堂而皇之地跑到对面端坐起来，俨然成为与老棋手平等博弈的新棋手了。真不知再过半个世纪，后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如此翻云覆雨的国际政治，是把它看成一幕充满理想和正义的重头大戏，还是一幕荒诞滑稽的国际闹剧？

至于作为基地组织和众多国际恐怖组织的精神领袖，这个人死亡之后恐怖主义是继续泛滥还是开始收敛，反恐斗争是仍要强化还是开始终结，新的恐怖主义领袖是随即产生还是今后朝分散化、本土化方向发展，当然要引起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似乎不在这里。宣布拉登死亡的那个深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事实再次提醒我们，美国一旦决定去做，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这句话说得太满了。击毙拉登对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军事科技深入四维空间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实并非像今天众多媒体描述的那样困苦艰难。应该去思索的不但是为什么做成这件事要用十余年时间，更是当人们在一茬一茬割韭菜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生长韭菜的土壤。说到底，拉登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说这个人是个怪胎，那么孕育他的国际环境就那么完美？如果说除掉他体现了国际正义，那么决定这一处决的政治体制又将怎样除掉滋生这样人物的土壤，这才是“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一件。

这个人死掉会带来种种现实好处：恐怖主义势力可能精神重挫、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反恐战争可能全球降温、国际秩序可能变得稳定。历史的误区也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将各种成因归于个人，忘掉培育其之力量和产生其之土壤。这个人以当美国人的枪、从事特种作战开始，最终死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乱枪之下，其中的含义和教训，被今天在大街上游行欢呼的人群所完全忽略，也被今天的大多数分析评论所基本回避。新一轮失误的隐患，就这样在狂欢中

悄悄埋下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阿富汗开启的那个潘多拉盒子，今天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被强行关上了？当年打开盒子的人今天也不敢下此结论。历史不会重复，不意味着错误不会重复。比如说今天纵情欢呼“茉莉花革命”的人们，谁知道是不是又在合力撬开一个崭新的潘多拉盒子。

从机械制胜到信息制胜

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仗。

由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等一系列发明带来的机械化时代，把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向一个全新阶段，也把人类的战争方式推向一个全新阶段。机械化战争中军队的机动能力空前提高，火力空前增强，战争的规模也空前扩大。过去的制胜因素被它推翻，新的要素成为钢铁产量，成为火炮口径，成为飞机、舰艇和坦克数量。

此景不短。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谋求优势者都在追求这些指标。此景也不长。20 世纪后半叶，由计算机、通信卫星和全球网络带来的生产方式改变，决定了战争方式必然改变。1991 年的海湾战争，从机械化战争的标准看，伊军与美军的装备差距不是很大，但迅速一边倒的结局，让全世界看到了信息优势所带来的全新战争能量。海湾战争之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的制胜因素颠覆性地出现了。

之所以说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性地动摇了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以来的传统制胜要素。

第一，优势转型。战争优势继从兵力优势转入火力优势之后，现在正由火力优势转入信息优势。掌握信息优势一方通过先期发现、先期决策、实时指挥、实时攻击，频频以“先手”投子布势，置对方于全局被动。在信息化战争中，实时、连续、高速流动的信息，已经不再单单是情报传递，而成为了一股巨大的战争能量。信息战成为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登上战争舞台，制信息权成为一个全新的夺取胜利不可或缺的制高点。

第二，信息技术导致战场日益透明。在经典的“克劳塞维兹三要素”中，

第一要素即克氏提出的“战争迷雾”：由于战争中信息的不准确与不全面，要获得对方全面准确的情况几乎不可能。但在现代条件下，由太空卫星、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地面各种传感器所组成的侦察探测系统，正在使战场态势日益透明，尤其是在对方不具备如此技术力量的条件下，战场“单向透明”作为压倒性优势已经出现了。其结果例如过去最不擅长夜战、最畏惧夜战的美军，现在利用其“单向透明”的优势，竟然频频在夜间发起攻击，甚至开始将主要军事行动放在夜间进行。

第三，“非线性”和“非对称”成为作战指导原则。传统战争是线性战争，“前线”“后方”概念在军事领域不知延续使用了多少年。信息化条件下，己方前后方所有要点都可能既在对方侦察探测范围之内，也在对方远程火力引导的精确打击范围之内，传统的线性作战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信息技术还造成前所未有的“非对称”。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通过这一优势迅速形成与对手武器装备的“代差”甚至“隔代差”，获得比以往大得多的优势，实现所谓的“超视距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网络中心战”等全新战法。而所谓“武器智能化”“战场网络化”等等，也不外是信息技术在装备建设和战场建设上的具体运用。信息不对称正在成为最大的不对称。它给一支军队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传统的火力不对称和兵力不对称。特别是在不对称原则日益上升为战争指导原则的前提下，越是缺乏信息优势，越容易遭到对方依托信息优势主动发起的攻击。

第四，信息化推动军事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信息化带来的网络多路链接、信息多路分发和共享，使上级与下级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指挥机构趋向扁平；使陆、海、空三个军种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真正意义的联合。如果说机械化时代军事指挥机构越来越复杂，陆海空三军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那么信息化时代军事指挥机构将越来越简捷，战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区分也将越来越模糊。在它的推动下，军事组织方式和战争进行方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第五，如果说机械化使人的体力得到极大延伸，那么信息化则使人的智力得到极大扩展。没有什么事物像战争这样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数，充满让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和余地。信息化没有压缩这个空间和余地，而是给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个空间和余地。正是在信息化建设的推动下，军队建设从未像今天这样，质量建设扮演最为关键和最具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特别是人。因为不论机械制胜还是信息制胜，说到底都是物化了的人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没有高素质的军人，既打不赢机械化战争，更打不赢信息化战争。

从机械制胜到信息制胜，胜利要素的转变必然带来建军方向的转变。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新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既要努力提高打赢战争的能力，又要努力提高遏制战争的能力。以信息化建设为方向，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基点，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这其中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机械制胜到信息制胜其间并非是相互否定、相互推翻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叠加的关系。发展，任何领域发展的生命力皆来自对传统的延伸，而非对其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从机械化到信息化没有无条件跨越的道路的原因。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原有武器装备，以信息化作为牵引推动军队建设向更高水平跃升，是谋求信息制胜的必由之路。

从机械制胜到信息制胜，更要强调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更要强调创新能力的获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支军队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一支军队能够保持旺盛战斗力的不竭动力。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巨大的转型。转型中既特别需要把握特色、珍视传统，更特别需要鼓励开拓、实现创新。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谁敢于改革、善于创新，谁才能加快发展，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推波助澜：新闻与战争

人类没有新闻之前，先有了战争。

自有了战争，便有了集结军队的号召，有了打探敌情的需要，有了传递战况的期待，有了宣扬胜负的愿望。烽火台，号角，风筝，弓箭，快马，跑断腿的信使……数千年来勉为其难地承担着报告战争的任务，直到现代信息传递手段在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中产生。通过印刷机海量印刷、通过电磁波高速传送的现代新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描述战争、评价战争、最终影响战争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战争也因它而改写。

战争：永恒的重大新闻

1566年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通衢大街交通便利之处出现一种张贴的单张纸。它与官方通告不同之处，在于定期张贴，内容新鲜，面向大众，内容都是与人们生活有关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事情，阅览者每人须付一枚钱。

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当时哥伦布已经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也完成了环球航行，人们的视野急剧扩大，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社会，非常需要了解有关商品生产、交易和价格的情况，以便熟悉新的市场，需要了解海洋知识，甚至需要知道天气变化，以便把握出航时间……

需求使报纸在商城威尼斯应运而生。

欧洲各大都市在威尼斯之后，均相继开始贴出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报纸”的那种单张纸。到1622年伦敦出版《每周新闻》的时候，专登国际要闻的报纸也产生了。

今天，以全世界新闻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来说，它的公民每天要购买6000万份报纸，阅读1.1万份杂志，从9000家广播电台和1000家电视台收听、收看各种消息和节目，平均每台电视机开7个小时。新闻媒介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和形成看法的主要途径之一。

报纸最初诞生，是搞生产和做生意的需求。

后来逐渐发现，影响生产和生意最大的，莫过于灾难与暴力。当灾难与暴力成为报道关注重点之后又发现，最大的灾难和暴力莫过于战争。

影响最大，刺激最大，因此关注也最大。很快，报道战争成为新闻机构获得突飞猛进发展的绝好契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国民新闻》《时事新报》等66家报社总共派出129名随军记者，对战争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报道。战争结束后，各报的发行量均是战前的数倍以上，其中《朝日新闻》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6.7万份，被评价为“开创了日本现代新闻的黎明”。

通过战争崛起的新闻机构，最典型的还是美国的“CNN”。

CNN，全称Cable News Network：有线电视新闻网。1970年，一个叫特德·特纳的人用250万美元买下了濒临破产的亚特兰大电视台。他喜好体育，讨厌新闻。联邦媒体委员会规定每周至少须播放7小时的新闻，他为了应付，便把新

闻节目安排在凌晨3时。

谁也没料到这个讽刺挖苦新闻的人，最后竟然创造出世界新闻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1980年6月1日晚，特纳在亚特兰大宣布，他主持的CNN将24小时连续播放新闻。来宾稀稀落落，不到300人。掌声也稀稀落落。美国新闻媒介的数量繁多，著名的三大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提供85%的电视节目，而99%的新闻则来自美联社和合众社两大新闻社。在新闻业已趋近饱和的情况下，谁也不认为一个被称为“CNN”的亚特兰大地方电视网能夺占已经瓜分完毕的市场。美国其他电视网根本就不相信CNN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连对娱乐节目都开始感到厌倦的美国人，还会对一天24小时播放的新闻节目感兴趣？

特纳毫不动摇，他认为这是个历史时刻。那天晚上侥幸收看到这个台的人，都会对特纳的播音员说过的话语印象深刻：“我是洛伊斯·哈特，现在开始播送新闻”；“我们将永远在此向您播放新闻，直到世界末日”；“当那一天来临之时，我们也将向您报道，并演奏《上帝与你同在》，然后结束广播”。

CNN作为现在全世界无人不晓的新闻业巨擘，就这样诞生了。

在美国也无例外：新闻节目从来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但是对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立誓成为全国电视巨头的人来说，新闻节目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正因如此，特纳决定采取典型的冒险策略：那些电视巨子播放30分钟的晚间新闻就要花费几百万美元，而他却要开始制订全天24小时播送新闻的计划。

特纳在进行一场押上他所有东西的赌博。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商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冒险家。”他的担心很快得到印证：搞新闻投入巨大。特纳原计划一年的采访经费为1200万美元，不久就调整到1800万美元，后来又追加到3000万美元。公司财政赤字达到2.5亿美元，最不喜爱新闻的特纳因电视新闻而债台高筑。

这些并未动摇他的信心。他把定了一条：全部希望并不在给他贷款的银行，而在收看他电视的观众。

CNN不断成功抢先发布新闻，如暗杀里根未遂、旧金山大地震等，使收看的观众大大增加。他又最先租用卫星播放他采集的这些新闻，使这个原来只能辐射方圆45英里的地方电视台，开始用电波覆盖全美。偶然收看到这个台的观众，立即会被CNN播送的新闻内容和报道方式所吸引。

CNN 从第一天起，播报新闻的方式就十分独特。那天的头条新闻是印第安那州弗农·乔丹杀人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第二条消息本来是报道内斯蒂公司的，但突然被主播部门打断，插入记者福特·韦恩的现场报道，内容是卡特总统到医院与进行治疗的乔丹闲谈。这就是 CNN 的报道风格：特别强调现场感、实时感，特别注意给观众提供很少剪辑的第一手资料。这种方式十分大胆，此前几乎从未被任何广播电视网采用过。观众迅速认同了 CNN 的这种方式。

当然，最终奠定现场实时报道地位也就是奠定 CNN 地位的，还是“沙漠风暴”战争。它平时所有的积累，在联军 38 天空中突袭、100 小时地面战斗中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终于使它达到了所有新闻业巨子都未达到的高度。

开始轰炸巴格达的第一天夜里，时任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的新闻发布官拉费瓦耶打电话给白宫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菲茨沃特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和你一样，正在收看 CNN。”

这是当时战争双方高级官员们不约而同都在做的事。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只肯在装有收看 CNN 设备的旅馆下榻。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都不肯把身后不停播放的 CNN 节目音量放小。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国防部长狄克·切尼都转向 CNN 了解外交和战争中发生的情况。中央情报局长威廉·韦伯每当从卫星系统中获悉伊拉克发射了飞毛腿导弹，便会立即打电话对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说：“打开 CNN，看看它落在什么地方。”海湾战争后，美国总统布什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说：“我从 CNN 获得的消息比从中央情报局获得的还多。”

CNN 作为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收集战场信息的速度及准确性竟然超过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那些老式机构仍然采用信号破译、图片分析、情况汇总、逐级上报的老式情报处理方法，这在瞬息万变的危机中显然是过于缓慢了。

因为 CNN 的快速报道，很多政府甚至把这一新闻机构当作外交工具使用。

海湾战争准备阶段，土耳其总统厄扎尔通过 CNN 的电视节目看到有记者问布什总统：厄扎尔是否会切断通向伊拉克的石油管道？布什回答说他正要向厄扎尔总统问这件事。几分钟后，当布什拨通电话时，厄扎尔说他正在等待这个电话。

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提出了一项和平方案，布什总统坚决反对。但怎么把美国的态度迅速通知 26 个盟国呢？白宫新闻秘书费兹沃特回忆说：“最快、

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 CNN，因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在收看它。接到伊方建议 20 分钟后，我即刻来到电视台，通知 26 个盟国要继续战争。”

空前加快的战争节奏，使某些时刻已没有时间起草外交照会、没有时间等待高层决策者一一签署，也没有时间让驻外大使拜会各国外交部长提交函件了。

人们目睹了美国把一件重大外交函件委托给一家私营电视公司向全世界发布。

没有人再小看特纳了。这个一直声称“憎恨新闻”、认为新闻邪恶的人，却从 24 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中获得了全球名声。

特纳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他在美国富翁榜上排名第 26，却为从门缝里取出一枚硬币差点被旋转门挤伤。他的 CNN 从报道暴力活动和战争中获益巨大，他却一心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提出要修改美国国歌，因为那是“战争歌曲”。他厌恶的东西造就了他，他喜好的东西却最终离他越来越远。

1980 年，CNN 开始全天播报新闻的时候，它的订户是 170 万户，1998 年已经是 8000 万户。600 多个国内和国际新闻组织采用它的节目。正是战争之火，使它成为全世界名声最大、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巨人。

CNN 代表现代新闻界一个残酷的事实：战争使新闻产生巨大魅力。这个魅力使得新闻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不论战争胜败，只要它还在不断地被渲染被报道，那么渲染者报道者就永远是胜利者。

新闻：推动战争与制止战争

战争先于新闻，但战争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新闻在不厌其烦、详尽描绘战争的时候，同时拔出了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推动战争，一面是制止战争。

可以看看日本新闻界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发挥的推动战争的作用。

1931 年七八月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事件，成为日本新闻界开展军国主义煽动的突破口。从 7 月到 8 月，日本各报社、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组织各种讲演会、座谈会，开始狂热地宣传“满蒙危机”。

1931 年 8 月 28 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题为《军部和国民》的社论：“国民与军队经常互相配合，以完成国防之大任。正如古语所云，二者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如果双方不协调，鸟不能飞，车不能转。无论军备多么精良，军人多么勇敢，没有国民的后援，恐怕连弱敌都不能战胜。现在的战争实际上不只是军人的战争。”

9月8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一条消息:有部队用飞机向城市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觉醒吧,我的国防!我的同胞!”

9月26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报社的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寄来的血书和慰问袋。截至25日,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两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共收到现金两千多元,而且肥皂、毛巾、牙膏等慰问品更是难以尽数。”

10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朝日新闻社决定“今后社会上的战争捐款、慰问袋等送往战地的请告知本社,明天开始本社将应募者的姓名、住址、金额公布出来”。

在新闻界的推动下,日本战争狂潮愈演愈烈。国民普遍认为,支持战争就是爱国,否则就是日本的敌人。

日本新闻界在完成战争舆论动员之后还不够,鼓动宣传逐渐朝向极端方向发展,由报道对侵略战争的慰问活动转向报道各种极端行为。

《国民新闻》报道:“两名第八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悲愤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跳下自杀。”

9月26日的《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给部队的信中写道:一定要让我们去做战地护士”,“第十师团军医家中的女用人,为激励士兵出征,从山阳线列车跳下自杀”。

12月14日的《国民报》报道:“大阪步兵井上清的夫人井上千代子为鼓励丈夫出征,以短刀自刃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明天你就要出征了,我非常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为我难过,我的死算不了什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保佑大家平安,为国出力。”

这些极端事件经报纸作为“爱国主义材料”一加宣传,使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更加激动,军国主义者则更加有恃无恐。

连不懂事的孩子也被卷入。

11月21日的《京都新闻》报道,12岁、7岁、5岁的一家3兄弟访问陆军部,大哥拿出1元、二哥拿出50钱、小弟拿出20钱捐给军队,使在场的人“大受感动”。还有一位老妇人带着4岁的孙子,拿出存钱盒说:“这是我孙子存的钱,说是送给前线士兵,请收下。”

《北海道每日新闻》报道,12月12日,深川区东川小学给陆军部新闻班发了一封信,信中夹有5元钱和20多名3年级学生的签名。信中说:“我们把

每天的零花钱积攒起来送去。老师说我们这里享受着温暖，过得很快乐，而满洲的士兵们却非常艰苦，那里已经很冷了。我们希望不管支那兵何时来，要毫不犹豫地给予最大的打击。”

看到这些宣传效果，谁还能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仅仅是陆军几个师团？谁还能说东条英机等十几个军阀就能承担所有战争罪恶？当日本民族整体踏入误区、其战争狂热像富士山喷发一样的时候，日本新闻界对形成其国民举国一致的战争喧嚣，难辞其咎。

再看看1999年3月24日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美国新闻界长期对波黑冲突报道，最终导致克林顿政府采取军事干涉手段介入巴尔干事务的产物。

本来美国人对科索沃知之甚少，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欧洲的一个地名，还是美国某一个加油站的名字。当B-52和B-2轰炸机空袭南联盟成为充斥报纸版面的重大新闻之时，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轰炸。这时候，新闻媒体担负了扫盲的责任：刊登浅显的文章，明了的地图，南联盟国家在遭受铺天盖地轰炸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和电视铺天盖地的是南联盟的“种族清洗”。新闻媒体对动员舆论进行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其实自海湾战争前后，美军的每次军事行动之前，人们都能看到美国新闻界的“涂鸦”：入侵巴拿马之前，美国新闻界已经涂黑了“毒枭诺列加”；出兵索马里之前，已经涂黑了“军阀艾迪德”；出兵海地之前，已经涂黑了“独裁者塞德拉斯”；出兵波黑之前，已经涂黑了“刽子手卡拉季奇”；发动科索沃战争之前，已经涂黑了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

于是干涉，特别是使用战争手段干涉，便在这里找到了合理性。

当新闻报道在大张旗鼓地推动战争的时候，它也不得不面对双刃剑的另一面：对战争杀戮行为的遏制。尤其是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新闻报道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

1865年林肯总统遇刺，过了五天消息才到达伦敦；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伦敦人两小时后就在电视中看到了事件的镜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有六天时间思考该怎么办，然后再向公众公布；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在交战双方都掌握大量实时信息的情况下，布什总统连六个小时的决策反应时间都没有。

现代新闻对战争实况清晰连续的实时报道，不仅使战争节奏空前加快，决

策时间大大缩短，更使单方面掩盖战争真相的企图变得越来越困难。正是新闻报道使人们现在拥有了足够的信息，不仅仅关心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开始关注战争的细微进程并有可能影响这些进程了。这使得少数人随意操纵大多数人命运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决定战争不再仅仅是总统和将军们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人们真正知道真相的话，过去很多战争的打法将会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战争再也不可能采取过去战争的那种少数人主导一切的形式了。新闻封锁越来越困难，范围和时间也越来越有限。政府和军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随时公布战况。各级主要领导人物也不得不亲自出马，在摄像机镜头前充当新闻发言人。人们不但更加不愿意让他们的亲人在战场上伤亡，而且也更加不愿意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即使那些最喜欢掩盖真相的新闻机构，也不得不在于各方面的压力和越来越强劲的竞争中，万般无奈地适应新的情况。

美军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是现代新闻对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

1992年12月9日，出兵索马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连脸上都涂着迷彩，悄悄登上被岸防部队弃守的海滩。此时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观发生了：几十名埋伏在那里的新闻记者突然出现，照相机的闪光灯和摄像机的聚光灯晃得士兵们睁不开眼，电视台的现场播音员大声地现场解说起来，把这场美军自以为神秘的登陆行动公诸全世界。

这场军事干预行动，由现场新闻报道开始，也由现场新闻报道终止。

1993年10月4日，CNN播放了一盘现场录像，展示了被索马里艾迪德武装俘获的美国军人镜头：一名受伤的美国飞行员被五花大绑，由索马里人牵着穿过首都摩加迪沙街道；一具赤裸的美军士兵尸体则被拖着游街示众；周围围满忠于艾迪德的索马里人，他们载歌载舞，朝天鸣枪欢庆胜利。

新闻一播出，美国舆论大哗。选民们纷纷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要求政府马上撤军。准备竞选总统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多尔一天就接到一千三百多个电话。总统克林顿也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付索马里局势的措施。

最终措施还是撤军。在摄像机前不可一世登陆的美军，又在摄像机前以“逮捕军阀艾迪德”失败、付出十八人死亡的重大代价，不得不在国内舆论的强烈要求下，狼狈地退出这个国家。

在新闻对一场战争的揭露和制止方面，莫过于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的起因和进程十分复杂。但只要看看越战期间那些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文章和照片，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输掉了那场战争。美国军人在越南滥杀无辜的场面，美军士兵在丛林中遭受严重伤亡的场面，他们在异国他乡痛思亲人的场面，通过新闻稿、传真照片和电视摄像传回国内，转化成洛杉矶反战大游行、芝加哥反战大游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转化成罢工、罢课、美国青年集体烧毁征兵证，转化成支持战争的政客纷纷落选、新上台的人物不得不口是心非地向选民许诺终止战争和实现和平。

美国人自己说，越南战争是一场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加坦率真切报道的战争。美国人自己还说，他们首先在报纸版面和电视屏幕上输掉了这场战争。

说新闻是柄双刃剑，是因为这柄剑的两面都锋利无比。它在把主持战争政府捧向顶峰的同时，也把同一个政府逼入绝境。

当年在反战情绪影响下逃服兵役的一个美国学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五、前事之鉴

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中，我相信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大清王朝的四次说“不”

一部中国近代史，人人皆知这八个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有人认为，那是旧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果真如此么？

我面前有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

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十一国。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先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

道光皇帝接手的大清江山，已经是一个朝风腐败的烂摊子。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近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即位，颇想重振大清雄风。他先从自己做起：衣非三日不易，食物价高，虽喜不索；宫中用款，岁不过二十万。然腐败之风由来已久，弥漫全国，病入膏肓，颇为节俭的道光也万般无奈。

万般无奈也是对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万般无奈，对外国的舶来物，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当强硬的，尤其对鸦片。

说起 1840 年那场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他们不知道 1838 年那场由 28 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20 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两年就泡汤了。

所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阅看了道光的朱批：“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戒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之后，道光颁旨：“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

林则徐认为不妥，立即复奏，“对英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主张区别对待。高居金鸾宝殿之上的道光朱笔一挥，批复道，“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坚持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 年 1 月 27 日，道光正式下诏对英宣战：

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前因西夷鸦片烟流毒日甚，特颁禁令，力挽浇风。惟英吉利恃其骄悍，不肯具结，是以降旨绝其贸易。乃并不知愧悔，日肆鸱张，突于上年六月间，乘驾夷船数十只，直犯定海，占据城池。复于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来，多方滋扰。……近闻数月以来，奸淫妇女，掳掠资财，建筑炮台，开挖河道，且令伪官出示，谕民纳粮。百姓何辜，罹此荼毒。兴言及此，寝馈难安。迨琦善抵粤后，明白开导，仍敢要求无厌，既思索偿烟价，又复请给码头。朕早料其反复无常，断非信义之所能喻，特于年前简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广东。又调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预备攻剿。……现在所调各省劲兵，计可赶到，著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以苏吾民之困。并著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垒经降旨严密防范，著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共膺上赏。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敢于宣战的道光，让谁去指挥作战？御前大臣、靖逆大将军奕山。

奕山又以宿将、湖南提督杨芳为前锋主将。英军初闻杨芳之名，还颇紧张了一阵。

杨芳怎么抗英呢？他认为英舰竟能于风高浪涌的洋面操大炮击中目标，定有邪术在内。破除之法，必用秽物。于是这位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厚积威名的战将，第一纸作战命令竟是遍收妇女溺器载入木筏，由一副将统领，一闻炮响便蜂拥而出，举筏齐列水面，以溺器对准英船，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杨芳以马桶为胜具，后来被笑传为“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大将杨芳丢了人，主帅奕山又能挣回几多面子呢？

道光要奕山对英军“分路兜剿，务使其片帆不返”。当时从湖南、四川、贵州等地调入广东前线的兵弁，已十倍于敌。但奕山却在兵力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英军攻击下，将道光于金銮殿中想象出来的不返“片帆”，扯成为广州城头一面可耻的白旗。

升了白旗的奕山又不想丢人，便虚报战果欺骗道光，说英军进攻靖海门、激战正酣时，烟雾中忽见观音神像，英军遂不敢再击；又观音山下三万斤火药被汉奸点燃，正欲爆炸，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时熄灭。

道光闻讯，亲书“慈佑清海”四字匾额送观音庙，以谢神恩。

节俭刻苦、想有所作为的道光，以其勇傲与孤陋，确实对英人大喝了一声“不”。但乞胜于马桶或乞灵于观音的“不”，该算一种什么样的“不”呢？

第一次说“不”终于以很快称“是”而告结束。1841年1月27日金銮殿上的一纸宣战诏书，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那份《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两。

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变成了第一个屈辱地说“是”的皇帝。《南京条约》的内容，凡英人的要求全部答应，无丝毫回旋余地，从此也开了从最傲然地说“不”转瞬为最谦恭地称“是”的先河。

听闻条约签订，道光帝退朝后不吃不喝，负手于便殿阶上徘徊往复，一夜不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割地赔款的屈辱，愧对祖宗的自责，使颇想有所作为的道光深陷懊丧与悲痛。他蹒跚于深宫，难以解脱。

道光的晚年沉寂潦倒。他至死未解脱重压于心头的“历史罪人”这个包袱，最终也未弄清楚败在了哪里。

一个王朝的吏治腐败如此，武备废弛如此，制度衰朽如此，如何去说“不”？怎么不溃败？

道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鲜明的是他的第四子，继承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帝登基时刚刚二十岁，血气方刚。大理寺卿倭仁进言，力陈为君者首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他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图画：

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才，小人排异。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君子刚正不挠谏诤匡弼，小人依违两可迁就逢迎。君子进忧危之议悚动警心，小人不畏天变滋长逸志。

倭仁说这些话是需要些胆量的。他通过用人问题，将一个衰败王朝的官场空气描绘得入木三分。咸丰非但无雷霆震怒，反赞其“言甚切直”，要大小臣工今后都如倭仁一样直陈所见。

咸丰立直言进谏的倭仁为榜样震动了官场。非但如此，他还以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置诸左右：

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

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

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不啗真情。

要防三渐的咸丰帝，上台伊始便重新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由原籍启程赴任，行至广东潮州病逝。咸丰闻讯，异常悲伤，御制挽联一副：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咸丰对林则徐的评价可谓异乎寻常，情真意切。

年轻的咸丰虎虎有生气，颇想有所作为。在寻觅君子的同时，他着手处罚小人。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道光帝最信任的大学士穆彰阿被他革职，永不叙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耆英被

他斥为“畏葸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降为五品顶带。如此之举，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不但敢撤投降派，而且也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十三艘英法舰中，四沉六伤，官兵伤亡五百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这面白旗，是近代史上以坚船利炮入侵中国的列强升起来的第一面白旗。它对咸丰王朝升起。自幼目睹其父道光皇帝因鸦片战争之败而潦倒不堪的咸丰，一定因大沽口之胜而深感为祖上出了一口恶气。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还敢扣押洋人特使。

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出其策划，遂下令将其扣留在通州。中国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自幼吟经颂典的咸丰帝为泄心头之愤，连祖宗之例也敢违，确实有点蛮莽的勇气。在得知巴夏礼被擒的当天，他便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与英法决战。

1860年9月12日，对英法宣战诏书的内容如下：

……(英法)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拥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惟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共谅。

咸丰一直在北京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

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之后，咸丰给臣下提出两个方案。一为“率师亲征”，一为“巡幸木兰”。前者是向前方挺进，是招牌；后者是向热河逃跑，是实意。这个一直主战的皇帝在发布宣战诏书后，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启銮”“北狩热河”，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肯定想不到一年零四个月后，他不得不谕

令曾经打得夷船张挂白旗的僧格林沁“即宣示夷人，并竖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抚”。

用什么去“抚”？用《北京条约》！批准《北京条约》时，咸丰落到比其父道光更加狼狈的境地。

咸丰之父道光打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之子咸丰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不给这个颇想有所作为的咸丰一点宽容。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败得更为痛惨：不但是更大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被英法联军将一百五十年时间用无数能工巧匠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在那里忙碌地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目的只要附近兵马“无分昼夜，兼程前来木兰行在”，保卫他的身家性命。他可眺望过北京上空腾起的浓浓烈焰？那红的火和黑的烟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人是一无所知了。唯一知道的是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宣战又是扣人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

他最后死在了热河，生命已经不再给他时间回京看看其夏宫的残骸与废墟了。

曾经发誓要报仇血耻的咸丰，比其父道光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再看看 1894 年 8 月 1 日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

……倭船多支，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还有 1900 年 6 月 21 日，慈禧太后对诸国（英、俄、德、法、美、意、奥、日、荷、比、西十一国）的宣战诏书：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教，朝廷以其劝

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詎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臬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一份又一份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使我们看到，满清末世的这些统治者并非没有说“不”的胆量和决心，他们说“不”的理由又每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说“是”的根据。为什么？

和战转换之间，表面上说保社稷江山，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

《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个晚上，退朝后不吃不喝、一日夜未尝暂息的道光皇帝，考虑更多的是他个人和爱新觉罗王朝的尊严受到损害，是“愧对祖宗”。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了《马关条约》，则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翹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几张牌而已。玩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让周围一无所剩，真可谓“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为

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

这样的人执掌国政，国家民族怎能不面临无穷无尽无边无涯的灾难。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是留英同学，后人常以伊藤博文回国后位尊首相、辅助明治天皇搞维新使日本面貌大变，而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嘲笑严复无大出息。

伊藤使日本变法而富强，也使日本扩张而侵略。无限膨胀的结果，终于令日本跌入1945年战败的深渊。

严复从英国回来后除了译书，基本无用武之地。然而仅上面那一段话，便不枉中国人民一辈子养活他。

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两千七百余年，危机则持续了七十一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有了严复那段话，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便以“天下为公”四个字，令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轰然倒塌。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那么向南眺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辉煌、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辉煌的真正注释。

一支开炮前就已失败的军队

战争与军队，是军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以来的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则是这一话题的最核心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三千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三千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一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在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 7335 吨的定远、镇

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	1	2	9
北洋海军	6	0	8

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十四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九点五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两百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来说，日舰每小时快一点四四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十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 1888 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 年 5 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

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 805 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六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最后，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 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 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宜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

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他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

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但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其次，作战效能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

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又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 11.17 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 107.71 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的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这支新式军队的军风，很快与八旗绿营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有大半是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练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皆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

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这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又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の逃遁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

“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

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这支投入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自林则徐以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清廷也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现在船不可谓不坚，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为什么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从理论上说能够一战、实践中却不经一战？

北洋舰队如此迅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竟败至如此之惨。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是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入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

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

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们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

我们的花环，我们的荆棘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如果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向大人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时间过去了六十八年，战争结局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花环。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那里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豁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这场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就不下10万人。

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不足两万人，而张学

良之东北军人数达 19 万。19 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吉，四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还必须直面那些往往令我们不那么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要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有多么衰弱，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真实的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有人说岁月能抚平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伤痕。

当工地的脚手架最终取代刑场的绞刑架，当建筑的喧嚣最终取代战场的喧嚣时，岁月真的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这种神奇的疗效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脸上这些刀痕是很吓人的。”1995 年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对采访者说。当年她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 37 刀，鼻子、嘴边、眼角、脸颊无处不是刀伤，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现在 58 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说着这一切的时候，77 岁的李秀英已经很平静。对面静静听的采访者，是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张纯如用英文记录下采访的一切。她从小在美国长大，虽然能用中文交流，但用中文阅读和书写已经很困难了。

1997 年，29 岁的张纯如出版了这本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这是从未经历灾难的新一代人，对那场浩劫的认识与思索，而且是更深刻的认识与思索。不说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也不说这本书让世界上多少人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它引人思索那些更加久远的命题：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

都知道不应该忘却，现实却迫使人忘却。遗迹在消失，老人在逝去。新诱惑、新追求、新概念、新梦想、新人类、新新人类……在层出不穷地产生。现

代都市的青年，大脑几乎变成一两周就要格式化一次的硬盘，还有多少空间存放那些历史的老照片呢？

这就是以张纯如心路历程为主线的大型舞剧《南京 1937》给我带来的震撼。

我不太喜欢看舞剧，也看不懂很多舞剧。但我一下子就看懂了这部舞剧。那一刻，我像个内行一样沉浸其中，心领神悟了几乎所有的舞蹈语言和造型语汇，并且被深深震撼。张纯如是年轻人，《南京 1937》的编剧、策划、作曲、造型、舞美……比张纯如更加年轻。就是这些年轻人用这部舞剧，让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人获得片刻停顿，回头反观我们平时很难有时间回顾的那段历史。当舞台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时间中断了，肉体静止了，思维却激越地飞腾和碰撞：思索我们最巨大的灾难、最刻骨铭心的伤痛，以及必须从灾难和伤痛中获得的力量。

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没有人准备把它恢复原貌，只是在说明的图片中，你可以领略它昔日的辉煌。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半点皱纹也没有、面孔鲜嫩得像五月的鲜花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头轻轻地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那时间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倾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就是他们的圣地。他们在他们的圣地，进行他们的心灵洗礼。我当时想：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岁月的皱纹也会悄悄布满他们鲜花一样的容颜。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一次又一次经历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毁灭这样的民族？谁还能遏制这样的民族的强大生机？

《南京 1937》不过是一出舞剧。但这出舞剧的真正了不起，就是它也使

我们获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这些年轻的主创人员，对我们民族的伤痛和灾难理解得那样深刻和透彻，不得不令人万分感慨：我们这个民族并非那样容易忘却，历史并非仅仅属于年长者，一代人真的是强于一代人。舞剧总编导、28岁的佟睿睿说：“排这出舞剧不为我们自己，不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为全体中国人。”就凭这一信念，这群年轻人不知克服了方方面面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发挥出了多么大的创造潜能，从而使他们的节目具有如此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穿透力。这哪里是一出舞剧，完全是台上、台下、幕前、幕后、演员、观众共同的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精神洗礼。

岁月的皱纹可以掩盖历史的刀痕。1918年出生的李秀英老人，2004年12月在南京病逝。先于李秀英老人一个月，1968年出生的张纯如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自杀。完成《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之后，忧郁症成为她长期的精神困扰。她们二人年岁相差整整半个世纪，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半球，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去向了同一归宿。再过多少年，当南京大屠杀的场所被一栋又一栋现代化建筑淹没的时候，当只有在圣塔克拉拉那个叫作“Gate of Haven”的公墓里才能找到张纯如的小小墓碑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永远不会忘记力图使我们永远记住灾难深重的过去的人们。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日子：2005年9月3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万人肃立，寂然无声，唯有60响礼炮一声接一声地轰鸣，震撼着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人们以及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内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隆重地表达对胜利的纪念，对先烈的崇敬，对苦难的追思。听得见这轰鸣炮声的，和已经听不见这轰鸣炮声的，共同分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中，我相信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我又相信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注入新鲜活力的人，都在使我们的声音穿越苍穹，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心声。

一封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通信

XX 你好！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演出《南京1937》的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

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以及“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最近某市新版的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最近一些英模,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其一,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绵延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

“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底,此时距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仅剩3个多月时间,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具有兵力优势、兵器优势,在美国帮助下甚至还拥有了空中优势,但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

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

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又是继续防御。所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共产党，全世界共产党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漫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已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的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国援助已经大量涌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美式重迫击炮，向日军发射数千发炮弹，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完全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在一个对一个的较量中解决对手。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能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曾享受过一阵，后来很快中断了）。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的意义完全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的意义相比。认为石牌作战重要性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的中国军人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既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恭

敬地放上几束白花的。

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死亡名单，至今也只有南京纪念馆内3000多个名字作为代表，其他296000余人的痕迹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账记在共产党头上，不但不公平，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共产党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内的共产党力量，已被“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都只有承认的史实。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完成历史回归的过程中，又把原来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奋勇无比，也不是实情。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回顾起来，仍觉羞愧。

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璉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部队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追回撤退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高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中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有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充当伪军。双方比较起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最硬的。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前来“调停中日争端”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蒋自己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即便退一万步说这是蒋的推诿，也可见其拿来当挡箭牌的，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共产党人。这是当年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认识那段历史，如果拿现在共产党内那些腐败分子去和当年的共产党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以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双方的仇恨也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今天虽然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第一次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

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共产党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共产党，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并不需要来个总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事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纪念仪式中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

内外全体中国同胞，这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并不都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只会加速思想的成熟。

下回寻找一个轻松话题。

由钓鱼岛揭开的海权意识

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陆疆比较起来，6.3平方公里无人居住的钓鱼岛，真可谓弹丸之地。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凝结着如此充满伤痛，如此让一个民族耿耿于怀、难以忘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恐怕并不多见。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使一个民族旅居各地的赤子结成共同心愿、发出共同呼唤、订立共同目标，在人类社会，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纠结，海洋纠结。

自古以来，我们对海洋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走向世界通道、作为经济贸易重要渠道、作为国家发展的全新空间，这些观念在中国十分缺乏。闭关自守的政治目标，本身就在抑制海权意识的生长和海洋进取信心的获取，最终使我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得不留下这份“望洋兴叹”的纠结与沉重。

恰恰在中华民族严重丧失海权的时刻，19世纪末，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美国海军上校提出“海权论”，最终使美国这个1776年刚刚获得独立、以“门罗主义”自我封闭的地区性国家走向大洋、走向世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汉所提的“海权”（Sea Power）与我们理解的“海权”（Sea Right）存在重大差异：前者使用的“Power”是指由力量产生的权力，后者使用的“Right”则是指由公正带来的权力。

东西方的概念这样无情地撕裂了，奇怪现象也随之发生：据说崇尚“专制”的东方，遇事反而总想跟人讲清讲透道理，通过以理服人获得“Right”；而据说崇尚“自由、平等、公正”的西方以及全力“脱亚入欧”的日本，则动辄

使用武力，习惯用“Power”夺取权益。结果是相信“有理走遍天下”的，凭借自身道理实在无法走出多远；崇尚力量征服的，反而横冲直撞畅行天下。如马汉所说：海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世界。

我们相信，我们终将迎来一个公正、平等、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世界。但在理想世界到来之前，我们仍然必须生活在这个不甚理想、由力量决定规则而不是由公正决定规则的现实世界中。一部近现代史一再证明，国家遭遇割地赔款甚至亡国亡种，并非仅仅因为战争的失败，本质上在战争尚未发生之时，在确定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手段以及决定主要依赖何种手段的抉择中，结局就已经大定。

结论很简单：在国际关系中，权利只有在争取和捍卫时才会得到彰显。只有公理没有力量，并不能战胜强权。

钓鱼岛成为中国人完成以上认识的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再次认识自身，再次认识世界。它已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审视自己利益、权衡自己利益，决定捍卫还是放弃这一利益的基本考验。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就是随着现实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一点点扩展开来的，从自然海洋走向权益海洋，最终才能是和谐海洋。没有这些问题发生，不遭遇这些挑战，我们对世界以及对自身的认识，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深刻。

中国所说的国家只是一个词，包含“国”和“家”两层意思。“没有国、哪有家”的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西方所说的国家，则有三个词相对照，且包含三层含义：Country 特指“土地”，Nation 特指“人民”，State 特指“政权”。

如果按照西方观念来阐释，那么此刻说到 Country，我脑中会浮现出钓鱼岛；说到 Nation，我脑中会浮现张惠荣、孙书贤、郁志荣；说到 State，我会记起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这就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

大挫折造就大变革

什么叫创新思维？一般定义告诉我们：创新思维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打破常规，寻求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

那么再问一句：什么叫军事创新思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上述定义稍作改动：军事创新思维是人们探索军事未知领域过程中打破常规，寻求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

这一定义强调了创新思维的探索性，它要打破常规寻求新成果；也强调了创新思维的自主性，它是人的思维活动，通过这一活动获得发展。但为什么忽略了创新思维，尤其是军事创新思维中往往包含的那种不言而喻的被动性呢？

美国防务分析专家约翰·派克说：“有些军队进行改革，是因为他们打了败仗，或是赢得很困难。如果能够轻松获胜，他们是不会进行变革的。”派克先生不要说别人，美军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皆大获全胜，陆军从一战前的8万人膨胀到二战后的80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这个时候，美国也承认，他们不过是从英国人那里学会了步兵作战，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机械化作战，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两栖作战，走了一条“模仿+经济技术基础+适用”的军事发展道路，真正带有独创性的属于自己的像样成果，实在少得可怜。

最终迫使美国人形成自己东西的，是越南战争。1969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的一段话，说出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刻骨铭心：“我们进行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政治仗。我们追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我们的对手则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

从1961年至1975年，14年焦头烂额的越战和前所未有的失败，迫使美军这支从来一帆风顺的军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詹姆斯·邓尼根和雷蒙德·马塞多尼亚在《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中说，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根源于二十多年前的越南战争，越战经历后，职业化军队和C3I系统（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一体化），使美军同过去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其实他们说还不够，越战后的美军不仅利用了高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网络技术，加上美军战法的改革，使军队信息化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而且还对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了彻底改造。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越南战

场的战役战术胜利堆积为战略失败这一现象，归结于“败在传真照片上”和“败在电视屏幕上”。此后美军严格的军事新闻管制和充分利用媒体“作秀”这一新特点，已经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再得到证明。形成不仅要用我的技术压倒你的技术，还要用我的声音淹没你的声音。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信息化作战开始成为美军一杆独特的旗帜，最终使其能够在世界军事中独树一帜。

别人是如此，我们难道不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被逼到墙角后，才表现出了极大的创新能力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决定开展武装反抗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激动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要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但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尚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毛泽东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是神的预见，而是黑暗中面对失败深刻思索的结果。

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面对优势敌兵的多路围攻，朱毛红军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颠覆了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败标准。

在此之前，从中国的孙子到德国的克劳塞维兹、从法国的拿破仑到美国的马汉、从瑞士的约米尼到俄国的苏沃罗夫，没有任何一个军事泰斗提出过这样的战争标准。所以今天执掌新军事变革龙头的美国人，念念不忘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创新往往源于挫折，大挫折往往造就大变革的原因。

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之所以常常借助危机的推动，就因为危机对惰性与麻木的冲击、对自我感觉甚佳的震撼、对创造潜能的强力调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思维特别是军事创新思维，往往呈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性质。

六、和平之履

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

“中国威胁论”——谎言也在编历史

“中国威胁论”是哪一年产生的？似乎鼓吹这一理论的那些人也不太说得清楚。有人说是因近年来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武器采购、研发先进装备产生的，于是“中国军力威胁”“中国导弹威胁”“中国海军威胁”“中国太空威胁”“中国潜艇威胁”“中国激光威胁”“中国军事不透明威胁”等便大行其道。

“中国威胁论”并非根源于近期中国军力的发展，在更早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当时主要不像今天这样围绕中国军队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大做文章，因为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实在太低、武器装备实在落后，实在无法就此做文章，于是意识形态就成为做文章的主要题目了。“红色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威胁”：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向印支半岛的“扩张”。整个东亚、东南亚到处都是行将倒塌的“多米诺骨牌”，需要美国大兵不远万里来亚洲到处“防堵”，而且说“防不胜防”。

其实这也不算资格最老的“中国威胁论”。在新中国成立的久远之前，19世纪后半期“中国威胁论”就出现了。当时美国掀起“排华浪潮”，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对美国主流文化形成“威胁”者，美国政府于1882年、1884年先后通过《排华法案》。那个时刻正是中国日益衰落的时刻。衰落的中国依然对别人构成巨大“威胁”，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怪事：怎样解释你不是人家的“威胁”呢？

查看“中国威胁论”这部粗糙的历史就能基本明白：这不是语言所能够说清的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事情。看看今日世界，美国全球

驻军，美国航空母舰全世界游弋，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太空中的美国卫星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卫星总和还多，美国海军宣布要控制16条海上战略通道，大西洋7条、地中海2条、印度洋2条、太平洋5条，囊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海峡和水道。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行动不算，能够被称为“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在追查任何涉案组织或国家时，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国家边界、什么国际法规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不在美国眼里。

2003年伊拉克战争得手后，这位据说“身体奇好、精神状态奇佳”的美国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提出“10—30—30”的作战构想，即一旦美国决定在全球某个地区动武，美军必须能够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30天内摧毁敌军，第二个30天再完成重组、做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个任务的能力。此设想一出，全球舆论哗然。依照此设想，美军必须在70天内打完一场仗并且完成投入下一场战争的全部准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野心和胃口，无怪乎欧洲舆论惊呼“美国要准备一年进行5场战争”！

即使如此，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新闻传媒，或是政治人物也不见有人站出来，大声诉说“美国威胁论”。似乎游弋在全世界的美国航母编队、遍布全世界的美军基地、能够把地球毁灭数遍的美国核武库、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持枪荷弹的美国大兵，都不如标记“Made in China”的鞋子、衬衫、毛巾、玩具等日常用品和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对世界和平带来得威胁大。

这叫什么逻辑？

有的逻辑更加荒谬。

2007年2月，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名古屋演讲时，竟然将“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演绎为“日本沦陷论”。这位如此富有创造性的前小泉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对听众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中国）就有可能‘非和平崛起’；要是把台湾列入其势力范围内，则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今后15年，倘若保不住台湾（意指中国完成统一），20年以内，恐怕就轮到日本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道理来回应这些近似梦呓的奇谈怪论？在日本方面倾其全力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像扫盲一样告诉中川昭一这样的日本政客，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独立权、领土管辖权、平等权和自卫权，既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又是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人民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尊严的追求，是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所有国家的基本追求。任何主权国家的这一基本追求，若遭受到任何方面以任何借口的任何干涉、任何破坏与任何阻碍，都是对该国利益的最大侵害和对该国人民感情的最大冒犯。

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不难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力的回应：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和海洋边界线，保持国防力量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的统一无可厚非；日本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军费开支却比中国多得多。秦刚说：“一个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都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却维持着如此庞大的军费，还在不断地叫嚷中国的威胁，那么它的目的，请问，真实的目的何在？大家不觉得奇怪吗！”“日方老是说，中国要增加透明度。我们也请日方增加透明度，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日方能否解释一下他的一系列的军事动向，包括将中国的台湾纳入他周边的法案，他的真实目的何在？”

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还用我们说吗？就像中国那句老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反复遭受列强入侵，不但多次被迫割地赔款，各个地区也被划成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家安全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建立保卫自己利益的力量和意志，迎来的绝对不是安全时刻，而是屠宰时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句话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百年心声。中国独立自主了，中国快速发展了，中国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中国决心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适应、与安全威胁相对应的武装力量了，就成“中国威胁”了吗？

2005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联手指责中国，拉姆斯菲尔德的质疑成为媒体最常引用的话：“既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造成威胁，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购买军

备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究竟想干什么？”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如此健忘，仅仅三个多月前，他们还在一起搞“美日2+2会议”，宣布以台湾海峡安全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这就没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形成威胁吗？如果哪两个国家以美国佛罗里达海峡安全为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美国能不感受到威胁吗？不用说美国至今对台售武，这难道不是国际关系中极其荒谬的事情：既宣布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在向对方某一地区出售武器，助长该地区的分裂倾向，还说是为了“军事平衡”，那么它是否也能够容忍别的国家到其内部去搞这样的“军事平衡”？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威胁论”。按照这种逻辑，你就是一只和平鸽，在别人眼里仍然也是威胁。

但我们仍然必须对别人说清楚，甚至需要非常耐心地说清楚。不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发起者——那些人头脑中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道理能够说服的，而是针对旁观者和旁听者。毕竟世界舆论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毕竟谎言重复若干遍也有可能变成“真理”，毕竟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哪怕现存的秩序有多么不合理。面对今日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主动，尤其当别人向我们身上泼污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话语权。这种时刻的沉默以对，不能称为韬光养晦。我们有发言的权力。我们有威胁的现状。我们有和平的传统。我们有和谐的追求。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威胁别人。我们中国人也从来不怕别人的威胁。

更加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努力阐述真相，世界对真相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2006年，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出笼后，在美方也遭到质疑。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用了“夸张”这个词来形容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霍华德·弗伦奇写文章称：美国正在犯“历史性错误”。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卡彭特说得更加直白：“我们的军事预算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都是过度的，不论是为了应付中国成为长期威胁，还是为了反恐战争”，“任何同反恐没有关系的安全开支，都把中国当作花费的借口了”，“就因为中国在二三十年后可能成为美国的安全挑战，我们现在每年就要花上5000亿美元搞国防，实在说不过去”。

不仅“中国军事威胁论”遇到反对声浪，其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不少人反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博特利尔、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师罗奇、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拉迪、卡托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伊肯森等有影响的经济学者都在各种场合批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欧洲，德国《每日镜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发展不应令西方担忧；意大利《新闻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已令整个世界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西方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作用。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指出，不能再用“善恶二元论”来看待中国，而应寻求共同的成功。

这些声音无论是来自利益，还是来自良知，都被我们欢迎，因为有助于澄清被扭曲的事实。我们也明白，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的论调也许很难，也许我们长期不得不在这种论调的伴随中发展和成长。但绝对不能让它的存在干扰了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影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就是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应有的气度和格局。

安提西尼的丛林法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名叫安提西尼（公元前435—前370年）。与其他哲学家颇为不同的是，安提西尼表露与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很少用那些枯燥乏味的术语和高深莫测的概念，而是大量运用生动形象的动物寓言故事。

其中一则寓言故事如下：

某日，森林中百兽聚会，小白兔率先提议：森林中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白兔的提议立即得到了松鼠、梅花鹿和山羊的响应与赞成。正当小动物们为之欢欣鼓舞之时，狮子突然站出来大喝一声：“那么你们的利爪在哪里？”周围顿时一片哑然，于是森林中依然以狮子为王，所有动物仍然无法一律平等。

安提西尼的这则寓言，被西方称为最早提出的丛林法则。

时至今日，两千多年过去了，丛林法则已经淹没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进程中了吗？情况似乎并非如此。“9·11”事件发生后，英国高级外交官罗伯特·库帕在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编写的《重组世界秩序——“9·11”事件的长远影响》中开诚布公、明确无误地说：“在我们中间，我们按法律办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行事时，我们也应该运用丛林里的法则。”库帕所谓的“丛林”，即“后现代欧洲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他认为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回到前一个时代所使用的较严厉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

欺骗乃至任何一种必要手段”。

今日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在通行无阻。

库帕算不上是大吼一声的狮子，在英国政客中，他还算个温和派。即使库帕不是温和派，大不列颠也无法重振往昔“日不落帝国”的雄风了。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衰落不等于一种规则的衰落。规则之所以能够比国运长久，因为它存在传承。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高峰时期，路透社记者的一句俏皮话道出了经久不衰的丛林法则的崭新承传：“英国雄狮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

看看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作战地域吧：从海地到波黑，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从巴拿马到科索沃，从1991年的科威特到2003年的伊拉克……不但军事行动遍及全球，而且越到后来越是谁说都不听，谁劝都不行，说打就一定要打。至于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需不需要联合国批准等等，早已不在话下，只遵循美国政界那句名言：“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武力，对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这还不是美式皮鞭对世界的抽打吗？发生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发生在费卢杰清真寺的枪杀战俘事件，还需要什么苍白的、言不及义的解释，它们不都是21世纪丛林法则的体现吗？

曾两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曾推动一种被称为“10—30—30”的军事转型，即做出动武决定后，美军要在10天内完成战斗准备并且向预定地区进发，用30天时间击败敌人，并使其在可预见的将来无力恢复有组织的反击，然后再以30天时间调整部署，为全球任何地区新一轮战斗任务做好准备。根据这种用70天打一场仗的“转型”设想，美军一年可以打五场仗。这到底叫全球反恐合适呢，还是叫全球称霸合适呢？单边主义也好，先发制人也好，“10—30—30”构想也好，不但将其进攻性表现得日益露骨，推行实力政策的立场也更加鲜明。一句话：更加“丛林”。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尊严来自实力，安全来自实力，和平也来自实力。冲突与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和平与发展同样是实力的较量。如果没有实力，不但无法控制冲突，而且还会丢掉和平。

两千多年前安提西尼描述的世界无人喜欢。无人喜欢不表明它真的不存在。

邓小平同志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他同时还说过，这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还很不太平。江泽民同志说过，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努力增强国防实力，

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一旦战争发生，往往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就要受到极大损害。在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

三代领导人的话揭示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你可能不喜欢它，但是首先你必须适应它，然后才有可能改造它。因自强而走向世界、因自信而融入世界的中国，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反战的心态与迎战的实力

1945 年 5 月 9 日 0 时 16 分，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苏军大本营代表在柏林近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个时刻终于结束。

那是德国卡尔斯霍斯特一个漆黑的深夜。世界就是这样从暗夜中挣脱出来，走向黎明的。

这个黑夜之前的 5 年零 8 个月零 8 天——1939 年 9 月 1 日的那个黎明，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战斗发起在清晨 4 时 45 分。当巨大的爆炸声把波兰士兵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世界也就从这个黎明开始，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深渊。

英国著名军事家富勒在其名著《西方世界军事史》的开篇中说：“战争是否为人类进化中所必需的因素，虽然还有辩论余地，但是下述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支配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会完全没有战争；很少有一代人以上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虽然历史书籍早在说明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战争，但那些习惯于将人类文明史和战争史连在一起写的先哲，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预见 20 世纪人类将战争的广度和烈度推向了一个怎样的极致、这种走向极致的战争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怎样的灾祸和苦难。

始于 1914 年 7 月 28 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 4 年零 3 个月，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亿人卷入其中。战争行动从欧洲波及亚洲、非洲及大西洋、地

中海、太平洋等广大海域，2000 余万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之大、毁伤之烈、损失之重，足令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参战国家和地区多达 61 个，17 亿人卷入战争旋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80% 以上。战火燃遍欧亚非三大洲及四大洋，战争持续 6 年，5700 万 ~6000 万人死亡。

从远古石器时代以简陋的石器作为武器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广岛和长崎腾起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蘑菇烟云，战争工具和战争手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进。中国近代大思想家章太炎说：“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魑魍之逐影。”从人类所有技术进步无不应用于战争这一点看，章太炎所言的确切中要害。

与战争工具和手段直线跃升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巨大的马鞍形变化。西方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说：“历来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实力分布之间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战争，或者具体地说，是霸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霸权争夺的典型争斗。但当战争开始后，交战双方民众具有同样心理：柏林和巴黎街头都是彻夜排队争上前线的市民，以及在凯歌声中夹道欢送军队开进的人群，战争被普遍描绘为“伟大的战争”和“最后的战争”。把战争当美梦的人们，最终被战争的灾难所震醒。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欧洲民众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但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和进逼面前，从政府到民众都选择了步步退让。巴黎和伦敦都有彻夜跪在教堂里的民众，祈祷上帝能够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从来不坐飞机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专门坐飞机去德国与希特勒签订协定，然后在世人面前举起记录《慕尼黑协定》的那几张白纸，高声宣布说他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世界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

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以空前残酷的方法，给人们以很多和平年代永远领悟不到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最深刻的启示之一，就是在战争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面前，仅仅具有反战的心态是远远不够的。当战争不可避免地被强加到头上时，还必须具有迎战的决心和实力。

2005 年 5 月 9 日，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60 周年庆典。这是所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中最为盛大的庆典。当年斯大林在德国法西斯包围中仍然于红场阅兵，受阅部队直接从检阅场开赴前线的豪壮气概，至今令后人激

动不已。当那些白发苍苍、胸前缀满勋章的战斗英雄和英姿勃勃、掌握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后继者通过红场时，除了满目彩旗和雪片般的贺词，同样不应忘记那些虽然与节日气氛不相符，但却值得永远记取的沉重教训。

当年大战即将爆发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主要领导者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为大国之间的战争还会像一战那样逐步展开，忽视了德军已经在西欧战场展现的那些战略战术变化，对新的战争节奏和新的作战方式毫无思想准备，成为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以为苏军兵力雄厚，装备齐全，战略纵深广大，希特勒尚需相当一段时间消化在欧洲夺占的成果，不至于立即东侵。这两条因素再加上第三条：苏军刚刚完成内部清理，很多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被清出军队，大量指挥岗位上经验缺乏的新手。

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苏军在战争初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德军在短时间内从西北、西部和西南三个方向向苏联境内纵深长驱直入600~1000公里，包围列宁格勒，占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兵临莫斯科城下。其中包含的深刻教训，不是后来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库尔斯克大会战甚至攻克柏林战役这些辉煌战绩就可以掩盖的。战争从来都是铁面法官，从来要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做出最为严酷的检验。总结其中的经验、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也决不能仅仅通过授勋、表彰就能够大功告成。该怎样真正地、深刻地记取那场战争的教训，今天仍然有待于艰苦的努力。

在这方面，以色列民族回顾二战的方式值得注意。2005年3月15日，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在耶路撒冷落成。典礼专门放在太阳落山后开始。在如泣如诉的音乐声中，以色列总统冈察夫说，为了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欧洲必须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德国外长费舍尔说：“这是一个为遭到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人纪念的时刻。德国是我的祖国，不忘记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道德上的责任，是我们国家应该为大屠杀所负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世界的经历，“今天我们纪念那些死去的人……是为了让他们的命运被写进历史，永远不被忘记，也是为了保证这种恐怖的事件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演”。

这种将灾难作为思想财富的思维方式，也许正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

对欧洲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战争在1937年7月7日已经开始，这一天甚至可以再向前延伸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参战最早、蒙受牺牲最烈。由于中国宁死不屈，苦苦坚持，使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深陷泥潭，为全世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波兰的奥斯维辛、俄罗斯的斯大林格勒、美国的珍珠港、法国的诺曼地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地，前往参观的人流常年络绎不绝。

2004年5月，美国又专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了一个“二战纪念园”，以4000颗金星铭刻在园内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代表二战中牺牲的40万美国人。作为世界最先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也要永远记住我们在最艰苦条件下开展顽强抗击的战争纪念地：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狼牙山……牢牢记住这些地方，把它们刻在心里，才能使我们真正感悟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辉煌的经历。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周围，有人公开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公开修改历史教科书、公开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面对这样的举动，你能说当年那场战争的任务都已完成了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有一个巨幅标语：永远不要战争。怎样才能永远不要战争？并非没有很好的范例。2005年5月10日，德国在柏林市隆重举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揭幕仪式。此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就说过：“修建这座纪念碑并不只是为犹太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德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引以为戒”。

当这些德国人真正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理解为解放、真正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美好未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挣脱了历史枷锁的羁绊。而想通过让别人忘掉那段历史，或自己修改那段历史的人，不但无法挣脱，反而在加重这种羁绊。

永远不要战争的前提，是永远保持记忆，永远保持警惕。

运河回归：没有帝国日不落

运河情结之一

1999年12月14日，对美国来说肯定是一个十分暗淡的日子。这一天，在巴拿马城附近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举行交接仪式，完成了巴拿马运河回归的

最终手续。

巴拿马政府有意把移交仪式营造成一次历史性大事，邀请多国政要参加。但请来的只有西班牙国王、墨西哥总统、哥斯达黎加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维亚总统和厄瓜多尔总统，西方七国集团的首脑一个未到。与巴拿马总统米蕾娅·莫斯科索完成交接仪式的美国代表，既不是总统克林顿，也不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只是前总统卡特。

卡特于1977年与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政府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即《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废除美巴1903年条约，规定美军将于1999年12月31日全部撤离。届时收回运河全部管辖权的巴拿马人，将以国土主人的资格处理有关运河的一切事宜。条约一签，立刻在美国内激起一片反对。卡特的继任者里根总统就说过，巴拿马运河同阿拉斯加、路易斯安娜州一样，美国是付了款的，应归美国所有。此后美国一直想修改《托里霍斯-卡特条约》，以便在2000年后可以继续霸占运河，但终未得手。

条约规定的这一刻现在即将到来，它是巴拿马人的历史盛典，却是美国人刻意回避之处。克林顿早就声明不会前往。原定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奥尔布赖特在最后一刻也借故推辞。最后仍然是白发苍苍、18年前就已卸任总统的卡特充当代表，大有谁做的事谁收摊、谁也不愿去陪绑的意味。就在卡特出席仿佛只是巴拿马人的大事的庆典仪式上，美国控制的传媒宁可继续使用大篇幅报道车臣的战况，报道千年虫影响，报道拘捕美籍华人李文和，也不情愿为巴拿马运河多费一点笔墨。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运河情结的第一类反应。

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中之甘酸苦辣，也许连美国人自己也表述不清楚。

西奥多·罗斯福：创造一个国家的同时攫取一条运河

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推出20位对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人物，名列榜首的是1901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而罗斯福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条巴拿马运河。美国作为一个扩张性的世界帝国，其发端即从此开始。

最早感悟巴拿马重要的是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助手巴尔博亚。1513年，巴尔博亚从大西洋西岸登上这块土地，站在山头上竟然望见了太平洋。他惊讶

不已，回国后立即禀告国王。后来经过测量，巴拿马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陆地最窄处只有70公里。西班牙国王立即命人研究开凿一条人工运河的可能性，结论是困难重重，只好放手。

一放就是300多年。

1826年，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代表会议上，建议美洲各国通力开凿巴拿马运河，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

由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助手开始的这场巴拿马运河梦想，几乎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变成现实。圣西门的这名学生名叫雷赛布，因凿通苏伊士运河已经举世闻名。1880年他来到巴拿马开办“运河公司”，雄心勃勃地组织勘探、测量、施工。

雷赛布不仅吃亏在所面对的丛林密布的地形和肆虐的热带疾病，更吃亏在他忘记了苏伊士运河是海平面运河，而巴拿马运河的最高水位为海拔26.52米，让一条重载的船只通过，决非易事。从这一点看，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难度远远超过苏伊士运河。他白白花费了10年时间和3亿美元的巨资，只开凿了不到计划长度的四分之一就被迫停工。

最后出场的是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43岁执掌总统职权，60年代约翰·肯尼迪44岁上台，90年代比尔·克林顿46岁当选，都没有打破西奥多·罗斯福的纪录。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又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扩张性的总统。他18岁考入哈佛大学，在大学高年级完成的第一部著作就是《1812年的海战》。美国军事家马汉的大作《海上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他影响极大，他认为海上力量是国家政策的基石。

这是一个帝国意识极强、关注国际政治甚于国内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军事冒险，相信弱肉强食。他在上台以前，已经为这条运河想了几十年。西班牙国王开凿运河是寻找运送黄金的近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凿运河是想完成连接世界海洋的伟业，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人则有极其现实的考虑。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海路遥远。如果巴拿马运河开通，这条航线将比绕行南美麦哲伦海峡要近13000公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不但可以方便地沟通美国东西海岸，而且它将成为掌握整个美洲的一把钥匙，进而成为美国把握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枢纽的钥匙，拥有这条运河的美国必能成为海上的巨无霸。这就是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巨大的吸引力所在，其动力远非麦哲伦的弟子或圣西门的弟子所能比。

罗斯福上台后，立即启动法国人撤出后停工以已久的巴拿马运河计划。当时巴拿马属于哥伦比亚领土，哥伦比亚议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开凿条件。罗斯福狂怒已极，立即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宣告成立，罗斯福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并派出美国军舰阻止哥伦比亚入侵。11月18日，美巴两国政府签署运河开凿条约。美国不但拿到了运河的单独开凿权，还获得一项特权：运河两侧各8公里区域为美国永久租用。

一切都在令人目不暇接的高速度中完成。从11月3日巴拿马“独立”到11月18日美巴缔结运河条约，西奥多·罗斯福戏剧般地用两周时间，在创造一个国家的同时攫取一条运河，或通过创造一个国家攫取一条运河，让全世界领教了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滋味。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个从来笃信弱肉强食、每一个毛孔都充满扩张气息的西奥多·罗斯福，竟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调解了与美国毫无干系的日俄战争。发明硝化甘油烈性炸药的诺贝尔老先生若在天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

剩下的便是一连串巧合，也许又不是巧合，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8月通航，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20年，运河正式启用时，美国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英国占据头号强国的位置了。

今天美国自己编写的历史也承认，西奥多·罗斯福是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性帝国的奠基者。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人连续夺取两次世界大战胜利、最终成就世界霸权的起点。

世纪水道的世纪回归：没有帝国日不落

巴拿马运河除了象征，更多的是实质性利益。1977年巴拿马政府曾经有过一个统计，自从运河通航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高达450亿美元，而巴拿马仅得到11亿美元。1986年统计，每年约有15000艘船只通过运河，年平均总吨位为15000万吨，其中60%以上来往于美国。美国每年从运河得到的好处超过9亿美元。

利益巨大，每年却只付给巴拿马政府25万美元的利息。后来支出与收入的悬殊连美国人都不好意思了，利息便由1914年的25万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43万美元、1955年的193万美元，再往后挤牙膏一般挤到230万美元，直

到 1977 年签署《托里霍斯 - 卡特条约》，才将这笔钱上升到 1000 万美元。但所有增加与美国人从运河获得的收益相比，皆不过是九牛一毛。巴拿马运河在成为美国经营海运业务摇钱树的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海上运输的生命线。

1986 年美国曾经宣布，它必须控制 16 个海上咽喉通道，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这 16 个咽喉通道的分布是：西太平洋地区 4 个，排首位的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中东地区 4 个，排首位的是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欧洲地区 4 个，排首位的是沟通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美洲地区 4 个，排首位的是被美国视为“国防和经济的生命线”的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不单是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军事的生命线，对美国来说并不为过。越南战争开始进入高峰的 1965 年，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美国军用船只就多达 21 000 艘。不单极大地方便了大西洋舰队与太平洋舰队之间的调动，而且仅通行优惠就为美军节约军费达 15 亿美元，成为美国掌控西半球地缘政治的战略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美军基地密布，军事区就占到运河区面积的 70%。这里先后开办过美洲陆军学校、泛美航空学校、海军训练和技术学校、地理测绘学校和丛林作战学校等 5 所美军军校。拉丁美洲国家的许多军事将领都曾在美军的运河区军校受训。单是一所美洲陆军学校，就为 22 个拉美国家培训了 44 000 名军官。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南美家喻户晓，如阿根廷的比奥拉，玻利维亚的班塞尔，智利的皮诺切特，厄瓜多尔的罗德里格斯，洪都拉斯的波利卡波，巴拿马的托里霍斯，秘鲁的贝拉斯科，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等。这里不但是美军官兵接受丛林作战的专门训练场地，也是美国培植于己于利的势力的场地。所以美国长期将它五大战略司令部之一的“南方总部”设在巴拿马运河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英国路透社一名记者在 60 年代末越南战争高峰期曾说过一句俏皮话：英国雄狮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

那位英国记者明白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的日落。现在虽然没有人说美国日落，但十分敏感、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巴拿马运河回归的美国人，却从这条世纪水道的世纪命运中，隐隐感觉到这条道理：没有帝国日不落。

运河情结之二

从一条运河里攫取了太多的利益，在一条运河上建立了太多的梦想，一旦要失去它，痛苦与焦灼也可想而知。

痛苦和焦灼在产生神经过敏。听说中国香港的和记黄浦有限公司通过竞标赢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管理权，美国朝野一些好事者立刻哗然。这些人情绪激动，说香港和记黄浦有限公司经营港口将危及美国安全，说中国势力在进入类同巴拿马运河这样一些最敏感的地区，硬是要从一桩普通的商业活动中透视出复杂深刻的政治背景来。

这是美国人运河情结的第二类反应。前一类可以对现实的运河世纪回归佯作不知，后一类则对想象中的任何力量介入都勃然大怒。

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已经向新闻界做出解释，他属下的和记黄浦集团仅在进行一项集装箱业务的投资，与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不相干；和黄集团只是在巴拿马经营集装箱业务的公司之一，同一些美国和中国台湾公司相比，它甚至也不是最大的集装箱经营公司。李嘉诚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美国人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事情闹到如此不像样的地步，克林顿也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针对国会一些政客的鼓噪，11月30日，他在白宫举行的吹风会上说，香港和记黄浦有限公司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克林顿说，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区想要展示给世人的是它在有效、公正地进行管理，“我认为，他们想向世界显示，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伙伴”。

巴拿马运河在整个20世纪都是大国政治的象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它已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象征。

柏林墙的尴尬

柏林墙的不可承受之重

为了便于让人们记住纷繁复杂的历史，一些事物或事件被精心挑选出来，摆放在那里，作为划分阶段的里程碑。柏林墙就是如此：它成为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象征，成为德意志民族分裂的象征，它的兴建与坍塌甚至被描述成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与这种对抗终结的象征……这段墙被反复赋予了太多原本不该属于它的意义。

从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年算起，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西方意义上的冷战持续了46年，而柏林墙只存在了28年。1961年8月动工兴建的时候，

冷战已经进行了16年，1989年11月它坍塌的时候，离苏联解体还有两年。以它作为冷战的象征，仅从时间上看也十分勉强。

柏林墙更不该对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负责。对德国的分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美、苏、英、法四大国的共同决定，四个大国应该共同负责。是大国在随意肢解一个无辜的国家么？事实又并非如此。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不但使欧洲成为一片焦土，而且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分割德国受到多数国家的拥护。这些事实虽然不是柏林墙的全部基础，但是也构成其基础中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因它是埋在土层之下的墙基，就不承认它的存在，那是重得我们绝对搬不动的历史。就如今天我们非常同情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居民，也不能忘记真正给他们带来浩劫的不光是美国的原子弹，更是他们本国疯狂到极致的军国主义。

至于柏林墙是否是两个阵营对抗的象征，事实就更加简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在1917年，早于柏林墙44年。从那个时候起，对社会主义的围堵就已开始。迄今这座墙垮掉24年了，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焕发出令全世界瞩目的生命力。

这样说只是在陈述几件并不复杂的事实，并没有小看这段106公里长的混凝土墙在国际政治史中蕴含的重大意义。只有把不该它承担的东西讲清楚，该它承担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显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柏林墙的倒塌引起了怎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战争，而且是自越战结束后规模空前的海湾战争。

萨达姆的失算

波斯湾与柏林墙相距甚远，各自的象征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把它们强行联系起来的先后有两个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萨达姆不是最先意识到柏林墙倒塌后出现巨大权力真空的人，却是最先利用这一真空人。当时两德忙于合并，美苏忙于重新界定欧洲的政治边界和秩序，国际社会忙于谈论冷战消除后世界的持久和平，人们并未意识到进入了一个失衡的世界，和失去平衡可能带来的机会和危险。

萨达姆第一个意识到了，并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把向他提供军备和训练、签定有友好条约的苏联视为实现扩张的羁绊，柏林墙的倒塌则成为羁绊的明显解脱。他觉得再不需跟谁打招呼了，出动大军一日之内吞并科威特，让包

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目瞪口呆于这个既成事实。

被柏林墙压抑的梦想，第一个被萨达姆挣脱为现实。当他把“伊科合并”比作两德合并时，人们都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便没有去认真思索这两个相距遥远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事实证明，失衡世界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萨姆这样的冒险者，而是在柏林墙西面小心翼翼蹲了几十年的美国。

没有柏林墙的倒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不可能调动全球力量。首先是冷战期间部署在欧洲的精锐力量，半年内全面封锁，38 天空中空袭，100 小时地面战斗，以泰山压顶之势将伊拉克压垮。美第七集团军原本的主要对手是柏林墙东面的华约部队，大墙不倒，它根本不可能从德国一路南下，又是火车又是轮船地急调到海湾地区，围歼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

仅从这一点看萨达姆也大大失算了。他首先发难，想成为那座墙倒塌之后的最先受益者，结果却首先受难，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先受害者。

倒塌后的残垣碎片

如果说柏林墙坍塌后的失衡世界仅仅产生了海湾战争，那么它必定带有某种偶然性。失衡的世界难免使个别领导人物想入非非，清醒过来便又是平安。这种想法很好，却又被波黑战争击得粉碎。

波黑战争源于南斯拉夫的分裂。南斯拉夫分裂则源于柏林墙的倒塌。

说南联盟因民族问题而解体的人们应该看到，冷战时期这些问题全部存在。当时维持南斯拉夫对西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上将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离经叛道”的样板，军事上将它作为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缓冲”。因此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南联盟所有的民族问题都不是问题。

那堵墙塌掉之后，原先不是问题的都成为问题了，更何况原先就存在的问题。

最先分裂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最先提供支持的是柏林墙倒塌后重新统一的德国。当时海湾战争刚刚打完，厄运由海湾转到了巴尔干。随后一发不可收拾：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相继宣布独立，波黑共和国随即陷入了内战。俄罗斯支持波黑塞族，德国则把克罗地亚族视为自己的盟友。英、法希望通过支持穆族来抗衡德国在巴尔干的影响，美国则挟海湾大胜之余威，或支持穆族压德国，或支持克族压英法，或支持穆、克压俄罗斯。没有大墙隔离的大国势力在波黑纵横捭阖，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利益插手内战，重划版

图。这就是为什么波黑战争久拖不决，成为二战结束后欧洲规模最大、最残酷战争的根源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分裂并未到此为止。共和国分裂差不多了又开始分裂自治省，科索沃战争成为对它最重的一击。参加空袭的北约成员，皆是柏林墙倒塌前给它提供物资、提供外汇、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并帮它掩饰种种问题的国家。那堵墙倒了，它们便抓住问题摊开最后通牒，然后接着的就是精确制导炸弹。

南斯拉夫的命运比伊拉克更加严峻。后者发动入侵，是墙倒后对失衡世界的试探和冒险；前者分崩离析，则是墙倒后成了一张可以随手抛弃的旧牌。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兴奋地高举《慕尼黑协定》，宣布说缔造了一代人的和平。一年之后希特勒的铁蹄踏遍欧洲。1989年，也有很多人站在柏林墙的废墟上，宣布人类将进入真正持久的和平。同样也是一年时间，大家又再次跌进战争。不论是打了42天的海湾战争、打了3年零8个月的波黑战争、还是打了79天的科索沃战争，都遍布了那座倒塌的墙壁的残垣碎片。

重建柏林墙？

也许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柏林墙倒塌引发的战火已经硝烟散尽。激烈进行中的车臣战争，仍然可见那座大墙倒塌的余烬。但更大的冲突也许将暂时消停一段时间，因为北约已经向东推进700公里，达到了俄罗斯的大门口。过快的进展使得很多东西来不及咀嚼就吞了下去，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消化。这会成为暂时平安的基础。

1989年圣诞节，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苏联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齐集柏林大音乐厅，同台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表示柏林墙倒塌后新的和谐。美国著名音乐家伯恩斯坦亲临指挥。当合唱队开始高唱《欢乐颂》时，群情激动，许多人跟着唱起来，很多人对这个场面长久不忘。

只从这个场面去找和谐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事情的另一面：柏林墙倒塌后苏联很快解体，美国的战略对手没有了，它却一天也没有放松发展军备。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6个国家军费开支总和的1.6倍。美国军队使用的装备，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不论技术性能还是战术性能，不论杀伤威力还是打击精确性，皆远远甩下了对手，也远远甩下了盟友。但它的军费开支仍然年年递增。科索沃战争开打时美国国会尤其大方，批准的国防预算甚至比克林顿提交的数字还多出了83亿美元，达到2889亿美

元。要说是军备竞赛，连竞赛的对手都没有了，它又是在跟谁赛呢？

世纪之交，美国哈佛大学防务代表团访华。有人问：失去了对手的美国为何仍在大力扩充军备？代表团成员、前驻欧裁军大使布兰克威尔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美国在寻求一种自己也不能准确描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己方以极小的代价，给敌方造成巨大伤害。至于该力量如何使用，在什么前提下使用，他也只能耸耸肩膀说声不知道，也许未来的美国总统也不知道。

可以听出来，它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竞赛。在它的眼里，似乎始终存在着那道钢筋混凝土和铁丝网组成的柏林墙。那道真实的墙不在了，它就竭力要造一个虚拟的墙。差别仅仅在于第一个建墙者是苏联，第二个建墙者是美国。

我们可以通过倒计时看看虚拟柏林墙的建造者。

真实的柏林墙倒塌 10 年后，美国采取了两个显著的动作。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科姆所说，如果美国最终不能说服俄罗斯同意修改 1972 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考虑退出该条约。

另一个是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参议院第一次拒绝接受一项军控条约。

这两项条约本是柏林墙存在期间为求缓和达成的重大成果，是使世界免除核战争灾难的里程碑式进展。现在柏林墙不在了，美国说它们也将成为废纸。它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说要防备想象中的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国导弹的攻击；它要重新进行核试验，进一步提高自己核武库的质量，否则别人核武库的质量就会与美国接近。在说出并坚持这些理由的时候，它甚至不顾最亲密盟友英国的反对。

与柏林墙存在的时候比起来，美国现在口气硬多了，而且不容商量。

从理论上说，柏林墙的倒塌本应使军备控制进展更为顺利，未料到它反而到了危机的边缘。如果作为军控基石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被突破，军备竞赛势必重新开始，世界稳定的前提就将不复存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宣称自己充满责任心的美国，现在竟然是一副万事与它无关的态度。

1999 年 5 月 25 日，美国众议院抛出了一份《考克斯报告》，无中生有地说中国盗取美国核武器设计，用于改善自身的武器系统。报告中的水分连美国人都知道，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事实，而是一次敌视中国的舆论动员。所采用的，仍然是标准的柏林墙时期的手法。这种人为渲染到处是“中国间谍”的气氛，不能不让人们联想到了冷战时期那个声名狼藉的“麦卡锡时

代”。

20 世纪不知修建了多少高墙，柏林墙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一道。1989 年 11 月当它倒塌时，不少人手持小锤和凿子，想敲下几块墙皮留作纪念。但这座墙的坚硬程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于是墙脚下有人开始摆摊出租重锤和钢凿，有人开始出售敲下的碎墙渣。一块半个手掌大小带颜色的墙皮，要花 8 个西德马克的高价。

人们在忙着留最后的纪念。他们以为这道坍塌的墙已经彻底死亡。

它没有死亡。因为产生它的基础仍然存在。它的阴影仍然在世界很多地方徘徊。

历史是什么？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近代以来这种影响又反了过来。明治维新之后，西方先进的思想通过日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词汇与概念，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间的影响使双方都受益匪浅。一衣带水必然联系方便，影响方便。一衣带水也还有另一面：掠夺方便，侵略方便。但这种掠夺和侵略就再也不是双向的了。

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侵占或掠夺过日本。而历史上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这些因素的混合，如同清水石灰与沙浆的搅拌一样，浇筑成一种坚硬无比的三合土。不管双方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中日两国 20 世纪的恩恩怨怨，21 世纪的关系发展走向，不得不踏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今天已经不用再去一个一个地细算，有几个日本首相参拜过那间幽暗的靖国神社了；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去细算，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正在第几次或第

十几次被修改。在多个亚洲国家的一片抗议声浪中，日本真像其所想表现的那样安之若素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是教师，有人说历史是婢女。前者可得教益，后者可任蹂躏。一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侵略扩张史，对相当一部分日本政要来说，就既是教师，又是婢女；既可将其供敬于庙堂之上，又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全看当时的需要而定。

第三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不反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为什么不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美国与多数亚洲国家一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对美国就毫无影响吗？尤其是亚洲多数国家，虽然被称为二战的胜利者，却都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并且都没有对日本造成相近程度的伤害。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在生命损失和社会物质财富损失方面的极度不平衡，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战胜国中，唯有美国对日本造成了比美国受损更大的伤害。广岛一颗原子弹，8万余人死亡，长崎一颗原子弹，6万余人死亡。在投原子弹之前，1945年1月东京大轰炸，美国用334架当时世界载弹量最大的B-29“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将2300多吨燃烧弹全部投向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3.8万人的东京地区，造成84000余人死亡，10万人重伤。当时的火势之烈已经完全无法扑救，甚至很多跳进池塘躲避大火的人，也因灼热火焰形成高温将池水煮开而被活活烫死。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实现了战后对日本的占领。

今天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最仰慕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不屑于什么靖国神社、不屑于什么教科书，因为日本几乎按照美国的要求做了每一件事情。在日本，那些修改教科书的人和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在历史问题上对亚洲所表现出的顽固与傲慢，与对美国所表现出的谦恭与顺从反差如此巨大，真令亚洲所有人大惑不解。我们的地理位置如此之近，我们的心理距离为何如此之远？如果一个民族除了仰视就是俯视，又该如何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

日本多届政府都宣称追求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目标无可非议。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人更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可是当我们看到在横须贺成为太平洋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部之后，日本政府又要求将东京附近的横田作为太平洋美军空军司令部、将神奈川的座间市作为太平洋美军陆军司令部，

这种规划和安排，使自己的国土遍布外军基地和指挥机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正常国家”？近些年举行的美日“2+2”会议还发表共同声明：“以台湾海峡的安全为双方共同战略目标”。这无疑是公开声明日本愿意充当别人的马前卒，要干涉“一衣带水”邻国的内政了。中日双方不是发表过联合声明吗？不是签署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吗？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有没有实践的空间？

中日今天的矛盾，决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不参拜靖国神社、不修改教科书就万事大吉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更加根本的是如何看待与对待邻国的发展：协助分享？冷眼旁观？还是参与遏制？任何国家都有属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那种不以邻为伴、而以邻为壑的思路，往往会把实现自己利益建立在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邻居为对手，单方面就足够；若要以邻居为朋友，则非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可。

我从来不怀疑日本国内的友好力量。中日两国世代交往下去、友好下去，不仅是国家领导者的态度，而且也是普通百姓的心愿。当日本国内某些势力通过种种渠道，开始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时，中国却从来没有将日本列为假想敌。中国所有对日本过去战争罪行的谴责是出自历史事实，出自希望对方真正记取教训、不再使悲剧重演的真诚愿望。做人是不会嫌朋友多的，国家也是一样。但需要朋友时，你却无法“制造”一个朋友，因为友谊需要基本的信任和长期的养护；需要对手时，制造一个对手却没有那样麻烦，只要宣称对方十分危险，就可以将关系扯破了。

中国的蓝图是发展经济，完成统一，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愿意和周围所有国家建立友好的友善的相互合作的睦邻关系，希望在实现自己蓝图过程中得到世界的帮助。日本也有自己的蓝图。希望日本的蓝图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愿画出来的。希望日本的蓝图建立在亚洲共赢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日美共赢的基础上。

真正决定能否成为“正常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自己。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担当

刚刚过去的2012年，让我们一言难尽。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难以想象十八大之前，有如此众多的严峻考验横亘在我们面前。

年初，重庆事件发生后，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演说中自得地说：“王立军、陈光诚这些人在危急时刻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使我感到，美国的价值观（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它起的作用比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重要。”紧随其后发生的黄岩岛事件，接着又发生钓鱼岛危机，又使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的评论强烈再现：“美国更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合作、战略上处于静止状态、军事上束手束脚的国家。”

建国六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新中国，几乎是突然之间来到了前行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举世瞩目。

预言中国要崩溃、会四分五裂、将发生大麻烦的比比皆是；希望中国蜕变、转向、混乱的比比皆是。这一切，发生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或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最大的移动电话用户、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用户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以世界上最大的规模、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口脱贫致富的时刻。简单事实与复杂思绪之间的巨大反差，优裕生活与激烈观点之间的强烈冲撞，似乎就像火车头行驶越快轰鸣声越大一样，以一种十分另类的方式，印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实全世界没有人否认，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正在眼前崛起。

1840年以来，把中国建设富强，是多少代人的梦想。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各种方法试过了，各条道路走过了，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

新中国前三十年，也未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小平同志设想：什么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搞到一万亿美元，拿出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就

是比较强的国家了。

今天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七万亿美元，国防投入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华民族创造的财富总量，大大超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的设想。我们今天拥有的物质实力是前辈无法企及的。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民族的精神洗礼。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一样，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使这一洗礼由精神延伸到了物质，由政治扩展到了经济。不但站立起来，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这一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国发展的方式成为全球议论纷纷的话题。这样的时代对每一个华夏子孙来说，能说不是大时代吗？

大时代中的大牢骚，本不足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时代中的大担当，尤为可贵。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识利器。

今天我们拥有前辈从未拥有过的巨额物质财富，我们也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高速发展中的城乡、地区失衡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单纯追求GDP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问题，侵蚀执政基础的以权谋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步入深化期和攻坚期。好干的，代价小的，得罪人少的，见效快的，基本都做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难干的，代价大的，得罪人多的，见效慢的。在这一现实境遇中，要干，要往前走，太需要一批不以眼前利害和任内利益为最高追求，而以追求长远为己任、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领导者了。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地质学家丁文江说了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我们今天早已脱离了当年那种艰难困境。但在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一批领导者敢于担

当、能够担当，依然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的基本依托。共产党人的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无不体现于艰险、困难、混沌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大无畏之中。

世界进入剧烈动荡与调整的时期，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成为全球战略竞争中心和焦点。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担当的艰难，担当的伟岸，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以上话语之中。

现实已经展示，生活于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时代，多么有幸。

历史将会证明：担当于这样一个走向复兴的关键时刻，多么有幸。

七、他山之石

这支缺乏传统，甚至开列不出像样军事思想的军队，也是一支作战理论、战斗方式、军队条令更新最快的军队。其包袱之轻、新理论对旧理论否定之大胆，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那个最不该谈论战争的国家

一个最不该有资格谈论战争的国家，却在世界上天天谈论战争

此小标题本身，就是我们在美国获得的强烈感受。

北美大陆是世界上一片经历了长时间和平的土地。当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战火不断、亚洲成为二战后空前激烈的争夺点而战火不断、非洲因种族和部族冲突而战火不断的时候，当原来的新火药桶现在的老火药桶中东战火不断、原来的老火药桶现在的新火药桶巴尔干战火不断的时候，美国却得天独厚，自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一百三余年未受战火洗劫。1941 年破天荒地叫日本人偷袭了一次珍珠港，但珍珠港所在的夏威夷群岛，1898 年美国人才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日本人袭击的，不过是一片攫取不到 50 年，且距美国本土尚有 4500 公里之遥的新土地。

长期和平，成为美国在空前动荡的 20 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关键条件。

矛盾就矛盾在这个最不该有资格谈论战争的国家，却在天天谈论战争。其所处环境与所关注事物的矛盾比比皆是。从西点要塞算起，麦克奈尔堡、巴林空军基地、塞文堡、昆特克尔陆战队中心、迈耶尔堡、卡莱尔兵营，我们先后进过的 7 个美军基地，个个基地内绿荫如织，绿草如茵，公园一般环境优美。但与轻松的环境格调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个个基地内训练严谨，人们紧张忙碌于操演战争。在那些舒适安静、灯光从来不关、空调从来不停的建筑物内，明亮柔和的光线下，你也许一边喝着加奶咖啡，一边翻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关于波黑武装冲突、索马里城市战斗，或穆斯林世界对未来挑战等堆积如山的材料。在安那波利斯塞文堡海军军官学院，你甚至可以一面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观看碧波荡漾的海湾、自由飞翔的海鸥、切开白浪的帆船及远处岛屿上

梦境一般的别墅，一面就在如此迷人的景致之下，使用便携微机的电子地图部署兵力，规划毁灭对手的战斗。

这真是一个充满奇怪矛盾现象的国家。这块长时期和平安定、一百多年未见硝烟的土地上，说起战争，大家竟然像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毫不陌生。就连与我们接触较多的国防大学的几位文职雇员，人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战争密切相联：罗娜的父亲是50年代退役的空军军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罗斯玛丽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军队护士，服役于欧洲战场；珍妮玛丽的父亲是空军退役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卡罗琳的姐姐是上校军医，刚刚退役，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至于布鲁斯，其家庭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布鲁斯本人为越战老兵，1966年至1967年在西贡以北的边和空军基地服役，其妻子是越南人，1975年越南统一后作为难民跑到香港，后被布鲁斯接到美国。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用兵的次数超过240次。无怪乎这些长期享受和平的人，对世界上哪一场战争都不陌生。

这是一支全世界扩张最为剧烈的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仅有98 5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陆军竟达到8 268 000人。三十年时间几乎扩充了100倍。

这也是一支最缺乏传统的军队。美国军队既缺乏德国陆军那种一脉相承的军官团传统，也没有日本陆军那样延绵久远的武士道精神。与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威灵顿的英国军队、俾斯麦的德国军队比较，这支混杂在民军基础上于一片争论声中不伦不类建立起来职业军队，除了建国前后与宗主国英国的殖民军打过几仗外，其军事经历就限于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交战，长时间未曾与世界一流军队相遇。无怪1944年当美军从诺曼底滩头爬上欧洲大陆后，依然被那些精于战争艺术的德国军官看不起。他们认为美军战术单调，既不会实施纵深突破，也不敢实行大胆穿插，只会凭借火力优势一线平推；深远包抄与战役合围这些战争艺术中的精彩之笔，美军几乎一次也没有。

德国人说这些话也有一个前提：除了那个动辄骂人“狗崽子”、不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倒像个粗野的牧场马夫一般的美第三集团军司令巴顿。

不以为然也不得不以为然。德国、日本那些富于军事传统且充溢战争精神的军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与之交战的那个几乎没有什么军事传统更谈不上战斗精神的美国军队，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且两次参战，都对扭转战

局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真是那些吃透战争艺术经典的军事专家的尴尬之处。

这还是一支世界上作战理论与部队编成变化最快的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杜鲁门泡制的“遏制战略”，到克林顿当局推出的“营造—反应—准备”，美国军事战略至少大规模变化了七次之多。几乎几年一变，反复调整。与此同时，美军作战纲要和条令的更迭就像微软公司的软件和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一样，更加令人目不暇接。80年代中期出笼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刚刚在海湾战争中得到验证，战争结束后人们蜂拥而上刚要开始认真研究它，美军就宣布将这一理论弃之不用，而代之以新推出的“联合作战”理论了。

不得不承认，这支缺乏传统甚至开列不出像样的军事思想的军队，也是一支包袱最轻的军队。美式实用主义同样在其军事领域居于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于是这支不拘泥于任何思想的军队成为世界上作战理论、战斗方式、战斗条令更新最快的军队。其新理论对旧理论否定之大胆，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英国雄狮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

这个小标题是60年代末越南战争高峰时期，英国路透社记者说出的一句俏皮话。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上无事不管，其之霸道恰好映衬出“日不落”大不列颠的日益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240次对外用兵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朝鲜战争高峰时期动用兵力44万，越南战争高峰时期侵越美军为55万，海湾战争则先后动用兵力接近50万。半个世纪内，美国竟有20年时间在国家陷入大规模交战的状态下度过。

这种到处插手的做法给其国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美军中有一句老话：“军装与军衔给你带来别人的尊重。”作为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获胜者，美国军人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威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对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卷入，使军人形象在社会上跌入低谷。现任总统克林顿60年代曾逃避服役未受惩罚，而且并未因此影响其在90年代进行的两次总统竞选，该时期美国军人的社会形象可见一斑。我们在美国看到一尊“美国大兵”的雕像，一个戴着钢盔、龇牙咧嘴的美军士兵，鼻子翘到天上、牙齿沾满鲜血，身躯由一堆痛苦挣扎蜷缩抽搐的尸体组成。这大约就是该时期美国军人社会形象的写照。现在这尊雕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现代艺术博

物馆收藏。

与我们很熟的布鲁斯，讲起当年越战时应征入伍至今气愤不已。他对我们说自己受了政府和将军们的欺骗，那些人讲打仗为了美国，否则越南成为多米诺骨牌，老挝、柬埔寨也要一张接一张倒下去，整个东南亚都会被共产党赤化。后来美国人还是不得不撤走，却根本没有发生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

这位与克林顿同时代的人，谈起克林顿当年逃避服兵役，至今耿耿于怀。

在美国，从将军到校官，从现役军人到文职人员，越南战争仍然是一个最让他们动感情的话题。不管讲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只要一涉及越战，他们马上就会变得严肃，为之动情。那场战争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至今念念不忘。在他们的军事教程中，海湾战争至今未列入教案，越南战争却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多个教程之中：战争是怎么发生的，美国的决策在哪里出现了失误，军队如何一步一步地深陷泥潭……他们如数家珍，一一反复检讨，向后人警示。比较之下，他们似乎对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不屑一顾，相反对在越南战场栽的跟头，至今耿耿于怀。

不到美国，不和这些美国人接触，你想象不到越南战争给他们的创痛是何等深重。讲起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同事，国家军事学院教务长绍尔上校能够在餐桌上放下汤匙，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柯因斯将军也默默无言，抑制不住长叹。

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北侧，有一座嵌进绿地中的低矮建筑，远看很不起眼，近到跟前才觉出非同寻常。此即现在举世闻名的越战纪念墙。该纪念墙由两扇像手臂一样“V”字形伸开的黑色大理石墙组成，一扇朝向利剑般直指天空的华盛顿纪念碑，一扇朝向坚如磐石的林肯纪念堂。78米长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58 209名死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姓名密密麻麻地刻在上面，似是聚集在此，向开国元勋华盛顿和民权总统林肯无声地倾说与诉求。人们在这里默默地走，默默地看，默默地念。没有人高声宣泄，没有人哀声痛哭，却能感受到一个民族心脏中的鲜血，从这里默默向外流淌。

这个取低矮不取高大取压抑不取张杨的建筑，给人留下一种震撼心魄的至深印象。我们没有想到这个1982年建成的建筑，竟由一位21岁的耶鲁大学女学生设计。一位80年代的青年人，竟能如此深刻地理解60年代青年人的命运。

越战纪念墙现在每年接待15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华盛顿所有的纪念地，每年来这里的人最多。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圣地。几乎任何时候，你都能看见

墙下花圈不断，人们络绎不绝。很多人站在墙下寻找自己的家人或亲友，轻轻触摸刻在墙上的名字。孩子们则拿出白纸铺到上面，然后用铅笔精心拓下这些姓名。

这段黑色大理石墙壁是美国人的“哭墙”。当美国大兵挥舞英国雄狮的尾巴鞭打全世界的时候，很多场合不得不鞭及自身。

但参战者不一定都反战。在林肯纪念堂南侧，1995年建起了一段与越战纪念墙相对应的朝鲜战争纪念墙，也同样是由当年参战的老兵倡议修建的。在一段长达10余米的墙面上，刻有这样一行字：“FREEDOM IS NOT FREE”。最初有人以为它是反战口号，要表达“自由国家无自由”这样的概念，后来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其准确的意思是“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义务”，意即面对国家需要，任何人都责无旁贷。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底蕴，已变成对过去参战的歌颂与怀念了。

旁边一块小石碑上的另一段话就是最好的注解：“OUR NATION HONORS SONS AND DAUGHT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DEFENCE A COUNTRY THEY NEVER KNOW AND A PEOPLE THEY NEVER MET”（译：光荣属于那些响应国家召唤的儿女，他们保卫的是他们从不了解的国家，和从不认识的人民）。

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他们的国家观、战争观由兴而衰又由衰而兴。

两支连军徽都互不了解的军队，却早已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美国军队也许是世界上军徽标记最多的军队。武装力量总司令徽标、国防部徽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徽标、五大军种徽标、各兵种徽标、各种专业徽标……几乎团以上单位都有自己的徽记。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大约没有一个中国军人能够将种类如此繁多的标记认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徽标则相对简单。八一军徽成为所有军种徽记的核心。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八一军徽，很多美国军人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访问陆战队大学的时候，我们把国防大学的校徽赠送给图书馆和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负责人、退役陆战队上校格罗夫专门拿出一个本子，问我们“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齿轮和麦穗象征着什么？要求我们一一解释。在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对校徽的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当时我头脑中就生出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这是两支连军徽

都互不了解的军队。

连军徽都互不了解，却不妨碍两军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在美国的学习工作实践使我们感受到，正因为互相间有过较量，美军人员才对中国军人表现出特殊的尊重。

与美国军人谈话，他们尽量不涉及中美之间发生的战争冲突。带领我们参观军史陈列，他们可以详尽地介绍美军如何参加一战、二战，越战和海湾战争，却不愿当我们的面讲朝鲜战争。近年来美国务院和一些政府机构一再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制裁”，其军方却一直强调要对中国保持接触，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美国军人也知道政客决定战争，流血还需他们。他们从心眼里想要避免与中国军人为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两次吃亏，都在亚洲，都是为了遏制中国。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持续3年零1个月，动用兵力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持续整整14年，动用兵力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美国人形容说朝鲜是亚洲大陆伸出的拇指，那么越南则像这个大陆一张拉满的弯弓。伸出的拇指和张开的弯弓，真正成了美国人的噩梦。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人不再在东亚进行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地面战了，终于从噩梦中醒来。在海湾用兵47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不到200人。

这三场战争的结局如此悬殊，美国人心中自有比较。

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总之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里面，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我又想到西点军校纪念馆内那个上甘岭战斗沙盘。陪同我们参观的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柏中校是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他说教官在课堂上讲过这个战例，据我们所知你们只有几个连队守卫，我们以七个营轮番攻击为什么就攻不下来，让人一直不明白。

胡柏这样的美国军官，至今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怎样的条件下艰苦作战。

当时坚守上甘岭坑道的将士要求后方多送苹果，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派人昼夜兼程到平壤一带紧急采购了两万

多个苹果。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党委发出号召：送进坑道一篓（不是一筐）苹果者，记二等功一次。

但一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没有一篓苹果能够冲过美军的火力封锁线。最后只有一名运输员从牺牲者身旁拾了一个苹果带进坑道。

这就是电影《上甘岭》记述的那个唯一的苹果。

这部电影在 50 年代中期拍摄出来时，曾经指挥上甘岭作战的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看了不到一半就泪流满面，难过得中途退场。上甘岭有两个著名的高地：537.7 高地和 597.9 高地。仅 537.7 高地七号阵地内，就有 15 名伤员饿死，10 名战士饿死了 3 人。

537.7 高地和 597.9 高地作为志愿军战斗精神的不朽象征，其模型安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内。它也带着美国人的不解之谜，摆在了西点军校的纪念馆里。

美国官方认为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但他们的很多军官却不这样认为。“我们拥有如此巨大的装备优势结果把仗打成这样，就是失败。”他们甚至不对中国军人隐讳这一观点。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每天晚上当我摊开日记本记录一天工作感受的时候，透过百叶窗外波光粼粼的华盛顿水道和对岸华灯闪烁的波特马克公园，我仿佛又看见了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看见那些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看见那些在零下 40℃ 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他们以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从今天美国人对中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国家之父也是军队之父

在美国，拿到法律学位，获取律师资格，被认为是从政的必由之路。从州长到总统，从州议会议员到国会成员，大多数政客的经历确是如此。

美国从 1776 年建国到小布什担任总统，共产生了 43 任总统，其中格罗弗·克里夫兰曾当选两任（第 22 任和第 24 任），所以只有 42 人担任过总统职务。这 42 人中，24 人在从政之前获有律师资格，占将近 60%，比例不可谓不高。总统由律师出身，美国人觉得天经地义，是法治国家的骄傲。除此之外这些总

统还从事过什么职业，他们便不再去关心和研究了。

如果你告诉美国人，“某国”历任总统 50% 以上当过兵、打过仗、有过军人身份，他们定会怀疑该国政府是否属于违反民主原则的军政府。他们会联想起西班牙的佛郎哥、智利的皮诺切特、乌干达的阿明、韩国的全斗焕……不启于齿之后便产生一个共识：文官政治只有与法律结缘，与军队无染，才能保持其之纯正。

如果你再告诉美国人，这个“某国”正是美国，他们定会大吃一惊，感到难以置信。

事实确实如此。

美国建国 220 余年产生的 44 位总统中，有 10 人获得过将军军衔，5 人获得过校官军衔，7 人获得过尉官军衔，共计 22 位总统与军队结下不解之缘。

10 名获得将军军衔的美国总统是：

- 第 1 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获陆军上将军衔；
- 第 7 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获陆军少将军衔；
- 第 9 任总统威廉姆·亨利·哈里森，获陆军准将军衔；
- 第 12 任总统扎卡里·泰勒，获陆军少将军衔；
- 第 14 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获陆军准将军衔；
- 第 18 任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获陆军上将军衔；
- 第 19 任总统拉什福德·海斯，获陆军少将军衔；
- 第 20 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获陆军少将军衔；
- 第 23 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获陆军准将军衔；
- 第 34 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获陆军五星上将军衔。

5 名获得校官军衔的美国总统是：

- 第 5 任总统詹姆斯·门罗，陆军中校；
- 第 25 任总统威廉姆·麦金利，陆军少校；
- 第 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陆军上校；
- 第 33 任总统哈里·杜鲁门，陆军少校；
- 第 37 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海军少校。

7 名获得尉官军衔的美国总统是：

- 第 16 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民兵上尉；

- 第 35 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海军上尉；
- 第 36 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海军中尉；
- 第 38 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海军上尉；
- 第 39 任总统吉米·卡特，海军上尉；
- 第 41 任总统乔治·H.W. 布什，海军少尉；
- 第 43 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空军中尉。

美国总统的军人背景，成为他们仅次于律师背景的第二大背景。

单独讲一两任总统的从军经历，美国人也不是不清楚。但把他们历任总统这方面的经历排列起来看，他们却没有做过这种尝试。总统们的从军经历某些时候被刻意宣扬、某些时候又被无意遮盖了。美国建国时间不长，有军人背景的总统却如此之多，在西方国家实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首先，因为美国是在战火中艰难诞生的。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使 3 位美国总统成为军人，维护统一的南北战争又使 5 位总统成为军人。

其次，因为美国是在战火中完成扩张的。在向西部和南部拓展疆域的战争中，5 位总统成为了军人。

最后，因为美国是在战火中称霸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中，8 位总统成为美国军人。

一个在战火中诞生、战火中扩张、战火中称霸的国家，它的总统怎能不深深地打上战争烙印？

在独立战争中，美国既有如第 1 任总统华盛顿那样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有如第 5 任总统门罗那样优秀的中层军官、第 7 任总统杰克逊那样大半生在火药味中度过的军人。

美国是在战火中诞生的。1776 年，13 个美洲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然而要把独立宣言变为独立事实，就不得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酝酿独立的 13 个州不乏深邃的思想家和激情的演说家，不乏纵横捭阖的外交人士和穿针引线的政治掮客，唯独缺乏领兵作战、冲锋破阵的军人。所以在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于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就决定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大陆军。所谓“大陆军”，不过是由宾夕法尼亚 6 个连、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各 2 个连凑成的 10 个民兵连队，与乌合之众几乎无异。

这些乌合之众，就是今天在全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武装力量的老底。

让谁来统率这支服装各异、武器各异、习性各异的队伍呢？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会议代表中唯一一位身穿军服的人身上。他就是退役的上校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 21 岁参军，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给他带来过辉煌，也给他带来过狼狈。最初华盛顿运气不错，在一场战斗中击毙法国前哨部队指挥官德·朱蒙维尔等 10 人并生俘其余 20 人，眼看英国人要晋升他为上校，他却又戏剧般地陷入法军的重兵包围，不得不缴械投降，还签下一份一年之内不得返回俄亥俄的丢脸协议。他翻身是在 1755 年成为英国将军爱德华·布伦道克的副官之后。自大的布伦道克对俄亥俄河谷一带地形毫无所知，径直把部队带进了法国人的伏击圈。这场猝不及防的战斗使华盛顿充分展示了其野战才华。他的两匹坐骑先后战死，军服被 4 颗子弹撕碎，他竟然浑身无伤，带领英军冲出包围。战后华盛顿获得上校军衔，并出任弗吉尼亚民军司令。

但他不想为英国人打仗，只想为家乡弗吉尼亚打仗。1758 年他退役从政，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和大陆会议代表。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上他戎装就座。之所以要穿上军服，就是想表明他准备为美国人的权力而战。极端缺乏军事人才、四处为军队寻觅指挥官的会议代表们立即领悟了这个暗示。在 1775 年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华盛顿被任命的大陆军总司令，并立即获得将军军衔。甚至连他穿的那身弗吉尼亚旧军服的蓝色和暗黄色，也很快被采用为大陆军军服的标准颜色。

大陆会议对这支近似散兵游勇的军队和这个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指挥官寄以厚望。正是这支军队组成之后，他们才敢于发出独立宣言。虽然美国人至今不承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但他们的开国元勋们倒是一个比一个明白：没有枪杆子就肯定没有政权。

华盛顿不负众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他不但在战场上打败了英国殖民军，而且当声望日隆、连议会也开始仰视他的时候，严辞拒绝了部下要他废除民主、拥兵称王的建议。一部世界历史，在国家追求独立的战争风暴中通常会诞生一代终身总统或者皇帝，但华盛顿无意成为美国的克伦威尔。他从未忘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名军人。1783 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他立即遂辞去军职，回乡过平民生活。1789 年他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 1 任总统，向国会宣读就职演说时，全场欢呼雷动。

他任满两届便拒绝再次竞选，发表《告别词》后返回他的弗农山庄。

这位美国的开国元勋是位奇人。他是一位军人，却为美国奠定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坚实基础。他是一个最有条件实现集权的人，却最坚决地摒弃集权。他在建国、建军中发挥的作用如此关键，不但领导美国人民通过胜利的独立战争摆脱过去，而且使这个新生国家在最初的危险岁月里团结一致，以第一步良好的开端走向未来。他是国家之父、军队之父，也是国家和军队现存制度之父。后世的美国历史学家下结论说，没有乔治·华盛顿，就不会有美国。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英国的海峡舰队和拿破仑的陆军都向他致哀。在那片最摒弃神化的土地上，他几乎变成了一尊神。

今天美国人对他们的总统是多怀批评的。窃听丑闻、纳贿丑闻、逃税丑闻、挪用公款丑闻以至性丑闻等等，包围困扰着一位又一位美国总统。但极少有美国人批评华盛顿。他对美国如此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人们觉得他代表着那个国家最好的东西。

军人政治家华盛顿，成为美国国家政治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17岁报名参军。当时独立战争刚刚爆发，门罗中断了自己的学业，离开著名学府威廉玛丽学院加入大陆军行列，1775年成为华盛顿麾下第三弗吉尼亚步兵团的一名少尉。1776年12月，在特顿的一场战斗中，门罗的连长负伤，指挥权落到门罗这个青年军官身上。他刚刚代替连指挥官，就被一颗子弹射穿击倒。伤好之后他继续返回部队服役，四年服役期内两度负伤，因作战勇敢于1779年提升为少校。华盛顿给他的评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英勇、积极和理智，并因此而获得声誉。”华盛顿也没有想到，他手下的这名优秀军官后来成为美国第5任总统。

1780年，弗吉尼亚议会授予门罗中校军衔。他就以这个军衔退役从政，于1817年当选总统。门罗上台后干了几件大事。一是1818年同英国划定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二是1819年从西班牙人手中获得东佛罗里达；三是1823年发表“门罗宣言”，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该宣言被后人广泛称为“门罗原则”。一任总统，任内的辉煌不足为凭。但门罗竟然能够为后世立下几条原则，在历史上无疑该算是有所作为的了。

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经历最具荒蛮的牛仔色彩。杰克逊参军时才13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生在木屋里的总统。所谓“木屋”有两层意思。一是贫困，属于穷人一列；二是边远，归入拓荒者之流。杰克逊出生时父亲刚

刚死于一次事故。他幼时受教育不多，主要靠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教他看书识字。9岁时他竟然能够在和父辈一样的拓荒者面前大声朗读“独立宣言”。后来这些边民组成了军队，他就在旁边观看他们的演习和操练。1780年美国革命波及卡罗莱纳，13岁的杰克逊与两个哥哥一起参加国民军，当上了传令兵，骑着马在部队间传递消息。第一年大哥修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年杰克逊和二哥罗伯特又一起被英国人俘虏。小战俘杰克逊的骨头颇硬。某日一英国军官要他擦皮鞋，他坚决不肯，军官抽出马刀便砍，他用胳膊护住头部，结果臂部和头部皆被砍伤。伤好之后，面孔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当时在南卡罗莱纳英国人的监狱中天花流行，兄弟俩刚刚被放出来，罗伯特就染病死去。杰克逊的母亲眼看大儿子阵亡、二儿子病死，悲伤不已，志愿去照看那些患天花的英国俘虏，结果自己也被染上天花，很快去世。

杰克逊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哥哥，只留下脸上一道疤痕，这些成为他终生恨英国人的根。

独立战争结束后，杰克逊跟随北卡罗莱纳一个著名律师学习法律，于1787年获得律师资格。此后他当过田纳西州的第一位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州最高法院法官。自小艰苦的生活和从军的磨难，养成了杰克逊好勇斗狠的性格。即使有了律师、法官这些正襟危坐的绅士身份，他也丢不掉在马背上穿越战火传递命令时留下的根。没有硝烟了他便热衷于决斗。杰克逊一生决斗将近百次，数次在决斗中负伤。1806年，一个叫查尔斯·迪金森的人对杰克逊夫人出言不逊，杰克逊立即提出决斗。迪金森是全国著名枪手，枪法纯熟，但杰克逊毫无惧色。5月30日，两人在肯塔基州红河边上的磨房决斗。名枪手迪金森首先开枪，一枪击中杰克逊胸部，打断他数根肋骨，并伤及胸骨。杰克逊竟然能够咬牙挺住，保持住自己的姿势开枪，一枪将迪金森击毙。

1829年，杰克逊当上了美国第7任总统。这个自幼丧父、少年丧母、一个人闯荡天下的硬汉能当上总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第4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如果没有麦迪逊引来一场战争，叫英国军队冲进美国首都放起大火，杰克逊也不会成为举国皆知的战争英雄。

英国大兵焚烧美国的白宫和国会大厦，比焚烧中国的圆明园早了46年。麦迪逊总统狼狈逃离华盛顿，也比咸丰皇帝狼狈逃离北京早了46年。

麦迪逊是宪法起草人，在美国被誉为“宪法之父”。他身高1米66，体

重仅 100 磅。因身体虚弱，从未在军队服役。这样一位文弱之人出任总统，本该与军事无缘、与战争无涉。但恰恰相反，1809 年，多病的麦迪逊上台不久便大动干戈，使美英之间第二次陷入战争状态。当时英国卷入欧洲大陆与法国拿破仑的战争多年，麦迪逊认为是个良机，便以大西洋上美国船只、货物和人员受到损失为借口，要求国会对英宣战。这位总统与朝野那些主战派一样，以美国的尊严和经济独立受到威胁为由，实际上眼睛直盯英国人控制的加拿大，把它当作一块可以重新切割的肥肉。

麦迪逊志大才疏。他手下的将军都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平均年龄 60 岁。尽管这些人当年是优秀军人，但流逝的时光已经磨尽了他们的精力和勇气。1812 年战争伊始，虽然正在欧洲与拿破仑做殊死搏斗的英国人无暇西顾，但美国人也未占到什么便宜。1814 年 4 月拿破仑战败退位，腾出手来的英国人挥兵西向，开始惩罚乘人之危的美国陆、海军。1814 年 8 月 24 日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之日：英军长驱直入，夺占华盛顿特区，文人总统麦迪逊带领政府仓皇逃离。英国大兵酷爱在对方首都点火，他们焚烧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和国会大厦，比 1860 年焚烧中国皇帝居住的圆明园还早了 46 年。麦迪逊比中国的咸丰皇帝高明之处，是他绝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寻机反败为胜。就在白宫腾起熊熊烈焰之时，一批富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将领在美军中崛起，取代了那些因循守旧的军官。已获得少将军衔的杰克逊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但杰克逊麾下那支所谓“世界化”军队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它由陆战队士兵、失去了军舰的水手、肯塔基志愿兵、路易斯安那民兵、新奥尔良自由黑人、巧陶克印第安人组成，甚至还包括 800 名海盗。但却正是这支杂牌队伍抓住了机会，为美国人在战争中挽回了脸面。

在英国人焚烧白宫约半年之后，1815 年 1 月 8 日，杰克逊的“世界化”军队在新奥尔良郊外设伏，藏在胸墙之后乘大雾消散时突然向挺进的英国军队开枪。他以 13 人阵亡为代价击毙英军 2000 多人，其中包括英军指挥官，取得新奥尔良大捷。其实在此之前英美双方已经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消息从遥远的欧洲传来，却落在了新奥尔良战斗之后。于是这个大捷产生了两个影响久远的作用。首先它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其次在全国上下情绪最低沉的时候杰克逊一扫失败情绪，给大家带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所以杰克逊理所当然成为了全国英雄。1828 年杰克逊竞选总统时，他的支持者绘制大幅画，描绘他是一个战争英雄，疆土开拓者，普通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对他后来的当

选起了重要作用。

从战争角度看，所谓“新奥尔良大捷”不值一提；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一仗却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受尊敬大国的地位。此前在欧洲人眼里，美国的地位不过与丹麦和葡萄牙相当。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毫无畏惧地站在大英帝国面前。

杰克逊在空前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中，以战争英雄身份走上了总统宣誓台。这个不精于政治的人当了8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值得流传。他来自社会底层，却相信蓄奴制；他出身军人，却反对军队的正规化和职业化。他终身敌视印第安人。只有在带火药味的事情上他还维持着好运：1835年1月30日参加某位议员的葬礼，一个刺客仅仅距离6英尺向他连开两枪，两颗子弹竟然全部奇迹般地卡壳，杰克逊毫毛未损。

大半生在火药味中度过的杰克逊，子弹也让他三分。

亚当斯以南北平衡考虑提议华盛顿指挥大陆军，杰弗逊以党派利益出发创建西点军校，这些决策底牌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可以轻描淡写。

美国建国之初，因为军事斗争极其重要，几任文职总统也为军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例如第2任总统亚当斯总结战争中的惨痛教训，眼见海上力量至关重要，强烈要求国会批准兴造战舰，并于1798年成立海军部。亚当斯是美国最早的海军倡导者，后来被美国人尊为“海军之父”。他在回忆录中写有这样动情至深的话语：“回顾美国的那一长串被俘或者被毁的舰船名单，重写我们海军建立和发展的全部历史，常常催人泪下。”

这位文官出身的总统成为美国建立海上力量最早和最有力的鼓吹者。

第3任总统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美国第一所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建立者。西点军校是美军建设史上的一座分水岭。此前美国军队是一支近似散兵游勇的民军，官兵几乎都是临时募集，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才少而又少。有了西点军校之后，这支民军才真正开始向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军队过渡。

特别应该提到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之时，亚当斯和杰弗逊这两位总统的一些特殊考虑。

第二次大陆会议决定建立大陆军，正是出自慷慨激昂的亚当斯的建议。让华盛顿出任这支军队的总指挥也是他首先建议的。虽然这个建议十分关键，足以改变美国历史，但亚当斯以华盛顿为人选时，主要并不是因为后者的军事素

养，而是因为后者南方人的背景。作为北方人的亚当斯感到，在一支新组建的北方人居多数的军队里面，南方也要有自己的代表，因此新组建的军队必须让一个南方人来当司令。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就是在这个说怪也不怪、说不怪也怪的理由下走马上任，成为军队总司令的。

至于杰弗逊建立西点军校的决议就更有自己的考虑。杰弗逊对常备军从来不感兴趣，认为它是对民主制度和人民自由的一种威胁。他颇为不满地说：“印第安人抢劫的每一件东西，都会被主张建立军队的人当作借口。他们认为保持一支常备军和公众为之负债是保障美国幸福所必需的，而且永远不允许撤销。”

其实杰弗逊 1801 年执政初期，美国军队只有 248 名军官、9 名见习官、3794 名士兵，编成 4 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两个骑兵连。但这支不大的军队里面，大部分军官职务由联邦党人把持。这个现象早已引起杰弗逊的不满。他是共和党人，他之所以在总统任上改变对常备军的态度，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看到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弱肉强食，军事上的软弱必然招致外敌入侵；另一方面作为共和党人的杰弗逊又感到，他必须打破联邦党人对军队的控制，保证军队按共和党人的意志行事。

于是杰弗逊一反自己对常备军的立场，1802 年让国会通过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法》。这是美国军事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法案，在纽约州的西点要塞建立一所军官学校，是该法案的关键产物。但当时杰弗逊主要的立意并不在军队正规化建设，而在建立一支共和党色彩的军官队伍。所以在军校设立之初，就规定总统对军校拥有特权，可以一手选拔学院领导、教员和参加学习的学员，直接任命校长、学员总监甚至每一名学员。这些规定沿袭了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陆军军官学院（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院和空军军官学院的通则，而从最初的本意上看，则主要是杰弗逊为共和党人进入军官团体开辟的道路。

文质彬彬的杰弗逊行动起来却大刀阔斧。他借《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法》对陆军进行整编，减少了 88 个军官职位，使一些联邦党人的军官下台，同时又增加了 20 名少尉编制，这些职务都委任给了共和党人。在西点军校教员和学员的选拔上，他也到处搜寻合适的共和党人而排斥联邦党人，大大加速了陆军“共和党化”的进程。

美国建国初期这种党派对军队的争夺与控制，反而奇怪地加速了军队的正规化历程，这真是一个令当事人意想不到也令后人颇为费解的事情。

亚当斯以南北平衡考虑提议华盛顿指挥大陆军，杰弗逊以党派利益为出发

点创建西点军校，这些决策的底牌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可以轻描淡写，到今天只剩下最简单的事实：伯乐亚当斯首先发现了华盛顿，党人杰弗逊率先创办了西点军校。

伯乐和党人皆为美军建设做出了关键贡献。

当国家独立的使命完成之后，疆土扩张就作为新的要求，摆在了军队和总统们面前。于是继独立战争中3位军人成为总统之后，在向西部和南部拓展疆域的战争中，又有5位军人成为了总统。

星条旗下的誓言

在《星条旗永不落》的军乐声中，美国星条旗上的五星由1777年的13颗，增加到了1959年的50颗。

1814年9月，英军洗劫完美国首都华盛顿后转攻海港城市巴尔的摩。麦克亨利要塞是巴尔的摩的前卫，英国舰队便集中炮火朝这个眼中钉猛烈轰击。该要塞整整饮弹25小时，炮火硝烟中一面星条旗竟然始终高高飘扬。当时一位叫弗朗西斯·基的美国谈判代表恰巧在英国军舰上，目睹了麦克亨利要塞的壮举，深受震动之余挥笔成诗，当晚又以一支古老的英国饮酒歌为曲，响彻美国大地近两百年的《星条旗永不落》就这样诞生了。

星条旗曾是美国人不屈不挠争取独立的象征。当国家独立的使命完成之后，它又成为美国人锲而不舍地扩张疆土的象征。1777年6月14日，当议会通过第一面星条旗方案的时候，上面仅13颗星，代表最初组成合众国的13个州。到1959年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第50个州的时候，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现今美国国旗方案，星条旗上的星由182年前的13颗上升到50颗。在《星条旗永不落》的进行曲中，美国国土由最初北美大陆东部沿海一条狭长地带，扩展到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至墨西哥湾、北达白令海和北冰洋、纵贯北美大陆最富庶部分的世界大国。

美国总统作为国家代表，在独立战争中冲锋陷阵，在扩张战争中照样冲锋陷阵。继独立革命战争中3位总统从军参战之后，在向西部和南部拓展疆域的战争中，又有5位总统从军参战。他们是：

第9任总统威廉姆·哈里森；

- 第 12 任总统扎卡里·泰勒；
- 第 14 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
- 第 16 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 第 26 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需要说明的是，华盛顿、门罗和杰克逊这 3 位独立战争时期从军的总统，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家扩张的军事行动，其中尤以杰克逊为最。这位在国家独立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哥哥、面部留下英国军官刀痕的人，1802 年在与克里克族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获得少将军衔；1817 年又率军与塞米诺族印第安人开战，并入侵西班牙人控制的西佛罗里达。1821 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条约，他成为美国这块新领土的军事总督。为美国独立自由付出重大牺牲的杰克逊，同样为美国夺取佛罗里达做出了关键贡献。

但总体看，杰克逊毕竟还属于开国元勋那一辈。

在国家扩张战争中身先士卒、大打出手的，自第 9 任总统哈里森始。

从“蒂普卡努英雄”到墨西哥战争英雄，扩张时期的美国总统竞相给自己涂抹拓荒者的粗犷形象。

哈里森出生在弗吉尼亚富裕的大庄园中，从小即有家庭教师教育。父亲想让他学医，送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著名医生本杰明·罗斯的指导下学习。18 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立即放弃令他头痛不已的医学，甚至大学毕业证书也不要了，加入美国第一步兵团，成为自幼梦寐的军人。以后几年他一直在西北部边境服役，担任过安东尼·韦恩将军的副官，因与印第安人作战勇敢而由陆军中尉升为上尉，成为新边疆俄亥俄—华盛顿堡的司令。1800 年哈里森 27 岁，被亚当斯总统任命为印第安那地区的统治者。该地区领土广博，包括今天的印第安那州、依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的全部，及密歇根州的绝大部分和明尼苏达州的一部分。哈里森在新领土上治理有方，1803 年、1806 年、1809 年三次获得总统提名和国会批准，连续 12 年统治这块动荡不安的土地。1811 年战火腾起，他率军在蒂普卡努河畔不顾沉重伤亡，战胜印第安人，获得陆军准将军衔。他从此名声大噪，成为全国英雄，蒂普卡努竟然成为了他的绰号。

就是凭借这些扩张老本，1840 年哈里森当上了总统。那是一次吵闹不堪的竞选。其支持者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用提，他们用“蒂普卡努英雄”的大幅

画像和大标语，把哈里森刻画为一个简朴的木屋居住者、喝烈性苹果酒的疆土开拓者和首屈一指的军事英雄。而哈里森的对手、时任总统的布伦却被描绘为一个喝外国香槟酒使用金银餐具的花花公子。哈里森本人大庄园主的出身和奴隶拥有者的身份完全被其开拓西部的经历掩盖了，他一下子就打倒了布伦，当选为总统。这次选举后来以虚幻的“小木屋和苹果酒的竞选运动”著称于世。

“喝烈性苹果酒”的哈里森未敌过华盛顿一场风寒。就职典礼那天他坚持骑马去国会大厦，并拒绝穿大衣和戴帽子。那天气候寒冷，他的就职演说词达8578个字，是当时总统就职演说中最长的。哈里森在寒风中整整读了1小时45分钟，仪式结束他就病倒了，很快死于肺炎。这位“蒂普卡努英雄”连躺在病床上的时间都算上，仅仅执政一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短的总统。

与哈里森颇为相像的是有“精明老粗”之称的第12任总统泰勒。泰勒在军中服役40年，美国军事史评价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能给周围人以鼓舞，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泰勒本人的征战史几乎就是一部美国的扩张史。他22岁参加肯塔基国民军，24岁成为新奥尔良的步兵中尉；先以少校军衔参加1812年至1814年的对英战争，续而在1832年对印第安人的“黑鹰战争”中获得上校军衔，后在1837年佛罗里达州对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晋升为准将。1845年波尔克总统派他率军进驻格兰德河，挑起美墨战争事端。1846年战争爆发，泰勒反应很快，立即将墨西哥军队赶出边境。波尔克总统的反应也很快，听闻胜利立即授予泰勒少将军衔。坚持不授予任何军人中将军衔的国会，也给了他两枚金质奖章。就像后来的西奥多·罗斯福是美西战争英雄一样，泰勒是美墨战争英雄。他在战争中数次击败墨西哥人，于举国欢呼的浪潮声中返回家乡。

血腥的美墨战争整整杀戮了两年。这场战争使美国赢得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片土地，终于达到了太平洋沿岸，领土扩展到了48个州。

从军40年未打过败仗的泰勒，以为国家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资格，于1849年出任美国第12任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未当选国会议员的总统。他的对手说他政治观点偏激，总与政府不合拍；他的亲信说他举止言谈粗犷，讨厌庆典和军官礼服。怎样做才适合总统身份，这位“精明老粗”一筹莫展。他似乎连新陈代谢系统都未为当总统做好准备，入主白宫一年即因急性胃肠炎去世。泰勒作为美墨战争英雄在总统位上，比“蒂普卡努英雄”哈里森实在强不了很多。

以律师和军人双重身份行事的皮尔斯，既为美国开拓了疆域，也为美国种下了祸根。以民主典范名垂青史的林肯，最先却是用肌肉给自己开辟道路。

第14任总统皮尔斯属于另一类带有军人背景的总统。皮尔斯1837年33岁进入参院，是当时参院最年轻的议员。1842年退出参院回新罕布什尔州从事法律事务，又获得成功。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政府要求新罕布什尔州募集两个连的志愿兵。皮尔斯立即停掉自己那个兴旺的律师事务所，以42岁年龄报名入伍。初为他是士兵，在这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军队中他上升很快，很快被提升为上校，1847年被提升为由志愿队伍组成的义勇军的准将。这年5月，他率2500人乘船从海上入侵墨西哥，长驱240公里，与向墨西哥城挺进的斯科特将军率领的大军会合。8月的战斗中皮尔斯从马上摔下负伤，部下的战斗队形出现混乱，成为后来政治对手攻击他的话题之一。战争结束后，皮尔斯退役返乡重操法律事务，新的事务所和老的一样成功。但从墨西哥战场回来的皮尔斯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从军事生涯中获得莫大启示。相信一个政党如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纪律、组织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便不会有战斗力。他后来成为新罕布什尔州由律师和政治家组成的团体“康科德派”首领，该团体控制了该州的民主党，成为他当选第14任总统的基础。

皮尔斯任上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被人们忽略。一是使用海军马修·佩里准将的舰炮轰开日本门户，迫其签订《神奈川条约》开港通商。此事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端，终于在1941年突袭珍珠港时给美国以惨重报复。二是起用陆军一个名叫杰弗逊·戴维斯的西点毕业生为陆军部长。戴维斯在陆军部长任上表现非凡，大力推进陆军改革，1861年却以南方总统兼南军总司令身份成为分裂首领，几乎把美国国家一劈两半。

当过军人也当过律师的皮尔斯，既为美国开拓了疆域，也为美国种下了祸根。

参与国家扩张军事行动的总统中，贡献最小的是第16任总统林肯。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总统，祖父是流浪汉，四处打工，一次为农场平整土地在树林中被印第安人杀死。父亲是木匠，未受任何教育，除了十分吃力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就再不能用文字表达其他东西。母亲出身更为贫苦，一字不识，用“X”来代替自己姓名。林肯自己当过工人、水手、店员、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这个后来成为美国民主象征的人，最初给自己打开一条通道却是凭借肌肉的力量。他身高1米93，长臂大手，身体健壮。虽然来自

小地方，但初到依利诺斯州的新塞勒姆，就在一场摔跤较量中战胜当地最强壮的杰克·阿姆斯特郎，不但成为镇上的著名人物，连当地黑社会也对他肃然起敬。1832年春天因杂货店倒闭，林肯失去了工作。此时恰好依利诺斯州州长号召志愿参加平定印第安人叛乱的“黑鹰战争”。林肯立即参加民兵，因其强健的名声，被选为民兵连队的上尉连长。志愿期满，林肯再度要求服役，这次是身份却是普通士兵。他总共服役3个月，未参加一场战斗。后来他半开玩笑地说，当时只是“率队攻打了野洋葱地，并在与蚊子的激战中流了血”。

玩笑归玩笑，林肯却一直十分珍视这3个月的军事生涯，认为这是自己经历中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西奥多·罗斯福戏剧般地用两周时间，在创造一个国家的同时攫取一条运河，让全世界领教了他那“胡萝卜加大棒”的滋味。

与第16任总统林肯从军几乎没干什么事相较，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干的事情就太多了。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总统之一。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推出20位对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人物，第一位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他自幼因体弱多病，便经常从事拳击、摔跤、骑马、打猎、游泳等运动，结果反而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他18岁考入哈佛大学，在大学高年级完成的第一部著作《1812年的海战》，已在喻示出他的兴趣和爱好。所以虽然大学刚毕业仅23岁他就当选纽约州议员，37岁又出任纽约警察局长，但这些职务并不能使他满足。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帝国意识极强、关注国际政治甚于国内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军事冒险，相信弱肉强食。他很早就梦想在中美洲开凿一条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而且这条运河为美国拥有。海军上校马汉1890年的大作《海上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他影响极大，他认为海军是国家政策的基石。1896年麦金利当选总统，他便四处活动，想获得海军部长助理的职位。麦金利虽然也是军人出身，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却也是在非常勉强的情况下，才同意让极富攻击性的罗斯福占据这一职位。这时已经是1897年，离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爆发只剩一年时间，罗斯福39岁。

1898年2月15日夜，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军舰“缅因”号被炸沉没，舰上354名官兵中266人遇难，美西战争终于有了导火索。2月25日，海军部长离开华盛顿。罗斯福立即以代理部长名义给海军亚洲分遣舰队指挥官乔

治·杜威去电，指示舰队向香港进发。他在电报中大胆越权，暗示战争即将爆发；而一旦战争爆发，杜威应立即采取进攻菲律宾的坚决行动。杜威与罗斯福私交很深。他年轻时本想上西点军校当陆军军官，由于名额已满，只好进了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后杜威表现平平，就能力与资历看，根本无法在能人如云的海军将校中脱颖而出。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结交有势力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是其中之一。正是靠这些政治关系，杜威才晋升为海军准将，获得亚洲分遣舰队的指挥权，所以他对罗斯福言听计从。

1898年4月24日，西班牙对美宣战。第二天，美国也对西班牙宣战。西班牙人万万想不到的是，4月30日深夜杜威的舰队就开进马尼拉湾，像进行海上校阅一样，几小时内令猝不及防的西班牙太平洋舰队灰飞烟灭。全美国沉浸在对杜威英雄壮举的狂热崇拜之中，没有人知道帮助杜威上台和指示杜威开战的是罗斯福。

这件事对罗斯福刺激很大。他对在后方通过大量行政工作操纵战争失去了耐性，渴望到战争第一线去一展才能。他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3年，获得过上尉军衔。1898年5月，在人们对杜威准将的欢呼声中，罗斯福辞去海军部长助理职务，以中校军衔出任第一志愿骑兵团指挥官伦纳德·伍德上校手下的副团长。伍德升为准将后，他出任第一骑兵团上校指挥官。

罗斯福使这个团成为美西战争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部队。1898年6月22日，第一志愿骑兵团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在古巴登陆。在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尤其是攻克圣朱安山要塞的战斗中，该团表现如此出色，以至美国报界宣扬的众多战争英雄和火线勇士中，没有哪一个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持续15年时间成为报刊的焦点人物。新闻记者们连篇累牍地报道他在敌人火力下如何勇猛，怎样机智地指挥部队避免损失，西班牙军队投降后，又怎样迅速地让士兵回国。他的名字如此响亮，以至麦金利总统谋求竞选连任时，像当初不情愿地提名罗斯福为海军部长助理一样，同样不情愿地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为副总统竞选伙伴。罗斯福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战争英雄，甚至连发动战争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合并夏威夷群岛并使古巴处于美国保护国地位的总统麦金利，也被笼罩在了罗斯福巨大的阴影之下。这个从小迷恋海军的人却最终在陆战中获得巨大声誉，不知他本人做何感想。

麦金利于1901年9月遇刺身亡，43岁的副总统罗斯福接掌总统职权。至今美国最年轻总统的纪录仍然由他保持。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这两个

年轻总统上台时，都比西奥多·罗斯福年长。如果麦金利不死，这个在海军部长助理任上就敢越权指挥舰队的副总统，还不知要干出多少违规的事情来。

他一上台就盯住巴拿马运河，急不可耐地要圆想了几十年的梦。巴拿马运河早在1880年就由一家法国公司开凿，1889年因银行破产，法国公司倒闭，运河计划停止。罗斯福刚上台就启动巴拿马运河计划，但当时巴拿马属于哥伦比亚领土，哥伦比亚议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开凿条件。罗斯福狂怒已极，立即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政府宣告成立，罗斯福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并派出美国军舰阻止哥伦比亚入侵。11月18日，两国政府签署运河开凿条约。美国不但拿到了运河的单独开凿权，还获得一项特权：运河两侧各8公里区域为美国永久租用。

一切都在令人目不暇接的高速度中完成。从11月3日巴拿马“独立”到11月18日美巴缔结运河条约，西奥多·罗斯福戏剧般地用两周时间，在创造一个国家的同时攫取一条运河，让全世界领教了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滋味。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个从来笃信弱肉强食、每一个毛孔都充满扩张气息的西奥多·罗斯福，竟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调解了一场与美国无干的日俄战争。发明硝化甘油烈性炸药的诺贝尔老先生若在天有知，定会被这个硝化甘油的无忌使用者气得吹胡子瞪眼。

但罗斯福只能用一只眼睛去领取世界著名的和平奖了。1904年12月在白宫和一位职业拳击手的较量中，他一只眼睛被击伤，从此失去视力。他是那种极富攻击性的人，当上总统住进白宫也不甘安逸，仍然像西部牛仔那样热衷于角力。

西奥多·罗斯福活到了1919年，不但用一只眼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且用一只眼看见了巴拿马运河通航，还看见了他的堂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1年当选第32任美国总统）像他一样，也当上了海军部长助理。

对他来说，应付这几件事情一只眼已经足够。

为记取62万人生命换来的沉重教训，以民主自由标榜于世的美国，公民誓词中将“永不分裂”置于了第一位。

直至今今天，每一个美国公民仍须向国旗完成如下誓言：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译为：“我站在国旗下对美利坚合众国庄严宣誓，忠于祖国，永不分裂，坚守对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公正。”

为什么以民主自由标榜于世的美国，却在公民誓词中将“永不分裂”放在第一位、置于自由与公正之前？

这里面包含有用 62 万人生命换来的美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教训。在国家扩张道路上一帆风顺的美国，1861 年突然走到了国家分裂的边缘。

持续四年的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军先后有 200 万人走向战场，南部同盟军先后从军的则达 90 万人。这场战争的伤亡人数是空前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死亡总人数是 578 000 人，仍未达到南北战争时期 62 万人的死亡总数。

在这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200 万北方联邦军官兵穿过 112 000 阵亡、228 000 病亡、23 000 亡于意外事故这长长一串死亡名单，走出来 5 位美国总统：

第 18 任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

第 19 任总统拉什福德·海斯；

第 20 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第 23 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

第 25 任总统威廉姆·麦金利。

1861 年 4 月，美国内战爆发，林肯政府号召人们参军维护国家统一。辛辛那提市一位名叫海斯的法务官在日记中写道：“我即便知道自己会在未来的战争中牺牲也决心前往，这将远远强过逃避责任而苟且地存活。”

这位 39 岁的法务官第一批报名参军，在联邦军队里出色地服了 4 年兵役。他初任第 23 俄亥俄志愿步兵团少校时，团里只让这位前法务官处理该团的法律事宜。海斯颇为不满，坚决要求上战斗第一线。他很快如愿。他在前线一直升到上校，成为该团的指挥官。一位部下后来回忆说：“海斯上校在战斗中如狮子一般勇猛，我们经常看到他策马疾驰冲向敌群。”他的另一位部下、后来出任第 25 届美国总统的军士威廉姆·麦金利说：“海斯上校原来的性格特征在战斗中似乎全部改变了。在一次次反复厮杀里面，他变得那样激烈、凶猛甚至残忍。”海斯在战斗中数次受伤，一直在陆军中服役到战争结束，然后退役当选为国会议员。为表彰他在军中的卓越贡献，林肯总统授予他少将军衔。

1876 年海斯当选美国第 19 任总统。他似乎把这一职务看作是军人的一个哨位，一上台便宣布自己只任一届。

海斯总统的继任者、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也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军官，从军前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俄亥俄州海勒姆学院院长。1861年内战爆发他报名参军，以出色的演说为组建俄亥俄第四十二志愿步兵团做出突出贡献，被任命为该团中校军官，继而成为该团上校指挥官。志愿部队在战场广袤的南北战争中是双方的主要搏斗力量，很多从来与军事无涉的文职人员在战斗中迅速跃升。加菲尔德1862年晋升为志愿部队的陆军准将，1863年升为陆军少将，成为美国由学者成为高级军官的典型。

这个典型于1880年当选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左撇子总统，又是最短命的总统之一。上台半年刚过，就在华盛顿火车站遭求职未遂的芝加哥律师查尔斯·吉托的枪击，两个月后去世，成为继林肯之后第二个被刺身亡的总统。

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南北战争爆发时，是印第安纳州最高法院的书记员。最初他置身事外，后来州长奥利弗·莫顿要他组建州志愿步兵第七十团，他完成这一任务如此出色，以至立即就被任命为该团的上校指挥官。哈里森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战斗状态的，他运气很好，跟上了一个杰出的军人。在名将谢尔曼的指挥下，哈里森参加了多场战斗，甚至参加了1864年血腥的亚特兰大战役。战斗中哈里森不避艰险不抢战功赢得豪侠的声誉，1865年获得准将军衔。战争一结束，这位将军便记起法院书记员的业务，于是退役重操法律旧业，并于1888年当选美国总统。

还有一位就是前面几次提到的第25任总统麦金利。麦金利既是第19任总统海斯的老部下，又是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老上级。他评论海斯“在一次次反复厮杀里面，变得那样激烈、凶猛甚至残忍”，对好战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使用他也一直深怀警惕。但这些并不妨碍麦金利本人在总统位置上发动美西战争。他年轻时正是由于在战斗中不怕危险，才得以由普通士兵直升军官的。1861年内战爆发时，麦金利仅18岁，在第23俄亥俄志愿步兵团服役，团长就是后来的第19任总统海斯。最初因作战勇敢，麦金利被选为军士代表。1862年9月在一场激烈战斗中，后勤供应极端困难；他率领一支驮着肉和咖啡的骡队，穿过南军严密交织的火网将给养送到第一线部队手中。此英勇行为给海斯以很深印象，破格提升他为少尉军官，并成为海斯司令部的成员。1865年战争结束时，麦金利的军衔已升至少校。

1896年底，麦金利当选总统。1901年9月第二任内，他在纽约州法布罗

被人刺杀，成为美国第三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林肯总统苦苦寻觅，才从障眼的人堆里拨拉出来一个平静生活中一败涂地、战争烽火里却大展雄才的格兰特。

说到在国家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为维护统一英勇战斗的人们，必须说到林肯。说到林肯，又必须说到格兰特。

林肯为国家统一不惜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其他文职总统比较起来，曾任民兵连长的林肯本应在军事上大展宏图。但这时美国的军事领域，已不再是民兵或国民军的天下，而已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的天下。1817年西点生在军官队伍中的比例为15%，1860年已经上升到76%。不论南方北方，西点军校培养的军官在高级司令部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南、北双方最初都用了一些声名显赫的老将。但后来战争实践证明：双方最杰出的军官，都是西点毕业生。声名卓著的老将们逐步被受过更好的专业训练、有着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军校毕业生们取代。

林肯当时面临这样严峻的局面：南方军队中不但有313名西点毕业生，而且南方总统兼南军总司令戴维斯本人1928年于西点毕业，还担任过皮尔斯总统的陆军部长，是进行战争的理想人选。只有民兵连长经历的林肯，在这些专业军事人才面前确实相形见绌得多。所以直到1864年竞选时，林肯提名参议员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因约翰逊也未受过正规教育，早年在裁缝店当学徒，被南方人讥作“铁路扳道工与裁缝的搭档”。

林肯最终战胜了戴维斯。当然北方代表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强大的人力和经济潜力，但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仍需要有人把它们转化到战场上去，通过枪炮的胜利获得证明。

林肯很苦地寻找了一番。从斯各特到麦克道尔，从哈勒克到麦克莱伦，林肯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从障眼的人堆里拨拉出来了格兰特。

格兰特属于那种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一败涂地、在战争动乱之中却大展雄才的人。少年和青年时代成绩平平，1839年17岁入西点，1843年毕业，在全班39人中名列第21。他曾以中尉军衔参加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战后结婚，但他被派到西部服役之时不允许带家属。苦闷孤独的格兰特开始酗酒。问题发展到上级指挥官下达最后通牒，令他或是停止酗酒或是退出现役的地步。格兰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1854年退役后，岳父在密苏里州圣路

易斯附近给了他一个小农场。贫瘠的农场无法维持他当军官时的体面生活。他把家搬到圣路易斯市，开始搞土地投机生意，很快落入失败行列。接下去做木柴生意和帮人收取账单的工作，也都归于失败。最后不得不靠他的兄弟们帮忙，到伊利诺斯州其父留下来的产业（归几个兄弟经营）皮革店工作，才算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到了1861年，虽然南北战争即将爆发、离格兰特的转机已经十分地逼近了，但家人和朋友都无一例外，认为这个已经39岁、每月才50美元工资、经常酩酊大醉的人，注定是个事业上的失败者。

1861年内战爆发，北军非常缺乏良好训练的职业军官，格兰特迅速升为伊利诺斯州第二志愿步兵团上校，因屡建战功，1862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863年在维克斯堡、查塔努加获得辉煌胜利被赞为“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军官”。（国会连续为他提供前所未有的最高军衔）1864年初国会恢复了陆军中将军衔，此前这个军衔只有美国独立革命战争英雄乔治·华盛顿和美墨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获得过。格兰特成为第三人：该年3月9日，林肯总统授予格兰特达这个最高军衔，并任联邦军队最高司令。1865年内战结束，他成为国家英雄，走到哪里都要被欢呼的群众包围。

就美国历史来说，南北战争的英雄除了林肯，便是格兰特。格兰特又比林肯幸运：后者遇刺那天晚上格兰特和夫人婉拒了林肯总统的看戏邀请，侥幸躲过了福特剧院那场暗杀。1866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full General），在此之前只有华盛顿拥有这个军衔。但这回给他的任务已不再是打仗，而是复员军队，重建法治。他开始接触政治。1867年至1868年任陆军部长。1868年底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选。他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人，却对担任总统之职毫无准备。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毫无经验，结果却也能把政治问题处理好。两届总统任内，对南部重建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取消“黑人法典”，建立黑人白人混合政府，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通过宪法第15条修正案给黑人以平等权利等。

格兰特此人的确十分怪异：处理国家事务井井有条，处理个人事务却一塌糊涂。担任两届总统后他卸任了，仍然有极高威望。在周游世界、会见数十位各国领导人之后，回国后在纽约置办房产，投资银行业，结果他的生意迅速破产，格兰特突然发现他又处于没顶的债务之中。过去他一天要吸20根雪茄，现在发现患有咽喉癌，而且身无分文。再度蒙受极度贫穷羞辱的格兰特拒绝接受慈善援助，而和出版商签了一个出版回忆录的协定。他忍受着巨大病痛昼夜兼程，开始了这个艰苦的工作。

这是他一生中个人唯一做成的一笔交易：自传回忆录一直写到1885年夏天他去世前四天才告完成。其一生大曲大折大起大落的经历，使这本书变成了一部畅销的名著，他的继承人由此继承了近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什么样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

杜鲁门虽然被人忌恨，也没有简单到只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符号

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能忆起小时候听惯了的一首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山上的杜鲁门！”这个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军队派到中国大门口来的杜鲁门，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简单到了只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符号。

长大以后才知道，还没有那么简单。

杜鲁门从小眼睛高度近视，但并未妨碍他的两大爱好：音乐和阅读。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钢琴。每周两次去上本地音乐老师的课程。这种枯燥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5岁，对一个活泼好动的少年来说的确不易。阅读时，杜鲁门对军事历史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一周要看四到五本这方面的书籍或人物传记，对那些重大战役的过程和伟大人物的经历非要弄到清楚详尽为止。这些书使得少年老成的杜鲁门变得容易激动，有时甚至趾高气扬。但家庭地位与他心中的抱负并不相称。他父亲以贩骡和农耕为业。1901年杜鲁门高中毕业后，付不起学费无法上大学。但他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他心中的梦想是入选西点军校。在西点军校因视力原因把他拒之门外之后，这个戴厚镜片的少年才真正痛心不已了。他后来当过新墨西哥首府圣菲的铁路计时员，堪萨斯城“堪萨斯星报”投递员，国民商业银行职员，联合国民银行记账员。1906年回乡甚至还当了一段农场主。1914年他的父亲去世，继承父业他成为城镇公路监督，还干过地方邮政局长。后来又与人合伙在密苏里开采铅矿，赔钱后转到俄克拉荷马勘探石油。没有正规学历的杜鲁门干尽了能找到的所有职业，业余爱好却始终不变：读历史与伟人传记。后来他当上总统后人们才发现，他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深刻，甚至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

战争是杜鲁门的转机。在美国正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已经卖光

自己的所有股份参加了陆军。俄克拉荷马州塞尔堡的军事训练使他兴奋不已。1917年，他终于从密苏里第二野战炮兵团获得了陆军中尉军衔。1918年3月30日，新提升为上尉的杜鲁门乘船在法国登陆。他负责指挥D炮兵连。这是一个出名的因吵闹混乱而不服管理的连队，绰号“Dizzy D”，意即令人头痛的D连。没想到在戴着厚眼镜片的连长治理下，“Dizzy D”被弄得井井有条，在圣米海尔和阿格尼战斗中表现十分卓越。杜鲁门也因作战勇敢和管理有方而崭露头角。但战争很快结束，1919年4月，来不及更多施展的杜鲁门以少校军衔退役。

他真正施展是在1945年4月，当罗斯福总统像一棵被伐倒的巨树轰然倒下之后。因党内力量平衡考虑出任副总统的杜鲁门，接掌总统职权时引来的是一片嗤声。杜鲁门能否和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打交道？能否收拾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残局？小人物行动了。他用《波茨坦协定》表明他能够平起平坐地与斯大林打交道。用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证明他能够收拾二战残局。出于对战争史的了解和对军事行动的热衷，前陆军少校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中不多见的“动作派”：敢于铤而走险、敢于单干、敢于个人负责。

丘吉尔是“冷战”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杜鲁门是该概念最坚决的行动者。1947年，他建立中央情报局，1948年批准“马歇尔计划”，1949年成立北约，1950年6月派遣美军入朝作战，同时封锁中国的台湾海峡。1951年4月，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掉了美国最负盛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职务，因为后者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杜鲁门如自己所言，是一个“拼死命干的”总统。

拼死命干的杜鲁门下台后欠的东西很多。日本人对他那两颗原子弹至今耿耿于怀。中国也感慨，如果当初他不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们今天还用为祖国统一熬神么？

艾森豪威尔阴错阳差：不想从军偏从军，想当海军偏当了陆军

如果说美国总统中有人从军是出于无奈，首当其冲者便是这位获得最高军衔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绝对不是一个自幼爱好军事、从小就想习武之人。

他从小喜欢体育。高中的艾森豪威尔已是运动明星，特别喜欢担任那些冲击性的角色，如棒球的外野手，橄榄球的阻截手。这些运动项目几乎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以致除去他最喜欢的历史之外，其他功课皆成绩平平。高中毕业后他和哥哥艾德加都想上大学，家庭却无法负担他们的学费。艾森豪威尔的

父亲是乳品工厂的机械修理工，挣的工资仅够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家中商定了一个办法：兄弟两人轮流工作，用一人的收入供养另一人上学。

1909年秋天，艾森豪威尔去了父亲工作的乳品厂。那一年他给上学的艾德加寄去了200多美元。第二年他突然悟出一条免费上大学的路子：入军官学校。他并非渴望成为军人，仅想获得免费教育。他首先选中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但年龄已过入学标准，不得已才转入对年龄的限制稍宽的西点军校。西点的入学考试同样竞争激烈。艾森豪威尔放弃了一切爱好，专心刻苦学习，1911年终于获得进入西点的任命。

在西点他注意力仍然在运动场，学习平平。一次橄榄球比赛他膝部严重受损，从此退出球队。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如此之大，他决定退学。申请书交了上去，硬是被同学们扣留下来。他是在周围伙伴的劝阻下，才坚持到1915年毕业的。在同级164名毕业生中，艾森豪威尔名列第61。

毕业以后依然不顺。他被分到得克萨斯州萨姆休斯顿堡第19步兵团任陆军少尉，遇见一位18岁的姑娘詹尼弗·杜德，一见倾心。他们开始约会。但女孩的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当兵的”。1916年他们结婚时真不知艾森豪威尔做何感想：自己不情愿成为军人却偏偏成为了军人，老丈人不愿女婿从军女婿却偏偏从了军。

西方有句名言：“战争是人类的不幸，没有战争却又是军人的不幸。”如果没有战争，艾森豪威尔与和平时期的军人定无差别：先服役再退役，拿退休金买一小块农场安度平庸的一生。对这位后来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五星上将来说，幸亏有了战争。是战争最终调动了他的全部情绪和精力，他以比当初投身体育运动高出数十倍的热情，投身于他当初并不情愿的军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领教了什么是战争。令他懊恼的是未获得派往欧洲战场的机会。从欧洲凯旋的装甲部队根据《1920年国防法》被缩编到只有2600名士兵，主力是驻扎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两个小坦克营，两个营长后来都名贯世界：一个是乔治·巴顿，另一个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除战争而外，将艾森豪威尔军事生涯推向顶点的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作为低中级军官，他得益于利文沃思的训练；作为高级军官，他得益于母亲的指点。

艾森豪威尔1926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利文沃思堡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的。该学院要求甚严，军官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平均每年有一位学员自杀，以致陆军曾想关掉这所学院。但正是严酷的竞争环境使艾森豪威尔打下了扎实

的军事根底。他后来回忆被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选到作战计划处工作时说：“我曾经在竞争性极强的利文沃思首屈一指。我认为马歇尔比较重视利文沃思的训练。”

利文沃思的教育奠定了他的军事素养，母亲的教诲奠定了他做人的风格。

他出生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两个哥哥和他从小就学会了喂鸡，清晨早起用木柴生着炉火，稍大一些便外出寻找挣钱的工作。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竟然不记得什么时候不用干活而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每天晚上全家人要在一起读《圣经》做祈祷。每个星期天则去教堂做礼拜。

贫困沉闷缺少色彩的生活使艾森豪威尔从小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喜欢动拳头，经常参加打架斗殴。某次万圣节前夕，他未被允许和两个哥哥一道去做一种叫作 trick-or-treat 的挨家挨户要糖果的传统游戏，生气至极，用拳头朝一棵苹果树的树干猛烈击打，直到双手鲜血淋淋。母亲用纱布包扎他的双手，谆谆告诫他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脾气。母亲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一个能够统辖自己精神的人，比占领一座城市的人更伟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一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出任欧洲盟军总司令后，表现出了空前的君子风范。他把包括美、英、法等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利益、被不同的军事教范培养出来的指挥官们团结在一起，消除摩擦、解决冲突、淡化矛盾、协调行动……这个当初以脾气暴烈著称的少年在最高司令官任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耐心，盟军也正是在这个杰出的协调者、仲裁者和平衡者指挥下，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翻船的危险。艾森豪威尔从来没有忘记时刻告诫自己。1945年1月，他响应前方急需O型血的呼吁去献血，从血站出来被门口排队的士兵们看到。一个士兵悄悄地说：“哎，他的血是值得一争的。有了他的血，也许我就能成为将军了。”艾森豪威尔听到这话，回过头来对士兵笑着说：“真是如此的话你要小心，不要继承了我的坏脾气。”

他在1953年成为美国第34任美国总统，是所有获得军衔的美国总统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也许正是这点使艾森豪威尔成为一道分水岭。在他之前，所有获得军衔的总统皆来自陆军；在他之后，所有获得军衔的总统皆来自海军。

零式战斗机在珍珠港倾泻下的炸弹，将后来的总统都推向海军

除艾森豪威尔之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位美国总统清一色来自海军。他们是：

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鱼雷艇艇长，海军上尉；

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前方观察官，海军中尉；

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运输勤务官，海军少校；

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航空母舰舰员，海军上尉；

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核潜艇艇员，海军上尉；

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海航飞行员，海军少尉。

二战中多位未来的总统集中于海军服役，这真是一个奇特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是从珍珠港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日本零式战斗机呼啸而下、将美国太平洋舰队炸得溃不成军之时，热血沸腾的美国青年报名参军，便纷纷选择了美国海军。

肯尼迪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战争还未爆发。本来陆军还能交一届好运，因为肯尼迪最先报名参加的是陆军。但与陆军失之交臂。1941年春天体检时，肯尼迪因在哈佛大学体育竞赛中脊椎受过伤而被陆军淘汰，紧接着战争爆发了。经过5个月特殊锻炼的肯尼迪通过了海军的体格检查，成为一名海军军人。1943年他担任太平洋舰队PT-109号鱼雷艇指挥官。该年8月在所罗门群岛附近一次夜战中，肯尼迪的鱼雷艇被一艘日本驱逐舰击成两截，12名乘员2人当场死亡，肯尼迪和其他幸存者在海水中抱着艇体残骸坚持数小时、救援希望破灭之后，开始游向5公里外的一个小岛。肯尼迪背部脊椎本来就有旧伤，他竟然还能用牙齿紧紧咬住一个受伤水手救生背心上的布带，拖着这个伤员游了数个小时，最终被当地人救上克罗斯岛。岛民把他要传递的信息刻在椰壳上，送给了美国陆军的一支巡逻侦察队，使肯尼迪和其他艇员最终获救。为表彰他的“勇气、坚韧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他获得美国军队的最高军功章——紫心勋章，并获得海军和陆战队的勋章。

海军上尉肯尼迪最后从事了政治，他说是为了继承在空军服役的哥哥的遗志。1944年，肯尼迪的哥哥约瑟夫执行轰炸比利时的任务时阵亡。约瑟夫入伍前一直想从事政治。肯尼迪决定接过其兄的计划。在家庭的全力支持下，他从众议员、参议员一直到当选美国总统。肯尼迪回忆说：“仅仅在我哥哥阵

亡之后，我才做出自己从政的决定。如果哪一天我也遇险，弟弟罗伯特会紧接着竞选我在参院的这个席位。如果罗伯特发生什么事情，小弟弟爱德华还会继续。”他不幸言中。作为总统他于1963年遇刺身亡。作为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人的罗伯特于1967年遇刺身亡。肯尼迪家族的最后一人：参议员爱德华仍然在竞争总统候选提名人。这个家族从事政治就像他们从事战争一样，前仆后继，严肃认真。

第35任总统肯尼迪是先参军再从政，第36任总统约翰逊则是先从政再入伍。

约翰逊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身高仅次于林肯，位居第二。他16岁高中毕业时已经长到1米90，精瘦、不安分、热衷漂泊的生活。他与几个朋友从家乡得克萨斯开车去加利福尼亚，到处打零工。在大楼里开电梯，到农场摘水果，上大街洗汽车，还干过一段时间咖啡厅招待。然后又返回家乡，两年多时间从一个职业漂泊向另一个职业。最后才悟出还是返校学习。1930年，他在西南得克萨斯学院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成为一名高中教师。1931年成为该州一位议员的秘书。1937年中得克萨斯选区的众议员突然去世，不得不进行特殊的补选。约翰逊的妻子和当地朋友为他凑了1万美元，他针对其他9个竞争对手，开始了颇富进攻性的竞选运动。这9人都比他知名，但只有他一人是罗斯福总统的完全拥护者。最终他以高票击败所有对手。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在得克萨斯州休假钓鱼，马上会见了这位新当选的28岁众议员，并把他带上总统专列，同去华盛顿。这层关系给约翰逊造成了极大的便利，初进众议院就被人刮目相看。

约翰逊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在国会充分表现出了他这个特点。他要求手下工作人员与他一样每天工作12~15小时，他的办公室规则之一是每封来信必须在24小时内回复。一个朋友后来回忆：“每个认识他的人对他后来的成功都不感到惊讶。不论何地从政的青年如果真有榜样的话，那就是刚进国会那几年的林登·约翰逊。”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约翰逊利用在海军委员会的地位，在得克萨斯州科柏斯克里斯蒂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海军训练基地，在休斯敦建立了一个海军船厂，在达拉斯建立海军预备役基地。他的国会选区沿海地带几乎被他推动建设的军事设施布满。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约翰逊报名参加海军。他是国会中第一个穿上军装的

议员。作为一名预备役海军中尉军官，他必须到海外服7个月现役。他去了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在那里他有过相当危险的经历：一次执行巡逻观察任务两架飞机凌空相撞，约翰逊竟在这个毁灭性的事故中奇迹般地生还。既惊叹他的运气又为表彰这位在南太平洋服役的国会议员，麦克阿瑟上将亲自把一枚银星勋章别在了他的胸前。

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以律师身份被政府征召到处理紧急事件的办公室工作的。干了6个月，他厌恶透了那里的官僚作风，于是1942年8月报名加入海军，以一名海军中尉身份被派到海军空运司令部，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担任航空运输地勤军官。他未能直面和日本人的战斗，1946年以海军少校身份退役。

第38任总统福特参军前也是运动迷。他1931年以出色的美式足球技术赢得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1932年和1933年密歇根大学队连续夺得全国冠军，福特是球队中锋，被评为全美最佳球员。1935年大学毕业时，两支国家足球俱乐部的专业球队底特律狮队和绿湾包装者队找上门来想和他签约，他却选择去耶鲁大学法学院。福特在耶鲁不但当校足球队助理教练，还当从未从事过的拳击队教练，在他看来目的单一：都是为了筹措上学资金。他1941年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从耶鲁毕业，刚与一个老同学开设一间法律事务所，就赶上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福特立即将事务所关闭，报名参加海军。在短期的作战训练后，他以一名现役海军少尉身份登上轻型航空母舰蒙特罗号，服役于南太平洋。他亲眼看到那些空前残酷激烈的战斗场面。他本人经历的最大危险，是1944年的一场台风，几乎把他从甲板上刮到海里。战争结束后，福特以海军上尉军衔退出现役。

第39任总统卡特从军受家族影响。卡特的父亲是种植花生的农场主，卡特有一个在海军服役的叔叔，经常从国外港口给他寄一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明信片回来。就是这些明信片使从小随父亲在花生地里劳动的卡特，萌生了一定要进入美国海军军官的摇篮——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的梦想。卡特在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进入海军军官学院，是家庭中第一个进入大学院校的人。1946年毕业时战争已经结束，他在820名学员中名列第六十，被分配到“海狼”号核潜艇上服役，随后为美国海军核潜艇之父、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工作。里科弗卓越的才识、冷峻的工作方式和严守纪律的习惯，给年轻的卡特留下了长久不灭的印象。卡特在海军7年，5年在潜艇上服役，并参加制订核潜艇计划。

1953年父亲被诊断患有癌症，他才以上尉军衔退出现役。海军少了一名军官，美国却又得到一位总统。

第41任总统布什1942年从马萨诸塞州菲利普斯学校毕业时，年纪刚刚18岁。他是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校垒球队长和足球队长，并且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当时美国已经进入战争。布什没有去耶鲁，而去海军报名，进入了海军预备役飞行训练。1943年6月他获得海军少尉军衔，成为当时海军最年轻的飞行员，在太平洋舰队任轰炸机驾驶员。1944年9月2日在执行一次轰炸日占岛屿的作战任务中，飞机被击中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阵亡，布什跳伞落在海里竟然遍体无伤。他运气很好，不但未被附近岛上的日军俘获，而且很快被一艘路过的美国潜艇救起。因飞机被击中坠毁之前准确摧毁了日军一个关键的无线电台站，布什获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他在战争结束后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进入耶鲁大学主修经济。1948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1971年至1972年任美驻联合国大使，1974年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6年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当选为副总统，1988年底当选第41任美国总统。

以上这些人，就是我们说的“曾经当过兵”的美国总统。

本文并非要解答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美国总统。这个命题也许永远没有准确、固定的答案。本文主要揭示什么样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

美国建国200余年，从一个400万人口的小国，一跃成为一个两亿人口、93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头号强国，其中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和思索。当然有对奴隶的盘剥，当然有对海外的掠夺。当然与欧洲众多帝国的发迹史一样，有资本完成每一分积累时溢出的累累罪恶。但这一定还不是它的全部。它一定还有某些自己独特的东西，否则它早该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预言的那样衰落。

所谓“美国之谜”，其中未及探索的因素肯定很多，从“总统”这个国家代表人物身上，我们也许可以管中窥豹。没有哪一个美国人敢说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总统毫无关系。这些总统的经历在折射国家和民族的经历。他们的作为在国家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他们有必然的一面，也有自由的一面，从来还没有简单到只是某个财团的符号，抑或只会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向选民许诺、唇枪舌剑地与对手争吵。这些经历各异、爱好庞杂、教育参差不齐、大多出身卑微的美国总统，一旦国家有难，大多身先士卒。对我们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若隐若现的道理：个人是可以在国家进程中注进自己生命的，如果你献身

于这个国家的话。

最后也应该记住两个逃避兵役的美国总统。

一个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当选两任，即第 22 和第 24 任的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后，与克里夫兰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在联邦军中服役，克里夫兰却借钱雇用了一个人代替他服兵役。这种行为为北方当时的《联邦征兵法案》允许，并且普遍在北方使用。克里夫兰后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 16 岁父亲去世后就不得不辍学工作，挣钱养活母亲和姐姐。一旦服役，家中就没有了支柱。

另一个逃避服役的，是 1964 年中学毕业的第 42 届总统比尔·克林顿。他之所以不愿去遥远的越南热带丛林履行服兵役的职责，据说是因为他反对这场战争，而且已经加入了反战组织行列。

作为中国人，我愿意相信克林顿逃避兵役的理由。

从“克林顿主义”到“软柿子主义”

美国自 1817 年门罗当选总统以后，曾出现多个总统的“主义”，如“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胡萝卜加大棒的罗斯福主义，遏制共产党运动的杜鲁门主义、收缩美国在世界各地插手深度的尼克松主义等；进入 90 年代中期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总统新主义——“克林顿主义”。

什么是“克林顿主义”？有人说其核心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以人权为借口的干涉都可称为克林顿主义。这就把手段与目的混淆了。克林顿主义最初来源于克林顿首届政府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外交政策阐述，他说，“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维持一超多强的世界，才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

所以这个主义的支柱之首，就是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冷战结束，美国也在单方面提升技术优势，力图在各类冲突中占居压倒性地位。它干涉伊拉克、干涉波黑、干涉阿富汗、干涉朝鲜半岛、干涉古巴、干涉台湾海峡、干涉科索沃等，手伸遍了世界。冷战结束没有几年，西方媒体统计，1993 年至 1996 年，美国对 34 个国家进行过经济制裁，1990 年至 1997 年，美国对外用兵 42 次，空中作战次数比冷战时期增加了 400%。

“克林顿主义”有强大的军费支持。1998年美军费开支2760亿，占世界总军费的三分之一，是美国之后前8位国家的总和。1999年9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总额为2889亿美元的2000财政年度国家防务预算。这项预算比克林顿总统提交国会的防务预算还多出83亿美元。这是美国80年代以来军费增加最多的一年。克林顿宣称，从2000年至2005年的6年，军费还要增加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60亿美元以上。

利用资金和技术，美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不接触战”。这是下个世纪初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新形态，即利用其技术优势，以远程突击兵器从空中和海上对敌方进行长时间精确火力突袭，瘫痪对方指挥系统，重创对方战争潜力，迫使对手屈服。科索沃战争是近代战争史上第一次未经地面交战、靠“不接触战”便基本达成战争目的的典型战例，也是执政进入第八个年头的克林顿政府显示其主义的顶峰。

就是在顶峰，“克林顿主义”感到了捉襟见肘。打一个科索沃，美国空军力量使了接近三分之一，空射巡航导弹几乎耗尽。因为F-16等机型已经停产，24小时不间断轰炸造成作战飞机备件严重不足，不得不拆卸国内现役战斗机紧急补充。飞行员不足，只能“疲劳飞行”，同时紧急动员国内预备队员。美国空军的一份备忘录称：“作战部队已处于困难时期，几乎没有可供使用的备用发动机，战时装备已近耗尽。”美军中央总部的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对地攻击飞机，太平洋总部的航空母舰都调来配合行动。如果说美国在一个局部的空袭作战中就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同时打赢两场主要战区战争”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科索沃战争在美国军政人员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

1999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西方政界普遍认为克林顿要借科索沃得手之机，将全面揭示“克林顿主义”，但9月21日克林顿向联大发表的演讲却令这些满怀希望的人大失所望。克林顿说，“我们无法处处及事事干预”，“军事干预并非永远恰当，有时政治及经济压力反而更能奏效”。演说后各国代表掌声疏落，与1998年演讲后获各国代表起立鼓掌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安全顾问柏杰在事后表示：“美国无能力也无责任援助每个有困难的人群。”

克林顿讲话第二天，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引用美国政府人士的话，将新干涉主义即“克林顿主义”归纳出五个因素，“如果外国危机（同时）具备下列5个因素，政府将倾向于采取行动”：

（一）内战、分离主义、种族冲突等暴力行动升级到足以引起世界的关注。

(二) 冲突发生在前苏联和中国领土以外或与之接壤的地区之外。

(三) 只需小规模军事行动且无太多伤亡即可奏效。

(四) 与盟国达成协议，美国不孤军奋战。

(五) 危机的周边国家没有维和部队或力量不足时。

西方将这五条称为“惹不起就不干预”战略。对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和车臣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克林顿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软柿子主义，拣软的打，拣弱的打，拣名声不好的打，拣容易得手的打，拣便于抽身拔腿的打，它并没有做好与一个大国对抗的准备。

“克林顿主义”目前的力不从心在亚洲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表现在朝鲜问题上，按照伊拉克和科索沃模式，美国必定会非常强硬地对待研制战略武器的朝鲜，更何况朝鲜经济形势困难，正是乘人之危的良机。但实际上美国人相当谨慎。谋求接触和谈判，争取在讨价还价基础上互相妥协。用取消部分经济制裁，给予经济援助和民用技术资助，换取朝鲜让步，做出暂不试射新型远程导弹的允诺。“克林顿主义”在朝鲜问题上的审慎和节制，主要来自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及其后果的判断。科索沃战争表明，军事强权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但在面对美国地面部队也许要大规模介入的问题上，它不敢勇往直前。

“克林顿主义”在亚洲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地区起作用的历史经验，与其说是科索沃战争的“胜利”，不如说仍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它使美国人无法以伊拉克模式或科索沃模式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当李登辉突然抛出“两国论”，指望有美国人来替他火中取栗，克林顿的恼火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应该让李登辉明白，“美国不喜欢台湾在假设的基础上做出声明，即假设万一他们挑起与大陆战争，美国就会来拯救他们”。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包道格说，“我们并没有承诺会不惜让美国子弟兵流血”。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则被国会指为“使用非常粗鲁的言辞辱骂李登辉”，因为布莱尔在参议院做证时说，美中关系好比一杯调好的鸡尾酒，台湾李登辉是杯中突然发现的一块鸡屎。

美国人大光其火，因为李登辉为常年征战、常年干涉、手伸得太长、事管得太多、已接近承受力极限的美国军队出了一道难题，设了一个陷阱。自越战

以后，美国所有军事干涉行动都离不开“快速”和“不深陷”这两个特点，都以容易得手的弱小者为干涉对象，以易于脱身的地区为作战地点，以能够号引起民意的像样借口为动手理由，尽量不出动地面部队——海湾战争地面战只有100小时，科索沃战争则干脆拒绝地面战——同时还要拉起一个“联盟”。它已经下决心绝不再单干了，尤其是再也不替别人去背负十字架。

从这一点看，“克林顿主义”也与最先的“门罗主义”一脉相承，仍然是有利就图、无利便撤的主义。

研究雷锋和孙武的美国军人

自从有人发现西点军校贴出雷锋照片之后，“美国军人也开始学雷锋”之说曾热闹过一阵。后来有机会访问西点，并与该校毕业的一些美国军人交换看法，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点军校有一个例行做法：定期向学员们介绍外国军队。他们确实贴出过雷锋的照片，介绍过雷锋的事迹，这些事迹也确实让一些美国军人有所触动，但他们的目的是让学员“熟悉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包括他们的偶像”。通过雷锋了解一支他们不甚熟悉的武装力量，并非他们也要开始以雷锋为榜样。

发现美国军人学雷锋是假的同时，却看到他们在认真地尊崇与学习另一个中国偶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1997年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时，我们得到的第一本赠书，是装订精美、全红皮封面的《孙子兵法研究》，全部由该校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该校是美国最高军事学府，它的学术主任绍尔上校告诉我们，很多美国军官都看过孙子的著作，美国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多所军事院校中都开设有孙子兵法课程。很多对中国并不熟悉的美国军官，说起孙子兵法竟然能够侃侃而谈。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雷默上将就说过，运用复杂技术装备的数字化部队，其战斗力的核心是瞬间回答三个问题：我在哪儿？友邻在哪儿？敌人在哪儿？三个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孙子的“知己知彼”。雷默讲这句话是1998年的事情。该年5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布鲁赫海军上将访华演说时，也多次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下级、太平洋舰队第五航母大队司令史密斯少将则在1995年访问青岛时对采访者说：“《孙子兵法》是一部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军事著作。1973年在罗德岛纽波特海军军

事学院深造时，我的一门选修课程就是这部书。我对孙子的哲学，包括它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都非常有兴趣，我认为《孙子兵法》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实用的地方。所以二十多年前看过的那本《孙子兵法》，一直保留到现在。”

这些美国军人如此钟情于中国的孙子兵法，不是追求表面文章，更不是寻求一种深奥玄妙的理论装装潢。他们力图探索的，是指导实践的制胜之道。1996年3月我军在台海地区演习期间，亲自向台海地区部署美国航母编队的，就是那个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威慑精要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布鲁赫上将；率领“独立号”航母编队最先到达台海附近地区的，又是那位揣了二十多年《孙子兵法》的史密斯少将。

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雷锋与孙武，是两位完全不同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同类型的中国著名军事人物。如果说美国人想通过介绍前者，捕捉中国军人特定的精神风貌，那么他们又想通过研究后者，获取一种普遍的制胜之道。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军战场总指挥、中央总部司令弗兰克斯就说过，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幽灵，似乎徘徊在沙漠上每部向前推进的战争机器旁边。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位陆战队上将脱口而出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几乎与他讲话同时，进入伊拉克战场的美国陆军第三装甲骑兵团也在引用同一句话，教育该团的官兵。同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句话，弗兰克斯与第三装甲骑兵团引用的却不是同一个英译本。弗兰克斯引用的英译是“Precise knowledge of self and precise knowledge of the threat leads to victory”，直译为“制胜要素是准确地知道自己和准确地知道威胁”。第三装甲骑兵团引用的英译是“If you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you need not fear the result of a Hundred battles”，直译为“如果你熟知敌人并且也熟知自己，那么你就不用担心未来战斗的结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被翻译如此，说实话，两个颇为累赘的译本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传达中文语义的精妙。意思虽然都在，语言的美感却完全消失。至于还有没有其他译本或还有多少个其他译本，可能谁也说不清了。可以估计的是，无论怎样翻译，也难以完全传达中文原文的神韵。

也许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以上那些翻译哑然失笑。但当美国军人把我们认为很有些变味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奉若经典、如饥似渴地吸收其中养分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其实是另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并不在意语言是否精妙或概念是否完美，而在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尤其在思维推动行动的成效。

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以直接攻击对方指挥中枢甚至指挥者本人的“震慑”行动开始，而所谓的“震慑”理论，就是曾任美国防大学教官的乌尔曼博士参考《孙子兵法》以后的创造。乌尔曼说，“我一直在思考像孙子所说的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在这一意识基础上，他同其他美国同行提出了“震慑”战略。

不管美国人如何对待雷锋，也不管美国人如何对待孙子，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到对方一条清晰的思维主线。他们在竭力追求了解对手，竭力追求胜过对手。

当我们在骄傲自己辉煌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之时，当我们热衷于把《孙子兵法》作为一门高深学问加以学术式研究和理论意义评价之时，美国人却在从中国古老渊远的军事理论中，发掘出指导现代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不光是我们的“道”；我们还必须防备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的确是我们必须思索、必须警惕和必须转变的。

那些美国女兵

一支大口径手枪

1997年10月初到美国，因工作所系，接触最多的是军事单位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注意到那些美国女兵。

当我们进出美国防大学所在的麦克奈尔堡、华盛顿军区所在的迈耶尔堡，国家海军学院所在的塞文堡、陆军军事学院所在的卡莱尔兵营及陆战队大学所在的昆特克尔陆战队中心的时候，经常见有女兵着一身迷彩服，穿高帮作战靴，神气十足地站在警卫哨位上。认真检查过车辆和过往行人证件后，如果你是军官，她会举起右手非常麻利地向你敬礼。有时候车已经开出去老远，你才突然悟出刚才那个帽檐压得很低的哨兵是女性。

当时涌入脑子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让女兵干这个？

假日的西点军校，参观的人流在绿树如屏、绿草如茵的西点游览区穿行。几个学员跑步过来，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其中一位是女性。

林荫道的岔路上走来一个由高年级学员担任的值日官。女学员踉踉跄跄地站住，立正，向值日官敬礼，大声报告，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通红的脸颊。

本也很年青的值日官一脸严肃，将保持立正姿式的报告人审视一番，才还

礼放行。

我们站在一旁，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种场景。望着那个作训服湿透的女学员远去的背影，才记起来是二十多年前看过的日本战争片《啊，海军！》。

但这里不是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这里是西点要塞——美国陆军军官学院。为什么把这些女孩训练得也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

开始对她们形成一个较完整印象，是在包林空军基地看见那支口径硕大的手枪之后。

华盛顿周围有两大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和包林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的专机通常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降，总统的直升机则通常在包林空军基地维修与停放。因包林空军基地离白宫较近，白宫卫队的黑色警车都停放在这里。基地内一幢独立警戒的银灰色办公楼，则是高度机密的国防情报局。

所以包林空军基地戒备很严。

那天上午我们在包林基地吃饭。我要了几样菜，端着托盘没走几步，视线立即被引向门边脚落里那张餐桌。有两个女兵坐在那里，胳膊排得很开，就着托盘一边吃一边饶有兴致地谈论。我站在那里能看见一个人的背影，一个人的侧影。一下抓住我视线的，不是两人全身的迷彩服和高靱作战靴。我看见那个背对着我的女兵，后腰上挂着一副锃亮的手铐；侧对着我的女兵，腰带上有一支硕大的手枪。

从伸出深棕色皮套的枪柄长度来看，枪的口径一定不小。

这是一个基层军官和士兵的餐厅，因为是休息日，吃饭的人并不很多。我立刻改变原来的方向，坐到了她们旁边的空桌子上。这时候看得仔细了，两个人的腰带上几乎被各种“家伙”坠满：黑色步话机、黑色警棍、雪亮的手铐，和沉甸甸的大口径手枪。两人的左臂上佩戴着黑色袖标，上面“MP”两个白色大字分外醒目。

这是军事警察的缩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宪兵。宪兵是一支主要维护军队内部安全、内部纪律与各种条令制度的武装纠察力量。通常由军队中可靠的、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人担任。

现在我面前的“可靠的、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人”，竟然是两个女兵。

她们两人动作很大，边说话边吃饭，一点也不影响速度，也一点不见女性的胆怯和扭捏。如果不是摘掉帽子后露出一头绾起的金发，你从她们的着装、言谈、举止，几乎完全看不出这是两位女性来。

连吃饭也携带武器的女性。

望着她们佩戴全副装束吃完饭端着盘大步流星而去的背影，还必须得说：这是两个雄赳赳的女性。

后来很长时间脑子里中一直浮现这两个宪兵。当兵时间不短，为什么偏偏这两个腰上挂着大口径手枪的女兵，让我重又想起军人与武器这个古老的命题。

军人离不了武器。而军人最基本的、最通用的武器，莫过于枪。但这条定律对女军人似乎不适用。多年来我看惯了以唱歌跳舞为武器的女军人、以手术刀注射器为武器的女军人、以接线塞和话筒耳机为武器的女军人；除非八一射击队的专业射击选手，我已经习惯不再把女军人与枪画上等号。

“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不是本应该属于我们专有的么？

后来在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又看见了几个专心检索文献的陆战队大学的女学员。她们与男军人一样，一个个迷彩服的袖子挽得老高，作战靴踩得吱吱响，即使在计算机前检索信息也全身戎装，一副随时准备应急出动的架势，无一人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退役陆战队上校格罗夫告诉我们，陆战队是美国武装力量中战备程度最高的，随时准备出动的概念属于所有军人，不分男女。

也许正是这些严格的要求，使得美国女军人军味十足、兵味十足。她们正在担负传统男性军人才能担负的任务。美国人告诉我们，自1993年4月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取消了禁止妇女参加海上和空中战斗行动的禁令后，美国女兵不但进入了空军的战斗飞行航空联队、海军的海上舰艇编队，而且也进入陆军步兵师、骑兵师（空中骑兵）、装甲部队和工程兵部队，直接介入各军种未来的野战行动。女飞行员驾驶舰载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从航母起降，女驾驶员操纵装甲战斗车在褶皱起伏的原野上奔驰，对美军已经不再新鲜。

常说男女平等。美军正在把这种平等化解为面对同样的挑战、战胜同样的危险。

我不知道爬出战斗机座舱摘下头盔，或走出莽莽丛林抹去满脸油彩的女军人，穿上她们原来的衣服、恢复她们原来的打扮会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一旦当兵，她们就与原来的自己告别。她们自己和她们的上级，首先把她们当作一个兵，其次才是一位女性。没有人觉得她们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兵。

这倒不完全是出于她们的自觉。很多时候，这是军队性质的强制。

从孙武训练宫妃开始，这条道理就被反复证明：没有强制，就没有了军队。

一枚 32 美分邮票

1998 年 10 月 19 日，天空灰蒙蒙的，不时飘下零星细雨，五颜六色的秋叶一片片粘在湿漉漉的地上，拂过脸面的微风清爽且寒冷。透过波特马克河望去，利剑一般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也隐没在沉沉阴霾之中。

我们这一天的安排是去阿灵顿公墓。那是一片占地 612 英亩、由美国陆军部管理的国家墓地，共葬有 240 000 具遗骸，大部分是军人，且大部分死于战场。听说平时去的人并不多，加上又是阴雨天，想必人更少了。

果然，街道上、地铁里人丁稀落。

还没到阿灵顿，地铁里人慢慢多了起来。到阿灵顿准备下车时，随着扩音器里传来列车员沉静清晰的报站声，车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我们是跟着人流下车出站的。起初不过是一节车厢的人流，后来竟像小溪汇成河一样，变成了一列地铁列车的人流。后来再加上对面到站的双向地铁的人流，走出站口后，乘地铁者与步行者和开车者竟汇合成一股规模可观的人流，在蒙蒙细雨中向远处高地上的阿灵顿公墓颇为浩荡地走去。

这真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在华盛顿，即便是最热闹的购物中心，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

还未到门口，就看见排起的长队。划着弧线、转着圈地排，像我们抢购紧俏商品一样，旁边还有公园警察拉隔离线，维持秩序。

的确是在抢购紧俏物品。10 月 18 日是美国妇女在军中服役纪念日。美国国家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新的纪念邮票，纪念过去 220 年来曾在武装力量中服役或正在服役的 200 万美国妇女。这枚 32 美分的邮票上，五颗白色将星之下是五位戎装整齐的女军人，分别代表美国陆军、陆战队、海军、空军、海岸警卫队这五大军种。

10 月 18 日邮票的首发式，就在阿灵顿公墓。我们看见的，已经是首发式的第二天。但依然那么多的人。邮票总共发行 3700 万枚，过不了几天不用排队在各处邮局都能买到。这些美国人却偏要大老远地赶到阿灵顿来买。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灰蒙蒙冷飕飕的雨天，站在灰蒙蒙冷飕飕的雨天中一圈一圈地排那么长的队。

而且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排队。仔细看看周围与自己一样走向阿灵顿的人，有老人，有青年人，也有孩子。青年人多是夫妻，很多还是推着婴儿车来

的，在车顶上架起遮雨的凉棚；孩子们则多是有组织地来的，大部分乘着学校的大班车。来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大部分老人中又有大部分是老军人，特别是女性老军人。她们很多穿着过去的军装、戴着过去的军帽、胸前饰有过去的勋章、纪念章及军种标记；有的就戴一顶船形帽，但上面银星闪耀；还有一位中年女性，胸前的徽章表明她曾是 B - 52 女机师。她们买完了邮票，便在漫山遍野的墓碑中徜徉，不知是寻找自己的伴侣、战友抑或是子女？

潇潇冷雨中，一位全身穿迷彩作战服的上了年纪的女士，长久呆立于一段残破的墓碑前，绿色草坪衬托着她的苍苍白发，给人以至深印象。

在包林空军基地，我记住了身配大口径手枪的现役女军人。

在阿灵顿公墓，我记住了步履蹒跚依然全身迷彩装的退役女军人。

很现实、很实惠，却也很怀旧、很传统的美国人。有时候，他们的现实主义与他们的理想主义也会像面粉与酵母一样混到一起，然后蒸腾出一些包括他们自己也包括别人谁也说不出名字的什么东西来。

一位三星女将军

美国女兵走过了艰苦的历程。从最初的厨师、勤杂工、缝纫匠，到护士、接线生、播音员，也许今天才能说，成为了真正的军人。

以 220 年的时间为代价。以 200 万人的服役为代价。

1976 年国会通过法案，国家陆军军官学院（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院（安那波利斯海校）、空军军官学院可以招收女学员。这是美国女军人的一个里程碑。这意味着她们提供给军队的，将不再只是医疗卫生及后方勤务，她们将直接进入美军的作战行列与指挥行列，然后以职业军官的身份，逐步进入美军领导层。

在美国防大学，我们先后接触过两位女性上校：空军上校玛丽·麦卡莉，海军上校林达·兰茨。

负责接待来访的林达·兰茨上校与我们的接触更多一些。她办事作风细致，有条不紊，既会善意引导，也会巧妙拒绝，方方面面被她安排得对双方来说皆无纰漏，十分周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女性海军上校也是非常扎眼的。参观五角大楼的时候，周围不少不少美国军人纷纷给林达敬礼。有她的帮助和引导，我们竟然毫无阻碍地在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陆军部长和空军部长等美国军界要人的办公室门前合影。

林达却对她目前的地位不以为然。她提过另外一个女性：克劳蒂亚·J. 肯尼迪。

这是1997年美军的新闻人物。军事刊物冠以大字标题：“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因为1997年2月，克劳蒂亚担任了美国陆军部分管情报的执行副参谋长。3月，克林顿任命她为中将。这样她就成为了美国陆军史上首位女性三星将军。发布任命时，她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美军“21世纪部队”的实验基地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这位美国陆军史上首位女性三星将军1968年入伍。当时美国陆军里女兵的数量非常之少，至于女性将军则一个没有。“我还记得当时一些情况，”克劳蒂亚对记者说，“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在部队待多长时间，后来我担任了补充营的指挥官，那是我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充满挑战的时刻。”

就是因工作出色，她后来的由补充营指挥官升为通信情报旅指挥官。营与旅这两级主官的锻炼，为她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记者向她为什么能够成功，她说：“我认为忘我工作就是事情的全部。”在解释什么叫“忘我”时她说：“忘我是这样一种感觉：你之所以努力去做事情，仅仅因为那些事情是正确的，仅仅因为完成它们对军队建设有好处。有些时候，做那些事情对自己毫无帮助。但只要对军队建设有利，它就值得去做。”

谁是这些女将军、女上校的后继者呢？

想起认识的两个美国女孩。

一个是19岁的金安妮，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学生物专业，喜欢田野，喜欢骑马，学习间隙还兼大学附近运动场的马术教员。

坐她开的车，我开始真有点提心吊胆。在那条路面质量很高却弯道频繁、上下坡起伏很大的公路上，她把车开得飞快。我在一旁悄悄抽紧安全带，再用脚使劲蹬实座位前方斜面，她却仍然将左臂支在车窗上，左手托着下巴，边和我说话边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只用轻轻搭在方向盘下沿的右手操纵汽车方向。

她告我她不喜欢父亲的日本车，虽然省油，但马力小。她喜欢马力强劲的美国车。对面一辆深红色吉普呼啸而去。她兴奋起来，用手拍着方向盘说她就喜欢那样的吉普，马力大，越野性能好。

就是这个女孩，学校离家400英里（640公里），平时开车8个小时去上学。她一个月回一次家，回来就是一声“嗨！”家里人也不向她盘问路上有多么辛苦；住两三天返校，与家里人说一声“拜拜！”也没有人向她唠叨上路要

怎么小心。

倒是我把一脑袋疑惑倒给了她：轮胎扎了怎么办？汽车途中抛锚怎么办？遇坏人劫车怎么办？没汽油了怎么办？疲倦了怎么办？找不到地方吃住怎么办？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

她颇为吃惊地看着我，面对这么多怎么办，她一个也没有回答。看得出来，她没有想到这么多，也从未被这些头脑中的想法所束缚所吓倒。

这个喜欢田野，喜欢骑马，喜欢大马力吉普的美国女孩。

另一个美国女孩是阿利克西丝，16岁，中学生，小小的个子却已经拿到了正式驾驶执照。父亲下班一回家，那辆旧车就属于她。她会一阵风地把车开出去再开回来。那天晚上他父亲请我们吃饭，她也想带同学前往，但不知地点。她父亲随手扯过一张纸片画起来：走某某号高速公路，到某处出口下来，转某某号高速公路，再下来，走某某普通公路，红绿灯过后再开不到5分钟，公路左侧那家饭店。图画完了，她也明白了，接过父亲递过来的车钥匙，随手将那张纸片一团，丢进了纸篓。

那天晚上，我们坐她母亲那辆崭新的“本田”，行车40分钟才开到那家饭店。坐在餐桌旁我想这下完了，路这么远，又是夜晚，阿利克西丝肯定找不到地点。我又想起自己在北京上中学的女儿，独自回一趟奶奶家，坐地铁就可直达，我们还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然后一遍遍打电话，先通知母亲说孙女已经出发了，再询问母亲孩子到了没有。

而阿利克西丝的父亲自从把车钥匙交给女儿之后，根本不考虑她是否能找到地点这件事。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他仅微微一笑，耸耸肩膀不表态。

饮料刚刚端上来，阿利克西丝一手牵着她最要好的同学，一阵风一样卷了进来。

这些美国女孩。

也许在军队待得太久的缘故，我从独自一人连续开车8小时去上学的19岁的金安妮那里，想到了军人的长途奔袭；从夜晚变换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普通公路去寻找一个陌生地点的16岁的阿利克西丝那里，想到了军人的方位判定。

这些美国女孩的共同特点是行动能力强，独立判断问题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办事泼辣，不拖泥带水。她们似乎不过多考虑性别差异，没有太多地划分什么事是男孩的，什么事才专门属于女孩。应该说这是优秀女军人必备的

素质了。

但这两个女孩并不打算选择军事生涯。

不选择也无所谓。任何一个国家的女孩们的能力与素质，必然成为构成该国家未来女军人能力与素质的基础。

一个尴尬的难题

美国女兵发展史上有两大里程碑。

一个是1976年国会通过法案，国家陆军军官学院（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院、空军军官学院这三所培养正规军队初级军官的学院，开始招收女学员。

一个是1993年国防部长阿斯平取消禁令，美国女性军人可以加入各军种的作战行动。

应该说这既是美国社会兵源短缺的结果，也是技术进步提供了实际可能。战争的发展，武器的发展，已经使战斗行动由近距离的肉搏格斗变化为远距离的武器引导，由“200米内硬功夫”变为超视距的较量。现代空战已由令人眼花缭乱的斤斗横滚俯冲跃升，变为单调乏味的超视距目标跟踪与武器制导。地面格斗也由短兵相接令人热血沸腾的刺刀见红，变为隐蔽于复合装甲之后在电子屏幕前冷静地操作按钮。这种较量于膀大腰圆却头脑简单者不利，于精于训练且敏于思维者有利。

由此，女性军人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用武空间。

在等待指令的作战机器面前，没有性别。

但在平时的操作训练中，性别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1970年，美军中女性所占比例仅为1.4%，197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6%。然后就是1980年的8.3%，1985年的10%，1990年占到11%。现在则有将近320 000妇女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已经占到其武装力量总数的13%了。美国陆军甚至在阿拉巴马州麦克莱伦堡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女兵训练中心。

比例上升的同时是问题的上升。

诸多问题之中，最普遍、最头痛、最令人尴尬且最难以解决者，莫过于性骚扰。

美国防部1995年有过一个调查报告，宣称自1988年美军大力采取防范措施以来，虽然性骚扰现象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安现象。调查显示，4%的女军人承认在她们服役期间，曾经成为或几乎成为性强暴或强奸行为的牺牲

品。另一份调查显示，在陆军，61%的女性军人表示她们遭受过其他类型的性骚扰，特别是接到要求发生不正当行为的骚扰电话。当这一统计数字报到国防部的时候，国防部长威廉姆·J. 佩里正在为55%这一各军种统计的平均数字大为光火，认为女军人遭到性骚扰的这个比例实在不能容忍。

美国陆军参谋长雷默上将说，陆军将继续坚持男女混合编组的训练方式，同时要与性骚扰行为做斗争。但他又说，需要清楚地界定“性骚扰”这一概念，因为他也不十分清楚它的全部含义。雷默上将承认，在完成将女性军人真正融入军队这一复杂的一体化任务的道路上，性骚扰和不正当的性行为，是达到目标的主要拦路石。

虽然英武，却也颇有几分尴尬的美国女兵。

美国国防大学见闻

卡莱尔兵营与麦克奈尔堡：既相互傲视又共同继承

有人说没有到过纽约，不知道美国的大都市；没有到过宾夕法尼亚，不知道美国的乡村。在风景如画的宾夕法尼亚乡村中，有一个不大的城镇，是美军最老的军事基地之一：建于1757年的Carlisle Barracks。直译就是“卡莱尔兵营”。这里坐落着美国陆军的最高学府陆军军事学院。它是美军最老的院校之一，其资格仅次于建于1802年的西点军校。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南面波特马克河畔，有一块很大的三角地，这里是建于1791年的华盛顿兵营，现已改名为莱斯利·麦克奈尔堡。这里坐落着美国武装力量五大军种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这是1976年成立的美军中最年轻的院校。

访美期间我们发现，卡莱尔兵营的陆军军事学院与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这一新一老之间，既有共同继承，又互相傲视。

麦克奈尔堡的前身——华盛顿兵营原是陆军军事学院的院址。种种原因使得这个老资格的学院于1940年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军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华盛顿兵营恢复陆军军事学院。

但已经不可能了。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得跨军种的联合教育成为头等大事；其次，华盛顿兵营也已经以陆军著名的改革者、诺曼底登陆中阵

亡的前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名字命名为麦克奈尔堡。而这里于1946年建立了各军种的联合学院——国家军事学院与武装部队工业学院，成为美国国防大学的前身。陆军失去了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51年，才得以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兵营恢复失去多年的陆军军事学院。

大陆军的梦想曾经兴起在麦克奈尔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的陆军军事学院与纽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曾经是美军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

大陆军的梦想最终又破灭在这里。当二战后各军种的联合教育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陆军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精锐的教学科研力量和相当一部分教材留在麦克奈尔堡不能带走，成为后来国防大学的家底。至今美国国防大学内很多资料上还存有“陆军军事学院”的名章。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心想在整个军校教育系统中，把国防大学办成跨军种的“骄子”，但“骄子”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骄得起来。首先陆军就不卖这个账。哪怕国防大学除最初的国家军事学院、武装力量工业学院外，1981年又加进了设在诺福克的武装力量参谋学院，1982年连国防部计算机中心也归入国防大学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但陆军仍旧把卡莱尔兵营的军事学院看成自己的最高学府。在陆军系统中若想担任高级指挥职务，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国防大学的学历，而是陆军军事学院的学历。

即使在联合作战条令已经出笼多年的美国军队中，我们也看到，联合的道路何其艰难。各军种仍然将自己在联合机构中工作的军官，看成是本军种利益的代表。它们一直怀疑跨军种的联合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是否还能代表本军种的利益。

虽然卡莱尔兵营和麦克奈尔堡在互相傲视，但我们这些作为旁观者的，还是感受到了它们的很多共同点，尽管它们一个位于繁华的华盛顿都市，一个位于幽静的宾西法尼亚乡村。

最大的共同点，还是它们对美国军事传统，尤其是陆军传统的珍视。

在这两个军事基地内，我们看到军史陈列品遍及各处。几乎每一所建筑物的走廊都陈列有著名军事单位的军旗，著名将领、著名战斗、著名战场的大幅油画和照片，各个时期各支部队使用过的步枪、钢盔等军械，著名军事人物穿过的军服、军鞋，以及用过的手枪、望远镜、钢笔等物。这些物品保管得都很好，周围照明的灯光也很讲究，而且不管有没有人，从不关灯。一进入那些高大明亮的走廊，你立刻会感觉到仿佛进入了一个军事博物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军事人物与军事活动栩栩如生扑面而来。

在敬重战斗部队作战历史的同时，是同样珍视自己的院校历史。

卡莱尔兵营陆军军事学院和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都保存有建校以来每一届校长、全体教研人员和全体学员的名录和照片。国防大学更把这些名字都铭刻于铜匾上，挂在教学楼走廊两侧。在国防大学国家军事学院挂满两面走廊的毕业学员铜匾上面，介绍人员就分别从几处给我们找出了海湾战争时的参联会主席科林·鲍威尔 70 年代到 80 年代从校官到将官几次在这里学习的记录。在卡莱尔兵营，我们甚至能够查看到 1860 年毕业学员的名册和照片。虽然照片上那些人物早已不在，但他们年轻的形象在军事资料档案中永远保存。

说实话，当你凝视着那些早已泛黄的照片上英姿勃勃的形象之时，内心的确颇感震动。虽然你不知道这些人最终去向哪里、葬于何处，但你亲眼所见，他们在他们的军校永存。这种通过对人物的珍存完成对历史的珍存的做法，不能不令后来者深深感动。

这两个军事基地当时就给我们一个深刻印象：美国人其实也是很讲政治、很会进行传统教育的。他们把他们的骄傲和光荣形象地化解为一件件具体物品，通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物品，形成了一个不论你走到哪里，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军事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优良场所，时时刻刻都在强化军人的意识。

西点要塞与塞文堡：赛场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

纽约北面哈德逊河畔的西点要塞，是著名的西点军校所在地。

华盛顿东面安那波利斯市的塞文堡，是美国海军的“西点”：海军学院所在地。

1802 年 3 月 1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法》。该法案中一条在当时看来并非重要的条文——各兵种都应建立军事学院，却成为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依此诞生于西点，即后来人们说的西点军校。

海军的西点却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陆军拥有西点军校后，海军一直想像陆军一样，拥有一所自己的培养海军专业化人才的学校。但一苦于没有经费，二苦于没有地皮，幸亏后来遇上一位既有魄力又有手腕的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班克罗夫特曾任过短期的陆军部长，与陆军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出任海军部长后，与陆军协调关系就比别人方便得多了。1845 年，班克罗夫特下令将属于陆军的安纳波利斯塞文堡划

归海军。接着又命令候补军官都从海上返回，在塞文堡接受训练。1850年，正式定名为美国海军学院。

班克罗夫特圆了海军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海军也破例给这位文职官员以极高的荣誉。学院中心那座规模庞大的中心建筑被以他的名字命名，让世世代代海军军官和候补军官都记住这位海军学院的创始人。

纽约的西点与安那波利斯的塞文堡，是两个典型的充斥美军各军种间那种“好斗”与“老子天下第一”习性的地方。

在西点军校的教学楼和学员宿舍楼顶上，我们见到用黄色油漆写上去的非常醒目的大字：“GO ARMY”（参加陆军）和“SINK NAVY”（击沉海军）；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则同样在醒目处写有“GO NAVY”（参加海军）和“BEAT ARMY”（打败陆军）。

最初我们看见“击沉海军”“打败陆军”这些口号真觉得大惑不解：军种之间关系这样搞如何得了。后来得知，这是他们每年一度冲突激烈的美式足球比赛的口号。这项两校对抗的体育运动从1890年开始，本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一度成为全国的盛事，每年底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向费城，就为目睹一年一度的陆海军争霸战；更多的人则通过报纸、收音机、电视机关心两校比赛的结果。双方的胜败记录保留至今，谁都想在新的一轮赛事中战胜对手。久而久之，“打败陆军”“击沉海军”这些球赛啦啦队的口号，竟成为两个学校与各自军种荣誉密切相连的口号。在西点军校，学员们普遍将“ARMY OVER NAVY”（陆军胜于海军）作为口头禅；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我们看到从军人商店购物出来的学员，大大小小的包装袋上都赫然印着“BEAT ARMY”（打败陆军）。

美军的另一军种陆战队，就作战性质来说本来与陆军很接近，实际战斗行动中也与陆军配合紧密，但就因其最初出自海军，且每年从安那波利斯的塞文堡获得部分军官补充，所以陆战队军官申斥部下时，依然大声使用沿袭下来的习惯：“是回家还是去陆军？”

陆军与海军是美国最老的两个军种，从建军之日起，就分头担负向外扩张的任务。陆军向北美大陆的西部拓展疆土，成为建立大陆帝国的关键性推进力量；海军则拓展美国的海外殖民地，为美国谋取世界霸权扮演重要角色。也同样从建军之日起，两个军种之间争夺战功、争夺经费、争夺人才、争夺社会地位的斗争从未止息。

西点与安那波利斯的塞文堡之间互相想压倒对方的口号，一方面反映出陆、海军从建军伊始沿袭已久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看到，这种旧有的矛盾，正被用来作为培养军人团队精神的新跳板，军种荣誉感由此成为了军人荣誉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这种方式我们难以接受，但他们从初级军官就开始培养的这种争强好胜，以及通过大力渲染造成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的确在形成其军种之间生机勃勃的竞争精神。

当这种精神被导向扩张与夺占时，无疑就蕴含更大的侵略性。

在塞文堡的核心建筑班克罗夫特大厦前，我们看到一口东方色彩很浓、锈迹斑驳的青铜钟。那是为美国打开东方大门的海军准将佩里，1854年率军舰从琉球国王那里夺来的战利品。现在它作为美国海军的骄傲，立于大厦正厅门前。每年新学员入学、老学员毕业进出大厦典礼时，都要以整齐的队伍，从它旁边列队经过。这口钟加上它的征服者、其肖像挂于班克罗夫特大厦大厅内的佩里，不能不在这些青年军官或候补军官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当这些美国军人以此为骄傲迈步走向全世界的时候，给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带去的，决不是福音。

巴林空军基地和昆特克尔陆战队中心：说不定明天就人去屋空

巴林空军基地是华盛顿周围仅次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大型空军基地。因为我们每天在这个基地的军人餐厅就餐，所以除了直接感受到美国军人的福利待遇搞得不错以外，也看到他们一些有意思的规定。例如我们就餐的地方，各种食物种类多，价格低，但只能初级军官和士兵享用，美军的中高级军官不能进入这里。中高级军官的餐厅里，食物虽然与这里基本相同，但价格却要高一些。因为他们收入高，所以按照规定，他们已不能享受初级军官和士兵那样高的补贴。

一个周末休息日中午，我们在巴林空军基地餐厅里遇见一个来自南京的中国人。他身穿一身灰色工作服，神色疲倦，但对我们很热情。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生，90年代初赴美，现已定居，承担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和巴林空军基地的空调设备维修工作。那天他说了很多，一直陪我们到吃完饭。

他对美国没有太多好感，告诉我们华盛顿和纽约这样的城市都很乱，犯罪率高，不安全；他都不敢住在这里而住在马里兰州，每天开两个小时车来上班。对接触过的美国军人他也印象不佳，说军队里有人偷东西，包括巴林空军基地

这样戒备很严的地方，照样有人撬办公室，有人偷汽车上的音响，他估计“准是那些当兵的干的”。我们问他怎样评价这些美国兵，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美国兵可是不好当”。问为什么，他说这伙人到处称霸，真的是要打仗。头一天还在这儿好好地吃饭，第二天说不定就派到什么地方去了；别看他们生活好，待遇高，但心理压力相当大，随时要准备出动，到世界各个角落去管事。

他对美军的描述确是实情。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哈罗德就对我们说过，就是这个巴林空军基地，海湾战争期间基本上人去屋空，都到海湾战场去了。而且在别的军事基地我们也看到，这些美国军人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操场上，整天都在认认真真地操演战争。

地处偏僻、森林环抱的昆特克尔是陆战队大学所在地。在这个一般地图上根本查找不到的地方，一位名叫格罗夫的退役陆战队上校，给我们眉飞色舞地介绍过陆战队如何精锐、如何先锋、如何在全世界任何冲突中身先士卒，一个人说得神采飞扬。他说陆战队的战备程度中是美军中最高的。为了一旦总统有令能立即出动，一部分兵力常年在航空母舰上处于待机状态。因此在非常时刻“最先战斗”（FIRST TO FIGHT）是陆战队员的标准口号。

在昆特克尔这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水的陆战队教育训练中心，我们看见陆战队军官、士兵和学员，人人都是一身迷彩服、高靿作战靴，袖子挽得很高、帽檐压得很低，一副随时准备出动的架势。

应该承认，就“军队要准备打仗”这个观念看，美国军人的战争准备程度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很高的。他们的军队报纸和刊物天天聚焦于国际冲突的热点和潜在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怎样应付现实的和未来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他们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介绍新兵器，研究新战法，论证新编制，炮制新学说，只看那些文章主题，你会以为有人已经逼到了他家门口，他已濒临战争的边缘。

也许就是这些，形成了他们的军人中这个相当普及的概念：不管愿意不愿意，军人要随时准备听从派往任何地点的召唤。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美国军人，他们的确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世界上无论什么地区稍有风吹草动，他们都要紧张一阵。从被动方面说是出于担心，害怕自己或家人被派到危险的地方去；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期到处插手、到处干涉的经历，的确培养了其军人和国民很强的国家安全意识，及对相距遥远的国家与地区插手管事的意识。这种意识距霸权意识并非十分遥远。我们不

能将强权仅仅看作是几个鹰派领导人头脑中的产物，而忽略它赖以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

我们不称霸，而且还要反霸。反对霸权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还要国家强大，军队强大。而国家要强大，军队要强大，就决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待遇问题和资金投入问题。军人不崇尚国防意识，国民不崇尚国家意识，最终仍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印象

2000年初，为参加英国国防部举办的“国防与外交”国际研讨课程，我们两名中国军官进入设在伦敦西部斯文顿附近的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成为第一批在该学院学习的中国军人。

“先生，请立即离开大楼，附近有炸弹！”

万万想不到学习第一天，竟听到这句让人大吃一惊的话。

那是个细雨蒙蒙的日子，下午从课堂回来，发现罗伯特大楼前停有警车，还拉上了黄色警戒线，拿步话机的警察来回奔忙指挥，不让汽车和行人通过。一个园艺工悄悄说，前面发现了炸弹。说罢开着割草机匆匆离去。

有炸弹？我半信半疑。英国的安全据说首屈一指，伦敦警察从不带枪，与美国警察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更是世界闻名。皇家军事科学院位于伦敦以西150公里的乡村田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是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大批美国军队在这片区域完成向诺曼底登陆的集结与训练。从这里向南伸展到索斯伯瑞平原，军事基地林立，训练场和武器实验场林立，是英国陆军的核心区域，还有恐怖分子闯进来？

警察得知我们住在罗伯特大楼，勉强让通过。但只许进楼，不许去别处。

大楼内有很多人趴在窗户上张望。外面警车越来越多，警察越来越多。一位女警官跑进来说：所有人离开窗户，回各自住房！窗前有危险！从她紧张的神色和窗前人迅速离去的动作，我明白不是开玩笑，是真有炸弹了。看来它的威力还不小，能够将楼的一面完全摧毁。

谁放的炸弹？爱尔兰共和军？目标是谁呢？英国军官？还是来自世界其他

国家的军官？在屋内还未想出个究竟，有人急促敲门。一位全身迷彩装的年轻军官在门口敬礼：“先生，请立即离开大楼！请从后门走。附近有炸弹！”

天色已黑，寒风冷雨之中，后门站满了人。很多英国学员刚从运动场回来，短衣短裤，也无法进大楼换衣服，在门口挤成一团。

我从后门悄悄绕到前门，只见红蓝警灯交映之中增加了很多穿防弹服的军人。一台机器人已经调整完毕，闪烁着红色和橘黄色信号，在指令下开始缓缓朝前移动。另一台机器人正由警察和军人七手八脚地从车上卸下，开始调整。皇家军事科学院进出的大门被封锁，挡在外面的军官被告之，里面进入“紧急状态”。

各栋建筑中疏散出来的人被领进一个简陋的礼堂。椅子不够坐，很多人靠墙站在两侧。我们的“国防与外交”国际研讨班总负责人泰勒教授，还有下午刚讲完“集体防务与国家安全”的贝勒梅博士皆夹在人群中靠墙站立，与普通“难民”毫无二致，讲台上的风采一扫无遗。

嘈杂声中，一位手握指挥杖的年长军人威风凛凛走上讲台，嗓门惊人洪亮，一句“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注意！”便有效控制住全场。他在台上大声讲话，来回踱步，权威性不容置疑。挤在台下的男女学员们、军官们和学者教授们鸦雀无声，听他介绍事件处理进程，服从他安排调度。其指挥若定的架势与威严的语气令我顿生直觉：此人定是附近驻军的准将旅长。

那真是一个奇异的夜晚，最后也一直未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第二天弄清楚两件事：

第一件是那枚被清除的炸弹并非来自恐怖主义组织，而是一个失恋军官报复情敌，将炸弹置情敌轿车的后备箱内；未料到开车的不是情敌而是前女友，这辆车开到皇家军事科学院后他终于良心发现，打电话告之车内有炸弹，让众多部门紧张忙碌了大半天。

弄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晚间礼堂内那位威风凛凛、指挥若定的军人其实不是军官，更非什么准将旅长，而是皇家军事科学院的总军士长。第二天为“国防与外交”班全体军官照集体相，他又站在那里，很权威、很准确地调度我们每个人的站立位置，然后理所当然地坐在了第一排正中总负责人泰勒教授的一侧。这种军士长制度、他们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这起炸弹事件还是使英国人大大地丢了面子。当晚对国际研讨班的欢迎酒会也被迫取消，成为各国军官谈论的笑柄。第二天上课路上，马来西亚军

官桑德指着路边一个遗留的橘红色塑料袋大声说：“小心，炸弹！”周围人都哄堂大笑。英国人后来再不对我们提及此事，显然不想在人们心中留下太多印象。

他们丢了面子，其实他们也挣了面子。从接到报警到建立警戒线直至机器人出动清理炸弹时间之短，可见其对紧急事态反应的迅速与敏捷；快速疏散中的有效组织与周围人员的协力配合，又见其安全观念深入人心；寒冷中男女学员穿单薄运动衣裤困于礼堂内却无人牢骚满腹，面对突发事件更没有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人只待来自权威方面的解释，更见其教育训练之有素。

一枚汽车炸弹使他们的弊端和优势都展露无遗，成为我们在皇家军事科学院第一天的意外收获。

“那里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包括美国人”

皇家军事科学院的学科设置类似五彩拼盘。英国军人既在这里学发动机，学传感器，学计算机，学车辆技术、装甲技术和火炮技术，研究新型火药、新型防护材料和精确制导，也在这里学习联合作战条令，研究防务管理，探讨全球安全。它既是英军一流的技术开发中心，也是英军一流的战略研究中心。

它的最大财富，是拥有两批非常突出的人。

一批人在我们面前极其熟练地拆卸手雷，组装肩扛式地空导弹，详尽地分析英军“勇士”型步战车与俄罗斯 BMP-2 步战车的优劣长短，爬到挑战者 II 型主战坦克上如数家珍一般介绍其复合装甲的防护能力、火控系统的远程精确射击能力和破甲穿甲能力，将各种兵器玩得烂熟。

另一批人则穿梭来往于国会、国防部、外交部等重要机构和北约、欧安会等区域性军事政治组织之间，不断变换语言，使用德、法、俄、西班牙语参加国际会议，与各个国家和各种肤色的人交流，研究国际安全形势，探讨英军未来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

在皇家军事科学院内，这两批人都很强。两批人结合在一起，形成搞技术装备者对英军的发展方向十分清楚，搞战略研究者则对英军现有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十分清楚。如果你在学术报告厅倾听专家分析英国加入欧元的利弊时，外面传来试验新型火药的爆炸声也一定不要吃惊，在这里，战略前瞻与技术创新集于了一身。

在这所综合程度很高、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军事院校内，令人印象深刻的还

有一点：它最开放的地方与最保密的地方都和计算机紧密相连。

最开放的地方是计算机中心。中心内 200 台计算机全部上网，三分之一入普通网络，三分之二入保密网络，每一个在这里学习和研究的人都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权限选择使用。中心 24 小时连续开放，虽然下班后里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任由凭磁卡出入的学员用计算机查询信息，收发电子邮件，用里面的设备扫描打印或复印，但依旧秩序井然。

最保密的地方是作战模拟中心。该中心运用计算机技术描述英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和主要作战地域，推演冲突与战争发展过程，评价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每年都有一批批英国中、高级军官进入那个神秘的地下建筑，在计算机模拟环境中感受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与战争，完成未来作战的轮训。那里防范极严。在作战模拟中心上面的建筑内工作的马修斯教授对我们说：“那里从来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包括美国人”。

英国人能够对他们万般依赖的美国人也拿出这种气魄？我表示怀疑。

“科索沃之后的世界，再不会回到科索沃之前”

两个月学习，回响在耳边最密集的词汇就是“KOSOVO”（科索沃）。讲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开始，最后一定要讲到科索沃；讲国家史和国际关系史，最后也是科索沃；讲 20 世纪意识形态，最后还是科索沃。新军事革命、不对称冲突、国际法、联合国与多国维和，最后统统是科索沃。学员之一、科威特准将哈利德·萨巴气愤地私下说：“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整天都是科索沃！”

英国人并非那么如愿。一直到国际研讨班结束，大家都记得第一周发生的那次课堂提问。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英国海军上校海因斯博士给我们上课。这位大胡子高个子的哲学博士不修边幅，甚至不顾及白色海军服已经出现了几分肮脏。他表情十分丰富，语言也十分生动、幽默而且自信。在分析完科索沃战争难以避免的种种原因后，他突然对全体学员提出一个设问：北约空袭南联盟正当还是不正当？你们怎么看？认为是正当行为的请举手。

情况突然，等大家都缓过劲来，才发现讲台下坐着的来自 26 个国家的 30 名学员，无一人举手。这个结果别说海因斯博士没有想到，学员本身也始料未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突然都笑起来。

有点尴尬的海因斯博士又问了一句：那么认为这场战争是不正当的，请举手。

这一下，举起了如林的手臂。虽然不少军官来自刚刚加入北约或正在要求加入北约的国家，还有一些来自穆斯林国家，但在科索沃问题上观点如此一致，对所有人的震动都很大。海因斯博士这回是真愣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才说，他本人一直在担心科索沃冲突的后遗症，现在他真实地看到了，这种担心不是想象，而是现实，他一定会将这个结果长久记忆在心。

全班只有一个学员——英国陆军的戈登准将气得满脸通红，事后一个劲指责与抱怨海因斯博士不应该这样提问，弄成这样的局面。

当然，不管我们如何受到这次课堂表决的鼓舞，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科索沃之后的世界，再不会回到科索沃之前。尽管听课者中普遍存在对北约在科索沃军事行动的不满，但光凭反感，难以抵挡西方国家的新一轮扩张。新一轮军事改革正在英国国防部、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和地面部队司令部酝酿开展。他们认为军队角色已经出现重大转换，以武装维和为核心的强制和平，加上“人道主义援助”甚至“灾难救助”等等，将成为未来西方国家军队的主要任务。在这一新形势下，武装力量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作用，依此进行重组。核心是要适应干预角色，提高干预能力，缩短部署时间。

同时还要扩大干预队伍，为扩大干预队伍又需要实施干预。

马丁·斯柏勒准将曾任北约驻罗马尼亚总代表，他在课堂上绘声绘色给我们讲述如何按照北约的标准，完成对罗马尼亚军事体制的改造。三万军官顶多只能剩下一万人。罗马尼亚军队自己的东西只能在初级院校使用。指挥与参谋学院必须全部使用北约的条令和教案，而且用英语教学。罗马尼亚必须建立“负责的防务政策与体制”。斯柏勒准将指责完当地的种种问题后说：“我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忠告，如果罗马尼亚人不喜欢我，可以让我回家。”

问题是谁敢让他回家？罗马尼亚军官马里安·布素曼平时谈锋甚健，有点目空一切，特别爱在小国穷国的军官面前表现优越感，当时却像一株被霜打蔫儿的庄稼，呆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噤若寒蝉。那场课大家听得很安静。有提问，但不热烈；有鼓掌，但不真诚。很多学员来自将被北约改造的东欧国家，惺惺惜惺惺，听着别人的处境，疼在自己心上，都不那么舒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机器动如此大的外科手术，冷战期间苏联对华约组织诸国似乎也未曾如此。

两个月学习，耳闻目睹大量事实让人深深感到，科索沃战争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培养皿，成为北约诸国构造新的国家关系框架、新的国际政治学说、新的武装力量职能与作用理论的营养源。围绕这场冲突与战争，北约国家内部正

在开展一场思想理论上、社会舆论上和军事组织上的转变。对这种转变尽管目前也有争论，也存在摇摆，但大的方向已经难以更改。隐蔽于其内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尽管科索沃战争实践并未使北约将干预范围扩张到欧洲之外，但其安全概念和干涉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人道主义”旗帜下的武装维和正在成为他们插手别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的主要手段，成为他们主导世界的主要手段。虽然科索沃的战火已经熄灭，北约用军事力量构建秩序的行动在欧洲告一段落，但它在思想意识领域构建秩序的行动却刚刚开始。在完成舆论准备、政策调整和实力组织之后，北约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应该警惕和准备。

八、民族之魂

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之时的精神历练与灵魂展示。

我们中国人

这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讲述的六十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当时还是个孩子。那天事情很突然，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区委干部和区小队来不及走脱，都混在群众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鬼子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土地上。

人们问老人，当时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怕？

老人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升华夸张，不会形容比喻，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的伙伴，没有谁认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没有谁觉得自己就是英雄。他们凭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得出一个棒子面窝头一样朴实无华的结论：“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上膛的三八大盖和雪亮的东洋指挥刀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感慨不已。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个村，少不了打架斗殴，互相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日本机枪和塞过来的日本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概念上，他们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那一代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

已的血脉，这个民族怎能堕落，怎能被黑暗吞没。

老人偶然想起了这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自然无奇。他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事应该让写书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的、写电影的也没有哪一个知道，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小村子里，人们每每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感佩不已时，却无一人觉得身边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万分感慨。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赚了几把钞票、开上一辆轿车、揣上一张绿卡，便以为成了可以傲视同胞的英雄。这些人不会知道那一千多个孩子的故事。

六十多年时间过去，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作北贾璧的村子里，当年的孩子们长成了与他们父辈一样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电视，比比那些夺金争银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正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在大山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无名烈士墓·界碑·国徽

什么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心理、观念、习俗、信仰、规范等方面的群体意识、风貌和特征。

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受威胁程度的界定。

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前者是对民族观念意识的高度凝练，后者是对民族生存质量的基本评估，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相互之间存在多少联系？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的异国风情，而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这位团长告诉我，那场景使他深受震动。

他慢言慢语的讲述不知不觉中仿佛变成一支画笔，在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之间，把那个场景凝聚成了一幅嵌入脑海的俄罗斯油画。

我与那位团长讨论：3岁到5岁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会在烈士墓前流泪。关键是老师流泪了，他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进而又想：一个民族，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其未来之精神素养该是何等强大。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国家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们那些珍贵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丢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内核。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新婚的夫妇联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这就是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虽属不同范畴，却在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复交汇。民族精神中的某些核心要素，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精神支柱。

人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有效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必须划拨一定比例的军费开支，必须颁布一系列相关的国防法律法规，必须开展国防教育和在适龄青年中例行军事训练，如此等等。但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关注那些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难以企及、不是今日投入明日就能产出从而取“立竿见影”效果的隐形要素。

其中的核心，即是民族精神的养育。

养育民族精神，关键不在孩子，而在老师。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老师除了个人痛苦或个人幸福便不再为其他事物动情流泪，怎么期望他们教育的孩子能够把奉献与忠贞铭刻在心？如果民族崛起仅仅意味着物质发达和经济腾飞而不包括精神凝聚与思想升华，这样的崛起进程又能坚持与支撑多久？联想到我们有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开始把《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课文从小学课本中转到辅导读物里去，联想到分数指标今天几乎在所有关键场合成为判定孩子素质的决定性指标，联想到曾有海外评论称我们的留学生“ABC很好（外语好）、XYZ很好（数学好）、懂得美元英镑（有经济头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基本没有看过《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这样的设问并非杞人忧天而不能成立。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不仅需要有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物质生产等方面形成的物质力量强大，还需要有思想独立、精神养育、文化陶冶等方面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强大。如梁启超所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

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精神衰落的民族会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个不能构成自己核心精神内核的民族会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同是那位边防团长，在抚远三角洲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处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情。他指着黑龙江畔的3号界碑说：“界碑上的国徽经常丢失。”我奇怪地问：“国徽怎么会丢呢？”他说：“国徽是铅做的，被人偷去卖钱了；发现国徽不见了，做一个再镶嵌上去，过几天稍不注意，又丢了。”

我当时觉得无言以对，后来觉得无地自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是要有一些不能亵渎的神圣之物的，必须是要有一些只能供奉的精神图腾的。如果连国旗、国歌、国徽这些物化的民族精神象征都不能令我们产生敬畏、产生为维护其之纯洁而英勇奋斗的冲动，什么都可以作价、什么都可以叫卖、什么都可以出让，这样的民族，还怎么去谈别人的威胁、怎么去谈自身的安全？

当然我百分之百地明白，国徽偷窃者只是极少数。即使把偷窃者、收购者、回炉化炼者这“一条龙”操作的人都算进去，人数也不会很多。但如果我们就此获得自我原谅和自我解脱、轻看这些行为和意识对民族机体和民族精神的毒化、轻看这种金钱至上个人利益至上其他统统可以弃之不顾的精神倾向，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现在一些人只要能赚钱，什么假烟、假酒、假药都可以去做，什么假广告都可以接，坑骗自己的同胞连眼皮都不眨一眨；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有些人身为国家公务员却暗中出卖国家利益，身穿军装却暗中出卖自己掌握的军事情报，只要能满足个人私欲，什么良心谴责、道德震慑皆不在话下，最终连自己的灵魂都能出卖的精神堤坝崩塌现象，还不令我们触目惊心吗？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这两个“前所未有”前面，能不能开拓新的精神流向，能不能建立新的精神家园，能不能养育并坚守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保证国家安全、发展从而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屈原在其名篇《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民族精神的养育也是这样。精华之物，必须采集天地间精华才能陪护。我每每

被天安门前不论风雨都如涌如潮观看升旗仪式的人群深深感动，被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立正敬礼的花儿一样的少先队员深深感动，被步履蹒跚却向迎风飘扬的国旗脱帽鞠躬的白发苍苍的老者深深感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就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养育中铿锵形成的。

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一个失去自尊的民族，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在公园门口悬挂“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告示的时代，在国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失去自尊的同时失去安全从而任人宰割的切肤之痛，今天也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当大清王朝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之时，一些官员不以割地赔款为耻，反以未让列强使者走正门，而让他们走了太监和用人使用的偏门为乐，除了十足的“阿Q精神”之外，还谈得上半点民族自尊、谈得上以民族自尊维护民族安全吗？

这反倒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对弱小民族来说，这种历练和展示显得尤为严酷。

以古老的充满苦难的犹太民族为例。

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大肆杀戮，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该城堡有储存的粮食和淡水，易守难攻。旋即而至的一万五千人的罗马军队，对坚守在里面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967人——整整围攻三年。公元73年4月15日马萨达陷落前夕，犹太人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十名勇士作为自杀执行者，随后这十人再抽签选出一人杀死其他九人。剩下最后一人的最后任务，是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清晨，冲进城堡的罗马人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面对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但没有一个生命的死城。

据说殉难前夕，守城领袖Elazar Ben-Yair有一段著名演讲：“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也是最后失去这个抗争的民族。天亮时我们将不再抵抗，感

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所爱的人一起高贵地死去。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马萨达是犹太人的最后一个城堡，陷落之后，该民族的足迹从迦南之地消失，开始了千年的流离失所。他们以这样悲壮的自尊，上演了自己命运中最艰难的一幕。尽管我怀疑 Elazar Ben-Yair 演说的真实性——守军集体自尽，谁能够记录下它然后传播开它呢？但我不怀疑马萨达是犹太人生命力的凤凰涅槃。他们把集体自尊表现得如此刚烈，证实这一真实的不是激动人心的语言，而是淋漓的鲜血和骄傲的生命。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多少个民族在被其他民族征服、奴役和驱逐后整体消失了，而犹太民族没有。这个民族失去家园一千多年而不溃散，不成一盘散沙，在经历亚述屠杀、罗马屠杀、希特勒屠杀之后，最终仍然能够聚拢为一个国家，没有以超强的民族自尊构成的强大精神底蕴，绝无此可能。

这是一个小民族表现出来的集体自尊。其人数之渺小与自尊之刚烈形成的反差如此巨大，恰恰给什么叫民族自尊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定义：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这种意识与习性完全不是崛起者和暴发户的自我炫耀，完全不是失意者与落魄者的自我解脱，而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命运的执着与坚守。如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就是民族自尊。没有了民族自尊，还谈什么民族精神；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才能最终实现民族自强。

我们中华民族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不仅有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不仅有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把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尊和自信不仅仅是语言，更是行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朝鲜半岛战火烧到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了新中

国的自尊。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

一位日本教授感慨道：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这就是新中国的自尊。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一直把中国人的爱好和平看作是软弱可欺，任怎么声明也无法扭转这一印象，朝鲜战争之后不用了。当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新中国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决心了。民族自尊这时候才像一面旗帜那样高高飘扬起来，成为捍卫国家安全的精神长城。

让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当年几乎被斩尽杀绝的弱小民族。

今天出耶路撒冷东南，沿死海海岸驱车数十公里，就能远远看到那座拔地而起、被两千年岁月风化的马萨达城堡。普通游客可以坐缆车上去，以色列学生则被要求沿古栈道一步步往上爬，然后像我们中国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样说一句“我登上了马萨达”。以色列军队新兵入伍的第一课也是行军赶到这里凭吊，然后庄重默念出他们那段著名誓言：马萨达再也不会陷落。

犹太民族寻到了自己的精神城堡，并以它作为捍卫安全的精神柱石。

不乏辉煌也不乏苦难，进入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可借以为鉴。

海纳百川·壁立千仞

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静态恒定之物，从来是在动态中不断变化演进的。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这一变化演进过程更加特殊：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余年中国国家安全的追求可用“救亡”二字概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召唤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直至五星红旗高高升起，这一使命才算告一段落。

——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50年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三步走”第三步目标、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100年中国国家安全的追求可用“发展”二字概括——“落后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次使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奋斗不止。今天仍然是我们尚须长期奋斗的目标和使命。

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百年沉沦、百年复兴、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陶冶和磨炼。有人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其实站起来与富起来本应是紧密相联之物。不站起来，富起来的意义在哪里？不富起来，又如何能够真正站起来？如果说站起来是救亡的基本追求的话，那么富起来就是发展的必然结果。站起来、富起来，成为20世纪至21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生长地和滋养源。

一百多年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当先进的中国人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也被注入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与包容。中国历史上从未像近代现代这样，全世界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在这里交汇、实践、接受检验。

孙中山说，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求解放、求发展的思想，在中国获得广泛的运用天地。如果不是如此，纵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会自然而然进入中国并且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与有些人一提民族精神就以为狭隘、以为排斥、以为唯我独尊截然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走出去、请进来，博采众长，广泛利用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广泛吸收其他民族创造的积极成果，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建设与发展成就。

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脱离世界潮流的封闭、停滞、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而落后必然要丧失安全，最终丧失生存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海纳百川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胸怀，更展现一个民族的视野。

如果说开放就进步、封闭就落后是一个被历史证明的真理，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日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谁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谁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海纳百川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国际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迅猛发展的今天，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新焦点，也是新世纪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安全的命脉所在。

遍布世界的“MADE IN CHINA”证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 380 飞机”的现状。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由此出现“中国开到美国的船都是满的，开回来时都是空的”现象，出现中国虽然是波音公司最大客户，但该公司的核心技术决不向中国人展示——“你们看不懂也没有必要懂”的现象。如本世纪初斯宾格勒的预言：20 世纪末“科学将变得更加傲慢与更不宽容”。另一方面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核心技术的缺乏、创新能力的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不足和对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不足，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缺憾。就产业看，在纺织品、家用电器、汽车直到电脑、数码产品等领域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国家，但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设备，尤其是其中关键设备与核心设备基本来自国外；就技术看，我们的技术专利较多地集中于轻工业品、家庭日用品等技术含量较低的领域，与国外专利集中于有机化学、信息技术、航天技术、超导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相比，差距很大。

有学者形容“技术是木桶的底，其他因素都是木桶的帮，没有桶底，桶帮再高也没用”，的确说出了别人今天用来制约我们的王牌和要害。市场经济最终有两个主宰：一是市场，二是技术。虽然技术本身不是市场，但技术可以垄断市场。没有技术，最终没有市场。技术不平等，正在成为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不平等。一个国家如果不改变生产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的依赖状况，不但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不利地位，而且还难保不成为别人的“技术殖民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许这是最不知不觉的“温柔一刀”，甚至想不起来要去唱“到了最危险时刻”。

由此可见，仅仅有海纳百川的学习借鉴与包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仍然不会如柳暗花明一般自然实现。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民族精神被注入的全新活力，就是她具有的“壁立千仞”作用——坚定地发展民族支柱产业，坚决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坚持不懈地掌握技术专利。已经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华民族，要真正做到强起来，不仅需要通过海纳百川广泛学习借鉴，更需要像当年研发“两弹一星”那样使中华民族能够壁立千仞。

1956 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

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间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伟人已经远去，后人必须加紧努力。完成这一使命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在需要，又具有世界发展大潮进逼下的时代紧迫性；既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要求，又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抉择，更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在此过程中，铸造新世纪中华民族之魂。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振兴

2000年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第一周要选两名学员介绍各自国家的基本状况，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队和国防等等，选谁不选谁，由抽签决定。

抽签的结果，我被排在第一。

面对那些投过来的兴奋目光，我知道大家感兴趣的，不仅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更因为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国家。虽然班里的30名军官来自东欧、西欧、中东、南美、东亚及南亚等26个国家和地区，但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他们很想听听中国军官如何阐释他们的社会制度。

有好心人劝我回避难点。捷克军官米洛斯·罗德维尔悄声对我说：何必真照要求的那样，讲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其存在理由；反正规定时间有限，讲一下国家的人口、自然面貌、物产和风土人情时间就到了，政治问题你可以绕开。

我知道罗德维尔中校的好心，他怕我为难。我也知道如果想回避的话，确有空子可钻：按照统一规定，发言时间被限制在12分钟内。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成就，只要把一些图片摆上去，把一些数据列出来，也就足以引起惊叹、把时间填满了。

但我更知道其他人的期待。很多学员最大的期待，恰恰是要我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清楚中国与他们大不一样的“政治性问题”：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

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站在讲台上，我只用那些最简明直观、哪怕对中国一无知的人也能够理解的事实，回答这些“为什么”。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半殖民地、半封建，任西方列强入侵、掠夺、凌辱；20世纪末，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连接世纪初与世纪末这百年沧桑的，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台下听得非常安静。多数军官来自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中国的命运，很多国家现在仍然在受别人的控制。说中国经历的屈辱，他们有同感；说中国现在的成绩，他们由衷赞叹。最初被认为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

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这些面孔有黑色的，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虽然他们生活在我们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但当你不绕弯、不躲闪、单刀直入只用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理解了你想表达的意思。

对我这12分钟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这次经历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什么比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呢？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紧迫课题：救中国与发展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000名英军、7200名法军就可以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不但开辟了空前的割地赔款，更使满清王朝经营30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获得发展的美梦彻底破产。

当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两个命题，满清王朝一个也完成不了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加速自己的覆灭命运。正因如此，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也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为口号，令延续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轰然倒塌。

推翻满清创立民国，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抢掠的现象，并未因满清王朝的崩溃而结束。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曾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

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了，国民党政权又先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军以19000的兵力就敢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兵力就敢对10余万兵力的二十九军发动七七事变，除了“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权再做不出其他解释。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表演一番，但有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面前，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地衰落和多么地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灾难。一百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无穷无尽的灾难中走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震惊中外的艰苦卓绝奋斗向世界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又是共产党人的坚决行动。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破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

有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气十足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陆之后，他之所以敢于指挥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全力挺进，就是根据一条坚信不移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至于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推即垮一碰即倒的形象，是其头脑中反复叠现的参照。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推动美国战争决策者实行占领朝鲜全境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敢于向国内一切腐朽的旧势力宣战，而且敢于挥师入朝作战的壮举。一百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与退让，选择了坚决抗争。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认识到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六十余年来，包括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也包括用“一国两制”方式完成香港、澳门的和平回归并继续保持两地的繁荣，证明的都是一个道理：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坚

决、最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是救中国，并在此过程中实践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个道理，那么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则是发展中国，并在这一过程用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就是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99年增加20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7位。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之时，12天创造的产值已经等于1952年全年的产值。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现在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以及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1999年达到1580亿美元，2000年更达到1656亿，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20世纪末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已于1995年提前实现。这种巨大历史的进步证明着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中国获得如此高速的发展。

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台上，与其说我在解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如说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救亡和发展这两个命题，给其他国家的军官留下深刻印象。下课后菲律宾的加维尔上校把我拉到一边，一定要合影留念。印度海军中校卡夫打听到我的住地和房间号码，晚上专门赶来，送给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他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匈牙利的斯潘克斯上校在我房间坐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他的叔叔曾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后移居国外，现在看见匈牙利这个样子，也不想回来了。他最后说：我们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希望你们坚持下去，相信一定成功。

与他们相比，我们确实值得庆幸。历史对中国是严峻的，也是宽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亡与发展之路。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u5fc3\u80dc_13328550.zip",
  "filename_decoded": "\u5fc3\u80dc_13328550.zip",
  "filesize": 78940397,
  "md5": "cf4c8d66413c27f2d4b494d7e86665b3",
  "header_md5": "89dc8397807b67864ac49dc6f68db60f",
  "sha1": "387cc2808ae6b4e23591aa1422b7b5a3950cdd2e",
  "sha256": "e80705cbc08517fb517cf8e94b58780b69330b8b23170cf2fc408416416da6c4",
  "crc32": 167312474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88317462,
  "pdg_dir_name": "\u2568\u2500\u2569\u00f1_13328550",
  "pdg_main_pages_found": 308,
  "pdg_main_pages_max": 308,
  "total_pages": 312,
  "total_pixels": 16004651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